

地缘政治的基础

——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

亚历山大·杜金

第一部

(俄文原版于 1997 年出版)

校译自俄、英文网络版 lwzhou 2023.2
(版权属原作者，侵权删)

目 录

	俄文版页码 (正文行间)	本书 页码
编者的话	7	10
前言	9	12
“地缘政治”的定义	9	12
制陆权和制海权	11	13
地缘政治目的论	13	15
边缘地带和“边界地带”	14	16
地缘政治是命运	16	18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奠基者	18	20
第 1 章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 国家作为空间有机体	18	20
1.1 教育：德国“有机体学派”	18	20
1.2 国家作为生命有机体	18	20
1.3 空间：土地的政治组织	19	21
1.4 扩张法	20	22
1.5 世界大战和海洋	21	22
第 2 章 鲁道夫·契伦和弗里德里希·诺曼 —— “中欧”	22	23
2.1 新科学的定义	22	23
2.2 国家作为一种生活形式和德国的利益	22	24
2.3 走向中欧的概念	23	25
第 3 章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24	25
3.1 科学家和政治家	24	25
3.2 历史的地理枢纽	24	26
3.3 俄罗斯的关键地位	26	27
3.4 三个地缘政治时期	28	29
第 4 章 阿尔弗雷德·马汉 “海权”	29	29
4.1 海权	29	29
4.2 海洋文明 = 贸易文明	29	30
4.3 征服世界 美国昭示天命	30	30
第 5 章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 “法国对抗德国”	33	32
5.1 法国地理图景	33	32
5.2 可能性论	33	32

5.3 法国主张“海上力量”	34	33
第 6 章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 “麦金德的修订，中心性 ‘边缘地带’”	34	34
6.1 为美国服务	34	34
6.2 对麦金德的校正	35	34
6.3 力量规模	36	35
6.4 中部洋	36	35
6.5 美国胜利的建筑师	37	36
第 7 章 卡尔·豪斯霍弗 “大陆集团”	39	37
7.1 战争与思想	39	37
7.2 欧亚新秩序	40	38
- 1 -		
7.3 与海洋统治的妥协	41	39
第 8 章 卡尔·施密特 “巨兽贝希摩斯与海怪利维坦”	43	40
8.1 保守革命	43	40
8.2 大地的法	44	41
8.3 陆地和海洋	44	41
8.4 大空间	45	42
8.5 全面战争和 “游击队” 形象	46	43
第 9 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萨维茨基《欧亚大陆中土》	48	44
9.1 欧亚大陆的命运	48	44
9.2 俄罗斯-欧亚大陆	48	45
9.3 图兰	49	46
9.4 地区发展	50	47
9.5 意识形态管制	51	48
9.6 苏联和欧亚主义	52	48
第 10 章 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地缘政治	54	49
10.1 行星二元论地缘政治基本规律	54	50
10.2 地缘政治家不能不参与	54	50
10.3 科学家的命运 权力的命运	56	51
第二部分 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与学派（二十世纪下半叶）	58	53
第 1 章 概述	58	53
第 2 章 现代大西洋主义	61	55
2.1 斯派克曼 D.W. 的追随者梅尼格、W.柯克、S.B.科恩、 K.格雷、G.基辛格	61	55

2.2 大西洋主义者赢得了冷战	62	56
2.3 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	64	58
2.4 近期大西洋主义的两个版本	66	59
2.5 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新大西洋主义	67	60
第3章 世界主义	70	62
3.1 世界主义的史前史	70	62
3.2 趋同理论	72	64
3.3 西方的行星胜利	72	65
3.4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73	65
3.5 雅克·阿塔利的“地缘经济学”	74	66
3.6 桑托罗教授的灾难后世界主义	75	67
第4章 应用地缘政治	77	68
4.1 “内部地缘政治”的伊夫·拉科斯特学派	77	68
4.2 选举“地缘政治”	77	69
4.3 作为“地缘政治”因素的媒体	78	69
4.4 地缘政治史	78	70
4.5 “应用地缘政治”而非地缘政治	79	70
第5章 欧洲“新右翼”的地缘政治	80	71
5.1 百旗欧洲 阿兰·德·贝努瓦	80	71
5.2 欧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都柏林 让·蒂里亚特	81	72
5.3 在大陆上思考 乔迪斯·冯·洛豪森	82	73
5.4 欧亚帝国的终结 让·帕尔维列斯科	84	75
5.5 印度洋是通往世界统治的道路 罗伯特·斯图克斯	85	76
5.6 俄罗斯 + 伊斯兰教 = 拯救欧洲 卡洛·泰拉西亚诺	86	76
第6章 新欧亚主义	88	77
6.1 欧亚热情 列夫·古米廖夫	88	77
6.2 新俄罗斯欧亚人	90	79
6.3 迈向新的两极	92	81
-2-		
第三部分 俄罗斯和空间	94	84
第1章 心脏地带	94	84
第2章 边缘地带问题	94	84
第3章 帝国的集结	96	86
第4章 温暖和寒冷的海洋	98	87

第四部分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	100	89
第 1 章 需要激进的替代方案	100	89
第 2 章 什么是“俄罗斯国家利益”？	102	90
2.1 今天的俄罗斯人没有国家	102	90
2.2 “后帝国合法性”的概念	103	91
2.3 俄罗斯人民是地缘政治概念的中心	105	93
第 3 章 没有帝国，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	109	96
3.1 俄罗斯人中没有“民族国家”	109	96
3.2 帝国的俄罗斯人民	110	97
3.3 “区域大国”的陷阱	112	99
3.4 对苏维埃国家地位的批评	114	100
3.5 对沙皇国家地位的批评	117	103
3.6 迈向新的欧亚帝国	120	105
第 4 章 重新分配世界	123	107
4.1 陆地和海洋。共同敌人	123	107
4.2 西轴：莫斯科柏林。欧洲帝国和欧亚大陆	125	109
4.3 莫斯科东京轴心。泛亚项目。到欧亚三边佣金	130	113
4.4 轴心国莫斯科德黑兰。中亚帝国。泛阿拉伯计划	135	118
4.5 多帝国的帝国	140	122
第 5 章 俄罗斯在欧亚帝国的命运	142	123
5.1 出于国家目的的地缘政治魔法	142	123
5.2 俄罗斯民族主义。民族人口学与帝国	144	125
5.3 即将到来的胜利后的俄罗斯问题	147	128
第 6 章 帝国的军事方面	150	130
6.1 优先考虑核能力和洲际能力	150	130
6.2 大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武装力量？	152	132
第 7 章 技术和资源	156	134
7.1 技术赤字	156	134
7.2 俄罗斯资源	158	136
第 8 章 “新帝国”的经济方面	160	137
8.1 “第三条道路”的经济	160	138
8.2 经济区域主义	164	142
第 9 章 结论	168	144
第五部分 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	169	145

第 1 章 主题和方法	169	145
1.1 俄罗斯的内部地缘政治取决于其行星功能	169	145
1.2 内部地缘政治和军事学说	170	145
1.3 中心和外围	171	146
1.4 内部轴线（“地缘政治射线”）	173	148
第 2 章 通往北方的道路	175	150
2.1 分析模型	175	150
2.2 俄罗斯北极的地缘政治特征	175	150
2.3 北方+北方	176	151
2.4 北方+中心	178	153
2.5 芬兰问题	180	155
2.6 北方和非北方	181	155
- 3 -		
2.7 总结	185	159
第 3 章 东方的挑战	187	160
3.1 “国内东部”（概念范围）	187	160
3.2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带（结构）	188	161
3.3 勒纳兰的阵地战	191	164
3.4 西伯利亚首都	193	165
第 4 章 南方地缘政治新秩序	195	166
4.1 南方“地缘政治新秩序”	195	166
4.2 区域和山区边界	196	167
4.3 巴尔干半岛	197	169
4.4 乌克兰主权问题	198	170
4.5 黑海和里海之间	199	171
4.6 中亚地缘政治新秩序	202	173
4.7 中国的没落	205	176
4.8 从巴尔干到满洲	207	178
第 5 章 西方的威胁	209	178
5.1 两个西方	209	179
5.2 打破警戒线	211	181
5.3 波罗的海联邦	213	182
5.4 天主教斯拉夫人是中欧	214	183
5.5 白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结盟	215	184

5.6 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分解	216	185
5.7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在什么标志下融合?	219	188
5.8 条件: 土壤, 而非血统	220	189
第六部分 欧亚分析	222	190
第1章 东正教地缘政治	222	190
1.1 基督教普世教的东西方	222	190
1.2 后拜占庭东正教	224	191
1.3 圣彼得堡时期	226	193
1.4 东正教民族的民族解放	227	194
1.5 伟大理想	227	195
1.6 “铭文”	228	196
1.7 大罗马尼亚	229	196
1.8 大保加利亚	229	197
1.9 东正教阿尔巴尼亚	230	197
1.10 东正教国家的地缘政治游说团	230	198
1.11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苏维埃	231	198
1.12 总结	232	199
第2章 国家和领土	234	200
2.1 三大地缘政治类别	234	200
2.2 左右地区主义	235	201
2.3 新的大空间: 世界主义还是帝国?	236	202
2.4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237	203
第3章 近邻的地缘政治问题	239	205
3.1 大空间法则	239	205
3.2 美式和平与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	239	205
3.3 俄罗斯的悖论	240	206
3.4 俄罗斯仍然是“历史枢纽”	240	206
3.5 中欧和欧洲帝国	241	207
3.6 德国欧洲的心脏	241	207
3.7 “加入欧洲”	242	208
3.8 “自由”的边界和失去的优势	243	208
- 4 -		
3.9 “警戒线”	243	209
3.10 从省到殖民地的转变	244	210

3.11 亚洲面临选择	245	210
3.12 “伊斯兰革命”的大陆前景	245	211
3.13 “泛突厥主义”陷阱	246	211
3.14 石油美元和世界主义	247	212
3.15 至少两极或……死亡	248	213
第4章 内战前景	250	214
4.1 国家利益和世界主义游说团	250	214
4.2 实力部署的选项	252	216
4.3 分析结果	256	219
第5章 南斯拉夫冲突的地缘政治	259	221
5.1 南斯拉夫的象征意义	259	221
5.2 三股欧洲势力	259	221
5.3 克罗地亚人的真相	260	222
5.4 塞尔维亚人的真相	261	223
5.5 南斯拉夫穆斯林的真相	262	224
5.6 马其顿人的真相	263	225
5.7 南斯拉夫战争的优先事项	264	225
5.8 塞尔维亚是俄罗斯	265	227
第6章 从神圣地理学到地缘政治学	267	228
6.1 地缘政治学 — “中间的”科学	267	228
6.2 陆地和海洋	267	228
6.3 景观象征	268	229
6.4 神圣地理学中的东西方	269	231
6.5 现代地缘政治学中的东西方	270	231
6.6 神圣北方和神圣南方	272	233
6.7 北方人	274	235
6.8 南方人	274	235
6.9 东方和西方的南与北	275	236
6.10 从大陆到元大陆	276	237
6.11 “富有的北方”的错觉	277	237
6.12 “第三世界”的悖论	278	239
6.13 “第二世界”的作用	279	240
6.14 “北方的复活”计划	280	241
第七部分 地缘政治经典文本	283	243

哈尔福德·乔治·麦金德	283	243
历史的地理轴（略）	283	243
彼得·萨维茨基	294	243
欧亚大陆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略）	294	243
让·蒂利亚特	299	243
超人类共产主义（略）	299	243
卡尔·施密特	307	243
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张力以及地球和海洋的对立（略）	307	243
陆地和海洋（略）	325	244
游击队理论（略）	356	244
卡尔·豪斯霍弗	396	244
大陆集团：柏林-莫斯科-东京（略）	396	244
经线和纬线的地缘政治动态（略）	404	244
海因里希·乔迪斯·冯·洛豪森将军	407	244
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地缘政治对立（略）	405	244
- 5 -		
海湾战争 - 反对欧洲的战争？（略）	416	245
让·帕尔维列斯科	420	245
第三个千年的地缘政治（略）	420	245
艾默里克·乔普拉德	424	245
大游戏（略）	424	245
亚历山大·杜金	426	245
反对西方的其他观点（略）	426	245
代替结论（第八部分）	434	246
元素启示录	434	246
1.1 只有两个文明元素	434	246
1.2 普遍洪水的特殊性	435	247
1.3 被忽视的元素	437	248
1.4 图标和土地	438	250
1.5 时空中绝对的友人和外人（ <i>Amicus et Hostis</i> ）肖像	439	251
1.6 火的法则	442	254
词汇表	444	256
- 6 -		

编辑的话

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和命运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已经变得熟悉，并在现代政治中被积极使用。地缘政治期刊和机构激增。出版和再版了该学科创始人的文本，组织了会议和研讨会，成立了地缘政治委员会和理事会。

但是，尽管如此，直到现在，地缘政治还未能落入传统科学的范畴。德国人拉策尔（F. Ratzel）、瑞典人契伦（R. Kjellén），尤其是英国人麦金德（Mackinder）的第一部地缘政治著作遭到了科学界的敌视。充分继承早期实证主义超批判精神的古典科学认为，地缘政治自称是过度概括，因此只有一种“庸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悲惨命运也与问题的政治方面有关。意见坚定地认为，第三帝国扩张、战争、驱逐等的战争罪主要是由德国地缘政治家在理论上准备的，据说他们为希特勒政权提供了伪科学基础。（他首先指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家卡尔·豪斯霍弗，他曾一度与元首关系密切。）

但是，德国地缘政治在理论上与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学（麦金德、马汉（Mahan）、斯皮克曼（Spykman））、法国地缘政治学（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俄罗斯“军事地理学”（米柳金（Д. А. Милютин）、斯涅萨列夫（А. Снесарев））等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同之处不在于豪斯霍弗的具体观点，这些观点完全符合学科本身的逻辑和充分性，而在于他的一些地缘政治规定的实施方法。此外，德国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国际政策细节，以其最令人反感的表现形式，与豪斯霍弗本人的想法截然不同。不是柏林-莫斯科-东京轴线上的“大陆集团”，而是对苏联的攻击，而不是有机主义者（本着施密特“人民权利”理论的精神）对生存空间学说的理解，“生活空间”庸俗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还应该指出的是，豪斯霍弗学派和他的期刊《地缘政治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从来都不是纳粹官方系统的组成部分。像许多知识分子群体一样，第三帝国的所谓的“保守革命者”，他们的存在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只是被容忍，而这种容忍因一时的政治局势而异。

然而，地缘政治受到历史压迫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过于坦率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内在机制，而各个政权往往更愿意将其隐藏在模糊的言辞或抽象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至少在其纯科学的分析部分）。正如马克思不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生产关系的机制及其与历史形态的联系，地缘政治也揭示了外交政策话语的历史煽动性，展示了影响国际、国家间和种族间关系的真正潜在杠杆。但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对古典经济史的全球修正，那么地缘政治就是对国际关系史的修正。最后一个考虑解释了社会对地缘政治科学家的矛盾心理。科学界固执地不允许他们受到严厉批评，而且往往没有

- 7 -

引起注意，而当局则相反，积极利用地缘政治计算来制定国际战略。例如，最早的地缘政治

学之一、该学科的真正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思想没有被学术界所接受，但他本人却直接参与了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政策的形成，为英国的国际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本世纪中叶被英国截获由麦金德的美国（更广泛地说，大西洋主义者）追随者开发。

在我们看来，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是成功的。这种方法可以被不同的极点所借鉴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资本的代表和劳工解放的战士同样重要。地缘政治也是如此：它指导大国（帝国）的代表如何最好地保持领土统治和扩张，他们的反对者也在其中找到了“民族解放”革命理论的概念原则。例如，凡尔赛条约是麦金德地缘政治学派的作品，它表达了西方的利益，旨在削弱中欧国家，镇压德国。麦金德的德国学生卡尔·豪斯霍弗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发展了“欧洲解放”的相反理论，完全否定了凡尔赛的逻辑，形成了新兴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最近的考虑表明，即使不被古典科学界所接受，地缘政治在实践中也极为有效，其价值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许多传统学科。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存在于今天，并逐渐获得官方的认可和相应的地位。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着“地缘政治”这个概念被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所取代，因为这个词的使用在普通人中变得很普遍。重点从创始人开发的全面和全球图景转移到特定的区域时刻或地缘经济计划。同时，全地部缘政治二元论、战略竞争、文明分化等的初步假设也出现了。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掩盖，甚至被拒绝。很难想象在任何其他科学中有类似的东西。如果在“质量”、“能量”、“加速度”等概念的基础上，科学家们会含蓄地、逐渐地开始否认万有引力定律，忘记它，然后简单地认识到，经典物理学会发生什么？牛顿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神话人物”或“黑暗的宗教狂热分子”。但是，经过必要的修改，这正是当今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事情。

本书的目的是客观、公正地呈现主要的地缘政治，超越先入为主的观念、意识形态的好恶。无论我们如何与这门科学联系起来，只有在熟悉了它的原理、历史和方法之后，我们才能对它做出明确的看法。

引言

“地缘政治”的定义

众多地缘政治学派代表的作品，尽管存在所有差异且经常存在矛盾，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总体图景，这使我们可以将主题本身称为完整而明确的事物。一些作者和词典在定义这门科学的主要研究主题和主要方法论原则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分歧源于历史环境，也源于地缘政治与世界政治、权力问题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这门学科的综合性的意味着在其中包含许多额外的学科，例如地理、历史、人口学、战略、民族志、宗教研究、生态学、军事事务、意识形态史、社会学、政治学等。由于所有这些军事、自然和人道主义科学本身都有许多流派和方向，因此没有必要谈论地缘政治中的某种严谨性和明确性。但是这个学科的定义是什么，如此模糊，同时又富有表现力和令人印象深刻？

地缘政治是一种世界观，因此它最好不是与科学相比，而是与科学系统相比。它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即对社会和历史的各种解释体系，处于同一水平，强调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作为基本原则，而把人与自然的所有其他无数方面都归结为这个标准

马克思主义¹和自由主义都以人类生存的经济方面为基础，即“经济为命运”的原则。这两种意识形态得出相反的结论并不重要，马克思得出了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而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情况下，都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过程的详细方法，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而且，尽管替代（和边缘）科学界不断批评这些形式的“经济还原论”，但它们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模式，人们不仅在此基础上理解过去，而且在此基础上创造未来，即计划、设计、构思和实施直接影响全人类的大规模活动。

地缘政治也是如此。但与“经济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它是基于“地理救济即命运”这一命题。地理和空间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的货币和生产关系一样，人类存在的所有基本方面都还原为地理和空间，地理和空间又是解释过去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存在的主要因素，存在人类自身周围。就像经济意识形态一样，建立地缘政治的基础存在

¹ 1943 年，卡尔·科尔施 (Karl Korsch) 在其著作《地缘政治的历史观》中指出了地缘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明确类比：“(……) 地缘政治的新唯物主义同所谓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特征具有相同的批判性、活动性和唯心主义（此词的传统含义），……正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力求有意识控制社会经济生活一样，今天的“豪斯霍弗主义”可以定义为尝试对空间进行政治控制。”引自 Karl Korsch, *A Historical View of Geopolitics, New Essays*, 6(3) 1943, 817.

近似、简化，因生命形式多种导致多参数，尽管这种理论存在明显缺陷，但它在解释过去时的和谐性，在组织现在和设计未来方面极致高效却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我们继续与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说，就像经

济意识形态肯定一种特殊类别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一样，地缘政治讨论的是“空间人”，人由空间预先确定，受到不同的空间特性、地形、地貌的影响，形成不同的人，这些人还受这些因素制约。但这种条件性在一个人在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等方面的大规模社会表现中尤其明显。无论从小到大的方面，每个人对经济的依赖程度都很明显。因此，经济决定论对于普通民众和处理大社会类别的当局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济意识形态变得如此流行，并在基于个人参与许多个人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挥了革命的动员作用。一个人对空间的依赖被视为地缘政治的主要论点，只是与个人有一些距离。因此，尽管有先决条件，地缘政治并没有成为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它的结论和方法、研究的主题和主要论文只有那些处理战略规划、理解全球社会和历史模式等大规模问题的社会机构才能理解。空间大量表现出来，因此地缘政治适用于处理国家、人民等普遍现实的社会群体。

地缘政治是权力的世界观、权力的科学和权力的科学。只有当一个人接近社会精英时，地缘政治才开始揭示它的意义、意义和对他的好处，而在此之前，它被认为是一种抽象。地缘政治是政治精英（包括当前和替代）的学科，其整个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完全由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民族过程的人处理，或者为这个角色做准备（如果它是关于替代的），反对派意识形态阵营因历史条件而下台）。

无需假装科学严谨的情况下，地缘政治在其自身层面决定了什么对它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人文和自然科学只有在不违背地缘政治方法的基本原则时才会涉及到。在某种程度上，地缘政治本身会选择那些对它有用的科学和科学方向，而不去关注其他一切。在现代世界，它是一本“统治者快速指南”，一本权力教科书，它总结了在做出全球性（决定性）决策时应该考虑什么，例如结盟、发动战争、实施改革、重组社会、引入大规模经济和政治制裁等。

地缘政治是一门关于统治的科学。

- 10 -

制陆权和制海权

地缘政治的主要规律是基本二元论的主张，反映在地球的地理结构和文明的历史类型学中。这种二元论表现在“制陆权”（陆地权力）和“制海权”（海上权力）的对立中。这种对抗的性质被简化为商业文明（迦太基、雅典）和军事威权文明（罗马、斯巴达）的对立。换言之，就是“民主”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

最初，这种二元论已经具有敌意的性质，即其两个组成极的交替性，尽管程度可能因情况而异。因此，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被认为是由“水”（“液体”、“流体”）和“土地”（“固体”、“永久”）这两种元素组成的。

“天国”、“地权”与空间的固定性及其质的取向和特性的稳定性有关。在文明层面，

这体现在久坐不动的生活中，体现在保守主义中，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标准中，这类人、部落、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大型协会都受制于这些标准。土地的坚定，在文化上体现在伦理的坚定和社会传统的稳定。土地（尤其是定居）人民与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格格不入。它们的特点是集体主义和等级制度。

“来自海洋的权力”、“海权”是一种基于对立态度的文明。这种类型是动态的、移动的、易于技术发展的。他的首要任务是游牧（尤其是航海）、贸易和个人创业精神。个人作为团队中最具流动性的部分，被提升到最高价值，而道德和法律规范则变得模糊，变得相对和流动。这种文明正在迅速发展，积极演化，很容易改变其外部文化特征，只保持总体态度的内在认同不变。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发展是在“地球政治”全球主导下，两种方向的范围都有限的情况下展开的。地球元素（土地）在整个文明中占主导地位，而“水”元素（海洋、海洋）只是零星地出现。二元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地理上的局部海岸、河口和盆地等。对立在地球的不同区域以不同的强度和不同的形式发展。

地球上各民族的政治历史表明，政治形式逐渐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大。国家和帝国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一地缘政治层面的过程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空间因素的加强。国家和帝国的大型政治形态的性质更深刻地表达了要素的二元性，达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文明类型的水。

在某个时刻（古代世界），出现了一幅相当稳定的画面，反映在麦金德地图中。地球统治区始终与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内陆地区一致（一般而言，与沙皇俄罗斯或苏联的领土一致）。

- 11 -

制海权的范围越来越清晰被指定为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带、地中海地区、大西洋以及从南部和西部冲刷欧亚大陆的海域。

因此，世界地图获得了地缘政治特征

1) 大陆空间成为“固定平台”、心脏地带（“地球的核心地带”）、“历史的地理枢纽”，稳定地保持着地球文明的特殊性。

2) “内陆新月”、“海岸带”、边缘地带代表着文化集约发展的空间。“海洋统治”的特征在此可见一斑。尽管它们被许多“地方主义”倾向所平衡。

3) “外部或岛屿新月”代表“未知的土地”，只有海上通信是可能的。它第一次在迦太基和商业腓尼基文明中得到体现，从外部影响了欧洲的“内新月”。

在布匿战争时代之后，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可能揭示了海洋统治和地球统治之间关系的这种地缘政治图景。但最终它在 17 世纪和 19 世纪英国成为海上强国的时期获得了意义。15 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星结构，脱离欧亚大陆及其海岸，完全集中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英格兰，美国）和殖民地。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新迦太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从那时起，地缘政治二元论已经形成了清晰可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

英国与奥匈帝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大陆大国的地位斗争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20 世纪下半叶)的地缘政治内容,而自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国家已成为海洋统治的主要据点。

在 1946-1991 年的冷战中,古老的地缘政治二元论达到了最大的比例,地中海政治被认同为美国,地球政治被认同为苏联。

两种全球类型的文明、文化、元意识形态形成了完整的地缘政治轮廓,概括了整个地缘政治历史的对立元素。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意识形态层面的完全地缘政治二元论形式对应于两个同样综合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谈论两种“还原论”在实践中的实施:经济还原论被还原为反对史密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地缘政治还原论被还原为将地球所有部门划分由制海权(新迦太基、美国)和制陆权(新罗马、苏联)控制的区域。

- 12 -

历史的地缘政治视野是行星二元论发展到最大比例的模型。陆地和海洋将它们最初的对立扩展到整个世界。

人类历史只不过是这场斗争的表现和走向绝对化的道路。

这是地缘政治的主要规律,元素二元论(陆地与海洋)规律最普遍的表达。

地缘政治目的论

直到美国在冷战中的最后胜利,地缘政治二元论在最初设定的框架内发展,它是关于通过海洋国家和地球国家获得最大的空间、战略和权力体积。鉴于双方都在积累核潜力,一些悲观的地缘政治家认为整个过程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在完全掌握了地球之后,这两个大国要么不得不将对抗转移到地球之外(地球理论星球大战)或相互毁灭(核灾难)。

如果历史的主要地缘政治过程的性质,在该学科的海洋政治和地球政治的最大空间扩张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它的结果仍然存在疑问。在这方面没有确定性。

因此,地缘政治目的论,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理解历史的目的,只有达到二元论全球化的时刻才会停止。

但是,尽管如此,在纯粹的理论层面上,在可以确定两种制海权体系之一的胜利之后,可以挑选出事件发展的几个假设版本。

第一个选项。公国的胜利,彻底取消了公国的文明。一个同质的自由民主秩序正在地球上建立。制海权(thalassocracy)绝对化了它的原型,成为组织人类生活的唯一系统。这种选择有两个优点:首先,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为它显示了地缘政治历史从完全制陆权(传统世界)到完全制海权(现代世界)的一般性结局;其次,这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选项。制海权的胜利结束了两个文明对抗的循环,但并没有将其模式传播到全世

界，而只是完成了地缘政治史，取消了它的问题。正如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消除，一些世界主义理论也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中，陆海对抗将完全消除。这也是“历史的终结”，但只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并不像在第一个选项中那样作了严谨的分析。

- 13 -

这两种分析都将制陆权的失败视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其他两个选项的处理方式不同。

第三种选项。制陆权的失败是暂时的现象。欧亚大陆将以新的形式回归其大陆使命。这将考虑到导致大陆主义势力浩劫的地缘政治因素（新大陆集团将在南部和西部拥有海上边界，即实施“欧亚门罗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将再次回到两极状态。但已经具有不同的品质和不同的层次。

第四个选项（这是前一个选项的发展）。制陆权（tellurocracy）在这场新的对抗中获胜。它试图将自己的文明模式转移到整个星球并自行“关闭历史”。整个世界将在类型上变成陆地，“意识形态”将无处不在。预料到这种结果的是“世界革命”的想法和第三帝国的全球统治。

由于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观和理性因素在历史进程发展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因此这四个选项不仅应被视为对地缘政治进程可能发展的抽象陈述，而且应该被视为可以成为全球范围行动指南的积极的地缘政治立场。

但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无法提供任何确定性的版本。这里的一切都归结为一组可能性，而实施这些可能性将取决于许多不再适合纯粹地缘政治框架的因素。

边缘地带和“边界地带”

地缘政治的整个方法论是基于将陆地和海洋的全球地缘政治二元论原则应用于更多的地方类别。在分析任何情况时，行星模型仍然是主要和基本的模型。那些作为整体画面特征的关系在更具体的层次上重复出现。

在强调了海洋统治和地球统治这两个主要原则之后，下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边缘地带，即“沿海地带”。这是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关键类别。

边缘地带（rimland）是一个复合空间，有可能成为制海权（thalassocracy）或制陆权（Tellurocracy）的一部分。这是最复杂和文化最丰富的地区。海洋元素，即水的影响在“沿海地带”引发了积极而充满活力的发展。大陆的质量压力，迫使能量被结构化。边缘地带一方面，成为岛屿和船舶，另一方面，成为帝国和众议院。

然而，边缘地带并没有被简化为一种中间和过渡介质，在其中发生两种冲动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它有自己的逻辑，极大地影响了制海权和制陆权。它不是历史的

对象，而是它的主动主体。边缘地带制海权和制陆权的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简单的战略地位

- 14 -

的竞争。边缘地带有它自己的命运和它自己的历史意志，然而，这些都无法在潜在的地缘政治二元论之外得到解决。边缘地带在选择上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在选择结构上不是自由的，因为除了海权或陆权路径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与这种品质相联系，“内新月”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分布区域。在大陆的深处，保守主义盛行；在大陆之外，挑战了迁移的混乱。

“沿海地带”就其所处的位置而言，需要回答地理提出的问题。

边缘地带是一个边境地带，一条腰带，一条地带。然而，这是一个边界。这种结合导致了边界的地缘政治定义。

与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同，地缘政治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不同，从原始模型开始，所有边界的第一个边界或原型是边缘地区的特定历史、地理和文化概念。

海岸带的空间体积是从外部，“从海洋外星人的角度”，看大陆的结果。对于“海洋力量”来说，海岸是向内陆延伸的一条带。对于大陆本身来说，对面的海岸，就是极限，就是一条线。

边界作为一条线（即国际法所理解的）是“陆地法理学”的残余，是现代法从古代传统中继承下来的。这种观点纯粹是陆地的。

但从大陆外部的海洋观点来看，沿海地区是潜在的殖民地，是可以与大陆其他部分分离的带状土地，可以变成基地，变成战略空间。同时，沿海地区永远不会完全“拥有”；如有必要，您可以登上一艘船，驶向您的祖国，前往“岛屿”。海岸变成了一条带状，正是因为来自海洋的外星人只在一定距离内深入大陆是不安全的。

由于地缘政治结合了海洋和陆地空间的两种观点，因此边缘地带在其中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现实，作为一个边界地带，其质量取决于哪个陆地或海洋冲动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印度和中国巨大且完全可通航的海岸是线条，体积最小的带。各自的文化以陆地为导向，海岸带的体积趋于零，成为大陆的尽头。在欧洲，特别在地中海，沿海地区是向内陆延伸的宽阔地带。它们的体量最大。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在谈论地缘政治边界。因此，这个类别是可变的，根据情况而变化，从一条线到一根条带。

地缘政治学也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与边界相关的更具体问题。她将州与州之间的边界视为“数量可变的区域”。它的收缩或扩张量取决于一般大陆动态。根据它，这些区域会在规

- 15 -

定范围内改变形状和轨迹。“地缘政治边界”的概念可以包括整个国家。例如，英国关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警戒线”的想法假定创建了一个由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组成的“无人区”（半殖民地并面向英格兰）。相反，俄罗斯和德国的大陆主义政策倾向于把这个区域变成一条线（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拉帕洛、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海权大西洋主义者

（Талассократы-атлантисты 或 thalassocrats-atlantists）试图通过人为创造“缓冲国”（etats-tampons）将其扩展至最大。

同时，一个完全完美的海洋国家（英国，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双重标准：海洋国家寻求将自己岛屿的边界缩小为一条线，并最大限度地扩大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对于大陆主义地缘政治，在相反的方向使用完全相同的原则是合乎逻辑的：欧亚大陆的边界是线，美洲的边界是条带。

将历史边缘地区类比为“文明的摇篮”，这也表明了“区域-边界”在更特殊的情况下的重要性。无需承担历史地理负担的冲击，“边境地区”经常将精力投入到文化和知识领域。而巧妙地利用这种“容易”的地缘政治潜力，正是对立双方地缘政治战略的艺术。

同时，正是“海上力量”将这一点掌握得淋漓尽致，因为他们始终本着最大限度、迅速地从被殖民领土上获取利益的原则。这将他们与土地征服者区分开来，后者在夺取领土后立即开始认为这是自己的，因此并不急于从土地上榨取一切。

地缘政治是命运

地缘政治规律对于政治史、外交史和战略规划的分析极为方便。这门科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军事战略、外交、宗教史等有许多交叉点。间接地，但有时非常清楚，它也与经济有关，以至于一些地缘政治家提议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地缘经济学。无论如何，在地缘政治方法的某些方面，诉诸经济现实是必要的。

目前，随着所有类型的科学趋向于综合、趋于融合、趋向于创建新的跨科学宏观学科和多维模型，地缘政治揭示了其对于管理全球或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范围内复杂文明进程的纯理论研究和实际步骤的重要性。这是未来的科学，在不久的将来，不仅在高等教育的专业机构、机构和学院，而且在普通学校都将教授其基础。借助地缘政治分析，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国家和人民历史发展的整个时代。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信息区域的扩展，这种简单和说明性的还原论方法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一个人就有可能在异构知识流的多样化和多维混乱中完全失去所有参考点。

- 16 -

地缘政治是教育问题的宝贵帮助。它的结构使得它可以成为学校发展新阶段的轴心学科。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信息的发展水平，普通人对整个大陆上发生的事件的积极参与，大众媒体的“全球化”，所有这些都突出了地缘政治方面的空间思维，这有助于将人民、国家、政权和宗教“分类”，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简化尺度中，以便即使是最基本的电视或广播新闻的含义也至少可以大致理解。如果我们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世界岛等最简单的地缘政治网格应用于任何有关国际事件的信息，则无需额外的

高度专业知识即可立即建立某种清晰的解释模型。在这种方法中，“北约东扩”意味着“增加边缘地区的数量，有利于海洋统治”；“德国和法国之间关于建立特殊的、纯粹的欧洲武装部队的条约”，“迈向建立大陆地区统治结构的一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冲突，大陆国家想要摧毁阻止对沿海地区直接控制的人造海洋构造的愿望”等。

最后，关于地缘政治方法论对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如果政党和运动的某些步骤以及权力结构的地缘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很容易将它们与全球利益体系联系起来，从而破译其深远的目标。例如，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的融合是地球统治力量（欧亚人）的举动，从中可以自动预测该国“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加强。相反，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和解意味着臣服于海权线，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市场参与者”的地位等等。同样，根据内部地缘政治规律，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俄罗斯内部民族分裂主义的内部政治进程，以及各个行政实体和地区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每个事件都具有明确的含义。这种地缘政治意义不能被视为事件的最终比例，但无论如何它总是具有高度的表现力，对分析和预测很有用。

今天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主题的教科书促使我们编写和编译这本书，这是对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介绍。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奠基者

第 1 章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 作为空间有机体的国家

1.1 教育：德国“有机学派”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 (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 可以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父亲”，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使用这个词。他写了关于“政治地理学”的文章。他的主要著作出版于 1897 年，名为《政治地理》。

拉策尔毕业于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在那里他学习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课程。他在海德堡完成学业，成为首个使用“生态学”一词的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教授的学生。拉策尔的世界观以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为基础，并受到对生物学浓厚兴趣的影响。

拉策尔自愿参加了 1870 年的战争，并因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在政治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并于 1890 年加入了卡尔·彼得斯的“泛日耳曼主义联盟”。他在欧洲和美国广泛旅行，并增加了他对民族学的科学兴趣研究。他成为慕尼黑技术学院的地理教师，并于 1886 年搬到莱比锡的一个类似部门。

1876 年，拉策尔为他的论文“移民在中国”进行了答辩，1882 年，他的基础著作《人类地理学》(“Antropogeographie”) 在斯图加特发表。他在其中阐述了他的主要思想：民族进化与人口学与地理数据之间的关系，地形对民族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影响等。

但他最基本的著作是《政治地理》。

1.2 作为生命体的国家

在这项工作中，拉策尔表明，土地是一个基本的、不变的既定条件，人们的利益围绕它旋转。历史的运动是由土地和领土预先决定的。接下来是进化论的结论，即“国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而是一个“植根于土地”的有机体。国家是由领土的起伏和规模以及人民对他们的理解而形成的。因此，国家反映了客观的地理现实和全国范围内对这一现实的主观理解，表现在政治上。拉策尔认为“正常”国家是最有机地结合了国家的地理、人口和民族文化参数的国家。

他写道：

“国家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被视为必然与其土壤保持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必须与地理

- 18 -

角度。正如民族志和历史所表明的，国家在空间基础上发展，越来越多地与之共轭和融合，

从中提取越来越多的能量。因此，状态变成了空间现象，由这个空间控制和激活。地理应该描述、比较和衡量它们。国家融入了一系列生命扩展的现象，是这些现象的最高点。”（《政治地理》²）

从这种“有机主义者”的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拉策尔将国家的空间扩张理解作为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类似于生物体的生长。

拉策尔的“有机”方法也反映在与空间本身（Raum）的关系上。这个“空间”从一个量化的物质范畴转变为一个新的品质，成为一个“生命圈”、“生命空间”（Lebensraum），一种“地球生物环境”。由此遵循拉策尔的另外两个重要术语“空间意义”（Raumsinn）和“生命能量”（Lebensenergie）。这些术语彼此接近，表示地理系统中固有的某种特殊品质，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预先决定他们的政治设计。

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其形式将稍后在拉策尔的追随者中发展起来。此外，将国家视为“植根于土地的活的空间有机体”，这个态度是地缘政治方法论的主要思想和轴心。这种对有机体的态度侧重于对整个现象的综合研究，而不管它们属于人类领域，还是非人类领域。空间作为自然、环境的具体表现，被认为是民族这一连续生命体所居住的场所。材料本身的结构决定了最终艺术品的比例。

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策尔是整个德国“有机”社会学学派的直接继承人，其中费迪南德·坦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是最杰出的代表。

1.3 空间（Raum）：土壤的政治组织

拉策尔如何看待民族与空间的关系，可以从《政治地理》的以下片段中看出：

“国家是附着在地球表面某一部分的有机体而形成的，其特征是从人和土地的特征发展而来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小、位置和边界。其次是土壤类型与植被、灌溉，最后是与地球表面其他砾岩的比例。首先是与邻近的海洋和无人居住的土地的比例，乍一看，这些比例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意义。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das Land）。但是当人们谈到‘我们的国家’时，会加上人类创造的一切，以及所有与地球有关的记忆。因此，最初纯粹的地理

² 参见 Fried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1887, “Einleitung”。

概念变成了该国居民与其历史之间的精神和情感联系。

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不仅因为它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表达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因为这种联系是相互加强的，成为一种统一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这是不可想象的。无人居住的空间，无法养活国家，这是一个处于休耕状态的历史领域。相比之下，居住空间有助于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如果这个空间被自然边界所包围。如果一个民族在其领土上感到自然，它将不断地复制相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源自土壤，将铭刻在其中。”³

1.4 扩张定律

将国家视为生命有机体的态度以拒绝“边界不可侵犯”的概念为前提。国家像生物一样诞生、成长、死亡。因此，它的空间扩张和收缩是与其内部生命周期相关的自然过程。拉策尔在他的著作《论国家空间增长规律》（1901 年）中确定了七个扩张规律：

- 1) 国家的范围随其文化的发展而扩张；
- 2) 国家的空间发展伴随着其发展的其他表现形式：意识形态、生产、商业活动、强大的“吸引力辐射”、传教领域。
- 3) 国家通过吸收次要政治单位而扩张。
- 4) 边境是位于国家边缘的机体（理解为有机体）。
- 5) 在进行空间扩张时，国家力求覆盖最重要的发展区域：海岸、江河流域、山谷，以及总体上所有富裕地区。
- 6) 扩张的最初冲动来自外部，因为国家扩张往往是被一个文明明显低劣的国家（或领土）所激起的。
- 7) 同化或吸收较弱国家的总体趋势激励了在自给自足运动中获得更多领土⁴。

毫不奇怪，许多批评家指责拉策尔为帝国主义者写了《教理问答》。与此同时，拉策尔本人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为德国帝国主义辩护，尽管他并没有隐瞒他坚持民族主义信念的事实。重要的是，他创造一个概念工具，以充分了解国家和人民与空间关系的历史。在实践

³ 参见同上

⁴ 见 Friedrich Ratzel “Ueber die Gesetze des räumlichen Wachstum der Staaten”，1901。

中，他试图唤醒德国领导人中的“Raumsinn”（“空间感”），对于他们来说，枯燥的学术科学中的地理数据往往是纯粹的抽象概念。

1.5 世界强国与大海

拉策尔对北美的了解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对北美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两本书：《北美城市与文明地图》（1874 年）和《北美合众国》（1878-1880 年）。他指出，美国人的“空间感”高度发达，因为他们面临着掌握“空白”空间的任務，背后有着欧洲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和地理”经验。因此，美国人凭直觉而逐渐有意执行了旧世界的那些做法。因此，在拉策尔的著作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即“世界强国”（Weltmacht）概念的

最初构想。拉策尔指出，大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最大的地理扩张倾向，逐渐达到全球水平。

因此，地理发展迟早要进入大陆阶段。

拉策尔将这一源自美国大陆空间政治和战略统一经验的原则应用于德国，为她预测了一个大陆强权的命运。

他预见到地缘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即海洋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的著作《海洋，国家力量的源泉》（1900 年）⁵ 中，他指出每个强大的国家都需要特别发展其海军力量，因为这是全球规模的全面扩张所需要的。一些民族和国家（英国、西班牙、荷兰等）是自发进行的，而陆地大国（拉策尔当然是指德国）这样做应该是有意义的：发展舰队是接近世界强国（Weltmacht）地位的必要条件。

拉策尔已经把海洋和“世界强国”联系在一起了，尽管只有后来的地缘政治家（马汉（Mahan）、麦金德（Mackinder）、豪斯霍弗（Haushofer），尤其是施密特（Schmitt））才会使这一主题变得完整，并具有核心地位。

拉策尔的著作是所有地缘政治研究的必要基础。他的作品以极简约形式囊括了这门科学的几乎所有要点。拉策尔的书籍是基于瑞典人契伦（Chöllen）和德国人豪斯霍弗（Haushofer）的概念。法国人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英国人麦金德（Mackinder）、美国人马汉（Mahan）和俄罗斯欧亚人萨维茨基（П. Савицкий）、古米列夫（Л. Гумилев）等，都考虑了他的想法。

需要注意的是，拉策尔的政治同情并非偶然。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都受到强烈的民族感情影响，无论它是民主的（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的麦金德、马汉）还是“意识形态”的（豪斯霍弗、施密特、欧亚人）形式。

⁵ 参见 Friedrich Ratzel “Das Meer als Quelle der Voelkergroesse”，1900。

第 2 章 鲁道夫·契伦和弗里德里希·诺曼——“中欧”

2.1 新科学的定义

瑞典人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是第一个使用“地缘政治”一词的人。契伦是乌普萨拉大学和哥德堡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此外，他积极参与政治，是议会成员，以强调亲德倾向而著称。契伦不是专业的地理学家，他认为地缘政治是他发展的基础，从拉策尔（他认为他的老师）的工作开始，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

契伦对地缘政治的定义如下：

“这是体现在空间中的地理有机体的国家科学”⁶。

除了“地缘政治学”之外，契伦还提出了另外 4 个新词，在他看来，这些新词将构成政治学的主要部分：

生态政治学（“将国家视为经济力量的研究”）；

民主政治学（“研究人民传递给国家的动态冲动”；类似于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

社会政治学（“国家社会方面的研究”）；

克拉特政治学（*кратополитика*，“与法律和社会经济因素问题有关的政府和权力形式的研究”）⁷。

但所有这些与地缘政治并行发展的学科都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而“地缘政治”一词却在各个圈子中牢固确立。

2.2 国家作为德国的生活方式和利益

契伦在其主要著作《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国家》（1916 年）⁸中，提出了拉策尔作品中的假设。契伦和拉策尔一样，认为自己是德国“有机主义”的追随者，拒绝对国家和社会采取机械化的方法。拒绝将研究对象严格划分为“无生命的物体”（背景）和“人类主体”（演员）是大多数地缘政治学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伦主要作品的标题具有指示性。

契伦根据当代欧洲的具体历史形势发展了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原则。

⁶ 参见 Rudolf Kjellén, “*Die Staat als Lebensform*”, 1916。

⁷ 参见同上

⁸ 参见同上

他得出逻辑结论，把拉瑟尔关于“大陆国家”的想法用于德国。他指出，在欧洲的背景下，德国是一个具有轴向活力的空间，旨在围绕自身构建其他欧洲大国。契伦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为德国（“轴心国”）的动态扩张与反对它的外围欧洲（和非欧洲）国家（协约国）之间发生的自然地缘政治冲突。法国和英国的地缘政治增长势头和德国的下行势头之间的差异确定了主要力量的走向。同时，在他看来，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暂时失败，但德国对欧洲的地缘政治认同必然不可避免。

契伦巩固了拉策尔的地缘政治格言，德国的利益（=欧洲的利益）与西欧大国（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德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德国人是一个“年轻民族”。

（这个把俄罗斯民族和德国民族认作“年轻民族”的想法可以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伦不止一次引用。）受“中欧空间”的启发，“年轻的”德国人应该迁移到一个全球性的大陆国家，因为这些领土被“古老民族”法国人和英国人统治着。与此同时，契伦认为，意识形态方面

的地缘政治对抗契伦是次要的。

2.3 走向中欧概念

虽然契伦本人是瑞典人，坚持瑞典政治与德国政治和解，但他关于德国空间独立整合意义的地缘政治思想与“中欧”（Mittleuropa）理论不谋而合。

瑙曼（Naumann）在其著作《Mittleuropa》(1915)⁹中，给出了与鲁道夫·契伦的概念相同的地缘政治诊断。在他看来，为了与英国（及其殖民地）、美国和俄罗斯等有组织的地缘政治格局竞争，居住在中欧的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组织一个新的一体化政治和经济空间。当然，这样一个空间的轴心将是德国人。

与纯粹的“泛日耳曼主义”项目相比，中欧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纯粹的地缘政治概念，其主要意义不是民族团结，而是共同的地理命运。瑙曼的计划意味着德国、奥地利、多瑙河国家以及，从长远来看，法国的一体化。

地缘政治项目也得到了文化相似性的证实。德国本身作为一个有机体被认定为“Mittellage”、“中间位置”的精神概念。这是由阿恩特在 1818 年提出的：“上帝将我们置于欧洲的中心；我们（德国人）是我们所在地区的中心。”

⁹ 参见 Friedrich Naumann, “Mittleuropa”, 1915.

通过契伦和瑙曼，拉策尔的“大陆”思想逐渐获得了切实的特征。

第 3 章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3.1 科学家和政治家

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 1861-1947）是地缘政治界最耀眼的人物。

他受过地理学训练，从 1887 年起在牛津大学任教，直到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从 1910 年到 1922 年，他是下议院议员，期间（1919-1920 年）担任英国驻南俄罗斯特使。

麦金德以其在英国政治界的崇高地位而闻名，他对国际定位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他拥有解释世界政治历史的最大胆和最具革命性的计划。

以麦金德为例，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所固有的典型悖论最为明显。麦金德的想法并没有被科学界接受，尽管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科学界本身也有很高的地位。即使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根据对世界政治和地理历史的解释，积极并成功地参与制定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也无法让怀疑论者认识到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和有效性。

3.2 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的第一次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演讲是他 1904 年在《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报告《历史的地理枢纽》。¹⁰ 在这本书中，他概述了他在随后的著作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和地理观点的基础。麦金德的这部著作可以被认为是这门学科历史上主要的地缘政治著作，因为它不仅概括了“政治地理学”以前所有的发展路线，也阐明了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

麦金德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地理位置将是中部的中心位置。中心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在每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它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其中心是“世界之心”或“心脏地带”。心脏地带是欧亚大陆大陆块的集中地。这是控制全世界最有利的地理基地。

¹⁰ 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1904. 中文版: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8 年.

- 24 -

在“世界岛”更广泛的语义中，心脏地带是一个关键领地。麦金德的“世界岛”包括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

因此，麦金德通过同心圆系统划分全球空间等级。在最中心是“历史的地理枢纽”或“枢纽区”(pivot area)。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在地理上与俄罗斯相同。同样“枢纽”的存在被称为心脏地带，“核心之地”。

接下来是“内新月或边缘新月带”(inner or marginal crescent)。这是一条与欧亚大陆沿海空间重合的地带。麦金德认为，“内新月”是文明发展最为密集的地带。这与所谓“波塔米理论”(пота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Potamic theory, 江河理论, Potamic 源自希腊文 ποτάμια, 江河--校译注), 即文明最初出现在河岸或海岸的历史假设相对应。应该指出, 后一种理论是所有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水陆空间的交汇是民族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话题后来由施密特和斯皮克曼专门加以发展, 然而, 麦金德是第一个推出这个地缘政治准则的人。

接下来是更外圈: 外部或岛状新月带 (“outer or insular crescent”)。就地理和文化而言, 该区域完全位于世界岛大陆的外部。

麦金德认为, 整个历史进程是由以下过程决定的。从心脏地带中心到其外围, 所谓“陆地劫匪”的恒定压力不断增加。这一点在蒙古人的征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他们之前是斯基泰人、匈奴人、阿兰人等。根据麦金德的说法, 源自“历史地理枢纽”、源自心脏地带最深处空间的文明是“专制的”、“等级的”、“非民主的”和“非商业的”。在古代世界, 他体现在像多里安斯巴达或古罗马这样的社会中。

来自“岛状新月”区域的外部压力, 即所谓“海上强盗”或“岛屿居民”, 对世界岛施加压力。这些是来自欧亚以外中心的殖民探险, 努力抗衡来自大陆内部的陆上冲动。“外新月”文明的

特点是具有“商业”性质和“民主形式”的政治。在古代，雅典国家或迦太基以这个字符而著称。

在这两个极地文明-地理冲动之间，有一个“内新月”地带，它具有双重性，不断经历着对立的文化影响，流动性最大，因此成为文明优先发展的地方。

根据麦金德的说法，历史在地理上是围绕大陆枢纽旋转的。这段历史在“内新月”空间中感受最为明显，而“冰冻”的古风在心脏地带盛行，而在“外新月”区域则存在一些文明的混乱。

- 25 -

3.3 俄罗斯的关键地位

麦金德本人发现他的兴趣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岛屿世界，“外新月”区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看到，“岛国”地缘政治取向的基础，在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心脏地带，最大限度地扩大“外新月”区域对“内新月”区域的影响。麦金德强调“历史地理枢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优先地位，从而制定了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法律：

“主宰东欧，就能主宰腹地；主宰腹地，就能主宰世界岛；主宰世界岛，就能主宰世界。”
（《民主理想与现实》）¹¹

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承认俄罗斯在战略意义上的领导作用。麦金德写道：

“俄罗斯占据着整个世界的战略中心地位，就像德国占据着整个欧洲的战略中心地位。除北方以外，俄罗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攻击，也可以受到全方位的攻击。全面发展俄罗斯的铁路能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历史的地理枢纽》）¹²

由此出发，麦金德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形成围绕“历史地理枢纽”（俄罗斯）的战略大陆联盟。因此，“外新月”势力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地将沿海空间从心脏地带剥离出来，将其置于“岛屿文明”的影响之下。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历史的地理枢纽》）¹³

最有趣的是，麦金德并没有简单地建立理论假设，而是积极参与组织协约国对“白人运动”的国际支持，他认为这是一种旨在削弱亲德欧亚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大西洋主义趋势。他亲自为白人事业的领导人提供建议，试图获得英国政府的最大支持。他似乎不仅预言了布列斯特斯的和平，还预言了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的条约……

1919年，他在《民主理想与现实》中写道：

¹¹ H.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1919.

¹² 参见 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1904. 中文版: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0页。

¹³ 同上,中文版第61-62页。

- 26 -

“如果有一天,这片伟大的大陆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无敌舰队的基础,海洋的力量会变成什么样子?”¹⁴

不难理解麦金德到底对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做了什么,半个世纪后成为美国和北大西洋联盟的地缘政治,主要趋势是:以任何方式阻止创建欧亚大陆的可能性集团,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建立战略联盟,加强腹地的地缘政治及其扩张。20世纪西方持续存在的恐俄症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地缘政治。尽管考虑到麦金德所确定的文明类型与某些力量的地缘政治性质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模式,通过该模式,地缘政治术语很容易转化为意识形态术语。

“外新月”自由民主;“历史的地理枢纽”不民主的威权主义;“内新月”是一种中间模式,是两种思想体系的结合。

麦金德参与了凡尔赛条约的起草,该条约的主要地缘政治思想反映了麦金德观点的精髓。该条约的制定是为了确保西欧成为海军的沿海基地(盎格鲁-撒克逊和平)。同时,他设想建立一个限制性国家,将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分开,以防止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对“岛国”和“民主”构成威胁的大陆战略联盟。

在麦金德的著作中追溯心脏地带地理界限的演变非常重要。如果在1904年和1919年(分别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和《民主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心脏地带的轮廓大致与俄罗斯帝国,后来是苏联的边界相吻合,然后在1943年在“圆形星球和征服世界”一文中,他修改了以前的观点,并从位于叶尼塞河以外的东西伯利亚的苏联领土的心脏地带撤出。他以勒纳河的名字将这片人烟稀少的苏联领土称为“俄罗斯勒纳兰”。¹⁵

“俄罗斯勒纳兰有900万居民,其中500万人居住在从伊尔库茨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横贯大陆铁路沿线。其他地区每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人。这片土地的自然资源,木材、矿产等,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圆形星球与征服世界》)¹⁶

将“勒纳兰”移出心脏地带地理边界意味着有可能将其视为“内部新月”区,即“岛屿”列强用来对抗“历史地理枢纽”的海岸空间。麦金德积极参与了协约国干预和“白人运动”,他似乎认为高尔察克反对欧亚中心的历史先例足以让他将其控制的领土视为潜在的“海岸”。

¹⁴ 参见 H.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1919.

¹⁵ 参见 Halford Mackinder "The Round Planet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1943.

¹⁶ 同上

- 27 -

3.4 三个地缘政治时期

麦金德将整个世界地缘政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¹⁷：

1) 前哥伦布时代。在此期间，属于世界岛边缘的人民，如罗马人，生活在“心脏地带”势力不断征服的威胁之下。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些是日耳曼人、匈奴人、阿兰人、帕提亚人等。对于中世纪的定居区（*ecumene*），这些是金帐汗国人。

2) 哥伦布时代。在此期间，“内新月”（沿海地区）的代表开始征服地球上未知的领土，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

3) 后哥伦布时代。未被征服的土地不再存在。文明的动态脉动注定会发生冲突，将地球上的人民拖入一场普遍的内战。

麦金德的这种分期，以及相应的地缘政治转变，将我们带到了地缘政治的最新趋势，我们将在本书的另一部分进行探讨。

¹⁷ 参见 H.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1919.

第 4 章 阿尔弗雷德·马汉--“制海权”

4.1 海权

与拉策尔、契伦和麦金德不同的是，美国人（Alfred Mahan, 1840-1914）不是科学家，而是军人。他没有使用“地缘政治”一词，但他的分析方法和主要结论完全符合纯粹的地缘政治方法。阿尔弗雷德·马汉

作为美国联盟海军（Union Navy）的一名军官，他从 1885 年开始在罗德岛州纽波特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海军史。1890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¹⁸ 几乎立即成为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其他作品紧随其后：《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¹⁹ 《美国现在和未来对海权的兴趣》、²⁰ 《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²¹ 和《海权及其对战争的态度》。²²

几乎所有的书都专注于同一个主题，“海权”。马汉的名字已经成为“海权”的代名词。

马汉不仅是军事战略理论家，而且积极参与政治。特别是，他对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政治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回顾整个 20 世纪的美国军事战略，我们会发现它是直接按照马汉的想法构建的。而且，如果一战时这一战略没有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成功，那么二战时效果显著，与苏联在冷战中的胜利最终巩固了海权战略的成功。

4.2 海洋文明=贸易文明

对于马汉来说，主要的政治工具是贸易。军事行动应该只为创造一个全球商业文明提供最有利的条件。马汉从三个方面看待商业循环：

- 1) 生产（通过水路交换商品和服务）
- 2) 航海（实现此交换）
- 3) 聚居区（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贸易）²³。

¹⁸ 参见 Alfred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i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中文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附《亚洲问题》），海洋出版社，马汉海权论三部曲，2013。ISBN: 9787502785666

¹⁹ 参见 Alfred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 -- 1812)*", Boston, 1892; 中文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马汉海权论三部曲，海洋出版社，2013。

²⁰ 参见 Alfred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1897.

²¹ Alfred Mahan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00. 中文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附《亚洲问题》），海洋出版社，马汉海权论三部曲，2013。ISBN: 9787502785666

²² 参见 Alfred Mahan "*The 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Boston, 1905.

²³ 参见 Alfred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in History (1660 -- 1783)*", 中文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29 -

马汉认为，国家的位置和地缘政治地位应该根据 6 个标准来分析：

- 1) 国家的地理位置，其对海洋的开放性，与其他国家进行海上通信的可能性。陆地边界的长度，控制战略重要地区的能力。用你的舰队威胁敌方领土的能力。
- 2) 国家的“物理配置”，即海岸的配置及其上的港口数量。贸易繁荣和战略安全有赖于此。
- 3) 领土的长度。它等于海岸线的长度。
- 4) 统计人口。这对评估国家建造并维护舰船的能力很重要。
- 5) 国民性。人民从事贸易的能力，因为海权建立在和平及广泛的贸易之上。
- 6) 政府的政治本性。将最佳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大的海洋力量取决于此。²⁴

从上述标准可以清楚看出，马汉完全基于“海权”及其利益建立了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对于马汉来说，古代迦太基是海军的典范，而就历史而言，十七、十九世纪的英格兰离我们更近。

“海权”的概念对他来说是建立在“海上贸易”的自由之上的，而海军只是这种贸易的保证者。马汉走得更远，继续认为“海权”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卡尔·施米特的远见卓识），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因此注定要统治世界。

4.3 世界征服美国--昭昭天命

马汉的思想为全世界所接受，并影响了许多欧洲战略家。就连以提尔皮茨（Admiral Tirpitz）上将为代表的陆上和德国大陆也亲身接受了马汉的提纲，开始积极发展自己的舰队。1940 年和 1941 年，马汉的两本书也在苏联出版。

但马汉的著作主要是为美国和美国人准备的。马汉是门罗（Monroe）总统（1758-1831）学说的热心支持者。门罗总统于 1823 年宣布了美欧国家互不干涉的原则，并使美国权力的增长依赖于领土扩张到邻近领土。马汉认为美国有“海洋命运”，而这个“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²⁵ 包含在将整个美洲大陆进行战略整合，然后建立世界统治地位的第一阶段。

²⁴ 同上。

²⁵ 参见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Baltimore, 1935.

我们必须对马汉几乎是预言性的愿景表示敬意。在他那个时代，美国还没有进入世界先进强国的行列，而且其“海洋文明类型”也不明显。早在 1905 年，麦金德在他的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就将美国称为“陆地大国”，它们只是“外新月”的一部分，只是作为海上英格兰的半殖民地战略延续。麦金德写道：

“美国刚刚成为东方大国。他们不是直接，而是通过俄罗斯，影响欧洲力量平衡的。”²⁶

但早在麦金德的文字出现前 10 年，马汉上将就预言了美国的全球命运，成为领先的海上强国，直接影响着世界命运。

在美国对海权的兴趣中，马汉认为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1) 积极与英国海权合作；
- 2) 阻止德国海事主张；
- 3) 警惕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并加以抵制；
- 4) 与欧洲人协调针对亚洲各民族的联合行动。²⁷

马汉看到美国的命运不是被动地参与“外新月”外围国家的大背景下，而是在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马汉独立于麦金德对“海洋文明”的主要危险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种危险首先是欧亚大陆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其次是德国。与俄罗斯的斗争是海军的主要长期战略任务。

马汉将美国将军麦克莱伦（McClellan）在 1861-1865 年北美内战中应用的“蟒蛇”原则运用到全球层面。这一原则包括从海上和海岸线封锁敌方领土，逐渐导致敌方战略疲惫。既然马汉认为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其成为海上强国的潜力，那么一旦发生对抗，首要的战略任务就是阻止敌营形成海上强权。因此，美国历史对抗的任务是巩固其在六大要点（如上所列）上的阵地，并在相同要点上削弱敌人。必须控制自己的沿海地区，并且必须不择手段地尝试将敌人的沿海地区从其大陆上撕裂开。更进一步：由于门罗主义（在领土整合方面）增强了

²⁶ 见 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中文版: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同前(文献12)。

²⁷ Alfred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1897.

- 31 -

国家实力,所以不应该允许在敌人内部形成类似的整体阵型。相反,在马汉的情况下的敌人或对手,即欧亚大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应该用“蟒蛇”环来护卫大陆地区,以牺牲失控的海岸线为代价缩减大陆地区,并应尽可能封锁往返海洋的通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施这一战略是为了支持与欧亚大陆边缘的白人运动签订协议(作为对布尔什维克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的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转向了对抗中欧,特别是通过对抗轴心国和日本的海军行动。但在冷战时代尤为明显,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达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地缘政治在理论上运作的那种全球范围的程度。

事实上,北约以及其他旨在遏制苏联的集团战略主线(“遏制”的概念与“蟒蛇”的战略概念及地缘政治概念相同)、东盟、澳新美安全条约、“CENTO”(“中央条约组织”)CENTO是马汉上将主要论点的直接发展,由此他可以被称为所有现代大西洋主义的知识之父。

- 32 -

第5章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法国对抗德国”

5.1 法国地理概况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被认为是法国地理学院的创始人。作为一名专业的地理学家,他着迷于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尽管他严厉批评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许多方面。

在他的《法国地理图景》(1903年)一书中,他提到了对德国地缘政治如此重要的土壤理论:

“在法国,土地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古老、连续性的原始特征(.....)。在我国,人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人们从远古时代就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最初,泉水,钙岩吸引了人作为居住和保护便利场所。我们有一个研究土壤的忠实弟子。研究土壤将有助于了解人口的性格、习俗和喜好。”²⁸

但是,尽管对地理因素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持如此完全的德国态度,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认为,拉策尔和他的追随者显然高估了纯粹的自然因素,认为它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德·拉·布拉什看来,人也是“最重要的地理因素”,但人同时也有“主动性”。人不仅是布景的一部分,还是剧中的主角。

5.2 可能性论

这种对拉策尔过度提升空间因素的批评导致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可能性论”（*posibilism*，源自“*possible*”一词）。根据这一概念，政治史具有空间（地理）和时间（历史）两个方面。地理因素体现在环境中，历史因素体现在个人（“主动权的承担者”）。²⁹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认为，德国“政治地理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地形是国家政治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根据德·拉·布拉什的说法，人类自由和历史性的因素被贬低了。他本人提出将地理空间位置视为一种“潜力”、一种“可能性”，它可能会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因素，也可能不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在给定空间的人的主观因素。

德国地缘政治学豪斯霍弗学派也考虑了这种方法，他们认为德·拉·布拉什的批评是合理的、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或种族因素在考虑国家政治历史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加，

²⁸ Vidal de la Blache, “*Tableau de la Geographie de la France*”, Paris, 1903.

²⁹ Vidal de la Blache, “*Principes de Geographie Humaine*”, Paris, 1921.

- 33 -

这与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种族问题的普遍激增产生了共鸣。

大多数地缘政治学派认为德·拉·布拉什的“可能性论”是对先前地缘政治学作者僵化的地理决定论的修正。

5.3 法国主张“海上力量”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特别关注当时法国的主要政治对手德国。他认为，德国是唯一一个地缘政治扩张遭到其他欧洲发达国家蓄意阻挠的欧洲强国。如果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世界各地都有广阔的殖民地，如果美国可以几乎自由地向南向北移动，如果俄罗斯有亚洲，那么德国四面八方被挤压，她的精力没有出路。德·拉·布拉什认为这是对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并认为有必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削弱这个危险邻国的发展。

这种对德国的态度在逻辑上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法国被定义为“海上力量”共同战线的一部分，以对抗大陆列强。德·拉·布拉什的立场并不是法国地缘政治家中唯一的立场，因为还有一种相反的亲德倾向，它以海军上将拉瓦勒(Lavalle)和戴高乐(De Gaulle)将军为代表。

1917 年，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出版了《东法兰西》一书，他在书中证明了阿尔萨斯-洛林省与法国的传统联系，而德国对这些地区的诉求是非法的。同时，他呼吁法国大革命，认为雅各宾主义是法国人民所表达的地缘政治倾向，通过地理一体化，努力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他还通过人们对土地的依恋以及将土地变为私有制的自然愿望来解释政治自由主义。因此，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以自己的方式将地缘政治现实与意识形态现实联系起来：西

欧（法国）的空间政策与“民主”和“自由主义”密不可分。通过这样的等式，很容易使德·拉·布拉什的地缘政治观点更接近麦金德和马汉的观点。

德·拉·布拉什选择的“航海方向”非常适合这个方案。

第 6 章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 - “对麦金德的修订版，‘边缘地带’的中心性”

6.1 为美国服务

荷兰裔美国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Speakman, 1893-1943) 是马汉上将的直接继承人。斯皮克曼是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后来担任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对他来说，与最初的地缘政治家不同，对地理学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更不关心他的人民与土地的

- 34 -

联系，地形对民族性格的影响等等。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是特定国际政策最重要的工具，是一种分析方法和一套公式，可以制定最有效的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他严厉批评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特别是在《和平的地理》³⁰一书中），认为“正义或非正义的边界是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

与马汉一样，斯皮克曼也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明确希望提出最有效的地缘政治公式，使美国能够尽快实现“世界统治”。这种实用主义决定了他所有研究的结构。

6.2 对麦金德的校正

斯皮克曼仔细研究了麦金德的著作，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地缘政治基本方案，与麦金德的模型略有不同。斯皮克曼的主要思想是，据称麦金德高估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这种重新评估不仅影响了当前世界地图上实力的现状，特别是苏联的实力，而且还影响了最初的历史模式。斯皮克曼认为，“内新月”、“边缘地带”、“沿海地带”的地理历史是自行完成的，而不是像麦金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在“陆地游牧民族”的压力下进行的。在他看来，心脏地带只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可以接收来自沿海地区的所有文化冲动，本身并不承载任何独立的地缘政治使命或历史冲动。在他看来，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是统治世界的关键。

对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公式，“谁控制了东欧，谁就主宰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斯皮克曼建议用他的话取而代之：“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命运。”³¹

原则上，斯皮克曼对此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而对于麦金德本人来说，“沿海地带”、“外新月”或边缘地带是控制大陆的关键战略位置。但麦金德并不把这个区域理解为一个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地缘政治形态，而是作为“海洋”和“陆地”两种冲动之间的对立空间。然而，他

从来没有理解过，对心脏地带的控制是对俄罗斯及邻近大陆的权力。东欧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和边缘地带之间的中间空间，因此，世界霸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心脏地带边缘的力量平衡。但是，斯皮克曼在他的地缘政治学说中转移了麦金德观点的重点，并认为这是一种全新观点。事实上，这只是概念上的细微差别。

³⁰ Nicholas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1942. (ed. Helen R. Nicho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4)) 中文版：尼·斯皮格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³¹ 同上。

6.3 力量规模

在他的著作《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³²和《和平地理学》³³中，斯皮克曼确定了确定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力量的10个标准。这是他在马汉首先提出的标准上作的发展。这10条标准是：

- 1) 领土的表面
- 2) 边界的性质
- 3) 人口规模
- 4) 矿物质的存在与否
- 5) 经济与技术发展
- 6) 财力
- 7) 种族同质性
- 8) 社会融合程度
- 9) 政治稳定
- 10) 民族精神

如果根据这些标准评估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能力的总结果是相对较低的，这几乎自动意味着这个国家被迫结成更广泛的战略联盟，为了谋求全球性战略地缘政治防护而牺牲部分主权。

6.4 中部洋

除了重新评估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斯皮克曼还从“海权”的角度为世界地缘政治图景做了另一个重要补充。他介绍了“中部海洋”这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这种地缘政治观点的基础是强调了欧洲历史上的地中海、古代的中东与北非，同近代西方文明史上的大西洋之间的类比。斯皮克曼认为“沿海地带”，即边缘地带，是文明的主要历史领土，所以古代地中海地区在

在他看来似乎是一个文化的典范，文化随后传播到大陆（培养了陆地野蛮人），并只能通过海上航线（培养了海上野蛮人）到达偏远的领土。就像这种地中海模式一样，在最近的全球尺度扩大时代，大西洋也是如此，美国和欧洲都是西方文明技术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³² 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1942. 中文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王珊、郭鑫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³³ 作品。同上。

- 36 -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部洋”不是分裂的因素，而是统一的因素，即“内陆海”（*mare internum*）。因此，斯皮克曼勾勒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现实，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大西洋大陆”，其中心就像陆地区域的湖泊一样，是大西洋。这个理论上的“大陆”，“新亚特兰蒂斯”，与西欧起源的共同文化，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伦理和技术命运的统一相联系。

斯皮克曼特别强调了智力因素在这片“大西洋大陆”中的作用。西欧和北美东海岸带（尤其是纽约）正在成为新“大西洋社区”的大脑。美国及其工商业综合体是神经中枢和权力机制。欧洲原来是美国的精神附属物，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路线成为所有西方大国的唯一和主导地位。欧洲国家的政治主权也应该逐渐减少，权力应该移交给联合所有“大西洋”空间代表的特别机构，并服从于美国的优先领导。

斯皮克曼预测了最重要的政治进程：创建“北大西洋联盟”（后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削弱战后世界的欧洲大国主权、美国的全球霸权，等等。

6.5 美国胜利的建筑师

斯皮克曼学说的基础不是放置于美国作为全世界“海权”（如马汉所说）地位的地缘政治理解，或许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事实，而是放置于多么需要控制欧亚沿海地区，即欧洲、阿拉伯国家、印度、中国等，而在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决斗中取得最后胜利。在麦金德的描述中，全球的二元性被视为某种“永恒的”、“不可移动的”，但是斯派克曼相信“海上强权”对边缘地带的完美控制将导致对“陆地强权”的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胜利，这将从此被完全控制。

事实上，这是马汉已经证明的“蟒蛇战术”的终极发展。斯皮克曼将整个概念带入了最终形式。

美国作为“海上强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证明了斯派克曼在地缘政治上的绝对正确性，他堪称“自由民主国家战胜欧亚大陆的世界胜利建筑师”。

至此，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带战略霸权和“中部海洋”重要性的论点似乎已经被历史本身所证明。但麦金德关于欧亚中心对政治复兴和大陆扩张的持续渴望的理论还不能完全抛弃。

另一方面，斯皮克曼的一些想法（尤其是他的追随者柯克（Kirk），他更详细地发展了

边缘地带理论)得到了一些欧洲地缘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看到,斯皮克曼对“沿海领土”的高
- 37 -

度战略评估是一个让欧洲重新加入决定世界命运的国家行列的机会。但为此,不得不摒弃
“中部海洋”的概念。

尽管一些欧洲地缘政治家采取了这一理论上的举措(然而,这仍然非常模棱两可),斯皮克曼无疑属于最聪明和最坚定的“亚特兰蒂斯主义者”。而且,他与马汉上将一起被称为“大西洋主义之父”和“北约的思想启蒙者”。

- 38 -

第 7 章 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 - “大陆集团”

7.1 战争与思想

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 1869-1946)认为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事实,即长期以来,它不仅被视为“伪科学”,而且被视为“厌恶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的”、“食人的”理论。

卡尔·豪斯霍弗出生在慕尼黑的一个教授家庭。他决定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并在军队中担任军官二十多年。1908-1910年,他在日本和满洲担任德国武官。在这里,他遇到了日本天皇家族和最高贵族。

健康状况不佳迫使豪斯霍弗放弃了相当成功的军事生涯,他于1911年返回德国,并在那里生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从事科学工作,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称号。从那时起,豪斯霍弗就定期出版有关地缘政治的书籍,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他的第一本书是致力于日本地缘政治的《大日本》。³⁴

通过他的学生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豪斯霍弗在因政变失败而入狱后立即见到了希特勒。有一种未经历史学家证实的观点认为,豪斯霍弗在专门针对某些地缘政治类别的地方参与了《我的奋斗》的写作。但概念分析表明,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观点与希特勒简单化的种族主义宣传段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从1924年开始,20年来,豪斯霍弗出版了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期刊《地缘政治》(Geopolitik),该期刊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更名为《地缘政治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

他在这个版本中发表了他的大部分文本。豪斯霍弗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很复杂。在某些方面,他的观点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一致,在其他方面则大相径庭。根据纳粹统治时期和个人关系,豪斯霍弗在第三帝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直到1936年,他才受到宠爱(他的年轻朋友赫斯的赞助特别有效),后来才开始降温。

在赫斯逃往英国后，豪斯霍弗蒙羞，在他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因参与 1944 年对希特勒的暗杀企图而被处决后，豪斯霍弗本人几乎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

尽管他的立场模棱两可，但他还是被盟军列为“纳粹要犯”（“видные нациста”，“prominent Nazis”）之一。1946 年，卡尔·豪斯霍弗无法承受如此多的命运打击和所有希望的破灭，与妻子玛莎（Martha）一起自杀。

³⁴ Karl Haushofer "*Dai Nihon*", Munich, 1913.

7.2 欧亚新秩序

豪斯霍弗(Haushofer)仔细研究了（拉策尔）Ratzel、契伦(Kjellen)、（麦金德）Mackinder、（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马汉）Mahan 和其他地缘政治家的工作。对他来说，“海洋力量”对抗“大陆力量”，或“海权”（“海上力量”）对抗“陆权”（“陆地力量”）的二元论图景是揭示所有国际政治秘密的关键，这些活动他都是直接参与其中的。（例如，在日本，他同那些对空间图片做出最负责任决定的军方人员打过交道。）重要的是，纳粹积极使用的“新秩序”一词，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美国人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形式，首先在日本用于地缘政治计划，以重新分配太平洋地区的影响，被提议在日本地缘政治生活中加以实施。

“海权”和“陆权”的全球二元论使德国面临地缘政治自我认同的问题。民族理念的支持者和豪斯霍弗无疑属于他们的一员，他们寻求加强德国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意味着工业发展、文化热潮和地缘政治扩张。但德国在欧洲中心的位置，即空间和文化的中部位置，使它成为西方海上强国英国、法国、未来还有美国的天然对手。“海权”地缘政治学家本身也没有掩饰他们对德国的负面态度，并认为德国（与俄罗斯一起）是西方海上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要指望与“外新月”势力结成强强联合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对德国有历史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因此，大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于与海上力量实际上已被认同的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地缘政治对抗。

卡尔·豪斯霍弗及其追随者的整个地缘政治学说就是基于这种分析。这一学说是关于建立“大陆集团”或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的需要。这样的联盟并没有什么意外，它是对对方阵营战略的唯一全面而充分的回应，这并没有掩盖一个事实，即建立类似的欧亚联盟将是其最大的危险。豪斯霍弗在《大陆集团》一文中写道：

“欧亚大陆不能被扼杀，只要其最大的两个民族，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尽最大努力避免像克里米亚战争或 1914 年那样的自相残杀：这是欧洲政治的公理。”³⁵

在同一个地方，他引用了美国荷马李的名言：“当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联合起来时，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最后时刻将会到来。”

豪斯霍弗在他的文章和书籍中以各种方式追求这个想法。这条线索被称为 *Ostorientierung*，即“面向东方”，因为它假定德国、其人民及其文化，自我认同是欧亚、亚洲传统的西方延续。二战期间英国人贬称德国人为“匈奴人”并非偶然。对于豪斯霍夫学派的

³⁵ Karl Haushofer, “Kontinentalblock: Mitteleuropa, Eurasia, Japon” in “*Ausgewählte Texte zur Geopolitik*”, Boppard am Rhein, 1979. 或 Karl Haushofer, “*Der Kontinentalblock: Mitteleuropa, Eurasien, Japan*”, München, Zentralverl. d. N.S.D.A.P., 1941, 54 S.

- 40 -

地缘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在这方面，应该强调的是，豪斯霍夫对“开放东方”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占领斯拉夫土地”。这是两个大陆大国、俄罗斯和德国的共同文明努力，它们将建立“新的欧亚秩序”，并重新规划世界岛屿的大陆空间，使之完全脱离“海洋力量”的影响。豪斯霍弗计划扩大德国的领土（*Lebensraum*），不是通过殖民俄罗斯的土地，而是通过开发亚洲无人居住的巨大空间和重新组织东欧的土地。

7.3 与海权的妥协

然而，在实践中，这似乎并不那么明确。豪斯霍弗纯粹科学的地缘政治逻辑在逻辑上导致了与莫斯科建立“大陆集团”的需要，但它面临着许多不同性质的倾向，这也是德国民族意识所固有的。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主义历史观，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影响。这种方法被认为是种族接近的最重要因素，而不是地理或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将德国人视为天然盟友，因为德国人在种族上与他们最亲近。斯拉夫人，尤其是欧亚大陆的非白种人，变成了种族上的对手。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同一种族原则，马克思和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是犹太人。

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直接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暗中将德国人推向相反的、反欧亚的及海权的策略。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德国理应从一开始就与英国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但另一方面，凡尔赛宫的耻辱经历仍然记忆犹新。这种二元性反映了第三帝国国际政治的模棱两可。这一政策不断地在海权路线，表面上以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为理由（反斯拉夫态度，攻击苏联，在巴尔干地区推广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等），和基于纯粹地缘政治原则的欧亚陆权（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等）之间取得平衡。

由于卡尔·豪斯霍弗尔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他被迫将自己的理论适应于具体政治细节。这就是他在英国高层的联系方式。此外，缔结《反共产主义条约》，即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豪斯霍弗尔对外表示欢迎，试图将其作为建立一个成熟的“欧亚

集团”的初步步骤。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联盟的反共倾向，以及一个属于边缘地区而不是心脏地带中心（莫斯科）的半岛小国的出现，是对真正的“大陆集团”充满矛盾的讽刺画。

但是，这些因循守旧的政治措施并不能代表豪斯霍弗尔的地缘政治整体性。他的名字

- 41 -

和思想完全准确地体现在德国“东方命运”概念中，这概念正是基于强大而长期的欧亚联盟。

- 42 -

第 8 章 卡尔·施密特 - “巨兽贝希摩斯与海怪利维坦”

8.1 保守革命

德国人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被称为杰出的律师、政治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但他的所有思想都与地缘政治概念密不可分，他的主要著作有《大地的法》³⁶、《大地与海洋》³⁷等。这些著作致力于理解地缘政治因素及其对文明和政治史的影响。

卡尔·施密特与保守革命的德国代表关系密切，这是一个结合了民族保守主义和社会革命元素的自相矛盾的运动。施密特的命运就是他的著作、他的法律和哲学学派的命运。像许多其他保守的革命者一样，他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的理论确实影响了纳粹意识形态。他的政治学著作《政治的神学》³⁸和《政治的概念》³⁹特别成功。施密特在其中对自由法和“法治”理念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在这些文本中，已经给出了施密特所有后续智力工作的大纲；它们表现出极端的政治现实主义，渴望将政治科学问题从人道主义修辞、多愁善感和社会煽动中解脱出来。这完全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精神。

同时，施密特的整个构想都是基于“人民权利”（*Volksrechte*）的基本思想，他反对自由主义的“人权”理论。在他的理解中，每个民族都有权享有文化主权，维护自己的精神、历史和政治身份。同样的方法是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特点，他们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普遍的，适用于地球上的所有民族。但正是基于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方法的泛日耳曼主义成为该政权的主导路线。因此，施密特的“人民权利”理论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党卫军思想家的批评（1936年，党卫军机关报“施瓦茨军团”发表了一篇针对他的攻击性威胁文章）。施密特的意识形态形成与拉策尔和契伦的“有机社会学”思想的氛围相同，但他也受到“北方之光”（*Nordlicht*）浪漫主义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社会政治形式和国家的形成并不是根植于刻板的功能，或依照数学逻辑的原子特性来运作，而是根植于神话，根植于“元素和精神”的圣灵世界。⁴⁰ 在施密特的理论中，“政治浪漫主义”和“严格理性主义”的矛盾组合无处不在。精心磨练的心理设置可以用来表达精神神话。

³⁶ Carl Schmitt “*Der Nomos der Erde im Vö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 Köln, 1950. 中文版：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刘毅 张陈果译，2017。（陈

伟考虑到 Erde 包含大地、海洋，甚至空气，而 nomos 是相对于自然的概念，他建议本书名译为《地球的秩序》，见“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政治思想史》期刊，2010 年第 1 期，第 5 篇，共 19 页）

³⁷ Carl Schmitt "*Land und Meer*", Leipzig, 1942.

³⁸ Carl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Munchen-Leipzig, 1922. 中文版：卡尔·施密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 吴增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³⁹ Carl Schmitt "*Das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Grünwald, 1928; 中文版：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⁴⁰ Carl Schmitt "*Theodor Da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ue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e und die Aktualitaet des Werkes*", Muenchen, 1916.

- 43 -

在纽伦堡审判中，有人试图根据卡尔施密特与希特勒政权的合作将他归类为“战犯”。特别是，他被指控“从理论上证实军事侵略的合法性”。在法官详细了解案件实质后，指控被撤销。尽管如此，施密特与海德格尔、容格等“保守的革命者”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界不受欢迎的人物，他的著作完全被忽视。

直到 1970 年代，由于一些左派、社会主义思想家对法律思想的巨大影响，施密特的著作才开始逐渐恢复。

目前，他被公认为政治学和法学的代表人物。

8.2 大地的法

施密特完全本着地缘政治方法的精神，断言了政治文化与空间的最初联系。不仅国家，而且所有社会现实，尤其是法律，都源于空间的定性组织。

施密特由此衍生出“法”（“nomos”）的概念。这个希腊词“nomos”（νόμος）的意思是空间意义上的“获取、塑造、有序、有组织的东西”。这个术语与拉策尔的“救济”概念和俄罗斯欧亚人（萨维茨基（Савицкий））的“地方发展”概念很接近。施密特表明，“nomos”是一种存在的组织形式，它在社会整体内部和这些整体之间建立了最和谐的关系。“Nomos”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的特殊综合组合，有机地表现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创造中。在“nomos”中，人类集体的自然和文化特征与环境相结合。

在《大地的法》一书中，施密特展示了陆地空间的特殊性如何影响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和国家。他将各种历史的法相互比较，特别强调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对空间态度之间根本的二元论。

但从分析“大地法”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施密特接近了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全球历史文明对抗的概念。在探索大地法时，他遇到了与海洋法相对的定性的、本质上的对立面。这导致他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方法论来理解世界的政治历史。

8.3 陆地和海洋

- 44 -

1942 年，施密特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陆地与海洋》⁴¹，这本书以及他稍后的著作《东

西方全球紧张关系及陆地与海洋的对抗》⁴²，成了是地缘政治学最重要的文献。

施密特将陆地与海洋对立的意义归结为我们谈论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彼此不可还原的敌对文明，而不是单一文明复合体的变体。这种划分几乎完全符合麦金德所描绘的画面，但施密特对海权（海洋统治）和陆权（陆地统治）的主要要素进行了与基本法律和伦理制度相关的深入哲学解释。奇怪的是，施密特用“巨兽”这个名字来表示“大地的力量”，用“利维坦”这个名字来表示“海洋的力量”，以提醒读者旧约中的两个怪物，其中一个体现了所有土地生物，而另一个则体现所有水生、海洋生物。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地的“法”（“*Nomos*”）一直存在，无可替代。这种“法”的所有变体都以存在严格和稳定的法律（和道德）形式为特征，这反映了土地，地球的不动性和固定性。这种与大地的联系，其空间很容易结构化（固定的边界、通信路线的恒定性、地理和地形特征的不变性），在社会、文化和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保守主义。大地的“法”的那个整体就是所谓的“传统社会”的历史。

在这种情况下，海洋、水面只是外围的文明现象，并没有侵入“伦理”领域（或偶尔侵入）。直到 16 世纪末世界海洋的开放，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英格兰岛）开始习惯于“海洋的存在”，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水域中的一个岛，一艘船。

但水域面积与陆地面积截然不同。它是无常的、敌对的、疏离的、不断变化的。路径不固定，方向差异不明显。海洋的“法”（“*Nomos*”）需要全球意识的转变。社会、法律和道德标准变得“流动”。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了。施密特认为，新时代和开启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突破，归功于人类向海洋法过渡的地缘政治现象。

因此，“外新月”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地缘政治对抗从施密特那里获得了社会政治定义。海洋法是对传统社会充满敌意的现实。陆上大国与海上大国的地缘政治对抗具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思想意义和哲学意义。

8.4 大空间（*Grossraum*）

施密特发展了另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理论：“大空间”理论（*Grossraum*）。这个概念考虑了空间状态的发展过程作为获得最大领土量的愿望。帝国一体化的原则是人类表达合乎逻辑

⁴¹ Carl Schmitt “*Land und Meer: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Klett Cotta, 2018.（首次出版于 1942 年。）

中文版：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⁴² Carl Schmitt “*Die planetarische Spannung zwischen Ost und West*”, 1959 in “*Schmittiana-- III*” von Prof. Piet Tommissen, Brussel, 1991.

的、自然的愿望。因此，国家领土扩张的阶段与人类精神向普遍主义运动的阶段相对应。

这一地缘政治规律适用于技术和经济领域。施密特表明，从某个时刻开始，国家的技术

和经济发展需要其领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加。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殖民、吞并、军事入侵。也可以由几个国家或民族，在采用单一宗教或文化形式的基础上，根据其他法律来形成大空间（Grossraum）。

施密特认为，发展大地法应该导致大陆国家的出现。变化的几个阶段是：从城市国家，经过领土国家，变为大陆国家。由大陆国家，到大陆大空间的演变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必然。⁴³

在 1940 年的《国际法中的空间和大空间》一书中，施密特对“大空间”的定义是：“规划、组织和人类活动的领域，植根于未来发展的当前和浩瀚的趋势。”为了澄清这个有点模糊的提法，施密特指出，实施美国门罗主义是创造“大空间”强烈意愿的一个例子。⁴⁴

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大空间可以等同于国家，更准确地说，可以等同于帝国（das Reich），但这个概念超越了普通国家。这是一种基于战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新型超国家联合形式。

与希特勒的泛德统一模式和苏联国际主义不同，施密特的大空间建立在文化和种族多元化、广泛自治的基础上，仅受战略集中制和对最高权威的完全忠诚的限制。同时，施密特强调，创造一个新的“大空间”既不取决于学说本身的科学价值，也不取决于文化能力，也不取决于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甚至也不取决于推动一体化的领土和民族中心的经济发展。这完全取决于承认这一地缘政治行动历史必要性的政治意愿。

施密特在这一学说中预见了现代一体化政策的主要路线。

8.5 全面战争和“游击队”形象

在施密特所考虑的几乎所有话题中，地缘政治动机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特别探讨了“全面敌人、全面战争、全面国家”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全面国家”是传统类型

⁴³ Carl Schmitt “Raum und Grossraum im Völkerrecht”, 1940; 同上。按 Julien Freund “Les lignes de force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Carl Schmitt” 见“Nouvelle Ecole”, No. 44, Paris, 1987.

⁴⁴ 同上。

国家的最完美形式，即地球“秩序”（nomos）（或“大地法”）的发展高峰。尽管这种国家的历史演变可能达到大空间的规模，但它的本质保持不变。“全面国家”排除了“全面敌人”和“全面战争”的概念，因为“全面国家”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敌人”一词的定义十分重要（而施密特重视“朋友”/“敌人”（amicus/hostis）概念的措辞），因此他提出了“形式战争”的概念，而“形式战争”是由战争权（Jus bellum）进行的，所以只涉及有限的职业军人。反过来，平民和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并且（至少在理论上）被排除在战争之外。

施密特独特地将自由主义与新时代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将自由主义和“海洋文明”，

和海洋“法”（“nomos”）联系在一起，同时否认“全面国家”，而为“全面战争”，为“全面敌人”的概念打开了道路。1941年，施密特在《国家主权与公海》一文中写道：

“陆地战争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即交战国家的武装部队之间的战争。它的合理性表现在它的局限性，以及将平民和私人财产带出边界的愿望上。相反，海上战争不是严格定义和法律规定的对手之间的战争，因为它是基于全面敌人的概念。”⁴⁵

施密特描述的总体地缘政治图景被简化为一种紧张的文明二元论，两个大空间，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美国）和欧洲大陆、欧亚大陆的对立。海权和陆权这两个“大空间”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全球大战，以向普遍化，从统治大陆走向统治世界迈出最后一步。同时，施密特对是否有可能将这场冲突简化为某种严格的法律基础持悲观态度，因为上述两个“大空间”的文明宏观概念都是基于相互排斥的“秩序”（nomos）——“地球秩序”和“海洋秩序”。最后一个破坏性因素是由发展航空学引入的，因为“空域”比海洋空间更不利于道德和法律的结构化。

施密特在生命尽头，将注意力集中在“游击队”形象上。根据施密特的说法，这个形象是地球秩序（nomos）的最后一个代表，尽管文明消失、其法律和文化基础瓦解，他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初心。“游击队”通过非正式联系与他的祖国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的历史性质决定了战争伦理的基础，这与更普遍和抽象的规范截然不同。随着“海洋模式”和“贸易伦理”变得普遍化，当然也包括军事行动领域，根据施密特的说法，“游击队”的形象获得了更大的文明意义，因为“游击队”仍然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在海洋统治的全面进攻下（无论如何）捍卫“地球秩序”的人物。由此遵循其近乎“救世论”的历史功能。

⁴⁵ Carl Schmitt “Staatliche Souveränität und Freies Meer” in “*Das Reich und Europa*”, Lipsig, 1941.

第9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萨维茨基 - 《欧亚中土大陆》

9.1 欧亚大陆的命运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萨维茨基（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авицкий, Pyotr Nikolayevich Savitsky, 1895-1968年）可能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从字面上看，可以被称为地缘政治家的俄罗斯作家。他是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是弗·维纳茨基（В. Вернадский, V. Vernadsky）和彼·斯特鲁弗（П. Струве, P. Struve）的学生。战前他与立宪民主党关系密切。革命后移居保加利亚，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他与尼·特鲁别茨戈伊（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N.S. Trubetskoy）王子一起领导了欧亚运动，其中地缘政治因素发挥了核心作用。对所有欧亚人的地缘政治最感兴趣的是萨维茨基。

与大多数其他欧亚人一样，萨维茨基的世界观是在斯拉夫派，丹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 Danilevsky），尤其是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 Leontiev）作品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是一种革命的斯拉夫主义，再加上“大俄罗斯人”特殊历史认同的核心思想，它既不能归根于宗教，也不能归根于种族上的斯拉夫本质。在这方面，他们最接近康斯坦丁·列昂蒂耶夫（Konstantin Leontyev），他提出了最重要的论点“有斯拉夫主义，就没有斯拉夫主义”，即“斯拉夫民族的种族和语言上的亲密关系不足以成为谈论他们文化和特色统一的充分基础。”欧亚运动在其最喜欢的主题和概念方面与德国保守革命者惊人地接近。就像保守的革命者一样，欧亚主义者努力将对起源的忠诚与对未来的创造性冲动结合起来，植根于俄罗斯民族传统与社会现代主义、技术发展和非传统形式的政治。这也是欧亚主义者对苏维埃国家和十月革命持谨慎积极态度的基础。

萨维茨基对苏维埃表示同情，这么说不仅由于他属于欧亚大陆派（即出版报纸《欧亚大陆》的巴黎圈子）中公开的亲苏者，萨维茨基与这些欧亚派正式断绝了关系，这么说也由于他属于最温和与最“保守”的那个派系。尽管如此，1945年苏联军队攻占布拉格后，萨维茨基还是被捕并被判处10年集中营监禁。在集中营中，他遇到了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儿子列夫，后者成为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当代俄罗斯最优秀的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1956年，萨维茨基恢复名誉并返回布拉格，12年后他在布拉格去世。

9.2 俄罗斯-欧亚大陆

萨维茨基的主要思想是，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文明形态，通过“陆地中部”的质量来定义。他的一篇文章“欧亚主义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1933年），开头第一句就是“俄罗斯比中国更有理由被称为‘中国’（Middle State）”。⁴⁶

⁴⁶ Петр Савицк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евразийства", 见"Элементы" № 3,第 51-54 页, 1933.

如果说德语“中间位置”（Mittellage）的“中间”仅限于欧洲语境，而欧洲本身只是欧亚大陆的“西海角”，那么俄罗斯在整个大陆上处于中间地位。对萨维茨基来说，俄罗斯的“陆地中部”是其历史身份的基础；它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也不是亚洲的延续。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精神和历史地缘政治现实，萨维茨基称之为“欧亚大陆”。

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欧亚大陆是一个大陆体或是一个洲，而是反映在俄罗斯空间和俄罗斯文化中的一种思想，一种历史范式，一种特殊的文明。来自俄罗斯极地的萨维茨基提出了一个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图景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抽象的“土地掠夺者”或“来自历史地理枢纽的向心冲动”，从他那里获得了明确定义的俄罗斯文化轮廓、俄罗斯历史、俄罗斯国家，及俄罗斯领土。萨维茨基中的“俄罗斯-欧亚大陆”与拉策尔的“空间”（Raum），更

准确地说，和施密特的“大空间”（Grossraum）相同。

如果麦金德认为机械冲动来自心脏地带的沙漠，迫使沿海地区（“内新月”）创造文化和历史，那么萨维茨基认为，俄罗斯-欧亚大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是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综合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同时，俄罗斯的自然界也参与建立俄罗斯文化。

萨维茨基从地缘政治角度理解俄罗斯，不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明，它是在雅利安-斯拉夫文化、突厥游牧制度和东正教传统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共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间”形态，它是世界历史的综合体。

萨维茨基认为大俄罗斯人不仅是东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帝国种族结构，它结合了斯拉夫和突厥的底层。这一刻将他带到了图兰的重要话题。

9.3 图兰

对于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来说，将图兰视为一个积极的方向是可耻的。因此，萨维茨基间接证明了蒙古-鞑靼枷锁的合理性，“俄罗斯获得了地缘政治独立，并在侵略性的罗马-日耳曼世界中保持了精神上的独立”。这种对突厥世界的态度，旨在将俄罗斯-欧亚大陆与欧洲及其命运彻底分开，以证实俄罗斯人的种族独特性。⁴⁷

“没有鞑靼人就没有俄罗斯”来自萨维茨基的文章“草原与定居点”，这个论点是欧亚主义的关键公式。因此，直接过渡到纯粹的地缘政治声明就是：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在世界历史的空间中，西欧对海洋的感觉，虽然是两极的，但只有受到蒙古人对大陆感觉的反对；同时，俄罗斯的“探险家”中，在俄罗斯征服和发展的范围

⁴⁷ П.Н. Савицкий "Степь и Оседлость" 见 "На Путиях: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Берлин, 1922, 第 341-356 页。

内，有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大陆感受。”⁴⁸

还有：

“俄罗斯是大汗的继承人，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事业的继承者，是亚洲的统一者。.....它结合了历史上的‘定居’和‘草原’元素。”⁴⁹

俄罗斯景观的基本二元性，即森林和草原的划分，甚至被斯拉夫派注意到。对于萨维茨基来说，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意义似乎是欧洲森林和亚洲草原这两个现实的综合。同时，这样的综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个地缘政治体系相互叠加，而是一种整体的、原创的、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和方法论的学说。

俄罗斯-欧亚大陆并未完全沦为图兰。俄罗斯-欧亚大陆包含更多的内涵。但对于把超越“沿海”意识的一切都视为“野蛮”的欧洲而言，俄罗斯人自称是“蒙古精神的承载者”，这是一种暴露欧亚人历史和精神优越性的挑衅。

9.4 地区发展

在萨维茨基的理论中,“地区发展”(location development)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该术语与空间(Raum)的概念完全类似,正如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和德国地缘政治学(+ 契伦)一般解释的那样。在这一概念中,与德国人完全对应的欧亚人的“有机主义”体现在“有机主义”学派中,与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家的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斯比克曼知道萨维茨基的作品,他对“形而上学废话”的愤怒甚至会比豪斯霍弗还要强烈。萨维茨基在《俄罗斯-欧亚大陆地理概况》中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社会政治环境及其领土’应该合并为一个整体,合并为一个地理个体或景观”⁵⁰。

这就是“地区发展”的本质,其中客观与主观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概念综合。在同一篇文章中,萨维茨基继续说:

“需要综合。需要能够立即查看社会历史环境及其所占据的领土的能力”⁵¹。

在此,萨维茨基接近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就像法国地缘政治一样,以文化类型来证明了法国不可分割,而无论阿尔萨斯-洛-雷恩的民族身份如何,萨维茨基认为:

⁴⁸ 同上

⁴⁹ 同上

⁵⁰ П.Н. Савицк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оссии-Евразии" в сборнике "Мир России -- Евразия", 1926, стр. 219 - 232.

⁵¹ 同上

“俄罗斯-欧亚大陆是‘地区发展’、‘单一整体’、一个‘地理个体’,同时也是一个‘地理、民族、经济、历史等方面的’景观”⁵²。

俄罗斯-欧亚大陆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发展”,它是许多较小的“地区发展”的整体存在形式。就像施密特大空间(Grossraum)是由整个较小空间(Raum)的层次结构组成。

通过引入“地区发展”的概念,欧亚人摆脱了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分解的实证主义需要,将它们分解为不仅与自然现象有关,而且与文化现象有关的机械系统。对“区位发展”、“地理个体”的诉求使欧亚主义者能够避免在民族、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问题方面过于具体。所有“历史地理枢纽”的居民都直观地感受到地缘政治统一,因此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是“合成的”,而不是简化成西方理性主义的不恰当、支离破碎、分析性概念。

这也体现了萨维茨基对俄罗斯知识传统的连续性,此传统一直致力于理解“整体”、“社区”、“团结”等。

9.5 意识形态管制

萨维茨基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意识形态管制”原则。萨维茨基认为，建立欧亚国家应该从最初的精神冲动出发，自上而下。因此，它的整个结构必须按照先验的理念来创造，而一个特殊的“精神领袖”必须站在这个结构的顶端。这一立场非常接近施密特关于“意志”、“精神”冲动的理论，大空间（Grossraum）就是源自这一理论。

意识形态管制假定对国家结构首先要采取非实用、非物质和非商业的方法。根据萨维茨基的说法，“地理人格”的优势在于能够超越物质需求，将物质世界有机地纳入全球历史创造的单一精神和创造性冲动中。

意识形态管制是一个涵盖所有形式的、基于非物质主义和非功利主义动机的、非民主非自由政府术语。而且，萨维茨基刻意避免澄清这个概念，它可以体现在神权的老生常谈、人民君主制、民族专政和苏维埃式的政党国家中。这一术语的广度对应于欧亚主义的纯粹地缘政治视野，涵盖了巨大的历史和地理卷。这是一次最准确地表达大陆直觉意志的尝试。

显然，意识形态管制与主导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学说的实用商业方法直接相反。因此，俄罗斯欧亚人最终明确了意识形态术语，其中海陆历史冲突已经显现出来了。海洋一方

⁵² 同上

- 51 -

崇尚自由民主、“商贸体制”、实用主义。陆地一方则是（各种）意识形态管制、“等级统治”、宗教理想支配。

萨维茨基关于意识形态管制的观点与德国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后者将所有社会模式和类型分为“英雄”和“商人”两大类。在地缘政治层面，“英雄”、“英雄主义”这个词失去其隐喻和可悲的意义，成为了专指意识形态管制的法律和伦理术语。

9.6 苏联和欧亚主义

彼得·萨维茨基以及更广泛地说，俄罗斯欧亚主义在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奇怪的是，西方教科书很少关注这个方向。在萨维茨基，我们有一个完全有意识、负责任和称职的地缘政治家，他充分、合理地表达了心脏地带的立场，而且从俄罗斯最深处的地区开始。萨维茨基的地缘政治学说与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和其他“海权主义者”的观点直接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谈论对替代学说的完整和详细介绍，该学说详细分析了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种族因素。用卡尔·施密特的术语来说，萨维茨基和欧亚人是当前状态下“地球之秩序”的代言人，是陆权的继承者，是大空间的思想家，是盎格鲁-撒克逊大空间的替代品。

将俄罗斯欧亚主义者的思想与德国大陆地缘政治家（豪斯霍弗、施密特等）的理论进行比较，后者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海权”战略的对立面，德国人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仅到一半，而俄罗斯人（首先是萨维茨基），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完整、一致、全面的世界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推导出一条规律：“德国大陆主义者的观点越接近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他们就越完全接受东方主义，他们的学说越一致和合乎逻辑，他们在地缘政治基础上制定的政治计划就越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接近萨维茨基的是德国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恩斯特·尼基什，他们很清楚德国地缘政治地位的二元性，与俄罗斯绝对的文化和大陆“中间”相比，德国的“中间”是相对的和次要的。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德国不能声称自己是地缘政治综合体的角色，它必须在西南方的、憎恨斯拉夫的、天主教的，以及在某些方面，“海权的”（资产阶级）德国（与奥地利一起），和北德国-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的、亲俄的、新教的及斯巴达普鲁士之间做出选择。恩斯特·涅基什（Ernst Niekisch）拥有著名的地缘政治论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弗莱辛的欧洲》，只有德国人的这种做法才能和谐地融入始终如一的大陆欧亚主义。自然，靠着奥地利天主教的、反共的和厌恶斯拉夫的希特勒路线，无论一些历史上更负责任的保守革命者和地缘政治人士如何努力纠正，都无法避免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它的历史存在。因为正是这些力量，即“永恒的联盟”，带来噩梦般的失败，也使得德国人只能成为全球陆权统治的帮凶。

- 52 -

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联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与萨维茨基和其他欧亚人的概念相吻合，尽管没有可靠的数据表明他们对苏联领导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接近欧亚主义者的方面，斯米诺维希派（Smekhovkhists）和民族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尼古拉·乌斯捷里亚洛夫（Nikolai Ustryalov），显然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斯大林，尽管他们从未担任过高位并且经常在集中营中结束生命。部分欧亚人埃夫隆（Efron）、卡尔萨文（Karsavin）等，公开与苏联合作，但也没有收到任何感谢。然而，对改革开始前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始终遵循欧亚路线，从未公开宣布这一点。

在这里只能做一个假设：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内部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组织，它以萨维茨基的思想为指导，使它们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并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词汇来装扮它们，要么是心脏地带的客观立场，迫使苏联惯性地采取那些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欧亚大陆国家应该已经采取的步骤。

- 53 -

第 10 章 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地缘政治

10.1 全球二元论是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

总结对地缘政治科学创始人的思想的简要了解，可以得出几个一般性结论。

尽管观点多种多样，但我们仍然在处理某种统一的世界图景，这可以称为地缘政治。这幅世界图景试图在分析历史进程、国际和国家间关系时同时包含地理、政治科学、意识形态、民族志、经济等几种学科的方法。这是所有地缘政治学说的主要特征，即渴望跨学科综合。

所有地缘政治家共享的最常见的方法论公式是断言存在根本的历史二元论。一方面是土地、陆权统治、大陆“法”（*nomos*）、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中土大陆”、理念管制文明、“历史的地理枢纽”；另一方面是海洋、海权统治、海上力量、海洋“法”、大西洋世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贸易文明、“外部或岛屿新月”。这可以看作是地缘政治的主要规律。没有这种二元论的假设，所有其他结论都失去了意义。由于在特定方面存在分歧，地缘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中没有一个人质疑这种对抗的事实。就其重要性而言，它堪比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

10.2 地缘政治必然带有偏见

地缘政治创始人观点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不断参与政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家会被禁止参与他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由此可见，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明显偏袒。从事科学研究的地缘政治家必须确定自己在地缘政治两极地图上的位置；他分析所有世界进程的观点将取决于此。在整个地缘政治史上，我们没有遇到过一个对其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作家，他不会认同他的主要伦理和历史取向。这在极端情况下尤为明显。盎格鲁-撒克逊的作者们无可挑剔、毫不含糊地遵循海权、海洋统治的逻辑和价值体系，从大西洋主义的无条件支持者的立场制定他们的理论；俄罗斯欧亚人同样忠于心脏地带的理想，他们甚至不质疑意识形态和俄罗斯-欧亚大陆的绝对伦理和历史优势。

法国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在理论上可以选择自我认同，要么是海权统治，要么是陆地权统治。在第一种情况下，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团结一致，与海上力量团结一致，在第二种情况下，亲德意志主义。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无条件同情国家。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趋势都存在于法国地缘政治中，但最和谐的地缘政治概念是由一群“亚特兰蒂斯主义者”开发的，

- 54 -

他们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追随者，他仍然是该地区的核心人物。从理论上讲，他的地缘政治对立面拉瓦勒（Lavalleye）和戴高乐远不如他。

德国也有双重情况。如果总体而言，其地缘政治思想主要是大陆的和“欧亚”的，那么这种取向仅限于与斯拉夫世界、亚洲，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复杂关系。这一限制如此重要，德国企图自愿将其中欧地位等同于中欧亚地位，从而无视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历史意义，如此顽固，以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不仅被迫与海权大国作战，但也反对其合乎逻辑的欧亚

盟友俄罗斯（苏联）。可以说，德国地缘政治的特点是“非欧亚”大陆主义。这种态度总结了整个德国历史的地缘政治公式，并决定了德国民族意识的结构。

地缘政治学需要首先确定自己在世界地缘政治地图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麦金德计划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证），这影响了一个事实，即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由主要大国的代表发展起来的，他们的野心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Weltmacht）、“超级大国”，实现对地球的统治。

美国人马汉和斯皮克曼、英国人麦金德则代表“新月岛”。他们是大西洋主义、陆权政体“代言人”。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和他的学派）代表大西洋主义法国。拉瓦尔和戴高乐倾向于大陆主义、“欧洲主义”、反大西洋主义。因此，尽管他们属于两个敌对阵营，但他们共同的亲德使他们在地缘政治上更加接近：拉瓦尔是维希合作主义政府的首脑，戴高乐是反法西斯法国军队的领袖。

德国人拉策尔、豪斯霍弗、施密特将德国与土地轴心、地球政体等同起来，力求从德国创造一个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海权政体的“大空间”。瑞典人鲁道夫·契伦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然而，他认为是中欧、德国欧洲空间的代表，而不是“狭隘的瑞典”民族主义者。最激进的大陆主义者是恩斯特·涅基什（Ernst Nikisch）、弗里德里希·乔治·杨格（Friedrich Georg Junger）、亚瑟·缪勒·凡·登·伯卢克（Arthur Müller van den Broek）等。他们走得更远，相信德国的未来只在于与欧亚俄罗斯的战略融合。

最后，俄罗斯欧亚人（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Трубецкой）等）表达了大陆主义最完整的版本，表达了这片土地“秩序”最激进的立场，即陆权政体。

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家中没有任何知名人士（尽管在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罗马尼亚、荷兰等地有这样的名字），这是因为基本的地缘政治二元论仅间接地涉及次要国家，它们对全球对抗进程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地缘政治的本质、它的尖锐性、相关性、它的“决定性”维度与这些人完全无关。

- 55 -

10.3 各大国地缘政治学家的命运

地缘政治学家的公民身份最直接影响他们的观点。这里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家，本质上是那些具有最大洞察力和责任感的人，能够在空间领域认清全球发展的历史趋势，了解其国家和人民在此背景下所处的位置，并为未来制定合理且最有效的方案。因此，它们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历史，然而，这是由完全不同的力量、团体、政党、领导人在完全不同的、与时俱进的口号下行事的。

但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模式。地缘政治家对权力的直接影响程度、科学发展之间的反馈以

及各国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进程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马汉、斯皮克曼和麦金德在各自国家担任要职，他们的政治活动取得了最直接的成果，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直接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尽管与他们国家的科学界发生了一些摩擦，他们的思想对整个“海洋文明”整体的意义受到了一些（战术上的）压制，但他们一生享有荣誉，他们得到了各种支持，他们的命运和事业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大陆地缘政治的情况有所不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被认为只是一位寻求将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政治规模的地理学家。政府对他的态度是尊重的，但总体上是冷漠的，尽管采用了许多实际原则（特别是在“法国东部”中规定的那些原则）。他不像英裔美国人享有同样的声望，但他的理论传统还是被考虑在内。

对于德国人，尤其是豪斯霍弗和施密特来说，情况已经更加严重了。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还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对他们的态度都在不断变化，从当局的一定关注转向直接压制。与“海权政体”的地缘政治家相比，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的事业是曲折的，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成为那些政权的受害者，尽管此时国家目标与他们自己的目标大体一致。不再有荣誉和尊重，而是歇斯底里的关注，以及交替出现迫害。

对于欧亚人来说，情况更加悲惨。这里没有直接的关注，官方资料中没有提及，只有集中营、流放、逮捕、完全无视的迫害。尽管在苏联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国际层面的主要决定似乎是由彼得·萨维茨基的追随者做出的，但出版欧亚人作品的每一环节都受到审查。转折点出现在 1989 年，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人能够连贯地解释传统外交政策的逻辑，因此，巨大的欧亚有机体遭到闪电般急速破坏，这是由三代人经受了战争、艰辛、苦难，难以忍受的艰辛。

地缘政治家的人格在权力影响方面的作用在东西轴线上急剧下降。与马汉和斯皮克曼所受到的崇敬南辕北辙，施密特受到党卫军持续威胁，豪斯霍费尔遭遇迫害（他的儿子被枪杀），更有甚者萨维茨基和卡尔萨文被关进了集中营。引人注目的是，最后，正是那些最乐意倾听

- 56 -

地缘政治家想法，并重视他们意见的国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并接近最终实现独霸世界。而德国则漠视豪斯霍费尔关于“大陆集团”的著作，以致半个世纪来这一学说被迫退出历史，惨遭惨败，政治上被遗忘殆尽。苏联不重视最负责任、最深刻、最有远见的俄罗斯爱国者的著作，放弃战斗和抵抗，发现自己处于与战后德国几乎相同的境地，世界影响力化为乌有，空间急剧减少，经济和社会领域变成废墟。

- 57 -

第二部分 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与学派

（20 世纪下半叶）

第 1 章 概述

地缘政治思想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大体上遵循了这门科学创始人所勾勒的路径。豪斯霍弗及其学派的历史笼罩着知识分子与第三帝国合作的不祥阴影，这迫使该学科的作者们绕道而行，以免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所以，美国人格雷（Colin S. Gray）一般建议用两个词来表示地缘政治：英语的“geopolitics”和德语的“Geopolitik”。第一个应该表示这种现象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实用主义版本，即那些继承了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方法的作者的作品，第二个是“大陆版本”，豪斯霍弗学派的遗产，它考虑了一些“精神”或“形而上学”的因素。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武断的，只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蛊惑人心的举动。

地缘政治中的美国路线，更广泛地说，大西洋主义（海权主义）路线的发展几乎没有与传统发生任何断裂。随着美国人实施成为“世界大国”的计划，战后的地缘政治学家只对理论的特定方面进行了提炼和详细说明，开发了应用领域。“海权”的基本模式及其地缘政治前景已经从个别军事地理学派通过科学发展而演变为美国官方国际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并进入最后阶段，在最后的海洋统治全球霸权之前，迫使美国地缘政治家考虑一种全新的地缘政治模式，参与其中的不是两股主要力量，而是只有一股力量。此外，事件的发展基本上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西方在与东方的地缘政治决斗中取得最终胜利，要么是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会聚成一个统一体，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项目被称为“世界主义”（mondialism），来自法语单词“monde”，即“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从地缘政治角度重新理解文明史的这种可能结果。这种情况导致了地缘政治的一种特殊趋势，即“世界主义地缘政治”。否则，这个理论就被称为“世界新秩序”学说。它自 70 年代以来由美国地缘政治家提出，并在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由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首次强势宣布。

欧洲地缘政治作为二战结束后独立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在 1959-1968 年这一相当短暂的时期，“大陆主义者”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时，情况才有所改变。从 1963 年开始，戴高乐采取了一些明显的反大西洋措施，导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联盟，并试图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但是，由于法国本身无法抵抗海权世界，欧洲内部法德合作和加强同苏联联

- 58 -

系的问题已提上议程。戴高乐主义的著名论断“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由此诞生。在温和的“欧洲大陆主义”精神下，这个欧洲被构想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主权大陆实体。

同时，到了 1970 年代初期，美国地缘政治研究极为火爆的时候，欧洲科学家也开始加入这一进程，但与此同时，他们与战前地缘政治学派的联系已经中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迫适应盎格鲁-撒克逊方法的规范。因此，欧洲科学家充当北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

技术专家，从事应用地缘政治研究，不超越狭隘的具体问题。渐渐地，这些研究变成了独立于“区域地缘政治”的东西，在法国相当发达（“伊夫·拉科斯特学派”，《希罗多德》杂志的出版商）。这种“区域地缘政治”从麦金德、马汉或豪斯霍弗的全球方案中脱颖而出，对基本的二元主义漠不关心，只使用地缘政治方法来描述种族和国家冲突、人口流程甚至“政治选举地缘政治”。

自战前以来，欧洲唯一保留下来的地缘政治传统是相当边缘群体的财产，或多或少与战后民族主义政党及运动有关。在这些狭隘和政治边缘的圈子中，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可以直接上溯到“大陆主义”、豪斯霍夫学派等。这一运动被统称为欧洲“新右翼”。直到某个时刻，公众舆论根本不理他们，认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残余”。仅在最近十年，特别是由于法国哲学家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t）的教育与新闻活动，这个方向才开始在严肃的科学界受到关注。尽管欧洲“新右翼”的知识界与当局及其“异见”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但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对地缘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摆脱了政治墨守成规的框架，他们的思想相对独立、公正地发展起来。此外，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时，这种情况发展到，欧洲的官方地缘政治家（大多数来自左翼或极左政党）被迫转向“新右翼”，这反映在他们的作品、翻译和研究中，以复现完整的地缘政治图景。

最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被官方认定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伪科学”，地缘政治在苏联并不存在。其职能由几个学科承担：战略、军事地理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地理学、民族志等。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联在全球舞台上的一般地缘政治行为揭示了一种相当理性的行为模式。苏联希望加强其在欧亚大陆南部、在“沿海地区”的地位，苏联渗透到非洲，破坏南美洲的稳定行动（旨在根据门罗主义分裂北美国家控制的空间），苏联军队甚至入侵阿富汗（为了切断美国的“蟒蛇”，它试图将“海权国家”的战略边界靠近“历史地理枢纽”的南部边界）等。苏联如此一贯且在地缘政治上合理的政策表明

- 59 -

存在某种“决策中心”，其中汇聚了许多传统科学的成果，并在此“信息”的基础上，“综合”出了最重要的战略步骤。然而，这个“加密地缘政治”中心的社会定位似乎存在问题。有一个版本是关于苏联格鲁乌（情报总局）的某个秘密部门的。

事实上，地缘政治完全是由边缘的“持不同政见者”圈子发展起来的。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代表是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尽管他在作品中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或“欧亚主义”一词，而且他千方百计避免直接提及社会政治现实。由于这种“谨慎”的做法，即使在苏维埃政权下，他还是设法出版了几本关于民族志史的书籍。

在华约和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再次与俄罗斯社会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废除使得最终有可能直言不讳。民族爱国圈率先参与地缘政治复兴也就不足为奇了（《每日邮报》（“День”）、《元素》杂志（“Элементы”）。这种方法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些“民主”运动掌握了主动权。改革后不久，地缘政治成为整个俄罗斯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就是现代俄罗斯对欧亚人及其遗产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

- 60 -

第2章 现代大西洋主义

2.1 斯皮克曼的追随者——D.W.梅尼格、W.柯克、S.B.科恩、K.格雷、G.基辛格

1945年以后地缘政治中美国纯大西洋主义路线的发展，基本上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Spykman）论文的发展。正如斯皮克曼通过修正麦金德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一样，他的追随者主要是修正了他的观点。1956年，斯皮克曼的学生梅尼格（D. Meinig）发表了《欧亚历史中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一书。梅尼格特别强调，“地缘政治标准应特别考虑人口和国家的功能定位，而不仅仅是领土与陆地和领土与海洋的纯粹地理关系。”这清楚地表明了维达尔·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的影响。⁵³

梅尼格说，欧亚边缘的整个空间根据其功能和文化倾向分为三种类型。

“中国、蒙古、越南北部、孟加拉国、阿富汗、东欧（包括普鲁士）、波罗的海和卡累利阿都是天然地被心脏地带吸引的空间。

韩国、缅甸、印度、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在地缘政治上是中立的。

西欧、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泰国都容易出现海权集团。”⁵⁴

1965年，斯皮克曼的另一位追随者柯克（W. Kirk）出版了一本书，⁵⁵复制了麦金德著名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标题。柯克发展了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带对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核心重要性的论点。基于梅尼格的文化功能分析及其对“沿海地区”与“陆权”或“海权”倾向的区分，柯克建立了一个以沿海文明为主的历史模型，大陆内部强度或多少的文化冲动由此而来。同时，“更高的”文化形式和历史主动性被承认为那些被梅尼格定义为“以海权为导向”的“内新月”部分。

美国人索尔·科恩在他的著作《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中，基于将主要的地缘政治现实划分为“核心”和“不连续带”，而提出在地缘政治方法中引入一个额外的分类⁵⁶。在他看来，地球的每个特定区域都可以分解为4个地缘政治组成部分：

1) “外部海洋（水）环境，取决于商船队和港口；

⁵³ D. W. Meinig, "Heartland and Rimland in Eurasian History" in *West Politics Quarterly*, IX, 1956 pp. 553-569.

⁵⁴ 同上.

⁵⁵ W. Kirk,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Leicester Universal Press, 1965.

⁵⁶ S.B.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world*, New York, 1963

- 61 -

2) 大陆核心（内核），与‘腹地’（地缘政治术语，意为‘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相同；

3) 不连续带（面向内陆或远离大陆的沿海部分）；

4) 在地缘政治上独立于这个整体的地区。”⁵⁷

“不连续带”的概念被亨利·基辛格等美国主要战略家所采用，他认为美国“不连续带”沿海地区的政治战略是将碎片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使大西洋主义完全控制苏联的欧亚大陆。这一学说称为“Linkage”，出自英文的“link”，即“连接”、“环节”。为了使“蟒蛇”战略完全成功，有必要特别关注欧亚大陆的那些“沿海地区”，这些地区要么保持中立，要么被吸引到大陆内部。在实践中，这一政策是通过越南战争、美中关系紧张、美国支持伊朗亲美政权、支持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持不同政见者等来实施的。

与以前的时代一样，战后美国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学派不断支持当局的反馈。

谈到与“核时代”相关的地缘政治观点的发展，我们遇见同一美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科林·格雷。在他的《核时代的地缘政治》⁵⁸一书中，他概述了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战略，还谈到核设施的全球部署取决于该地区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特征。

2.2 大西洋主义者赢了冷战

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发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达到高潮。蟒蛇策略展示了绝对的效率。在此期间，人们可以看到由麦金德和马汉提出、经斯皮克曼纠正的首批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学几乎是“先知”的正确性。

华约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整个 20 世纪实施的大西洋主义战略方向的胜利。西方正在赢得与东方的冷战。海权庆祝其对心脏地带的胜利。

在地缘政治上，这一事件解释如下：

苏联集团与北约之间的对抗，是历史上陆地与海洋、巨兽贝黑摩斯与海怪利维坦之间的第一次纯粹而纯粹的对立形式。同时，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不仅反映了意识形态，也反映了地缘政治恒定状况。

苏联作为欧亚大陆的的心脏地带，体现了苏联式的意识形态。从地理上看，它是一个相当

⁵⁷ 同上

⁵⁸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N.Y., 1977.

完整的“大空间”，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战略武器。苏联的主要优势是居住在其辽阔领土或毗邻苏联领土上人口的“文化和功能”倾向，而且，因为存在难以到达的内陆空间，就可能建立起可靠的防御和技术立足点。此外，在苏联北部和东部，它有海上边界，这比陆地更容易防御。

由于中央集权经济，苏联实现了商品食品自给自足和超级大国军事地位。它尽可能地把影响力扩展到其他大陆。

但东方集团有几个根本的地缘政治缺陷。最重要的是漫长的陆地边界。如果从南边与欧亚山脉的山脊相吻合，从满洲到天山、帕米尔高原和高加索山脉，那么在西边，边界穿越平

坦的欧洲中部，那是大西洋主义的战略基地，而它的中心基地在“地中海”（Midland Ocean）*的西岸。但即使在南方，山脉不仅是保护，也是障碍，阻碍了扩张进入南方海域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东方集团被迫将军事战略、经济、知识、生产力和自然资源集中在同一个地缘政治中心。

这一状况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地缘政治地位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没人会羡慕西欧在这种力量排布中的地位；她在对方阵营的边界附近充当了美国的陆上基地，成为一条“警戒带”）。美国完全受到“海上边界”的保护。此外，美国通过战略整合其大陆，控制了欧亚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即边缘地带。大西洋主义者控制的区域，从西欧经过希腊和土耳其（北约成员国），延伸到远东（泰国、韩国、战略殖民地日本），这个区域顺利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位于圣地亚哥岛、菲律宾，以及关岛、加勒比海和海地。因此，所有潜在的冲突都被排除在主要战略空间的领土之外。

与此同时，大西洋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复杂而差异化的地缘政治权力“核心”分配体系。美国直接提供了军事战略力量。知识、金融和工业结构以及高科技发展中心都集中在西欧，不必负担自己的军事安全（除了警察和纯粹装饰性飞机的维护）。

自然资源来自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来自那里。

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出现的现状是一种进攻立场，因为根据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家的预测，这种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陆集团的枯竭，注定要完成自给自足，被迫单枪

* “地中海”（Midland Ocean）系斯皮克曼（N. Spykman）的术语，指大西洋。他把北美和欧洲视为统一的地缘政治空间，遂将大西洋看作其内海，并称之为“地中海”。-- 校译者

匹马同时发展所有战略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心脏地带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向西方进行军事扩张，目的是征服整个欧洲直到大西洋。经过这一发奋，苏联可以确保平静的海洋边界，并确保工业、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类似地向南发奋，为了最终到达温暖海域，打破“蟒蛇环”的海权。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如果成功，可能会导致稳定的大陆和平，并在短期内导致美国崩溃，也不再有边缘地带。

相反，另一种方式是苏联及其武装部队从东欧撤出，以换取北约部队从西欧撤出，并建立一个单一的、严格中立的欧洲集团（也许有一个有限的、起“劝阻”作用的核潜力）。这个选项在戴高乐时代认真讨论过。

亚洲也可以这样做。放弃在政治上直接控制一些中亚的共和国，以换取与阿富汗、伊朗和印度（也可能包括中国）一起，建立一个面向内陆的强大战略反美集团。

最后，有可能将这两种选择结合起来，在西方和平前进，而在东方则以武力进发（或者反过来）。唯一重要的是，要同时开始这两项地缘政治行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希望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从明显的领土损失变为获得胜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突破“遏

制”，这个词在冷战时期被用来描述“蟒蛇”的地缘政治策略。

但由于苏联不敢采取这种激进的地缘政治步骤，大西洋主义大国只能收获其经过严格计算和地缘政治验证的长期地位战略的成果。

自给自足的苏维埃国家因为受不了全面过度消耗而倒下了。而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却没有在西欧采取平行的（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战略步骤配合，未能亡羊补牢，最终导致局势恶化。

2.3 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

传统的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将海上势力置于其概念的中心，是“海洋地缘政治”。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全球战略引导西方建立了全球大国。但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空域的发展，这使得“空中地缘政治”的发展具有相关性。

与完整且充分发展的“海洋地缘政治”不同，不存在成熟的“空中地缘政治”。不断膨胀的因素加入了整体地缘政治图景。但实施空中环境和相关新型战略航空武器、洲际导弹和核武器的关联发生了显著变化。

- 64 -

空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陆地和海洋处于平等地位，因为对于飞机和导弹来说，这些空间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显著。（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是建造航空母舰，因为这完全从陆地上去除了空军基地，使它们同地球表面性质无关。）

与此同时，航空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尺度的比例，使地球变得“更小”得多，距离“更短”得多。与此同时，火箭科学和战略航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海陆边界、内陆基地等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只具备相对的含义。

将军备武器向地球轨道转移，以及对外层空间进行战略探索，是“压缩”地球各处距离，并使得空间差异最终只具有相对含义的最后阶段。

当前的地缘政治，除了陆地和海洋，还被迫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空气和太空（外层空间）。在军事层面，这些元素对应于核武器（空中）和星球大战计划（太空）。类比陆权（陆地势力的陆地控权）和海权（海洋势力的海洋控权），这里所讨论的两种最新的地缘政治系统变体可以称为空权（航空势力的航空控权/аэрократия/аерocracy）和天权（太空势力的航天控权/эфирократия/etherocracy）。

卡尔·施密特给出了这两个新领域的草案。同时，他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评论是，“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都代表了海洋“法则”（诺莫斯/номос/nomos）的进一步发展，正是“海权”的高级阶段，因为开发新领域的整个技术过程都是朝着环境“液化化”过程进行的，根据施密特的说法，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伦理、精神、社会政治的意义上，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和文明进程，逐步脱离陆地的“法则”。

或者说，空天环境的发展是纯粹海权主义倾向的延续，因此可以认为是纯粹大西洋战略的最高阶段。

从这个角度看，冷战中集团间的核对抗表现为“海权”强加于心脏地带的竞争，令其被迫接受对方主导的战略地位对决条件。这种将对决“要素”主动适应“环境液化”的过程，加上与西方世界在技术和战略意义上的发展逻辑，与大西洋主义者在将沿海地区与大陆中心分离政策中的进攻立场是平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地缘政治阵营主动进攻，另一个地缘政治阵营防御反击。

在知识层面，这表明大西洋主义者正在理论上发展“主动的地缘政治学”，公开并系统地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就西方而言，地缘政治是一门规划国际战略总体轮廓的学科。在东方集团的情况下，这门学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它只是作为应对潜在对手的步骤而存在，并仍将以这种角色而存在。在东方这门学科过去和现在都是“被动的地缘政治学”，更多地以惯性来应对大西洋主义的战略挑战。

如果说在核武器和航空领域（在航空控权领域），苏联能够倾其所有内部资源为代价实现相对均等，那么在下一阶段，在航天控权领域，出现了结构崩溃，与“星球大战”相关技术领域进行竞争导致了地缘政治的最终损耗，并在冷战中落败。

为了理解核世界地缘政治过程的本质和轨道空间发展的条件，卡尔·施密特所说的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不是独立的文明体系，而只是海洋“法则”的发展，这是根本性的。

2.4 最新大西洋主义的两个版本

大西洋主义者对苏联（心脏地带）的胜利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需要原创的地缘政治模式。所有传统的领土、地区、国家和同盟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后对全球现实的理解导致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学家提出了两个主要方案。

其中之一可以称为“悲观的”（对大西洋主义而言）。它继承了与大西洋主义传统的心脏地带的对抗路线，该路线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并没有随着苏联的垮台而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并预测了基于文明传统和稳定种族原型的新欧亚集团的形成。这种选择可以称为“新大西洋主义”，其本质归根结底是从基本二元论的角度继续考虑世界的地缘政治图景，而这只是通过分配额外的地缘政治区而变得微妙（欧亚大陆除外），未来也可能成为与西方对抗的中心。这种新大西洋方法最杰出的代表是塞缪尔·亨廷顿。

相反，基于相同的初始地缘政治图景的第二种方案是乐观的（对大西洋主义而言），因为它认为由于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而发展起来的局势是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这是“世界主义”理论的基础，即历史终结和一个世界（One World）的概念，它声称所有形式的地缘政

治分歧，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等等，都即将被克服，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统一的人类文明时代即将到来。历史将随着最初为历史提供主要动力的地缘政治对抗而终结。这个地缘政治项目与美国地缘政治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名字有关，他写了一篇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纲领性著作。这个世界主义理论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让我们分析一下亨廷顿概念的要点，这是西方传统的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的超现代发展。亨廷顿构建他的纲领性著作《文明的冲突》是很重要的，这部著作作为对福山关于“历史

- 66 -

史的终结”论点的回应。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这场辩论符合美国两大政党的立场：福山表达了民主党的全球战略立场，而亨廷顿则是共和党的喉舌。这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两个最新的地缘政治计划的本质：新大西洋主义遵循保守路线，而“世界主义”更喜欢一种全新的方法，其中所有地缘政治现实都受到全面修正。

2.5 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新大西洋主义

哈佛大学约翰·奥林（John Olin）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意义，归纳在《文明的冲突》⁵⁹（作为大型地缘政治项目《全球安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的总结）中，阐述如下：

随着苏联的解体，大西洋主义在全球上获得明显的地缘政治胜利，大陆力量的最后堡垒消失了，但实际上，它只影响了现实的表面部分。北约的战略成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形成，它虽然拒绝主要的竞争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并不影响深层文明。亨廷顿反对福山，认为战略上的胜利不是文明的胜利。西方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市场等。只是暂时没有争议，因为文明和地缘政治特征，类似于萨维茨基所说的“地理个体”，很快就会开始在非西方民族中出现。

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传统的国家结构，一些实体崩溃，出现另一些实体等等，不会自动导致全人类与大西洋主义价值观的普遍体系结盟，而是相反，更深层文化层次将会摆脱肤浅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会再次相关。

亨廷顿引用乔治·威格的话：“非世俗化是 20 世纪末的主要社会因素之一。”因此，人们不会像福山所说的那样在一个世界中抛弃宗教认同，相反，人们会更加生动地感受到宗教归属感。

亨廷顿认为，随着包括北美和西欧在内的西方（=大西洋主义）文明，可以预见另外七个潜在文明的稳定的地缘政治：

- 1) 斯拉夫东正教，
- 2) 儒家（中国），
- 3) 日本，

4) 伊斯兰,

5) 印度,

⁵⁹ Samuel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s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2-49.

- 67 -

6) 拉丁美洲

可能还有 7) 非洲⁶⁰。

当然, 这些潜在的文明绝不是等价的。但他们一致认为, 它们的发展和形成的载体将朝着不同于大西洋主义和西方文明轨迹的方向发展。因此, 西方将再次陷入对抗的境地。亨廷顿认为, 这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是现在, 尽管世界主义圈子欣喜若狂, 但仍应以现实的公式为基础: “西方和非西方” (“The West and The Rest”)⁶¹。

这种做法的地缘政治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亨廷顿认为, 大西洋主义者应千方百计加强自身文明的战略地位, 做好对抗准备, 巩固战略努力, 抑制其他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反大西洋倾向, 防止他们联合成一个对抗西方危险的大陆联盟。

他提出以下建议:

“西方应该

确保在他们自己的文明中更紧密的合作和团结, 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部分之间;

西方应该在自己的文明中更紧密地合作和团结, 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之间;

将东欧和拉丁美洲文化接近西方的社会融入西方文明;

确保与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密切;

防止文明之间的局部冲突升级为全球战争;

限制儒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

停止削减西方军事力量, 确保在远东和东南亚的军事优势;

利用伊斯兰和儒家国家关系中的困难和冲突;

支持面向西方价值观和其他文明利益的团体;

加强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构和使其合法化, 并确保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⁶²

这是对新大西洋学说的简明扼要的表述。

⁶⁰ 同上, 第 25 页

⁶¹ 同上, 第 39 页

⁶² 同上, 第 49 页

- 68 -

从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这意味着严格遵循马汉和斯皮克曼的原则, 亨廷顿强调文化和文明差异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表明他属于古典地缘政治学派, 这可以追溯到“有机”哲学, 这种学说最初普遍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实体不是靠机械论的或纯粹意识形态形成的,

而属于“生命形态”。

亨廷顿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列为西方最有可能的对手。这直接受到梅尼格和柯克学说的影响，他们认为“沿海地带”、边缘地带国家（而“儒家”和伊斯兰文明的地缘政治方向就主要属于边缘地带），比中心地带的位置更重要。因此，与新大西洋主义的其他代表，特别是保罗·沃尔福威茨不同，亨廷顿认为主要威胁不在于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复兴，也不在于其心脏地带或一些新的欧亚大陆形成。

美国人保罗·沃尔福威茨（安全顾问）在 1992 年 3 月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中谈到“需要防止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出现一支有能力抵抗美国的战略力量”⁶³，并进一步解释说，最可能的力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是俄罗斯，应该以波罗的海国家为基础建立一条“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战略家沃尔福威茨更接近麦金德而不是斯皮克曼，这表明他的观点与亨廷顿的理论截然不同。

在所有情况下，无论对特定潜在对手的定义如何，所有新大西洋主义者的立场基本相同：冷战的胜利并不能消除其他地缘政治实体（现在或未来）对西方的威胁。因此，现在谈论“一个世界”还为时过早，海权（由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得到加强）和陆权的全球二元论仍然是 21 世纪的主要地缘政治方案。

这种二元论的一个新的、更普遍的公式就是斯克鲁登（Roger Scruton）的著作《西方与非西方》。

⁶³ 引用出自 "Monde Diplomatique", 1992 年，年度汇编。

第3章 世界主义

3.1 世界主义背景

“世界主义”的概念早在西方在冷战中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世界主义的意义归结为假设完全全球一体化的必然性，即从多元化的国家、人民、民族和文化过渡到单一世界的统一世界。

这个想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某些乌托邦和千禧年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在历史的某个高潮时刻，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将聚集在一个单一的王国中，不再了解普通地球历史中固有的矛盾、悲剧、冲突和问题。除了世界主义乌托邦的纯神秘主义版本外，还有它的理性主义版本，其中之一可以被认为是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的“第三时代”学说或莱辛的人文末世论。

世界主义思想通常是温和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特征（其中一些人联合在“费边社”中）。共产党人还谈到了一个单一的世界国家。另一方面，类似的世界主义组织从 19 世纪末开始由世界商业界的主要人物创建，例如组织圆桌会议的塞西尔·罗德斯爵士（Sir Cecil Rhodes），其成员应该“为建立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的贸易体系和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做出贡献。”社会主义动机常常与自由资本主义动机交织在一起，共产主义者在这些组织中与最大金融资本的代表共存。所有人都因相信全球统一的乌托邦理念而团结在一起。

国际联盟、后来的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著名组织正是这种世界主义圈子的延续，对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意义重大。

20 世纪，这些避免过度宣传，甚至经常带有“秘密”性质的世界主义组织，改名换姓。有哈里·戴维斯的“世界联盟环球运动”，还有“联邦联盟”，甚至（1946 年由英国议员亨利·阿斯伯恩组织的）“世界政府十字军东征”。

随着所有针对西方的话语权和战略权都集中于美国，美国就成为世界主义的主要总部，其代表形成了一个由顾问、分析师和战略研究中心组成、与权力平行的机构。

三个主要的世界主义组织就是这样形成的，西方公众最近才知道它们的存在。与官方结构不同，这些团体在设计和研究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它们不受规范联合国诸委员会等

- 70 -

机构活动的那些固定与正式程式约束。

第一届“外交关系委员会”（以下简称 CFR）。它的创造者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家摩根。这个非官方组织正忙于制定一项全球性的美国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的完全统一并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组织成立于 1921 年，是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个分支，它的所有高层政治家都对世界的未来持世界主义观点。由于 CFR 的大多数成员同时也是苏格兰共济会的达官显贵，可以假设他们的地缘政治项目也带有某种人文神秘主义成分。

1954 年，第二个世界主义组织——比尔德伯格（Bilderberg）俱乐部或称比尔德伯格集团诞生了。它不仅网罗了美国的分析师、政治家、金融家和知识分子，也网罗了他们的欧洲同行。在美国方面，它完全由 CFR 成员代表，并被视为国际上那些机构在美国的延续。

1973 年，比尔德伯格集团的积极分子创建了第三个最重要的世界主义机构——三边委员会。它由 CFR 和比尔德伯格集团的美国人领导，除了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东 46 街 345 号）外，在欧洲和日本还有两个总部。

三边委员会的命名是基于基本的地缘政治考虑。它旨在联合在大西洋主义和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以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三个“大空间”：

- 1) 美国空间，包括北美和南美；
- 2) 欧洲空间；
- 3) 日本控制的太平洋空间。

比尔德伯格和三方委员会最重要的世界主义团体由 CFR 的一位资深成员，最大的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尔（David Rockefeller）领导，他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所有者。

除了他之外，在所有世界主义项目的中心都是大西洋主义的分析家、地缘政治家和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还有著名的乔治·鲍尔。

所有世界主义项目的主线是在西方和“进步”、“人文”、“民主”价值观的战略主导下，过渡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为此目的，形成了由政治家、记者、知识分子、金融家、分析师等组成的平行结构，以便在世界政府的这个世界主义计划被广泛宣传之前做好准备，因为如果没有准备，它就会遇到不愿在这个全球大熔炉中溶解其身份的人民和国家的强大心理抵抗。

-71-

这些组织开发和执行的世界主义项目并不是同质的。它有两个主要版本，在方法上不同，理论上应该导致相同的目标。

3.2 趋同理论

世界主义的第一个最和平主义和“和解”的版本被称为“趋同理论”。这一理论是在 70 年代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领导的一群“左派”分析家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深入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它提出了通过创造一种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介于纯粹大西洋主义和纯粹大陆主义之间的新型文化和意识形态文明，来克服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二元论的可能性。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可以克服的障碍，通过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废除私有财产”等命题，转向其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版本。反过来，资本主义的西方应该限制市场的自由，引入国家对经济的部分监管，等等。在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的传统中可以找到共同的文化取向，西方民主政权和共产主义社会伦理（在其软化的社会民主版本中）都可以追溯到这些传统。

以“趋同论”为基础的世界政府被设想为莫斯科承认与华盛顿一起以大西洋方案控制全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和平时代开始了，冷战也会结束，各国人民将能够减轻地缘政治紧张的负担。重要的是在这里与技术系统从“海权”到“航天控权”的转变进行比较：世界主义政治家开始不是通过被大海包围的西部大陆居民（如传统大西洋主义者）的眼睛，而是通过“太空轨道上宇航员”的眼睛，来观察地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真的看到了单一世界（One World）。

世界主义中心在莫斯科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员。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系统研究所所长格维夏尼（Гвишиани）院士，该研究所类似于“三边委员会”在苏联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活动在西欧极左党派中尤其成功，这些党派大部分走上了“地方自治欧洲主义”（Europeanism of

Municipalism) 的道路, 这被认为是全球趋同的主要概念基础。

3.3 西方的全球胜利

趋同理论是进行改革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此同时, 在苏联改革开始前几年, 中国开始实施类似的项目, 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 三方委员会的代表与该项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中苏“改革”的地缘政治命运却不同。中国坚持

- 72 -

“公平”的分配角色, 并相应地将西方意识形态转向社会主义。苏联在重大让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按照美国世界主义者的逻辑, 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苏联空间向“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的结构转型。首先, 这影响了华约国家, 然后影响了苏联诸共和国。开始削减战略武器并与西方取得意识形态和解。但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注意的是, 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年代正好处在美国极端共和党人里根和布什的总统任期内。此外, 里根是近年来唯一一位一贯拒绝参加所有世界主义组织的总统。根据他的信念, 他是一个强硬的、一贯的和不妥协的大西洋主义者, 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拥护者, 不倾向于与“左”意识形态妥协, 即使是与最温和的民主或社会民主主义信仰都不会妥协。因此, 莫斯科旨在走向趋同, 并建立一个由东方集团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政府, 在与西方相反的极点处, 竖起最不利的意识形态障碍。大西洋主义者里根(后来的布什)只是将戈尔巴乔夫的世界主义改革用于纯粹的功利目的。中心地带自愿让步, 但是并没有跟着在海权上做出相应让步, 西方也没有对自我清算的欧亚大陆做出任何地缘政治妥协或意识形态妥协。北约没有解散, 其军队也没有离开欧洲或亚洲。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地缘政治学说付诸实践, 而是作为冷战时期实用的工具, 美国从未放弃其基于麦金德和马汉提纲的逻辑。

3.4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在苏联解体和西方的胜利, 大西洋主义的胜利之后, 世界主义项目要么消亡, 要么必须改变其逻辑。

后苏联时代的一个新版本的世界主义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学说, 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表了纲领性文章《历史的终结》。它可以看作是新世界主义的思想基础。

福山提供了以下版本的历史过程。从“权力法则”、“蒙昧主义”和“对社会现实的非理性管理”的黑暗时代, 人类走向了最合理、最合乎逻辑的制度, 体现在资本主义、现代西方文明、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中。历史 and 它的发展只是由于非理性因素而得以延续,

这些非理性因素逐渐让位于理性法则，让位于所有贵重物品的一般货币等价物等等。苏联的垮台标志着“非理性主义”最后堡垒的垮台。与此相关的是历史的终结和特殊全球存在的开始，这将在市场和民主的标志下发生，它将把世界团结成一个协调良好、合理运作的机器。

- 73 -

这样的新秩序虽然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大西洋体系的普遍化基础上，但它超越了大西洋主义，世界所有地区都开始按照一种新的模式，围绕其经济最发达的中心进行重组。

3.5 雅克·阿塔利的《地缘经济学》

在欧洲作家中也有类似福山的理论。多年来一直担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私人顾问，同时还担任过一段时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他的《地平线》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理论。

阿塔利认为，第三个时代“货币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因为将万物等同于物质数字表达，以最理性的方式管理它们是极其容易的。阿塔利本人将这种方法与救世主时代的到来联系在一起，在犹太-卡巴拉主义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他在另一本专门讨论信使主义的书《他会来》中更详细地发展了这方面的想法）。这使他与严格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框架内的福山区区别开来。

雅克·阿塔利提供了他对“已经到来”的未来的看法。单一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市场体系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变得单一性和同质化，历史上曾占主导的地缘政治现实在“第三时代”正退居幕后。地缘政治二元论被弃置不用了。

但是，统一的世界仍然接受了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化，这一次是基于“地缘经济学”的原则。“地缘经济学”的概念首次由历史学家弗里茨·罗里格（Fritz Rörig）提出发展，并由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予以推广。

“地缘经济学”是世界主义地缘政治学的一个特殊版本，它优先考虑非地理、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地缘政治方法的本质，但在其与空间的关系中所显现的是纯粹的经济现实。对于“地缘经济学”来说，那里生活着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怎样的等等，绝对不重要。只是关心那些世界交流中心、矿产、信息中心、大型工业处在什么位置。“地缘经济学”接近政治现实，仿佛世界政府和单一全球国家早已有之。

阿塔利的地缘经济方法导致了三个最重要区域的分配，在单一世界中，这些区域将成为新经济空间的中心。

- 1) 美洲空间，最终将南北美洲统一为一个单一的金融区和工业区。
- 2) 欧洲经济统一后出现的欧洲空间。

- 74 -

- 3) 太平洋地区，一个“新繁荣”地带，拥有东京、台湾、新加坡等多个竞争中心。⁶⁴

根据阿塔利的观点，在这三个世界主义空间之间，不会有特殊的差异或矛盾，因为经济类型和意识形态类型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严格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将是最发达中心的纯粹地理位置，使得欠发达区域围绕在这些最发达中心附近，形成同心结构。这种同心重组，只有在“历史的终结”之时才能发生，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废除了由地缘政治支配传统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文明-地缘政治二元论遭到废除。大西洋主义的对立面荡然无存，这导致对空间的彻底反思。地缘经济学时代降临了。

在阿塔利模式中，构成“三方委员会”基础的那些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方委员会”是制定和实施此类项目的概念和政治工具。

1989年1月，“三边委员会”领导人（大卫·洛克菲勒、时任欧洲分部负责人乔治·贝尔图安和亨利·基辛格）访问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接见，这一点意义重大。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法林、阿赫罗梅耶夫、多勃雷宁、切尔尼亚耶夫、阿尔巴托夫和普里马科夫也参加了会见。雅克·阿塔利本人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保持着私人联系。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只有自我清算了欧亚苏联的地缘政治之后，才有可能向地缘经济逻辑和新世界主义过渡。

新世界主义不是历史世界主义的直接延续，历史世界主义最初假设最终模型中存在左翼社会主义元素。新世界主义是介于真正的世界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的中间选项。

3.6 桑托罗教授的灾后世界主义

新世界主义有更详细的版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米兰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在卡罗·桑托罗（Carlo Santoro）教授的指导下提出的未来地缘政治概念。

根据桑托罗模型，人类目前正处于从两极世界向世界主义多极世界的过渡阶段（从地缘经济角度理解，如阿塔利）。对福山乐观的世界主义而言，国际机构（联合国等）似乎已经发展到足以成为“世界政府”的核心，而在桑托罗看来，这样的国际机构却显得力不从心，反映了两极地缘政治的过时逻辑。此外，整个世界都带有冷战的永久印记，其地缘政治逻辑

⁶⁴ Jacques Attali "Lignes d'Horizon", Paris. 1990.

仍然占主导地位。桑托罗预见到，这种情况只能在一段文明灾难时期结束。

他接下来假设这些灾难情景会是这样的：

- 1) 国际机构作用进一步弱化
- 2) 包含华沙条约成员国和第三世界等国家中民族主义倾向增长。这导致混乱过程。

- 3) 传统的国家集团分裂（这不会影响欧洲），现有国家逐步解体。
 - 4) 中低强度战争时代开始，由此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 5) 全球混乱的威胁使各个集团认识到需要建立新的拥有巨大权力的国际机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 6) 在新的国际机构（世界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建立一个全球国家⁶⁵。
- 这种模式介于弗朗西斯·福山的世界主义乐观主义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大西洋主义悲观主义之间。

⁶⁵ 见 Carlo M. Santoro "Progetto di ricerca multifunzionale 1994 - 1995" -- I nuovi poli geopolitici, Milano; Carlo M. Santoro, "Studi di Geopolitica 1992-1994", G. Giappichelli Editore, Torino, 1997, "I nuovi poli geopolitici", pp. 15-58.

第 4 章 应用地缘政治

4.1 “内部地缘政治”的伊夫·拉科斯特学派

欧洲的地缘政治复兴与地理学家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的活动有关，他于 1976 年创办了《希罗多德》杂志，在战后欧洲首次开始定期出版地缘政治文本。应该强调的是，领导者是一个接近左翼政治圈的人，而在那之前，只有相当边缘的右翼民族主义圈子才参与欧洲的地缘政治。

1983 年，《希罗多德》杂志在标题中引入了副标题“地理与地缘政治学杂志”，从此开始了地缘政治学的第二次生命，现在被正式承认为一门特殊的政治学学科，有助于全面分析地缘政治学。情况。

伊夫·拉科斯特力求使地缘政治原则适应当前形势。拉科斯特本人既没有大陆主义学派的“有机主义方法”特征，也没有海权理论家的纯粹实用主义和机械地缘政治功利主义。在他看来，地缘政治所考虑的只是为了“证明当局对某些领土和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抱有什么对立愿望是合理的。”⁶⁶ 这可能既涉及国际关系，也涉及狭隘的地区问题。

对于拉科斯特来说，地缘政治只是一种分析特定情况的工具，而该学科背后的所有全球理论都被简化为相对的、受历史制约的概念。

因此，拉科斯特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全新定义，实际上是一门新学科。这不再是大陆思维，不再是基于基本的全球文明-地理二元论，并与全球意识形态体系相关联，而是使用传统地缘政治学在一般背景下所拥有的一些方法论模型，但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独立的东西。这就是“去全球化”地缘政治，将其简化为狭义的分析方法。

这种地缘政治被称为“内部地缘政治”（la geopolitique interne），因为它经常关注当地问

题。

4.2 选举“地缘政治”

这种内部地缘政治的一种形式是一种专门的方法，旨在研究人民的政治同情与人民居住的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的先驱是法国人安德烈·齐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1875-1959），他是一位政治家和地理学家。他首次尝试探索与某些地区的政治同情相关的“国内地缘政治”。制定第一批法律可以追溯到他，这些模式构成了伊夫·拉科斯特新学派“选举

⁶⁶ Yves Lacoste *"Dictionnaire Geopolitique"*, Paris, 1986.

- 77 -

地缘政治”的基础。

齐格弗里德写道：

“每个政党，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个政治倾向，都有自己的能享有特权的领土；不难看出，正如有地理区域或经济区域一样，也有政治区域。政治气候可以用研究自然气候同样的方式来研究。我注意到，尽管表面上带有欺骗性，但因地区而异的舆论却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在不断变化的政治选举图景下，总可以追踪到反映地区气质更深入持久的趋势。”⁶⁷

在拉科斯特学派中，这一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并成为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工具，广泛应用于政治实践中。

4.3 媒体控权 -- 作为“地缘政治”因素

伊夫·拉科斯特的任务是将信息社会固有的最新标准引入地缘政治。直接影响地缘政治进程的最重要的信息系统是大众媒，尤其是电视。在现代社会中，主导的不是概念理性的方法，而是“形像”（“image”）的光鲜程度。仅仅靠电信传播就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社会大部分人的观点。媒体“形象”是一个原子综合体，其中同时集中了种族、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几种方法。“形像”的综合质量使其更接近于传统上由地缘政治所使用的那种手段。

对于某热点地区，例如国会大厦居民，情况一无所知，其信息报告，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展示该地区的地理、历史、宗教、经济、文化、民族概况，并按照狭义政治目的调节该信息报告的重点。因此，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的职业正在接近地缘政治的职业。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扮演辅助角色，而是成为一种强大的独立地缘政治因素，有可能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产生强大影响。

4.4 地缘政治史

在欧洲地缘政治“复兴”的总体过程的框架中，还有一个方向，即地缘政治史。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本地缘政治，因为它旨在使用资料、年表、系统分类、书目数据等重建该学科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博物馆方法”，并不就当前情况做出任何结论和概括。这样的历史路线首先由以下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皮埃尔-玛丽·格洛瓦（Pierre-Marie

⁶⁷ Andre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sous la Troisieme Republique"*, Paris, 1913.

- 78 -

Gaullois) 以及埃尔韦·库托-贝格里 (Herve Cuto-Begari)、杰拉德·沙利安 (Gerard Chalyan)、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 (Hans-Adolf Jacobsen) 等。

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出版并再版了麦金德 (Mackinder)、马汉 (Mahan)、契伦 (Kjellén)、豪斯霍费尔 (Haushofer) 等人的历史地缘政治学著作。

此类历史研究经常发表于法国杂志《希罗多德》(Herodotus) 和新的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边界》(Limes) (由 Lucio Caracciolo 和 Michel Korenmann 出版，前面提到的拉科斯特也参与其中)。

4.5 “应用地缘政治学”不是地缘政治学

应用地缘政治学或“内部地缘政治学”是现代欧洲政治学的特征，并刻意避免观念性概括和未来学发展，这是由伊夫·拉科斯特以及其他主要专家米歇尔·科伦曼 (Michel Korenmann)、保罗-玛丽·德拉戈尔斯 (Paul-Marie de la Gorce) 等人发展的。这是此整体区域 (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 的地缘政治学派与美、英大西洋主义与世界主义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和大西洋主义与世界主义相比，应用地缘政治学和历史的战前地缘政治学的联系要少得多，更不用说“大陆主义”传统了。应用地缘政治学是一种纯粹依赖分析的政治科学与社会学技术，仅此而已。因此，应该将其与地缘政治学全球计划区分开来。本质上，我们谈论的是两个学科，他们只是包含了相同的术语和方法。“应用地缘政治学”忽略了地缘政治二元论，认为它要么已经被克服，要么微不足道，要么超出了主要研究框架，这样，应用地缘政治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而只是一种统计社会学方法。

在与大西洋主义和世界主义战略中心相关的其他情况下，真正的地缘政治学正在制定与欧洲和欧洲人民命运休戚相关的决策和项目。因此，欧洲一体化计划完全由在“三边委员会”中的知识分子们通力合作努力发展起来，而三边委员会是一个既没有严格法律地位，也没有政治合法性的世界主义超国家组织。法国人雅克·阿塔利的地缘政治理论是基于他在这个组织的数据，而不是基于现代欧洲学派的“应用”地缘政治学。

第 5 章 欧洲新右翼的地缘政治

5.1 百旗欧洲 阿兰·德·贝努瓦

欧洲少数几个与战前德国地缘政治大陆主义思想保持持续联系的地缘政治学派之一是“新右翼”。这一趋势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法国，与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哲学家和政论家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有关。

“新右翼”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传统的法国右翼君主主义者、天主教徒、恐德者、沙文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保守派等截然不同。“新右派”提倡“有机民主”、异教徒、亲德派、社会主义者、现代主义者等。起初，传统上在法国极具影响力的“左翼阵营”认为这是普通右翼的“战术策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的严重性得到证实，并为众人认可。

“新右翼”意识形态基本原则之一是“大陆主义地缘政治”原则，其他欧洲国家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与“旧右翼”和古典民族主义者不同，德·伯努瓦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民族（Etat-Nation）原则在历史上已经枯竭，未来只属于“大空间”。此外，这种“大空间”的基础不应是不同国家在一个务实的政治集团内的统一，而应是不同规模的民族团体平等地进入一个单一的“联邦帝国”。这样一个“联邦帝国”应该是战略上统一，民族上分化。

德·伯努瓦最感兴趣的“大空间”是欧洲。“新右翼”认为，欧洲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印欧起源，来源单一。这就是“共同既往”原则。但在当代环境下，拥有真正地缘政治主权所必需的战略与经济一体化趋势十分活跃，这就要求在纯粹务实的意义上加以统一。因此，欧洲各国人民注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由此，德·伯努瓦得出结论，“百旗统一欧洲”⁶⁸这一命题应该成为主要的地缘政治原则。从这个角度看，就像在“新右翼”的所有概念中一样，众望所归，要将“保守”和“现代”的元素，即“右翼”和“左翼”，结合起来。近年来，“新右翼”放弃了这一定义，认为自己在“右翼”的程度上与“左翼”不相上下。

德·伯努瓦的地缘政治理论是基于“欧洲大陆命运”的主张。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遵循了豪斯霍弗学派的理念。由此衍生出“欧洲”与“西方”对立的“新右翼”特征。对他们来说，“欧洲”是一个大陆地缘政治实体，以印欧血统的民族组合为基础，具有共同的文化根源。这是一个传统的概念。相反，“西方”是一个与现代世界相连的地缘政治和历史概念，否定了民族和精神传统，提出了纯粹的物质和数量的存在标准；它是一种功利的、理性的、

⁶⁸ Alain de Benoist “*Les idées à l'endroit*”, Paris, 1979

这创造了一个“新右翼”的具体计划。欧洲必须整合成一个反对西方和美国的“联邦帝国”，尤其应该鼓励地区倾向，因为地区和少数民族比被“西方精神”打击的特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特征。同时，法国应该把重点放在德国和中欧。因此，“新右翼”对戴高乐和弗里德里希·瑙曼产生了兴趣。在实际政治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右翼”主张欧洲严格战略中立，退出北约，发展自给自足的欧洲核潜力。

关于苏联（后来的俄罗斯），“新右翼”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们从经典观点“既非西方也非东方，只是欧洲”开始，逐渐演变为新的观点：“欧洲优先，和东方的关系，要优于和西方的关系。”在实践层面，最初对中国的兴趣以及建立欧洲与中国战略联盟以对抗“美苏帝国主义”的项目，已经让位于温和的“亲苏维埃”，以及欧洲与俄罗斯结盟的想法。

“新右翼”的地缘政治从根本上是反大西洋和反世界主义的。他们将欧洲的命运视为大西洋主义和世界主义计划的对立面。他们反对“海权”和单一世界的概念。

应该指出的是，在冷战期间大西洋主义在欧洲全面战略和政治主导的条件下，德·伯努瓦的地缘政治立场（理论上和逻辑上完美无缺）与“政治思维规范”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它根本无法被广泛传播。这是一种“异议”，与任何“异议”和“不墨守成规”一样，具有边缘性。直到现在，“新右翼”的知识水平，他们的出版和出版物的高质量，甚至他们在欧洲学术环境中的大量追随者，都与当局和分析机构对他们的微不足道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地缘政治项目为当局服务。

5.2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都柏林的欧洲 让·蒂里亚特

另一位欧洲“持不同政见者”比利时让-弗朗索瓦·蒂里亚特 (Jean-François Thiriart) (1922-1992) 提出了一个稍微不同版本的大陆地缘政治。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就是全欧激进运动“年轻欧洲”的领袖。

蒂里亚特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主要的政治学学科，没有地缘政治学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理性而有远见的政治和国家战略。作为豪斯霍夫和 (Haushofer) 和尼基希 (Nikisch) 的追随者，他认为自己是“欧洲民族布尔什维克”和“欧洲帝国”的建设者。正是他的想法预见“新右翼”更先进、更复杂的计划。

让·蒂里亚特将他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大空间专制”原则之上。由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ederick Liszt) 于19世纪中叶发展，该理论认为，只有拥有足够的地缘政治

- 81 -
规模和强大的领土能力，国家才能实现全面的战略和经济发展。蒂里亚特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当前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欧洲国家不联合成一个反对美国的单一帝国，它们的世界意义将完全丧失。同时，蒂里亚特认为，这样的“帝国”不应该是“联邦制”、“地区化”的，而应该是极其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与雅各宾模式相对应。它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单一大陆

民族国家。这是德·伯努瓦和蒂里亚特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蒂里亚特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结论，欧洲的规模已不足以摆脱美国的海权统治。因此，“欧洲解放”的主要条件是欧洲与苏联的统一。从一项包括三个主要区域，即西方、欧洲、俄罗斯（苏联）的地缘政治计划，他转向了一项只有两个组成部分的计划，即西方和欧亚大陆。与此同时，蒂里亚特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即欧洲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比选择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更好。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都柏林的欧苏帝国”⁶⁹的计划就这样出台了。它几乎预言性地描述了为什么如果苏联不在不久的将来在欧洲和南方采取积极的地缘政治步骤，将会导致苏联崩溃。蒂里亚特认为豪斯霍弗关于“柏林-莫斯科-东京大陆集团”的想法与今天高度相关。重要的是，蒂里亚特在苏联解体前 15 年提出了这些论点，绝对准确地预测了其逻辑和原因。蒂里亚特试图将他的观点传达给苏联领导人。但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曾与纳赛尔、周恩来和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进行过私人会晤。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拒绝了他关于在欧洲组织地下“欧洲解放分队”，以打击恐怖主义“大西洋主义代理人”的计划。

让·蒂里亚特的观点是现在欧洲民族布尔什维克（“欧洲解放阵线”）活跃的不墨守成规运动的核心。它们接近当代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项目。

5.3 考虑大陆 乔迪斯·冯·洛豪森

与蒂里亚特非常接近的是奥地利将军乔迪斯·冯·洛豪森（Jordis von Lohausen）。与蒂里亚特或德·伯努瓦不同，他不参与直接的政治活动，也不建立特定的社会项目。他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并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分析。他最初的立场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和新右派的立场相同，是大陆主义者和豪斯霍弗的追随者。

洛豪森认为，只有当统治者不考虑暂时的和局部的范畴，而是思考“千年与大陆”问题

⁶⁹ Jean Thiriart “L’Empire Eurosovietique de Vladivostok jusque Dublin”, Brussell, 1988

时，政治权力才有机会变得持久和稳定。他的主要著作是《统治的勇气。在大陆上思考》⁷⁰。

洛豪森认为，全球领土、文明、文化和社会进程只有以“远视”的眼光看待，才能变得可以理解，他将其与历史上的“近视”进行对比。人类社会的权力是选择历史道路和最重要的决定所依赖的，必须以非常普遍的计划为指导，让特定国家或人民在巨大的历史视野中找到一席之地。因此，确定权力战略所需的主要学科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它与全球范畴一起运作，从分析细节中抽象出来（而不是拉科斯特学派的“内部”应用地缘政治学）。现代意识形态、最新的技术和文明变革无疑会改变世界的面貌，但无法改变几千年来自然和文化周期的一些基本模式。

这样的全球类别包括空间、语言、民族、资源等。

洛豪森提供了以下权力公式：

“权力 = 力量 x 位置”

他阐述道：“既然权力是力量乘以位置，只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才能充分发挥内力。”⁷⁰

因此，（政治、知识等）权力与空间直接相关。

洛豪森将欧洲的命运与西方的命运分开，认为欧洲是一个暂时处于海权下的大陆实体。但是为了政治解放，欧洲需要一个空间（位置）最小值。要获得这样的最低限度，只有通过德国统一、中欧一体化进程、恢复（被撕裂成波兰、苏联和东德的）普鲁士领土统一，并将欧洲列强进一步组成一个独立于大西洋主义新的独立集团。重要的是要注意普鲁士的作用。洛豪森（继尼基施（Ernst Niekisch）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之后）认为，普鲁士是德国最具大陆性、最“欧亚”的部分，如果德国的首都不是柏林，而是科尼斯堡，欧洲历史将朝着不同的、更正确的方向发展，重点会放在与俄罗斯结盟，对抗盎格鲁-撒克逊海权统治。

洛豪森认为，从战略角度看，如果没有俄罗斯，欧洲的未来是不可思议的，反之亦然，俄罗斯（苏联）需要欧洲，因为没有它，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是不完整的，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地理位置要好得多，因此，它的力量迟早会远远领先于苏联。洛豪森强调，苏联可以在西方拥有四个欧洲：“一个充满敌意的欧洲、一个被征服的欧洲、一个满目疮痍的欧洲和一个结盟的欧洲”。如果苏联在整个冷战期间所奉行的欧洲政策路线得以维持，前三个选项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让欧洲“结盟友好”的愿望，才能纠正苏联致命的地缘政治局势，成为地缘政治历史新阶段——欧亚阶段的开端。

⁷⁰ Jordis von Lohausen “*Mut zur Macht. Denken in Kontinenten*”, Berg, 1978.

⁷¹ 同上.

洛豪森的立场故意局限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声明。他忽略了意识形态问题。例如，波亚尔俄罗斯、沙皇俄罗斯或苏联的地缘政治对他来说是一个单一的连续过程，独立于统治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变化。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是一个心脏地带，因此，无论它拥有什么政权，它的命运都是由其土地预先确定了的。

洛豪森和蒂里亚特一样，提前预测了苏联的地缘政治崩溃，如果按照他一贯的做法，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家将这样的结果视为胜利，洛豪森则将其视为大陆势力的失败。但是，细微的差别是，苏联体制解体后打开的新机遇可以为建立新的欧亚集团，即建立大陆帝国创造有利条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某些限制将不复存在。

5.4 欧亚帝国的终结 让·帕尔维列斯科

法国著名作家让·帕武列斯科（Jean Parvulesco）阐述了地缘政治的浪漫主义版本。文学中的地缘政治主题第一次出现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身上，他在反乌托邦的《1984》中以未来主义的方式描述了地球被划分为三个巨大的大陆块“奥斯塔西亚、欧亚大陆、大洋洲”。在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雷蒙德·阿贝里奥（Raymond Abellio）等人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主题。

让·帕武列斯科将地缘政治主题作为他所有作品的核心，从而开辟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小说”类型。

简而言之，帕武列斯科的概念如下⁷²：人类的历史就是力量的历史。进入文明的中心位置，即各种半秘密组织正在追求权力本身，其存在周期远远超过普通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王朝、宗教机构、国家和人民的持续时间。这些组织在历史上以不同的名称出现，被帕武列斯科定义为“大西洋主义者教团”和“欧亚教团”。他们之间存在着百年的斗争，教皇、族长、国王、外交官、大金融家、革命者、神秘主义者、将军、科学家、艺术家等都参与其中。因此，所有社会文化表现形式都可以简化为原始的、尽管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型。

这是一条达到其逻辑极限的地缘政治路线，其先决条件在地缘政治的创始人中已经清楚地追溯，相当理性，与“神秘主义”“”格不入。

帕武列斯科故事情节中的核心角色是戴高乐将军和他建立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后仍处于这一地缘政治结构阴影中。帕武列斯科称之为“地缘政治戴高乐主义”。这种“地缘政治戴高乐主义”是豪斯霍弗大陆主义学派的法国类比。

⁷² Jean Parvulesco “*Galaxie GRU*”, Paris, 1991.

这条路线支持者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欧洲大陆集团“巴黎柏林莫斯科”。在这方面，帕武列斯科的理论与“新右派”和“民族布尔什维克”的论点相融合。

帕武列斯科认为，当前的历史阶段是几个世纪地缘政治对抗的高潮，大陆与文明对决的戏剧性历史正在走向高潮。他预见到“终结欧亚帝国”的巨型大陆构造即将出现，然后与“大西洋帝国”进行最后的冲突。他用世界末日的术语描述了这场末世的决斗，他称之为“Endkampf”（“最后一战”）。奇怪的是，在帕武列斯科的作品中，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共存，作者与这些历史人物中许多人保持（并且仍然保持）友好关系。其中有戴高乐核心圈的政客、英美外交官、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哲学家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政治家兼作家雷蒙·阿贝利奥（Raymond Abellio）、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Arno Brecker）、神秘组织成员等。

尽管是虚构的形式，但帕武列斯科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实际地缘政治价值，因为，奇怪的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的许多文章却准确描述了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盛行的世界局势。

5.5 印度洋是通往世界统治的道路 罗伯特·斯图克斯

与“地缘政治远见者”帕武列斯科完全相反的是比利时地缘政治家和公关人员罗伯特·斯图克斯（Robert Steuckers），他是两本著名杂志 *Orientation*（《趋势》）和 *Vouloir*（《渴望》）的出版人。斯图克斯从纯粹的科学、理性主义立场研究地缘政治，试图将这门学科从所有“偶然的”阶层中解放出来。但按照学术方向的“新右派”逻辑，他得出的结论与帕武列斯科的“预言”惊人地接近。

斯图克斯还认为，各个国家和集团的社会政治项目，尤其是外交项目，无论它们可能采用何种意识形态形式，都是全球地缘政治项目的间接表达，有时甚至是含蓄的表达。在此他看到了“地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是地球上的存在（由地球创造）。因此，地球、空间预先决定了人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是“地缘历史”的前提。

大陆主义取向是斯图克斯的优先事项；他认为大西洋主义对欧洲怀有敌意，并将欧洲繁荣的命运与德国和中欧联系起来。⁷³ 斯图克斯支持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与阿拉伯世界的积极合作。

同时，他强调印度洋对地球未来地缘政治结构的重要性。他将印度洋定义为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中洋”。印度洋严格位于非洲东海岸和太平洋地区的中间地带，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都位于太平洋地区。印度洋的

⁷³ Robert Steuckers, “La Russie, L’Europe et L’Occident” in “*Orientation*” No. 4 Nov.- Dec. 1983.

- 85 -

海上控制是对非洲、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地区和太平洋地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大空间”施加地缘政治影响的关键位置。这意味着，印度洋上一些小岛，尤其是与所有沿海地区等距的迭戈加西亚岛，在战略上具有优先地位。

斯图克斯说，印度洋是整个欧洲战略应该关注的区域，因为通过这个区域，欧洲将能够影响美国、欧亚大陆和日本。在他看来，预先决定 21 世纪未来图景的决定性地缘政治对抗，将在这个空间展开。

斯图克斯积极参与地缘政治史的研究，他在新版《布鲁塞尔百科全书》中撰写了关于这门科学创始人的文章。

5.6 俄罗斯 + 伊斯兰教 = 拯救欧洲 卡洛·泰拉西亚诺

意大利也存在一个活跃的大陆主义地缘政治中心。二战后的意大利，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的思想比其他欧洲国家传播得更多，因此地缘政治的思维方式在那里变得非常普遍。此外，在意大利，让·蒂里亚特的“年轻欧洲”运动最为发达，因此，大陆民族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思想也是在意大利最为发达。

在众多涉及地缘政治的政治和社会学“新右翼”期刊和中心中，米兰人的《猎户座》特别受关注，过去 10 年中，卡洛·泰拉西亚诺（Carlo Terracciano）博士的地缘政治分析定期在该杂志上发表。泰拉西亚诺表达了欧洲大陆主义最极端的立场，其立场最接近欧亚主义。

特拉西亚诺完全接受麦金德和马汉的图景，并同意他们强调的严格的文明和地理二元论。同时，他毫不含糊地站在中心地带一边，认为欧洲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命运，取决于东方。大陆东部为正面的，大西洋西岸则是负面的。欧洲人的这种激进做法即使在大陆倾向的地缘政治家中也是一个例外，因为特拉西亚诺甚至没有强调欧洲的特殊地位，他认为，面对海权和地权之间的全球对抗，这是次要问题。

他完全认同单一欧亚国家的理念，“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都柏林的欧苏帝国”，这让他更接近蒂里亚特，但同时又不认同蒂利亚特的“雅各宾主义”和“普世主义”观点，而坚持民族文化差异和区域主义，这反过来又将他带到了阿兰·德·伯努瓦。

特拉西亚诺强调俄罗斯因素的中心性与另一个有趣的观点相辅相成：他认为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明显反美的政权：伊朗、利比亚、伊拉克等，在反对大西洋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这使他得出结论，伊斯兰世界是大陆地缘政治利益的最终体现。同时，他认为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版本是正面的。

- 86 -

总结特拉西亚诺博士的地缘政治观点的最终公式是：

俄罗斯（心脏地带）+ 反对美国（大西洋主义，世界主义）的伊斯兰教⁷⁴

特拉西亚诺将欧洲视为俄罗斯-伊斯兰反世界主义集团的跳板。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激进的问题提法才能客观地导致真正的欧洲复兴。

《猎户座》杂志（Orion）的其他员工和在其基础上运作的知识中心（克劳迪奥·穆蒂（Claudio Mutti）教授、毛里齐奥·穆雷利（Mauritsio Murelli）、社会学家亚历山德拉·科拉（Alessandra Colla）、马尔科·巴塔拉（Marco Battarra）等）也有与特拉西亚诺相似的观点。一些左翼分子、社会民主主义、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圈子、《人道报》（Umanita）、《新视角》杂志（Nuovi Angolazioni）等，也都倾向于这种民族布尔什维克趋势。

⁷⁴ Carlo Terracciano, “Nel Fiume della Storia” in *Orion*, Milano, Nos. 22 - 30, 1986 -1987.

- 87 -

第 6 章 新欧亚主义

6.1 欧亚热情 - 列夫·古米廖夫

欧亚学家萨维茨基最杰出的学生是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历史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ёв / Lev Nikolayevich Gumilyov）。实际上，他的作品中并没有涉及地缘政治话题，但他的民族起源理论和种族周期理论显然延续了“有机主义”方法和部分“地理决定论”的路线，这构成了拉策尔、契伦契伦、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本质等。

古米廖夫的研究对于欧亚大陆古代时期民族地图、大草原、游牧民族及其文明尤为重要。从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史观，其中欧亚东方不仅是文明边缘的蛮荒之地（等同于西方文明），而且是一个民族起源、文化、政治历史、国家和技术发展的独立与充满活力的中心。西方及其历史被相对化，欧亚文化和欧亚民族族群被揭示为一个多维的、完全未被探索的世界，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宗教问题、历史规律等。

古米廖夫发展了欧亚大陆共同的观念，并将这种观点推向了逻辑极限，即种族上的大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不仅是东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而且是在突厥-斯拉夫人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民族。这间接表明，俄罗斯有效控制着突厥民族居住的欧亚土地。伟大的俄罗斯文明是在突厥-斯拉夫民族起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地理层面上实现了森林和草原的历史联盟。正是森林与草原的地缘政治结合，构成了俄罗斯的历史本质，决定了其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命运的本质。

古米廖夫追随斯宾格勒（Spengler）和汤因比（Toynbee），确定了文明和文化的循环，以及相应的族群。在他看来，民族、国家、宗教团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在各个方面都像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他们经历了出生、青春、成熟和衰老的时期，然后消失或变成所谓“遗物”。这再次清楚地表明了“有机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学说一般适用于所有大陆主义地缘政治学派。

古米廖夫关于民族起源（即一个民族或国家诞生）的理论非常有趣。为了描述这个过程，他引入了“激情”或“激情推动”的术语⁷⁵。这是指一种无法解释的生物和精神能量的同步涌动，它突然触动了“老旧”民族及其文化萧条的历史存在，在空间、精神和技术扩张的动态浪潮中俘获了各种已建立的民族和宗教群体，征服并融合各种残余民族，结果涌现出欣欣向荣、切实可行的崭新面貌。在正常情况下，高涨成熟的激情、生机勃勃的民族孕育过程催生出

⁷⁵ Л. Гумилёв "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 Ленинград, 1990.

特殊的超级民族，与其说它对应政治组织的一个民族国家形式，不如说它对应一个帝国的诞生。

激情渐趋低落。“怀古主义”（对于古米廖夫来说，这属于正面的语汇范畴，他将其等同于“英雄主义”，等同于以忠于民族传统为名进行无私创造的道德愿望）正在被“现实主义”所取代，即只关心当下，脱离传统，也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命运。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激情崩溃”，民族生成进入了消极保守阶段，接着败相初现。紧随其后的是“未来主义”阶段，在

这个阶段中，无能为力的“梦想家”、“幻想家”、“宗教逃避者”占主导地位，他们对周围的存在失去信心，努力进入“另一个世界”。古米廖夫认为这是最终衰落的迹象。民族正在退化，超级民族正在瓦解，帝国正在崩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的“热情推动”，地平线上冒出又一民族，并引发崭新民族诞生时，老旧结构残余分崩离析。此外，一些族群仍处于“遗迹”状态（古米廖夫称它们为“幻想”），而另一些族群则消失在新族群的诞生过程中。

尤其重要的是古米廖夫的断言，即大俄罗斯人是一个相对“新鲜”和“年轻”的族群，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俄罗斯-欧亚大陆或欧亚帝国的“超级民族”。

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提出了以下地缘政治结论（他本人出于可理解的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而是更愿意严格停留在历史科学框架内）。

1) 欧亚大陆是一个成熟的“发展之地”，是一个民族起源和文化起源的沃土。因此，人们必须学会不以“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单极光学（这是典型的大西洋主义史学）来看待世界历史，而是以多极的视角，尤其对欧亚大陆的北部和东部感兴趣，因为它们是西方的替代品，是最重要的全球文明进程的来源。古米廖夫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绘了麦金德关于“历史地理枢纽”的论文，并赋予该枢纽特定的历史和种族内容。

2) 森林和草原的地缘政治综合是大俄罗斯国家地位的基础，是对亚洲和东欧进行文化战略控制的关键现实。此外，这种控制有助于东西方的和谐平衡，而西方文明（森林）的文化局限及其对统治的渴望，以及对东方（草原）文化的完全误解，只会导致冲突和剧变。

3) 西方文明处于民族形成的最后下降阶段，是“嵌合”民族的集合体。因此，重心必然会转移到年轻人身上。

4) 也有可能在今后的将来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激情推动”，这将彻底改变政治和

- 89 -

地球文化地图，自“遗迹”族群长期统治以来不能持久。

6.2 新俄罗斯欧亚人

古米廖夫本人并没有根据他的世界图景得出地缘政治结论。这是他的追随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审查制度减弱（然后废除）期间完成的。这个方向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新欧亚主义”，它又具有几个变体。并非所有人都继承了古米廖夫的思想，但总的来说，他对这种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

新欧亚主义有几个变种。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和最发达的）是一个完整的、多维的意识形态，它是由全国反对派的一些政界制定的，反对 1990-1994 年的自由主义改革。我们指的是一群围绕着《每日邮报》（后来的《明日报》）和《元素》杂志团结起来的知识分子。⁷⁶

这种新欧亚主义的基础是萨维茨基 (P. Savitsky)、沃尔纳德斯基 (G. Vernadsky)、普林斯 (Prince)、特鲁别茨科伊 (N. Trubetskoy), 以及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家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 (Ustryalov/ Николай Устрялов) 的思想。对历史欧亚人的分析被认为和当前情况高度相关, 并且非常适用于当前情况。帝国大陆范围内的民族意识形态理论既反对自由西方主义, 也反对狭隘种族民族主义。俄罗斯被视为地缘政治“大空间”的轴心, 其民族使命明确与帝国建设密切相关。

在社会政治层面, 这个方向明确地倾向于欧亚社会主义, 认为自由经济是大西洋主义阵营的特征。俄罗斯历史上的苏联时期, 被认为是旨在追求全球扩张和“欧亚反大西洋普世主义”的俄罗斯传统民族愿望的现代化形式。因此, 这个版本的新欧亚主义出现了“亲共”的倾向。

列夫·古米廖夫的遗产被接受了下来, 但同时, 激情理论和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 (Wilfred Pareto) 的“精英循环”学说联系在一起。古米廖夫的宗教研究在欧洲传统主义者学派 (基农 (Genon)、艾弗拉 (Evola) 等) 的基础上得到了修正。

传统主义者的“现代世界的危机”、“西方的堕落”、“文明的去神圣化”等思想是新欧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补充和发展了俄罗斯作家仅凭直觉、零碎呈现的那些内容。

此外, 对欧洲大陆主义项目 (豪斯霍弗、施密特、尼基施、“新右翼”等) 进行了深入研

⁷⁶ Francoise Thome, “Eurasisme et Neo-Eurasisme”, *“Commentaire”*, etc. 1994, no. 66.

究, 因此欧亚学说的视野延伸到欧洲, 被理解为潜在的大陆力量。这一动机与历史上的欧亚侨民格格不入, 他们的主要作品是在美国还没有独立的地缘政治意义、关于欧洲与西方差异的论题尚未得到适当发展的情况下写成的。根据欧洲大陆主义者的意见, 特别考虑到是欧洲地缘政治地图不稳定划分导致冷战中苏联失败, 新欧亚主义承认欧洲对欧亚“大空间”的地缘政治完整性和有效性在战略上极其重要。

新欧亚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选择伊斯兰国家 (尤其是大陆性的伊朗) 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欧亚大陆西南海岸反大西洋战略的核心是建立俄罗斯-伊斯兰大陆联盟的构想。在教义层面, 这种联盟是建立在俄罗斯和伊斯兰文明的传统特征基础上, 两者的文明将它们联合起来反对违反传统、世俗实用的西方。

在新欧亚主义的这个方向上, 所有与当前形势相关的地缘政治计划的图景都已完成, 因为在思想上、战略上、政治上和地位上, 新欧亚计划是最完整、最一致、最接近完成、历史上最合理地反对 (包括大西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 各种西方地缘政治计划。

世界主义和大西洋主义表达了极端西方的两种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欧洲地缘政治的欧洲主义与温和大陆主义代表了一种中间现实。最后, 《每日邮报》的新欧亚主义, 尤其是《元素》杂志的新欧亚主义, 表达了一种激进的反西方观点, 它同所有其他地缘政治计划相融合, 包括从欧洲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或伊斯兰“社会主义”), 直至第三世

界各个角落的民族解放运动。

新欧亚主义的其他变体不太一致，它们代表着上述整体综合的思想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要么我们只谈论实用的经济“欧亚主义”，旨在重建苏联前共和国的经济互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 Nazarbayev）的计划），或者关于正当性扩张主义论文（日里诺夫斯基（V. Zhirinovskiy）的“大国”计划），或者纯粹是对“欧亚共同体”的口头呼吁，以维护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联邦内少数民族（主要是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团结（叶利钦政府中若干人的计划草案），或者纯粹对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苏维钦斯基、卡尔萨文等流亡人士圈子内的遗产有历史兴趣。但所有这些计划都必然是人为的、分散的、前后不一致的，不能声称拥有独立而严肃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因此，详细讨论这些计划没有多大意义。

我们只注意到，对欧亚主义和欧亚大陆的任何诉求，无论人们使用这些概念的含义多么有限，都直接或间接指的是在反对派圈子中发展起来，并在《每日邮报》和《元素》杂志作者的作品中阐明的新欧亚计划。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欧亚主义”这个词才有道理，

- 91 -

一方面因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派具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因为俄罗斯以外全球范围内对地缘政治项目普遍表现狂热。

6.3 迈向新的两极

新欧亚主义，除了它的知识遗产和大陆地缘政治的一般原则之外，还面临着西方最新地缘政治计划所带来的最新问题。此外，这一地缘政治方向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不仅能够从地缘政治上解释当前历史事件的逻辑，而且可以发展出一个能抵御西方计划、连贯的未来学项目。

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从概念上来说，意味着两极世界的终结，和单极世界的开始。同时，如果纯粹的大西洋主义者（亨廷顿）假设这种单极是相对的，西方（The West）将被迫不断解决与“世界其他地区”（The Rest）日益增长的文明间冲突。然后世界主义者（福山、阿塔利）将西方在全球毫无问题的统治视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即使是最有争议的桑托罗（Santoro）教授，最终也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为前提。

这些是地缘政治赢家的项目，他们今天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和战略主动性，必须得到最高程度的重视。他们都同意一件事：西方式的普世主义迟早会在地球上取得胜利；大西洋主义的、海权的价值观体系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占主导地位。冷战时代的两极世界认为已被彻底征服。欧亚大陆和欧亚主义在这样的图景中毫无立足之地。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直接来自第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家的作品，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战略方法，特别是“蟒蛇”战略，千方百计削弱陆地势力，削弱他们的力量、限制他们的发展，并且严格控制越来越大的

边缘地带。

新欧亚主义在保持自身同时，不能承认这一事态的合法性，并且注定要寻找扭转所有这些过程的方法。它从最核心的问题，即单极问题开始。单极（无论是形式上纯粹的，还是通过世界主义的大西洋主义主导地位），都注定欧亚大陆作为心脏地带会被历史遗忘。新欧亚主义必须坚持抵制这种单极状态。

这只能通过新的两极来实现。

这需要一个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苏对抗结束后，世界本身将进入多极体系，中国将崛起，人口进程将把伊斯兰国家纳入地缘政治中心国家的范畴，即太平洋该地区将宣布其与欧洲和美国等的竞争力，等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没有考虑到这种新型多极化将在“大西洋价值体系”的标志下举行，即将仅代表海权体系的领土变化，绝不是真正的地缘政治替代方案。西方、市场和自由民主的挑战是普遍的。中心地带胜利后，人民和国家尝试

- 92 -

西方道路以外的任何其他道路的国家都失去主要支持。无论是亲苏政权，还是所有坚持“第三条道路”的“不结盟”国家，都是因为存在两极分化，因为西方和东方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存在差距。从此以后，对所有那些声称自己是发达地区的人，现代胜利的西方将决定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状况。因此，任何维持现状的多极化都是虚构的和世界主义的。

西方战略家对此深有体会，他们深知，西方现阶段的主要地缘政治任务是防止可能形成一个陆地面积大规模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西洋主义的势力匹敌。这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的美国军事政治理论的主要原则。换句话说，西方最不想回到两极状态。这对他来说将是致命的。

新欧亚主义从“历史地理枢纽”的利益出发，主张与西方完全相反。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新的两极主义，因为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欧亚大陆才能获得真正的地缘政治主权。只有新的两极建立后，才能为这种超越海权自由民主制度框架的多极体系开辟道路，即世界真正的多极化，每个国家和每个地缘政治集团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在通过新的全球对抗从全球大西洋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之后，才有机会实现。

同时，重要的是欧亚大陆集团不能成为华约的简单复制品。前地缘政治大陆结构的崩溃是不可逆转的，其根源在于其结构本身。新的大陆联盟应该包括整个欧洲直到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南部海岸的几个最重要的部分：印度、伊朗、印度支那等，或者确保这些空间友好中立，即让他们脱离大西洋主义的控制。回到旧的两极主义是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意识形态的。新欧亚两极主义应该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前提出发，基于完全不同的方法。

这种“新两极主义”理论在新欧亚项目中得到充分发展，成为欧洲和第三世界所有不墨守成规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理论依据。正如心脏地带在客观上是唯一能够成为全球替代海权统治的跳板地区一样，新欧亚主义也是唯一的理论平台，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一整套否定大西洋主义及其文明价值体系（市场、自由民主、世俗文化、个人主义哲学等）在世界上

统治地位的全球战略。

- 93

第三部分 俄罗斯和空间

第 1 章 心脏地带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大陆块，与欧亚大陆本身相同。在发展了西伯利亚，并完成整合之后，毫无疑问，俄罗斯就同心脏地带，即大陆的“中央地块”，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相吻合。麦金德将俄罗斯大空间定义为“历史地理枢纽”。在地理、景观、语言、气候、文化和宗教上，俄罗斯是欧亚东西部的综合统一体，其地缘政治功能不仅限于总结或协调东西方趋势。俄罗斯是第三者，独立而特殊，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在文化上理解俄罗斯的“中间”地位，俄罗斯欧亚人谈到了“中间帝国”的特殊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对立在精神上的垂直综合中被消除了。从纯粹的战略角度来看，俄罗斯与欧亚大陆本身是相同的，这仅仅是因为它的土地、人口以及工业和技术发展足以成为大陆独立、自给自足的基础。为了完成大陆一体化，根据地缘政治规律，这必须发生在每个“岛屿”上，包括“世界岛”本身，即与欧亚大陆。

就俄罗斯心脏地带而言，所有其他欧亚国家和土地都是沿海的边缘地带。俄罗斯是“历史枢纽”，因为“文明”围绕着它旋转，创造出其最浮华、最引人注目、最完整文明形式的，不是在生机勃勃大陆上的起源，而是在“海岸区”，在临界地带，在陆地空间与水面、大海或大洋交界处。从战略上讲，俄罗斯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领土结构，其安全和主权与整个大陆的安全和主权是一样的。从战略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领土结构，其安全和主权等同于整个大陆的安全和主权。对于任何其他欧亚大国，无论是中国、德国、法国还是印度，都不能这样说。如果对海岸邻国或其他“岛屿”国家，中国、德国、法国、印度、印度等国可能是一个大陆大国，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它们将永远是“海岸线”、“边缘地带”，不管其战略、文化和政治后果如何。只有俄罗斯才能以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代表心脏地带发言。它的战略利益不仅是接近于大陆的利益，而且与它们严格一致（至少，在技术界的当前发展阶段，确实如此）。

第 2 章 边缘地带问题

俄罗斯对西方罗马日耳曼和东方三大传统文明（伊斯兰、印度教和中国）的邻近大陆文明的态度至少有两个层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相互混淆，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误解。首先，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本质，它的精神自决，它的“身份”当然是由“既不是东方

也不是西方”或者，（用俄罗斯欧亚人的话来说）“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欧亚大陆”的公式来定义的。俄罗斯在精神上是第三方的，是独立的，是特殊的，它既没有东方的表达，也没有西方的表达。在这个层面上，俄罗斯的最高利益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独特性，在面对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的挑战时捍卫其原创性。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孤立主义，但仍然限制了可能假借的范围。历史现实主义要求我们勇敢地承认，肯定“自己的”。“我们的”总是与否定“外星人”、“不是我们的”相伴而生。肯定和否定都是人民和国家的民族、文化、历史和政治独立的基本要素。因此，在文化上否定西方和东方是俄罗斯独立的历史要务。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和讨论，承认原创性，有些人认为向东方开放多些比向西方开放多些更好（“亚洲方向”），其他人则相反（“西方方向”），其他人更喜欢完全拒绝任何对话（“孤立主义者”），第四个假设在两个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开放性（“新欧亚主义”的某些方向）。

在战略层面和纯地缘政治层面，情况完全不同。由于俄罗斯-欧亚大陆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全球对手与其说是“沿海文明”边缘地区，不如说是对立的“岛屿”大西洋美洲，因此最重要的战略要务是将“沿海领土”转变为盟友，战略渗透进入“沿海”地区，缔结泛欧亚协定，或者至少确保尽可能多的边缘地区在与跨大西洋西部的区位对抗中完全和严格中立。在这里，俄罗斯的战略方案应该明确地是“东西方”的方案，因为只有欧亚大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大陆一体化才能保证其所有人民和国家的真正主权，最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自给自足。在战略层面，今天只有一个反对派是相关的：世界主义（美国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或大陆主义（将地球划分为两个或多个享有政治、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主权的大空间）。边缘地带是俄罗斯成为真正拥有主权的大陆地缘政治力量所必需的。目前，随着军事、战略和经济技术的实际发展，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非大陆的主权：各种“民族主义的”、纯粹的“孤立主义”项目来解决俄罗斯的国家问题。战略领域的结果与世界主义计划完全一致，即全面控制地球并完成对欧亚大陆和俄罗斯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占领。

显然，将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问题转移到战略或地缘政治层面（即赋予“非东非西”公式纯粹的地缘政治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转移，旨在使俄罗斯对外政策在战略上迷失方向。无论“狭隘的种族”、“种族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俄罗斯建国模式的核心是不是无知、天真或有意识地反对其人民及其独立，其结果都与世界主义目标完全一致。如果不把俄罗斯变成“民族保留地”，美国就无法完全控制世界。

边缘地带问题只有在今天才以这种方式提出，此时两极世界整体战略历史及苏美全球冷战已经过去。在俄罗斯欧亚人政治活动的鼎盛时期，战略形势完全不同，很少有人能展望未来。因此，应该谨慎考虑欧亚主义者的一些地缘政治计划。特别是，他们更多从文化而不是战略方面来处理边缘地带问题。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以便俄罗斯制定一个严肃而有

意义的地缘政治议程，一个现实而有前途的议程，将大俄罗斯独立、主权、自主、自给自足和自由，这些主要的地缘政治要求放在首位。

第3章 帝国的集结

地缘政治的主要信条之一是断言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比该国家的政治结构特征重要得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精英的性质，甚至宗教在地缘政治光谱中被认为是重要的，但与基本的地缘政治原则国家与空间的关系相比，是次要的因素。通常（尤其是在俄罗斯）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性几乎被认为是“愤世嫉俗”甚至是“反民族”的做法。当然，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是地缘政治并不假装是决定国家和国家政治利益的唯一最高权威。像其他同样重要的学科一样，地缘政治学是使充分制定国家的国际和军事学说成为可能的几个基础学科之一。正如物理学，为了成为一门精准科学，必须从化学及其规律中抽象出来（这绝不意味着物理学否定化学），所以地缘政治学，为了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必须撇开其他非地缘政治的学科。然而，在考虑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最终结论时，非地缘政治学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同地缘政治学方法一起予以采用。

俄罗斯最紧迫的地缘政治要求之一是“集结帝国”。无论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苏联、东方集团、华约国家等，无论我们如何评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政治和文化现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对于可能的欧亚统一、对于大陆一体化和我们大空间的主权而言，东方集团的存在无疑是一个积极因素。正是地缘政治逻辑迫使比利时理论家让·蒂里亚特(Jean Thiriart)谈到建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都柏林的欧苏帝国”的必要性。只有东方集团才能成为欧亚大陆统一为帝国的基础，尽管欧洲的分裂和苏联在亚洲政策的不一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严重障碍。许多现代地缘政治家认为，在许多现代地缘政治人物看来，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西部和东部的战略脆弱性，美国对西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控制得如此之好和连贯，以至于这些国家最终未能实现欧洲大陆一体化，并助长了东欧集团本身的崩溃。两极世界的终结是对欧亚大陆的战略打击，对大陆主义和所有欧亚国家潜在主权的打击。

- 96 -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主权的当务之急，不仅要恢复失去的“近邻国家”区域，不仅要恢复与东欧国家的同盟关系，还要包括西方大陆国家（首先在新兴欧亚战略国家集团、法德集团，目标是摆脱亲美北约的大西洋主义监护），包括大陆东部（伊朗、印度和日本）。

地缘政治“集结帝国”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式，一种可能的国家与空间关系，更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是独立大陆上的独立国家，存在的保证和必要条件。

如果俄罗斯不立即开始重建大空间，即将暂时失去的欧亚大陆恢复到俄罗斯战略、政治和经济影响范围内，俄罗斯将使自己和生活在“世界岛”上的所有人民都陷入一场灾难。

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过程很容易预见。如果俄罗斯选择“集结帝国”以外的其它道路，心脏

地带的大陆使命将被新的大国或国家集团接管。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辽阔广大将成为宣称是“欧亚大陆新据点”势力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控制“历史地理枢纽”的空间，要控制这片大陆是不可想象的。要么中国拼命向北方进军哈萨克斯坦和东西伯利亚，要么中欧转移到俄罗斯西部领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即大俄罗斯西部，要么伊斯兰集团试图整合中亚、伏尔加河地区和乌拉尔以及俄罗斯南部的一些领土。这种新一轮的大陆整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与它的单极大西洋主义方向水火不容。在地缘政治中，“圣地永不空”的神圣法则是颠扑不破的。此外，推动其他欧亚集团向俄罗斯领土扩张的，不是“领土利己主义”或“俄罗斯恐惧症”，而是空间的必然逻辑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被动性。在大陆战略领域，期望其他民族仅仅出于尊重“俄罗斯文化的独创性”，在领土扩张到俄罗斯领土之前止步不前，那是愚蠢的。只有强大的领土冲动和位置优势才能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即使对立即“集结帝国”一事犹豫不决，进入俄罗斯边界建立另一种地缘政治大空间，已经足够挑战，已经奠下充分基础。无疑，这将激怒俄罗斯人，并引发一场可怕而无望的欧亚内部冲突；无望，因为它甚至没有理论上的积极解决方案，要创造一个非俄罗斯的欧亚大陆，必须彻底摧毁俄罗斯人民，这不仅困难无比，而且史无前例，也决无可能实现。另外，这样的冲突会使大陆邻国和反大西洋方向的邻国之间兵戎相见，而这样的结果只会强化第三方势力的地位，即强化美国及其同僚在世界主义规划中的地位。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拖延“集结帝国”（更别提可能拒绝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扩张）必然会引发欧亚大陆的大流血事件。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可怕的例子，说明在俄罗斯会发生无与伦比的大规模事件。

- 97 -

今天，在作为“历史枢纽”的俄罗斯主持下就重新统一欧亚领土，会充满相当困难；但是，如果不是立即启动“集结帝国”，就不可避免发生灾难。同这些灾难相比，那些困难微不足道。

第 4 章 温暖和寒冷的海洋

“集结帝国”的过程最初应该着眼于一个长远的目标，那就是俄罗斯进入温暖的海域。正是由于遏制了俄罗斯在南部、西南和西北方向的扩张，大西洋主义英格兰成功保持了对欧亚大陆周围所有“沿海空间”的控制。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是东方和北方的“完整”大国，其政治边界与欧亚大陆的自然地理边界重合。但矛盾的是，这些海岸与寒冷的海域相邻，这是航行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以至于它将在海上与西部岛屿（英格兰，以及后来，美国）的船队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的自然和文化特征，俄罗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从未被充分利用过。所有的俄罗斯亚洲部分整合项目，从巴德迈耶夫博士向末代皇帝的提议到勃列日涅夫的巴姆项目（БАМ，贝加尔湖-阿穆尔铁路干线项目—校译者），都在自发的或

受控的历史灾难影响下倒塌。

尽管如此，从北部和东部的进入冷海必须辅以从南部和西部的进入暖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才会“完整”。事实上，俄土之间爆发过多次战争，然而从战争中获利的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英国人，他们抽干了三个传统帝国中后两个帝国（第三奥匈帝国）的血。俄罗斯向南方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搏是苏联向阿富汗扩张，不幸以失败告终。地缘政治逻辑清楚地表明，俄罗斯肯定会再次回到那里，作为一个真正的盟友、保护者和朋友，而不是一个残酷的惩罚者去那里会好得多。只有当海岸线成为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边界时，才能说其大陆建设的最终完成。这不一定依靠征服、扩张或吞并。与欧洲大陆和亚洲大国建立强大的反大西洋主义等战略联盟将足以实现这一目标。要想进入暖海，不仅可以通过血腥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合理利用有利于所有大陆大国地缘政治的利益来做到，因为当这些打过面对另一个被门罗战略学说团结起来的大西洋岛屿时，欧亚战略一体化项目将使得所有这些大国具有真正的主权和独立。俄罗斯过去是无法进入海峡和温暖海域的，而当时美国这样一个明显威胁整个欧洲和整个亚洲利益的大西洋因素还不存在，各个大陆大国互相争执，在领土战略联盟的问题上对抗英格兰，对抗领导权。门罗主义在美国的实施凸显了俄罗斯的全部地缘政治重要性，因此，无论大陆各国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怎样的政治形式，与俄罗斯结盟成为大陆所有现实地缘政治家不言而喻的王道。世界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全球

- 98 -

主义的威胁，在理论上，通过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不言而喻的联盟对抗海外入侵者，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温暖海域的通道。

- 99 -

第四部分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

第 1 章 激进替代方案的必要性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提出了关于俄罗斯未来的两个基本项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生活、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民族利益、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军事建设等方面。

第一个项目属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改革者”，他们以西方社会、现代“商业制度”为例，完全赞同弗朗西斯·福山的同名著名著作中提出的“历史终结”项目。本项目否定人、民族、历史、地缘政治利益、社会正义、宗教因素等价值观。其中的一切都基于最大经济效率的原则，基于个人主义、消费和“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自由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新社会来代替俄罗斯，这将建立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赖以生存的规则和文化坐标。这个阵营可以很容易地根据西方已经存在的模型，使用西方自由主义术语和法律规范，并依赖于整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发达理论结构，对任何关于俄罗斯现实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问题做出回答。前段时间，这一立场几乎在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它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因为它与自由主义改革的一般过程和基本逻辑大体相吻合。

俄罗斯未来的第二个计划属于所谓的“民族爱国反对派”，这是一个多元化和多方面的政治现实，把反对自由改革和反对改革者所倡导的自由逻辑两者联合了起来。这种反对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也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而是“红白相间”，即由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大部分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和君主制、沙皇主义的支持者主导。“联合反对派”的两个组成部分在观点上差异很大，但不仅在“共同敌人”的定义上，而且在他们共同的一些心理、意识形态陈词滥调上也有相似之处。此外，绝大多数爱国“反对派”由改革前（*pre-perestroika*）体制的领导人组成，他们甚至将纯苏维埃心态的元素引入“白人”、“沙皇主义项目”，而这些项目在改革开始之前往往没有历史，家庭或政治关系，在勃列日涅夫的现实感觉很好。尽管如此，这个对立的项目可以被称为“苏联沙皇”，因为它是基于一些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政治社会和行政原型，这些原型客观地将苏联时期和（至少在二十世纪框架下的）前苏联时期放在一起考虑。爱国者的意识形态比自由主义逻辑和完整建构更加矛盾和混乱，因此它往往不是以一个完整的概念或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零碎的、情绪化的、不一致的和杂散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这个由苏维埃-沙皇精神残骸组成的怪诞集团已经有一定完整性，但其结构有时并非合理。

- 100 -

这两个项目，自由主义项目和苏维埃沙皇主义项目，本质上都是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

史的死胡同。自由主义项目往往使得俄罗斯人的民族特征在“历史终结”和“全球市场”的世界性时代逐渐消失；而苏联沙皇主义项目则试图在这些世界中复兴民族和国家，然而，这是一种诱惑，并逐渐导致俄罗斯人垮台。

除了“改革派”的自由主义和“联合反对派”的苏维埃沙皇主义之外，迫切需要一种“第三条道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项目，它不会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妥协，也不是“中间主义”。它是一个完全激进的创新，一个未来主义的计划，它打破了“不是自由派就是反对派”的绝望二元逻辑，就像身处没有出口的迷宫，俄罗斯人当前的公众意识则东奔西突、多方尝试。

有必要打破僵局并树立真正的替代方案，既要反对自由主义方案，也要反对苏维埃沙皇方案。处于危急关头是这个伟大的国家，是这个国家的利益，是这个国家的命运。

- 101 -

第 2 章 什么是“俄罗斯国家利益”？

2.1 俄罗斯人今天没有国家

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严格来说，谈论“俄罗斯的战略前景”是不可能的。此外，不可能提出任何有关俄罗斯外交和国内政策的项目，因为主要问题是今天的俄罗斯是什么？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也没有被认真对待。

前苏联发生的整个政治、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迅速改变完全颠覆了所有现有法律及政治的标准与规范。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后来的苏维埃国家的瓦解在前苏联领土上创造了一个完全不确定的领域，其中不再有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没有严格的法律框架，没有具体的社会前景。苏联解体后，靠惯性“自动”形成的地缘政治结构是随机的、短暂的和极不稳定的。这不仅适用于与莫斯科分离的共和国，而且首先适用于俄罗斯自身。

要为“国家利益”制定计划，就必须清楚地知道所指的是哪个国家。换句话说，在存在明确识别的政治主题的情况下，它是有意义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人没有这样的主题。

俄罗斯的存在，被理解为俄罗斯联邦（RF），显然不符合确定“国家”地位的任何严格标准。在评判俄罗斯联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时各说各的，正是这一事态的生动证明。什么是俄罗斯联邦？苏联的接班人和继任者？区域势力？单民族国家？跨种族联盟？欧亚宪兵？美国项目的抵押品？打算进一步分裂的领土？根据具体情况，俄罗斯联邦扮演这些角色之一，尽管这些定义绝对不一致。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声称在世界政治中具有特殊作用的国家，在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次要的区域大国，在第三个方面，它是分裂主义实验的领域。如果同一个领土政治实体能同时起到所有这些作用，那么很明显，我们谈论的是某种条件，某种变量，而不是在国家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来指代一个完整而稳定的政治现象。

俄罗斯联邦不是俄罗斯，一个成熟的俄罗斯国家。这是一个广泛而动态的全球地缘政治进程中的过渡实体，仅此而已。当然，未来俄罗斯联邦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国家，但这是否会发生完全不明显，是否应该争取也不明显。

尽管如此，对于俄罗斯联邦这样一个不稳定、暂时的现象，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谈论“战略利益”的，而基于当前的事态试图制定“俄罗斯联邦战略学说”更是荒谬的。“俄罗斯联邦的战略利益”只有 在这些利益的政治、社会、经济 and 思想主体出现、形成和确定之后才

- 102 -

能变得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之前，任何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计划都将仅是海市蜃楼。

俄罗斯联邦没有国家历史，边界杂乱无章，文化取向含混不清，政治体制模糊且摇摇欲坠，民族版图种类繁多，经济结构支离破碎。这个集团只是一个更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实体崩溃的结果，是从整体上撕下的一个片段。即使为了在帝国这个骨架上创造出一些稳定的东西，也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类似于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中创造了现代化的世俗土耳其（尽管这里再次出现了问题：是否值得为此努力？）。

如果俄罗斯联邦不是俄罗斯国家，那么独联体也不是俄罗斯国家。尽管几乎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领土（极少数例外）都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曾经是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今天独联体国家拥有足够自治权，并且在法律上被认为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人们可以（并且更有理由）断言，这些国家与俄罗斯联邦的相同，这些实体没有任何真正国家地位哪怕一丁点真凭实据的迹象，它们也缺乏实际主权属性，并且至多处于一个“领土过程”，而不是一个稳定和明确的地缘政治单位。即使我们忽略独联体国家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是反俄罗斯的，来自非自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国家碎片本身，人们也不可能拼凑出一幅和谐的画面。比利时地缘政治家让·蒂里亚特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准确的比拟。“苏联就像一块巧克力，标明了共和国的边界。一旦掰开，就没法拼成一整条巧克力了。从现在开始，这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把整条巧克力统统熔化，再重新成型。”

“俄罗斯联邦的战略利益”与“独联体国家的战略利益”是同一个空洞图像。它与“俄罗斯人的战略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

2.2 “后帝国合法性”的概念

尽管完整意义上的俄罗斯国家并不存在，但某些法律原则仍在整个后苏联空间运作，西方对俄罗斯联邦某些行动的反应和俄罗斯领导层采取的瞬时逻辑都是基于这些原则的。乍一看，正是这些原则使俄罗斯联邦乃至更广泛的独联体免于彻底混乱。我们谈论的是“后帝国合法性”学说。为了理解当今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进程的本质，有必要简要概述这一概念的主要论点。

“后帝国合法性”是与该地区前一阶段政治发展，即“帝国合法性”（“帝国遗产”），密切相

关的一套法律规范。一个帝国（至少是一个“世俗”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帝国），在其殖民地的领土安排中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行政和经济方面的，不考虑种族、宗教或民族因素。帝国内部的行政边界相当随意，因为这些边界显然只是为了方便对大都市集中控制而设立的

- 103 -

条件性屏障。帝国在其存在期间迫使其他势力承认其内部行政系统是合法的。但随着帝国的崩溃，“法律不确定区”总是会出现，因为法律上规定其组成部分地位的这种安排不复存在。

在“后殖民”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国际法律概念，为后帝国领土和政治实体合法管辖到不堪胜任的分类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后帝国合法性”的概念。它的含义浓缩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整个帝国不存在，但其纯粹行政组成部分获得了成熟的法律地位，无论该实体是否满足成熟国家的标准。这种方法基于世俗自由主义思想，即任何国家的形成都是历史偶然性。按照这个逻辑，种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的成分是难以理解和无关紧要的，因为人口被理解为简单的经济统计单位。这反映了“帝国”、“殖民”方法的惯性，习惯于将“殖民地”和“省份”视为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在一般背景下的“补充措施”。

作为一项规则，“后帝国形式”永远不会（或几乎永远不会）成为成熟的国家，并继续作为前（或新）母国的经济和政治附属物而存在。他们中的统治精英几乎总是殖民政府的直接继承人（通常是门生），经济完全依赖外部因素，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为中心模式。这种“后帝国合法性”的维护往往导致同一本土民族居住在不同后帝国国家的领土上，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生活在一个国家内。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相对平衡只能通过诉诸外部因素来维持，最常见的是诉诸前母国（或可以取代它的发达国家）的公开或隐藏的权力。很明显，在非洲“解放”的最后阶段，泛非大会决定在所有新成立的国家适用“后帝国合法性”原则，尽管许多非洲大民族，特别是班图人，祖鲁人等原来是同时住在两个或三个国家。

这是在避免种族、部落和宗教战争的借口下进行的。事实上，这是关于后帝国政府领导人希望让他们的人造精英继续掌权，防止在国家高涨过程中产生新的有机国家等级制度代表。鉴于非洲的战略和社会经济落后以及缺乏新鲜和重要的国家传统，这种方法非常成功。

“后帝国合法性”的原则现在适用于从苏联废墟中崛起的国家。在前“加盟共和国”中，几乎所有掌权者都是“殖民行政”的继承者，这些殖民行政机构就是完全在苏维埃帝国背景下形成的单一行政结构的各个分部。这些精英与本国人民的民族和文化传统疏远，惯性地倾向于维持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母国。唯一的例外是亚美尼亚，在那里（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 104 -

（Nagorno-Karabakh）的情况下），“后帝国合法性”逻辑受到侵犯，于是，纯粹的国家政治力量比所有其他独联体国家更重要。此外，亚美尼亚是独联体国家中唯一的单一民族共和国。

乍一看，“后帝国合法性”原则似乎对俄罗斯联邦和莫斯科有利，因为它为保持俄罗斯联邦在“近邻”的影响力创造了先决条件，并简化了与地理邻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事实上，一切都有些复杂。就像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一样，帝国的崩溃削弱了母国的地缘

政治力量，部分殖民地和领土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暗中控制，它利用“后帝国合法性”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美国，它实际上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接管了大部分前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因此，独联体国家的后苏联“殖民政府”可以被另一个“殖民政府”取代（并且即将被取代），它利用现存的人工政府结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后帝国合法性”使俄罗斯联邦本身与其他独联体国家平起平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文化、宗教和种族利益被完全忽视，变成属于“后帝国”的、纯粹行政法的抽象规范，分散在各种外来的伪国家和准国家政体上。残存的俄罗斯帝国政府（政党官僚机构）对于俄罗斯人是陌生的，而这套管制结构对其他共和国而言同样陌生，因为那套帝国制度是建立在不同的行政和经济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族和文化原则之上。俄罗斯人从（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解放”出来后，并没有获得自由和独立，却失去了相当大的民族社区，俄罗斯人沿用旧名称，继续处于依赖地位，他们还面临新的危险，受到更强大外部政治势力的影响。在（苏联）帝国存续期间，上述威胁并非近在咫尺，但俄罗斯联邦一旦成为简单的“地区大国”，便完全暴露在这些威胁面前。

所有这些考虑都对“后帝国合法性”原则在当前条件下的适用性产生怀疑，因为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相矛盾。

但在确定什么是“俄罗斯国家利益”时，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在确定何为有益，何为无益时，应该以谁为主体？今天的俄罗斯应该归为哪一范畴？

2.3 俄罗斯人民是地缘政治概念的中心

苏联帝国的解体、其领土上（包括俄罗斯联邦）新政治结构的脆弱和国家失败迫使我们寻找一个更具体的范畴来理解“俄罗斯国家利益”。在这件事上，只有俄罗斯人民才是唯一有机的、自然的、有历史根源的现实。

- 105 -

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历史共同体，具有作为一个成熟、稳定政治实体的所有标志。俄罗斯人民在种族、文化、心理和宗教上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性并不是作为政治和社会战略主题置于地缘政治概念中心的主要原因。与许多其他民族不同，俄罗斯人民已经成长成为一种特殊文明的承载者，该文明具备原创、成熟全球历史现象的所有特征。俄罗斯人民在文明上持续改进，它成为一个枢纽，创建了不仅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从东斯拉夫公国众多诸侯国（мозаики, mosaic）到莫斯科罗斯（Московская Русь）、彼得罗夫斯基帝国（Петровская Империя）和苏联集团。此外，对文明的持续改进决定了在政治、社会、领土和结构上如此不同的实体之间的连续性和联接性。俄罗斯人民不仅为构建所有这些国家提供了民族基础，而且还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文明理念。不是国家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相反，俄

罗斯民族、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上尝试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系统，（根据具体情况）表达了他们的独特使命。

俄罗斯人民当然属于弥赛亚民族。和任何弥赛亚民族一样，它具有普遍的、全人类的意义，不仅与其他民族观念相竞争，而且与其他形式的文明普世主义相竞争。康·列昂季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 K. Leontiev）和俄罗斯欧亚人非常充分地发展了这个想法。

无论是遇到麻烦，还是身处过渡时期，或政治动荡，俄罗斯人民始终保持着他们的救世主身份，因此始终是历史的政治主体。在另一次国家动荡之后，同样古老而强大的俄罗斯人创造了新的政治结构，将他们的精神冲动融入新的地缘政治形式。此外，一旦国家结构发展到临界点，超过这一临界点，政治形式与民族内容之间最终会失去联系，危机和灾难就会接踵而至。随后，新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建设就会开始，并按新的形象和政治设计赋予俄罗斯人民文明的使命。

而在当前的过渡时期，应该把俄罗斯人民作为主要的政治主体，抛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规模以及社会经济利益。俄罗斯人民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但不是作为一个明确界定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潜力。一方面，这种地缘政治潜力是真实而具体的；另一方面，其新的国家结构尚未确定，无论是它的意识形态、它的领土边界，还是它的社会政治结构都未确定。

然而，今天“潜在俄罗斯”比短暂的俄罗斯联邦或独联体具有更多固定的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关系到文明使命，而实现文明使命，就是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

首先，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无疑对控制欧亚大陆东北地区负有责任。这场俄罗斯的“向东向北推进”（“Drang nach Osten und Norden”）构成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历史上自然的地缘政治进程。任何政治灾难都未能阻止这一进程。麦金德将俄罗斯称为“历史的地缘 - 106 -

政治枢纽”，这绝对是事实，因为俄罗斯人民在传统上确实倾向于那些位于欧亚大陆质量中心的、大陆内各部分之间的文明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人的战略利益与欧亚东北部的广袤是分不开的。这是决定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地缘政治真正前景的基本原则。

其次，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这与天主教-新教的西方以及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后基督教文明截然不同。作为俄罗斯的文化 and 地缘政治对立面，我们应该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其组成国家之一。现代西方文明是一种普遍主义导向：在所有西方文化中，都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统一体，其基础是主要哲学和世界观问题的解决方案。俄罗斯的普遍主义是俄罗斯文明的基础，在所有主要方面都与西方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两个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模型，是相反的两极。因此，俄罗斯人民的战略利益必须是反西方的（这是维护俄罗斯文明身份的先决条件），未来也有可能出现文明扩张。

第三，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从来没有将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种族同质的国家作为自

己的目标。俄罗斯人的使命具有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上系统地走向建立帝国，帝国的边界不断扩大，涵盖了越来越大的民族、文化、宗教、领土、地区。将俄国人有计划的和公开的“扩张主义”视为历史偶然是荒谬的。这种“扩张主义”是俄罗斯人民历史存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优质的文明使命息息相关。这项任务带有一定的“共同点”，使俄罗斯人能够将最多样化的文化现实融入他们的帝国。但是，这些“共同点”只适用于具有特定历史特征和文化内容的民族，而其他民族(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与俄罗斯的普遍性截然不同(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在欧洲政治影响力的不稳定性甚至不一致)。

第四，俄罗斯人民(=俄罗斯)的存在是从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救世论”角度出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这不是关于俄罗斯人无限扩张“生存空间”，而是关于建立一种“俄罗斯”式特殊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强调末世，并声称在地球历史上拥有最后的话语权。

因此，从理论上讲，地球上不存在这样的人、这样的文化或这样的领土，其命运和道路将与俄罗斯意识无关。这体现在俄罗斯人对真理、精神和正义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不仅在俄罗斯国内，而且在任何地方。剥夺俄罗斯人这种末世信仰无异于对他们的精神阉割。俄罗斯人关心每件事，关心每一人，因此，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归根结底不仅限于俄罗斯民族，也不仅限于俄罗斯帝国，甚至也不仅限于整个欧亚大陆。在制定未来的地缘政治战略时，

- 107 -

必须考虑俄罗斯民族这一“超验”的特点。

显然，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普遍接受的西方、世俗、定量自由的法条规范下，没有任何客观可能性，可以不仅在法律上巩固“俄罗斯人民”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而且在法律和外交用途中引入如“人民”这样的术语。现代国际法(在其主要特征上模仿罗马法)只承认国家和个人是成熟的政治主体。

因此，存在“国家权利”和“人权”的代码，但却没有“人民权利”的概念。这并不奇怪，因为世俗和定量的方法无法考虑涉及种族、人民等文化精神的类别。苏联体制和“民主”世界都有类似的数量比例。而且，由于当前时期的俄罗斯人民居住在“后帝国”或自由民主合法性原则运作的领土上，因此，自动承认“人民”政治地位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因此，明确和保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逻辑要求对现有的法律实践作出重大改变，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层面重点对这种做法进行彻底修改。

对一个不发达、没有技术装备的民族，这样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对俄罗斯人，情况并非如此。今天，我们仍然有可能进行完全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转型，因为俄罗斯拥有战略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西方的压力。在这里，一切都只取决于那些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负责的人，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意愿和决断能力。

尽管如此，确定“俄罗斯人民的国家利益”的第一步是承认俄罗斯人民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有权自行决定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并采取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战略的相应步骤。

第 3 章 没有帝国，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

3.1 俄罗斯人缺乏“民族国家”

俄罗斯从来都不是像那些具有现代欧洲特征的“民族国家”。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亚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都体现出这类民族国家的模式。

“民族国家”的基础是行政统一和官僚集中制，这种体制形成由国家创造并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政治共同体。毫无疑问，“民族国家”模式首先在专制主义的法国形成，然后在雅各宾革命模式中得到巩固。“民族国家”最初在本质上是强调世俗的，主要代表一种政治统一体。在这个概念中，“民族”一词被理解为“公民的集合体”，而不是有机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或“民族”。这种类型的国家基于种族、信仰和阶级水准，基于整个社会中都有类似的法律和程序规范，不考虑地区、宗教或种族特征。名义上，“民族国家”可以是君主制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不是政治制度的具体细节，而是将国家理解为行政中央集权的实例，而置于所有社会-种族和文化-宗教差异之上。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具有纯粹的政治含义，这与民族主义者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截然不同。

“民族国家”历史上在欧洲出现于帝国统一最终崩溃的时期，帝国体系是以封建区域结构形式保存下来的，当帝国体系的最后残余遭到破坏，结果就出现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受世俗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主导，这些价值观将定性的社会差异减少为简化的定量行政结构。“民族国家”通常不是由“神念”（如神权或神圣帝国）统治，不是由“英雄贵族人格”（如封建制度）统治，而是由“法律专政”（“法治”），这赋予了法学家和法律官僚权力。事实上，“民族国家”是最易于管理、最定量有序的政治现实，因为所有非量化的、“非理性”的因素在其中都被限制在最低程度。

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民族国家”。从那时起在欧洲正是这种模式在 18 世纪开始生根发芽，俄罗斯不择手段地拼命抵制。沙皇政权尽管不断对欧洲模式做出一些让步，但试图尽可能地保持帝国结构的完整。虽然彼得大帝进行了亲欧改革，但俄罗斯帝国既保留了神权统治元素，也保留了贵族统治原则，（与西欧国家不同）在实践中却从未完全实现将牧师和贵族代表转为国家官僚级别。民族因素抵制了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这种退化，这种

“民族国家”经常引起人民和精英们自发的或有意识的抗拒。即使俄罗斯在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下，改革派和反动派的情绪也经常发生变化，从自由主义改革开始，他们经常转向神秘的复辟计划（这在神圣同盟创始人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直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才接近于按照欧洲模式实现“民族国家”。然而，这次，这一进程也因一场革命爆发而挫败，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是不自觉地）强烈反对一种无视精神上大众使命的国家机构。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现代主义修辞背后，俄国人隐约认识到自己的末世理想是理念、正义、真理的胜利。苏维埃国家被公众视为建立“新帝国”、“光明王国”、“精神家园”，而不是建立最合理的机构，对各部门进行行政管理和定量经营。布尔什维克大灾难的悲剧和狂热恰恰是由任务的“理想”性质造成的，而绝不是由于无法更“人道”，或者成本更低地组织人力资源。

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国家”，而是延续纯粹的帝国民族传统，它被包裹在奢侈的外在形式中，和后来的俄罗斯帝制模式形成对比，滑入普通资产阶级社会，滑入“法律专制”。苏维埃帝国与任何政治结构一样，存在众所周知的“革命三阶段”：建立独特制度（列宁的青年时期）、巩固和扩大国家的稳定阶段（斯大林的成熟阶段），以及崩溃和衰败阶段（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此外，正是勃列日涅夫晚期产生了与典型“民族国家”的官僚集中制最相似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在改革中，整个苏联编队的生命周期结束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民民族历史的另一个阶段也随之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在俄罗斯转变为“民族国家”时，灾难接踵而至，在新的一轮转变中，俄罗斯民族又会遇到另一个（有时相当奢侈的）方式去逃避看似不可避免的转变。俄罗斯人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避免这样的事态发展，因为他们的政治意愿不符合官僚有效机制框架内合理的、平均定量存在的狭隘标准。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做出难以想象的牺牲和艰辛，哪怕只是为了实现和发展民族理想，实现伟大的俄国梦。

这个国家至少在帝国中看到了这个梦想的边界。

3.2 俄罗斯帝国人民

俄罗斯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是个民族国家；俄罗斯最初几乎是一个潜在的帝制国家。从留里克（Рюрик, Rurik）统治下的斯拉夫和芬兰-乌戈尔部落的统一，到辽阔的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广袤领土，俄罗斯人民稳步走上政治和空间一体化、帝国建设和文明扩张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的扩张恰恰具有文明意义，绝不是为了功利而追求殖民地，也不是平

- 110 -

庸地竞争“生存空间”。不是缺乏这种“生存空间”，也不是经济上的需要，促使俄罗斯人民越来越多地向东、向南、向北、向西扩展他们的边界。缺乏土地从来都不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俄罗斯人把领土扩张当作他们特殊使命的载体，其地缘政治反映在深刻意识到需要统一欧亚大陆的广大领土。

欧亚空间的政治完整性对于俄罗斯历史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可以说，俄罗斯人对这个空间、它的状况、它的联系、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负有责任。麦金德正确地认为俄罗斯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陆地大国，它继承了罗马、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等地缘政治使命。这就是“历史的地理枢纽”，无论外在的、短暂的因素如何，它都不能不履行其地缘政治命运。

俄罗斯人民与地缘政治现实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空间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意识、它的精神感知塑造了人们的心理，成为其身份和本质的主要定义之一。

真实的地球空间不是一个纯粹的量化范畴。气候、景观、地形地质、水道和山脉对形成民族类型，乃至更广泛而言，形成文明类型，起到重要作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文明及其特殊性一般是由地理严格决定的，必须服从特殊的定性规律。俄罗斯人是一个陆上的、大陆性的、北部欧亚大陆的民族，而这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使其“灵魂”最大限度地倾向于“开放”，倾向于实现“整合”功能，倾向于一种微妙而深刻的过程，即发展欧亚共同体的特殊大陆。

文化因素是对俄罗斯纯粹的地缘政治命运的自然补充。地缘政治使命在文化层面得以实现，反之亦然，文化理解、塑造和激活地缘政治冲动。作为卓越的帝国建设者的人民，俄罗斯人民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地域和文化。使得俄罗斯民族从东斯拉夫人的一部分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特殊的、无与伦比的群体的，不是血缘，不是种族，不是行政控制，甚至不是宗教。正是欧亚大陆的浩瀚无垠，文化精神的极致开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他们在“地域和文化”的标志下，对种族、政治、伦理和宗教诸方面历经深思熟虑。俄罗斯人正是在帝国中，在其建设的英雄主义，在其防御的功绩，在其扩张的运动中，形成、发展并成长为一个民族。拒绝构筑帝国伟业，意味着俄罗斯人民作为一种历史现实、一种文明现象不复存在。这种拒绝无异于国家自杀。

与罗马（第一罗马）不同，莫斯科、俄罗斯在其帝国冲动中具有深刻的目的论和末世论意义。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末世情境中的绝对理念必须以普鲁士国家形式的最终“有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普鲁士，甚至单独从德国来看，在地缘政治上不足以认真对待黑格尔的这个概念。第三罗马俄罗斯，在宗教、文化、地域和战略

- 111 -

上都完美对应反映历史本质的类似目的论观点，并且明显在寻求完成这一使命。以俄罗斯为例，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构筑俄罗斯帝国的精神根源，它吸引着将文明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将如此严肃的黑格尔标准应用于“民族国家”是荒谬的，那样的话它就显然假设了其他具有自己目标、神话和利益的“民族国家”会成为你的邻国。将绝对意义的本质传授给这样一个相对结构是相当荒谬的。但对于一个基于特定的、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在某些方面没有完全阐明原则的庞大帝国而言，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古代帝国被称为“神圣帝国”并非巧合：之所以被赋予“神圣”品质，是因为他们在完成一项特殊精神使命，他们注定会代表“终结的帝国”，即遍布大陆的“绝对理念王国”。

俄罗斯人民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在他们国家扩张的每个阶段，俄罗斯人都进入了弥赛亚普世主义的下一个阶段，首先召集东斯拉夫人，然后包括草原和西伯利亚的突厥河流，

然后向南移动，进入沙漠和山脉，最后形成一个巨大政治集团，在苏联时期，真正控制着半个世界。如果我们认识到俄罗斯人民的本质就是这个帝国构筑过程，就是创立意志坚定的“绝对理念国家”地缘政治倾向，那么很明显，俄罗斯人民的存在直接取决于延续、发展，以及不断强化这一帝国构筑过程。通过削减或压制这一倾向，相当于直击俄罗斯人心脏，剥夺他们的民族认同，使他们成为一堆历史残余，扰乱全球目的论、末世论的整体进程。

3.3 “区域性大国”陷阱

传统上，肩负着文明和地缘政治使命的俄罗斯人民一直是（现在也是）纯粹自由的西方模式在地球上广泛传播的严重障碍。沙皇和苏维埃政权都遵循不可阻挡的民族逻辑，阻止了西方向东方特别是深入欧亚大陆的文化和政治扩张。不仅如此，地缘政治的严重对抗始终体现在以下事实上：俄罗斯将自身及周边各国和人民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战略帝国集团。俄罗斯正是作为一个大陆帝国，参与了世界政治，捍卫了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利益。

目前，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正在寻求对俄罗斯施加另一种地缘政治功能，将俄罗斯变成一个无法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并具有广泛文明使命的政治结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 1992 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的主要战略任务是防止在前苏联领土上建立一个能够奉行独立于美国政策的大型独立战略实体。”正是基于西方如此迫切的需要，俄罗斯才被赋予了“区域性大国”的角色。

“区域性大国”是一个现代地缘政治范畴，描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大国，但其政治利益 - 112 -

仅限于紧邻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的地区。例如，印度、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国等都被视为区域性大国。区域性大国的特点在于，它的政治权重比普通第二梯队国家大，但比超级大国或帝国小。换言之，区域性大国对全球文明和世界地缘政治进程没有直接影响，在主要战略路线上服从于更强大帝国的力量平衡。同时，区域大国相对于其直接（较弱）邻国具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对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当然，只有在不与超级大国利益相抵触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西方今天向俄罗斯提出（强加）“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无异于自杀。这样做的目的是人为地在强大外部影响下逆转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倾向，切断俄罗斯帝国统一的地缘政治进程。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俄罗斯必将拒绝一个国家的深层冲动，而这是其最高和最深层身份的基础。对俄国人来说，丧失帝国规模意味着他们落败而无缘参与文明，意味着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体系不堪一击，意味着他们的普世主义和救世主抱负惨遭破灭，意味着贬低和揭穿了整个民族意识形态，而正是民族意识形态复兴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民，给了他们力量和能量去开拓、创造、斗争和克服逆境。

如果考虑到俄罗斯人民族帝国自我意识的具体情况，很明显，俄罗斯接受“区域性大国”

的地位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在这种情况下，由此对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造成的打击将如此之大，以至于问题将不限于俄罗斯联邦的边界或类似的领土空间。俄罗斯失去了使命，就无法找到足够力量来维护其在“区域性国家”中新的“弱势”身份，因为按照逻辑，在失去帝国规模的国家中，是无法维护这种身份的。因此，“区域性大国”的解体过程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赤贫的俄罗斯人将不再能够对抗日益增长的区域性宗教分离主义浪潮。

即使是为了巩固后帝国时代俄罗斯的“区域性地位”，也有必要唤醒民族主义强大浪潮，这是全新的、人为的、基于活力和思想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真实的、正当的俄罗斯帝国趋势无关。可以将其与青年土耳其人的小规模“世俗”民族主义相提并论，青年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通过“民族革命”创造了现代土耳其，一个“区域性大国”。但青年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与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民族主义毫无关系，而事实上，今天的土耳其在精神上、种族上和文化上，都与二十世纪初期的土耳其帝国完全不同。

同样，即使不是更糟，也会威胁到俄罗斯，并且很可能试图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获得立足之地，放弃文明使命和普世价值观，这将唤醒“青年俄罗斯人”（类似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类型的政治家们，他们很可能会宣称是一种特殊教派意识形态，而与俄罗斯国家主流理念毫无关系。这种俄罗斯“非帝国”的、世俗的、人为的民族主义，只会投西方

- 113 -

所好，玩弄地缘政治把戏，因为这将确保俄罗斯的“区域”性地位，导致虚幻和短期的内部稳定，同时为未来的俄罗斯内部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打下基础。但如果土耳其有两三个足以有效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集权制的大型民族社区，而在俄罗斯联邦生活的数百个民族在帝国模式下相处得很好，却不适合“小俄罗斯民族主义”框架。那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会逐渐被卷入层出不穷的内部冲突，转而又将是兵戎相见，最终必将分崩离析。

这将是俄罗斯人失去其帝国使命的自然结果，因为这一过程不会仅限于相对减少领土，而是必须达到其逻辑的极限，即彻底摧毁作为历史、地缘政治和文明主体的俄罗斯民族。

3.4 对苏联建国的批评

俄罗斯人民帝国组织的最后一种形式是苏联及其地缘政治区域（华沙条约国家）。在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地理上扩大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极限。土地开发和军事行动包括俄罗斯地缘政治区域的广大领土。

在空间意义上，这种扩张似乎应该代表俄罗斯国家地位的最高形式。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帝国的轴心结构正是俄罗斯人民，他们将自己特定的普遍主义（至少部分地）体现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模式中。

今天，乍看之下，真正的俄罗斯在当前条件下的国家发展前景似乎必须与恢复苏联，重建苏联模式与重塑苏联国家地位相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并合乎逻辑的，在这种情

况下，主张恢复苏联的新共产主义运动更接近于理解俄罗斯人民的地缘政治利益，更明确、更清晰地代表了其战略和文明愿望的本质，而不是代表一些新民族主义圈子，这批人倾向于“青年俄罗斯人”（类似“青年土耳其党人”）模式，倾向于“小规模”、“修整”、“种族的”民族主义。当然，地缘政治复辟主义的新共产主义者是有道理的。同斯拉夫主义者、东正教君主主义者或爱国者内种族主义派别的浪漫主义与形式上不负责任（而结果具有颠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运动相比较，这些新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更为天然，更具“民族”性。如果在重建苏联和建设单一民族甚至单一文化的大俄罗斯国家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选择重建苏联会更加合乎逻辑，也更加正确。

但苏联解体和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原因需要进行客观分析，这绝不能归于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颠覆分子）的影响，即归结为“阴谋论”。西方自由民主对苏联的外部压力确实巨大，国内“颠覆分子”的活动也配合默契、极为有效。但这两个因素只有在苏联帝国进入内部

- 114 -

危机阶段时才至关重要，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制度和苏联制度的本质。如果不理解苏联衰落的内部原因，并进行深层分析，任何恢复苏联（尤其是建立新帝国）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毫无希望的。而且，在这件事上任何纯粹惯性的保守主义只会使情况更糟。

让我们找出导致苏联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崩溃的几个因素。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在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将纯粹民族的、传统的、精神的因素引入到一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情结中。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事实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它从来没有得到法律认可，这阻碍了俄罗斯-苏联社会的有机发展，造成了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矛盾，并破坏了执行地缘政治和社会政治项目时的明确性和感悟力。无神论、唯物主义、进步主义、“启蒙伦理学”等等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整个俄罗斯人民来说都非常陌生。在实践中，这些借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顺便说一下，在马克思主义自身中，这只是相当随意的一部分，拿来向费尔巴哈风格的老旧实证人文主义致意的）被俄国共产党人看成民间神秘主义精神，有时甚至看成非正统末世论观点，而不是认作西欧文化的理性产物。然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本可以为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找到更合适、更俄罗斯化的术语，但从未被制定出来。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上矛盾设计的局限性和不恰当迟早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在苏联后期尤为明显，这时愚蠢的教条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煽动完全摧毁了社会上一切意识形态生活。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犹似冰冻三尺，并顽固拒绝引入任何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是有机的、民族的和自然的意识形态成分，导致整个苏维埃体系崩溃。对此负责的不仅是“影响力代理人”和“反苏主义者”，而且首先是中央苏维埃意识形态理论家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苏维埃帝国在意识形态上和实际上都被共产主义者摧毁了。现在，我们不仅不可能以相同形式和相同意识形态去重新创造它，而且也毫无意义，因为曾经导致国家毁灭的相同前提，按照假设，必定会重蹈覆辙。

其次，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层面，从长远来看，苏联在抵抗大西洋主义西方集团方面缺乏

竞争力。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陆地边界比海上边界脆弱得多，而且在各个层面（边防部队的数量、军事装备的成本、战略武器的使用和部署等）都是这样。二战后，苏联发现自己与聚集在美国周围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相比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美国有一个巨大的岛屿基地（美洲大陆），完全被海洋控制和包围，不难防御。此外，美国控制了欧亚大陆南部和西部的几乎所有沿海地区，对苏联构成了巨大威胁，同时又远离了苏联潜在的非稳定行动。把欧洲划分为东方（苏联）和西方（美国）只会使苏联在西方的地缘政治地位复杂化，增加陆地边界

- 115 -

的数量，并使苏联靠近其潜在的战略对手，此外，欧洲人民本身被动地处于互为敌对的境地，他们发现在一场地缘政治决斗中，自己处于人质的位置，而决斗的意义并非显而易见。同样情况也适于亚洲南部和远东地区，在这些地区，苏联要么有邻国，要么被西方国家控制（巴基斯坦、阿富汗、霍梅尼时代之前的伊朗），要么是敌对的非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只能在两种情况下能获得相对稳定：要么迅速向西部大洋（大西洋）和南部大洋（印度洋）推进，要么在欧洲和亚洲建立中立的政治集团，而不受任一超级大国控制。斯大林试图提出这个概念（中立的德国），在他去世后，贝利亚继续试图提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联（连同华约）既太大又太小。维持现状只掌握在美国和大西洋主义手中，因为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工业和战略潜力越来越枯竭，而那座受保护的大岛，美国的力量却在增长。东方集团迟早会崩溃。因此，重建苏联和华约不仅几乎不可能，而且不必要，因为即使取得近乎不可能的成功，也只会带来一种注定要失败的地缘政治模式。

第三，建立苏联行政机构的基础是，从世俗、纯粹功能性的角度，定量地理解国内机构划分方法。经济和官僚集中制既没有考虑到国内各地的区域性特征，更也没有考虑国内各地的种族差异与宗教差异。社会的平等化和纯粹的经济结构化原则导致产生了这种僵化的制度，这些制度压抑并且充其量“保存”了各种民族，包括（并且在更大程度上）俄罗斯民族自身的自然民族生活。即使名义上它是一个民族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或民族地区的问题，领土原则仍然有效。同时，随着整个苏维埃政治制度“老化”，区域种族平等化的进程越来越明显，苏维埃政治制度到了最后阶段，越来越倾向于某种苏维埃“民族国家”，而不是苏维埃帝国。民族主义在早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成立，但最终成为纯粹的负面因素，因为过度的集权和统一开始引起自然的抗议和不满。帝国原则萎缩，官僚集中制僵化，渴望最大限度合理化、追求纯粹经济生产力，于是逐渐在苏联之外制造了一个政治怪物，它失去了生命，被视为强加推行的中央极权主义。一些仅从字面上理解“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论文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苏联模式的这一方面，它不是针对特定的民族、文化、宗教，而是针对抽象的“人口”和“领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复活。相反，应尽快消除这种定量方法的后果，这种定量方法在车臣、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卡拉巴赫冲突，在阿布哈兹、德涅斯特罗瓦等问题上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第四，苏联的经济体制建立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循环基础之上，这种循环逐渐使社会

对特定的个人利益不再有任何感觉。在所有经济过程中，直至最微小的经济过程，都需要终

- 116 -

极的社会化和详细的国家控制，再分配的职能，都只能授权给一个集中的、纯粹的高层权力机构，从而造成一种社会的排斥、冷漠氛围，以及对社会事务不感兴趣的气氛。面对官僚国家机器的庞大结构，社会主义及其所有优势变得毫不明显、难以察觉，它只能退居幕后。个人和具体的集体在抽象的“社会”活动面前迷失了，社会主义分配的循环与现实脱节，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的莫名其妙的、异化的、外在的武断逻辑。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其原因在于苏联历史上，特别在其后期阶段，所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样式，尽管这种退化的根源应该在学说本身，在理论本身中找到。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剥夺了经济的灵活性、人们的热情和创造性过程的热情，助长了对社会的寄生态度，这种态度今天在黑手党自由主义情绪中被绝对化。共产党人也应对这种后苏联时代的过度行为负责，他们无法在构成国家的部门方面改革社会主义，并让人们维持体面的生活。

前苏联模式的这四个主要方面是苏维埃国家崩溃的主要因素，它们是苏维埃帝国崩溃的原因。很自然，假设重建苏联，应该得出的激进结论是，必须彻底摧毁历史上曾经使一个伟大民族注定遭受国家灾难的那些原因。

但是，如果复辟苏联是在放弃唯物主义、无神论、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地缘政治空间、行政结构、国际主义、中央集权制等意识形态旗帜下进行的，那么这样做来谈论“苏联”或“苏维埃国家”，谈论“共产主义”，“复辟”等是正确的吗？将其改称为创建“新帝国”，不是更正确吗？

3.5 对沙皇国家地位的批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要求回归皇室、君主制模式的呼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对苏联主义的抹黑迫使俄罗斯人转向那些在俄罗斯历史上共产主义时期之前就存在的国家形式。这个国家模式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尽管恢复共产主义之前国家制度的难度令人难以置信，但人们正在越来越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

鉴于俄罗斯国家地缘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谈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晚期是有道理的，当时俄罗斯达到其帝国领土范围最大时的边界。

这个计划中最为正面的一点是接受沙皇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基础，宣称（尽管名义上）忠于民族精神（民族性），忠于宗教真理（正统性），忠于神圣的传统政治制度（专制政治）。然而，根据俄罗斯欧亚人的公平观察，乌瓦罗夫（уваровская, Uvarov）公式（正统性、专制政治、民族性）在沙皇俄国的最后时期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而不是政治生活和

- 117 -

社会结构的真实内容。俄罗斯东正教被彼得大帝的世俗改革所震惊，在此期间与“神圣俄罗

斯”的理想相去甚远，实际上从属于国家控制，在许多方面失去了“东正教和谐精神”的神圣权威与谐调一致。失去精神上的独立后，俄罗斯教会在沙皇下属的主教会议上，被迫与世俗权力妥协，从而被限制了真正承认超自然真理的自由。

专制越来越失去其神圣的意义，陷入解决纯粹政治事务中，常常忘记了它最高的使命和宗教目的。尽管直到末位皇帝退位为止，俄罗斯对沙皇权力的限制从未达到欧洲君主国（主要是法国和英国）所达到的那种空洞滑稽程度，但欧洲在这一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最后，著名口号“民族性”纯粹是宣示性的，人民本身远离政治生活，比如，人民普遍对从根本上摧毁君主制模式的二月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漠不关心。

如果在我们的条件下直接呼吁恢复这三条，很可能会导致恢复那些秘密的、更为蛊惑人心的妥协，这些妥协实际上是隐藏在后罗曼诺夫时代的这三条原则背后（顺便说一下，这三条就是在那个时代制定的）。此外，鉴于俄罗斯王位没有明确的竞争者，当前东正教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态，以及“民族性”一词的抽象含义（通常仅被理解为肤浅的、民间传说风格的，甚至把知识分子幻想成一个民族的假象），不难预见，比起革命前的沙皇政权，现在要回归乌瓦罗夫的那三条意识形态将是更大的笑话。

沙皇模式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缺陷，导致俄罗斯帝国像苏联在七十年后一样崩溃。

回到沙皇时代，因此，整体回归“亲斯拉夫”的地缘政治充满可怕的威胁。事实是，在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统治家族的外交政策并非由亚历山大一世的欧亚传统和（基于俄罗斯和中欧大国结盟的）大陆神圣联盟加以确定，而是通过亲英和亲法的那些手段，俄罗斯被卷入了一场站在其天然地缘政治对手一边，反抗其天然地缘政治盟友的自杀式冲突。支持塞尔维亚人的要求，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不负责任的神话，参与法国共济会的欧洲反德阴谋，所有这些都迫使俄罗斯扮演一个不仅不符合其特点，而且直接将她毁灭的政治角色。沙皇政权试图在亲斯拉夫的基础上在东欧站稳脚跟，并不断与中欧大国（俄罗斯的天然盟友）发生冲突，系统性地破坏了俄罗斯国家的基础，直接导致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自杀。土耳其战争和与日本的战争也是这样的情况。矛盾的是，似乎俄罗斯试图为先进的法国和殖民资本主义英国的大西洋主义利益做出最佳服务，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其欧

- 118 -

亚使命，并寻求与所有（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相似的、保守的帝国政权结盟。亲斯拉夫的地缘政治乌托邦使俄罗斯失去了沙皇、教会和帝国，只有当面向欧亚的布尔什维克到来，才使得国家和人民免于彻底退化，免于变成“区域性大国”。

在我们的条件下，尝试遵循罗曼诺夫时代晚期“亲斯拉夫”路线，只能导致类似的结果。甚至呼吁支持革命前的俄罗斯这样做本身也带有潜在的自杀政治动机，这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比恢复苏联的计划危险得多。

在君主主义倾向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我们谈论的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

纪之交俄罗斯固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尽管这是受国家、社会和文化界限限制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变体，而不是“狂野”的自由市场，但任何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异化效应都非常强烈。俄罗斯资产阶级坚定地取代了国家及军事的精英统治、神职人员，取代了官僚和雇员。这种俄罗斯资产阶级（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商人阶级代表相当不同）实际上反对作为俄罗斯民族价值体系本质的文化、社会和伦理规范。俄罗斯资产阶级吸取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教训，尝到了金融和股票投机的滋味，巧妙地利用了仍然受制于荣誉准则的俄罗斯贵族的经济低效率，他们走到了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最前沿，完美融入流行的君主主义、伪父权主义的全貌，失去了生命中所有神圣内容。俄罗斯资本家（而且经常具有民族主义的“黑色百人团”倾向）成了在俄罗斯受到英国和法国影响的首批代理人，成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发展并形成的大西洋贸易模式的天然代理人。

罗曼诺夫王朝晚期的国体是表面上的去神圣化君主制、自杀式的亲斯拉夫地缘政治和大西洋主义导向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民族言论都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比喻，其背后的政治趋势与社会趋势，不仅远离俄罗斯人民的真正利益，而且直接同这些利益背道而驰。

这种模式的另一个要素是相当可疑的，那就是俄罗斯帝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原则。尽管在实践中这并不妨碍属于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自由发展，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俄罗斯人只是帮助各民族形成和发展其特定的文化，法律上不承认文化民族自治和宗教自治，一些强硬的、由国家调节平衡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让各民族参与统一和自由大陆帝国建设的最佳方法。在罗曼诺夫王朝末期出现的“民族国家”元素与苏联最后几十年所出现的完全相同，其效果也非常相似：种族群体同莫斯科（圣彼得堡）及俄罗斯人疏离，分离主义觉醒，“小民族主

- 119 -

义”高涨等等。作为报应，伟大的俄罗斯救世主意志堕落为平庸的民族沙文主义。

在君主制的俄罗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文化和宗教方面，正是名义上忠诚于神圣传统，怀念神圣俄罗斯、神圣王国、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想。东正教作为教条真理的堡垒、专制主义的和谐性、神明的俄罗斯人民对历史使命的认识，它是真正俄罗斯帝国的精神象征，它具有典型的、持久的价值，然而，东正教应该清除形式化、煽动性，以及法利赛式的攻击。但反常的地缘政治、容忍资本化、帝国内部小民族低估种族和宗教因素、罗曼诺夫帝国晚期的反德、反日、反奥斯曼倾向，这一切都应该被承认为一条与俄罗斯人民真正利益无关的政治道路死胡同，这种模式的历史性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3.6 迈向新的欧亚帝国

基于上述考虑，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即将到来的帝国的前景是俄罗斯人民值得拥有和自然存在的唯一形式，也是完成其历史使命和文明使命的唯一机会。

1. 即将到来的帝国不应该是“区域性大国”或“民族国家”。这很明显。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帝国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区域性大国或一个民族国家的延续和发展，因为这样一个中间阶段将对深层次的国家帝国趋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将使俄罗斯人民陷入无法解决的地缘政治与社会矛盾的迷宫中，而这反过来又必将导致无法系统地、一致地、合乎逻辑地建立帝国。

2. 新帝国必须立即按照帝国样式建立起来，此计划的基础必须是成熟发展的纯帝国原则。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属于遥远的未来，希望未来会出现有利条件。如果人民以及努力为俄罗斯帝国采取行动的政治力量现在没有已经自觉地、明白无误地确认他们基本的国家地缘政治方向，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条件建立伟大的俄罗斯帝国。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两者完全不同。帝国是一个各项参数都超越普通国家的战略及地缘政治集团，它是一个超级国家。一个普通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帝国。帝国是直接作为一种特殊文明意志表达，作为一个超级目标，作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冲动而建立起来是。因此，今天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俄罗斯国家，而是俄罗斯帝国。这不是一条社会政治演变的道路，而是地缘政治革命的道路。

3. 新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轮廓应该在克服那些导致历史上以前帝国形式崩溃的时刻的基础上确定。因此，新帝国必须：

- 120 -

- 1) 不唯物，不搞无神论，不以经济为中心；
- 2) 相邻大陆领土或者有海上边界，或者是友好国家；
- 3) 内部政治和行政架构具有灵活和差异化的民族宗教结构，即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当地、种族、宗教、文化、伦理等特点，赋予这些要素法律地位；
- 4) 使国家灵活参与经济管理，而且只涉及战略领域，大大缩短社会周期，人民群众得以有机地参与分配事务；

（前四点来自对苏联帝国崩溃原因的分析。）

5) 用真正的神圣内容填充宗教-君主制公式，这些内容是在世俗西方对罗曼诺夫王朝影响下丢失的，必须进行东正教“保守革命”，以回归真正基督教世界观的根源；

6) 将乌瓦罗夫公式中的“民族性”转变为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使人民成为主要的、基本的政治与法律范畴，将人民的有机概念同自由和社会主义法理学定量法相对比，发展“民权”理论；

7) 不采纳亲斯拉夫的地缘政治，而是转向欧亚大陆计划，拒绝西方的俄罗斯反德政策和东方的反日政策，结束伪装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大西洋主义路线；

8) 阻止帝国的私有化和资本化进程，阻止股市博弈和金融投机，聚焦于企业、集体和国家对人民经济现实的控制，摒弃“民族资本主义”的可疑妄想；

9) 摒弃沙俄时代的省级原则，转向创建具有最大程度的文化、语言、经济和法律自治的

民族-宗教区域，在政治、战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主权中，将其严格限制于一项。

（这五点源于对沙皇模式的批评。）

新帝国的建设者必须积极抵制俄罗斯民族主义中的“年轻俄罗斯人”倾向，这些倾向旨在努力巩固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地位，并在其地缘政治计划中包含所有怀旧的政治力量，以吸引那些已经导致帝国陷入灾难的因素。

如果不创造一个帝国大陆，俄罗斯人民能成为一个有机的历史共同体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人只有在新帝国框架内才能保持民族地位。

- 121 -

按照地缘政治逻辑，这一次的帝国，应该在战略上和空间上都优于之前的国体（苏联）。因此，新帝国应该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大陆的，从长远来看，还应该是全球的。

俄罗斯统治世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 122 -

第 4 章 重新划分世界

4.1 陆地和海洋。共同的敌人

俄罗斯人民将要创建的新帝国有自己的内部地缘政治逻辑，并铭刻在全球地理空间的自然结构中。

麦金德最清楚地阐述的主要地缘政治规律认为，在历史上，持续的主要地缘政治过程是陆地、大陆大国（具有自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岛屿、海洋国家（商业、市场、经济系统）之间的抗争。这是罗马与迦太基、斯巴达雅典、英国、德国等的永恒对立。自 20 世纪初以来，这两种地缘政治永恒势力之间的对抗开始具有全球性特征。美国成为海上贸易极，将所有其他国家拉入其轨道，而俄罗斯则成为陆地极。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终于确定了各自的文明角色。美国战略性地吞并了欧亚大陆的西部和沿海领土，苏联将欧亚大陆的辽阔大陆块团结在自己周围。从作为一门科学的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海洋与陆地、商业富豪统治与意识形态统治、商人文明与英雄文明（“商人与英雄”的二元论，是同名书籍的作者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话）这些古代原型的对立，在冷战时期，也找到了它的表达方式。

东方集团的崩溃，然后是苏联的崩溃，破坏了相对的地缘政治平衡，有利于大西洋主义，即西方集团和一般的市场文明。然而，地缘政治趋势是客观的，不能以唯意志的、“主观的”方式废除它们。土地倾向、大陆冲动无法单方面逆转，因此，建立新大陆、东方、大陆帝国，在地缘政治上潜在地是必然的。

今天的大西洋、海洋、商业文明的一极无疑是极其强大有力的，但客观因素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使得东方提出开发大陆。大陆帝国潜在地永远存在，并且只寻求有利的环境，以便在政治现实中加以实现。

新帝国必须建立在清楚认识到这种地缘政治必然性的基础上。在这个帝国中，俄罗斯人将具有天然的关键功能，因为他们控制着欧亚大陆块中的枢纽地带。新帝国只能是俄罗斯帝国，因为在领土、文化、文明、社会经济和战略上，俄罗斯人自然而有机地与这一全球使命相呼应，并在其民族和国家历史上实现这一使命。麦金德称俄罗斯土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欧亚大陆的沿海文明（通常被认为是一般的“文明”），就是在海洋（外部）和陆地（内部）文化和政治冲动的辩证对立影响下，围绕这片枢纽土地创造出来的。其他人民或其他国家

- 123 -

只有控制整个俄罗斯土地，才能成为欧亚大陆帝国一极，为此，必要满足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即必须摧毁俄罗斯人民，必须将俄罗斯民族从地球表面抹去。由于这似乎不太可能，俄罗斯人必须承认、意识到并再次承担起欧亚帝国中心的艰难角色。

这个帝国的地缘政治建设必须建立在“共同敌人”的根本原则之上。拒绝大西洋主义，拒绝美国战略控制，拒绝经济至上及市场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些是共同的文明基础，普遍的推动力，将为持久的政治和战略联盟开辟道路，将为即将到来的帝国创造枢纽骨干。绝大多数欧亚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历史、国家传统和经济伦理都有大陆、“土地”的特征。这些国家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认为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影响力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使得国家与其历史命运渐行渐远。尽管欧亚大国之间存在内部文明、宗教和社会经济等各种差异，但它们对大西洋主义的整体控制，就像“公分母”那样，有着强烈和不可动摇的共同敌意，都渴望摆脱贸易体系的海外监管，而美国就在全力以赴地谋划着贸易体系，这个“海洋”文明的大本营。

欧亚国家在地区利益、宗教、民族、种族和文化取向上的差异，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只有当来自“共同敌人”令人窒息的经济和战略影响消失时，才会认真、充分地谈论上述差异。这种强加的模式对几乎所有的基督徒、穆斯林、国家资本家、佛教徒、共产主义者和印度教徒都是陌生的。与此同时，美国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所有欧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都是人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更为全球性的因素在实践中组织和控制这些冲突，以保持欧亚大陆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澄清欧亚内部的关系才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区域性大国”在逻辑上都服务于大西洋主义者的利益，因为这些区域性大国无法开展大规模抵抗（这只有在帝国战略背景下才有可能），他们完全依赖于唯一超级大国，只有在海外统治者批准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援助邻国。

“共同敌人”大西洋主义必须成为新地缘政治结构的纽带。这一因素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所有反对这一想法的，要么天真地没有考虑到大西洋主义主导地位的客观严重性和整体性，要么故意将地缘政治注意力从唯一负责任和现实的角度转移到次要的地区问题上，由

于不去考虑全球结盟，所以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欧亚大陆是预先确定的地理和战略统一。这是一个严格科学的地缘政治事实。不可避免的是，俄罗斯必须站在这样一个地理、战略统一的中心。统一背后的推动力必然是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的文明使命，他们的普世主义理想，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所形成的逻辑，与这一使命完全一致。新的欧亚帝国被载入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缘政治的地理和政治预设之中。

- 124 -

在这种情况下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与这样一个大陆结构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新帝国的欧亚地缘政治不仅仅是抽象的地理，也不仅仅是表达假设无限扩张的意愿。它的原则和主要方向考虑了地缘政治常数、当前政治形势、真实的国际趋势、战略力量平衡以及经济 and 资源格局。因此，欧亚帝国计划同时具有文化、战略、历史、经济、政治等多个维度。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强调，在一个或另一个“枢纽”地缘政治联盟中，在创建帝国时，我们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整合程度，具体取决于级别。在一种情况下，在另一种宗教中，在第三经济中，可能存在文化或种族和解。这些问题在每个特定情况下都有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未来欧亚帝国唯一的普遍一体化现实是战略统一的绝对必要性（即定言令式，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й императив, 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样一个地缘政治联盟将在所有战略方向上有效抵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和政治经济独裁。

欧亚大陆的战略统一应牢牢控制世界各地对欧亚大陆的海洋边界，保证大陆经济、工业和资源自给自足，并确保集中管理欧亚武装力量。欧亚内部一体化的所有其他方面将根据每个具体情况根据灵活、差异化的原则来决定。必须始终牢记这一基本考虑，以避免可能出现不合理的怀疑和反对意见，避免有人误以为此事仅仅涉及政治、种族、文化、宗教或经济联盟，而不是战略联盟。顺便说一句，各民族“小民族主义”的代表们会很自觉地产生这样的误解，一味指责欧亚大陆的帝国建设者想要在一个新的“国际主义乌托邦”中解散他们的民族、宗教、文化等。欧亚计划绝不会导致国家的平均化，相反，它源于维护和发展民族和文化认同的需要，但同时它与“小民族主义者”的不负责任的浪漫梦想无关（这在实践中只会导致沙文主义和自杀性的种族冲突）。欧亚计划是对当前局势严肃且客观的理解，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削弱大西洋主义西方的全球影响力，削弱其宣称统治世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只剩下找出这个大陆计划的具体细节，这需要考虑到前一时期的阻碍实施这个宏伟文明计划的消极因素。

4.2 西部枢纽：莫斯科-柏林。欧洲帝国和欧亚大陆

在西部，新帝国有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桥头堡，这就是中欧。

中欧是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实体，在战略上、文化上，以及部分地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在种族上，这个空间包括前奥匈帝国的民族，以及德国、普鲁士，和波兰一部分与乌克兰西部领土上的民族。巩固中欧的力量传统上是德国，它将中欧地缘政治集团统一在其控制之下。

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原因，中欧具有明显的“陆地”、大陆特征，与西欧的“海洋”、“大西洋”空间相对。原则上，中欧的政治影响可以进一步向南延伸到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在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将柏林视为中欧的地缘政治首都，作为德国的象征，而德国又是整个中欧实体的象征和中心。只有德国和德国人民才具备有效整合这个地缘政治区域的所有必要素质，具有历史意志、发达的经济、优越的地理位置、民族同质性和对文明使命的意识。陆地的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德国传统上反对商业海运的英国，这种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对抗明显影响了欧洲历史，尤其在德国人最终成功建立自己国家之后，这一点更明显。

英国在地缘政治上是最不像欧洲的国家，其战略利益传统上反对中欧大国，更广泛地说，反对欧洲大陆的趋势。然而，在美国的作用得到加强并几乎完全控制英国殖民地的同时，英国的战略作用显著下降。今天在欧洲，英国更像是美国的一个域外浮动基地，而不像一支独立的力量。尽管如此，在欧洲内部，英国是对大陆利益最敌视的国家，是中欧的反叛者，因此，新的欧亚帝国是英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对手。英国自愿逆转其文明道路是不太可能的，它创造了一个纯粹“海洋”型的巨大贸易殖民帝国，并促成出现了基于贸易、数量、资本主义、投机和股市游戏的整个现代西方文明。这是完全不现实的，因此，在欧亚计划中，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替罪羊”，因为欧洲大陆一体化进程必然会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不会考虑英国利益，而且需要直接反对英国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乃至欧亚大陆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直至鼓励英国分离主义倾向并在政治上破坏其稳定。

另一个有争议的地缘政治实体是法国。在许多方面，法国历史具有大西洋主义的特征，反对大陆趋势和中欧趋势。法国是奥匈帝国的主要历史对手，全力支持德意志公国的分裂状态，倾向于反传统和不自然的“改良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总的来说，在破坏欧洲大陆传统方面，法国一直走在前列，在很多情况下，法国的政策被认定为最具侵略性的大西洋

主义，至少在美国接管全球功能之前是这样的大西洋主义的主干。

法国还有另一种地缘政治趋势，它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歌德认为他是欧洲土地一体化的领导者）的大陆路线，并生动地体现在寻求与德国结盟的戴高乐的欧洲政策中，即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的欧洲联邦。在某种程度上，同一条路线启发了密特朗的法德计划。尽管如此，人们可以假设发生这样一种事件，法国承认中欧因素至高无上，并自愿共谋建立具有反美倾向和大陆倾向的地缘政治欧洲集团。法国领土是欧亚集团西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控制大

西洋沿岸，进而新帝国在西部边界的安全直接取决于此。无论如何，法德联盟是欧亚大陆西部地缘政治的主要纽带，前提是中欧的利益，即其自给自足和地缘政治独立将成为这里的优先事项。这样的计划称为“欧洲帝国”。在德国支持下，作为这样一个欧洲帝国基础的欧洲一体化完全符合欧亚计划，是全球大陆一体化事业中最可取的过程。

只有遵循一个基本条件来建立莫斯科-柏林的稳固地缘政治与战略枢纽，所有围绕德国（中欧）实现欧洲统一的趋势才会具有积极意义。就其本身而言，中欧没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潜力脱离美国大西洋主义者的控制而获得真正的独立。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如果没有俄罗斯因素的革命影响，很难期待欧洲真正的地缘政治觉醒和民族觉醒。没有莫斯科的，更广泛地说，没有欧亚大陆的欧洲帝国，不仅由于缺乏军事力量、政治主动性和自然资源，无法充分组织其战略空间，而且由于贸易体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的影响深深腐蚀了欧洲人民民族世界观的基础，破坏了他们历史上的有机价值体系，这样的欧洲帝国也无法具备文明意义上的明确理想和指导方针。欧洲帝国只有在来自大陆深处，即来自俄罗斯的、新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精神能量的影响下，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地缘政治现实和文明现实。此外，只有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才能为欧洲提供战略独立、政治独立，以及资源上的自给自足。因此，欧洲帝国应该紧紧围绕柏林形成，柏林与莫斯科处于直接和重要的轴线上。

欧亚推动力应该完全来自莫斯科，将俄罗斯人的文明使命（经适应欧洲具体情况改造后）转移到柏林，然后，柏林将根据受深层地缘政治大陆推动力启发的原则和计划整合欧洲。欧洲帝国充分性的保证在于德国本身的亲俄倾向明确占主导地位，正如从穆勒·凡登·布鲁克（Müller van den Broek）到恩斯特·尼基什（Ernst Nikisch）、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和约蒂斯·冯·洛豪森（Jordis von Lohausen）的最优秀的德国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作为这种地缘政治亲俄主义的延续，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应该追随亲德主义方向。只有在

- 127 -

这样的条件下，欧亚帝国的西方载体才能足够强大、战略稳固、意识形态一致。但应该承认，没有深刻的矛盾和内部分裂，欧洲其他部分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例如，在美国、北约的控制下，欧洲目前的统一很快就会感受到所有的地缘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因此，它将不可避免地要么受挫，要么中止，要么获得反美的（以及潜在地是欧亚的）维度，让·提利尔（Jean Tiriart）就这么预见过。

重要的是立即强调，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统一必须考虑到先前尝试重大政治误判，首先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史诗的失败。欧洲在中欧（德国）周围的地缘政治统一绝不意味着德国人的种族统治或以巨大的德国国家形式建立中央集权的雅各宾结构。根据蒂里亚特（Jean-François Thiriart）的说法，“希特勒的主要错误是他想让欧洲变成德国人的欧洲，而他应努力做到的是让欧洲变成欧洲人的欧洲。”这个论点在现阶段仍然是绝对相关的，并且总体上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新帝国进程，包括在俄罗斯。围绕德国组织起来的欧洲帝国必须完全是欧洲人的，不受任何一个民族的种族和语言支配。为了成为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心，德国必须获得

超国家的、文明的、适当的帝国特征，放弃创建种族同质的“民族国家”的矛盾和不切实际的尝试。欧洲各国人民必须成为建设欧亚大陆西部桥头堡的平等伙伴，并将共同的帝国冲动调整成适应自己民族和文化的特点。欧洲帝国不能压制欧洲民族，不能让他们屈服于德国人或俄罗斯人，相反，要把他们从数量文明、消费文明、市场文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唤醒他们深厚的民族能量，让他们作为独立的、鲜活的、成熟的政治主体回到历史的怀抱，其自由将得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的保障。

建立柏林-莫斯科轴心作为欧亚帝国的西部支撑结构，涉及到位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东欧国家的几个重要步骤。该地区传统的大西洋主义政策是基于麦金德关于需要在这里建立“警戒线”的论点，这将作为冲突缓冲区，防止俄德联盟的可能性，这一联盟对整个大西洋主义国家集团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为此，英国和法国千方百计地破坏东欧人民的稳定，给他们灌输要“独立”以及从德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想法。此外，大西洋主义者的外交潜力以任何方式试图加强德国的恐俄情绪和俄罗斯的恐德情绪，以便将这两个大国拉入两国间势力范围划分的局部冲突中，这涉及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国家，及乌克兰西部等。目前的北约战略家们也在追求同样的路线，向那些与大西洋主义直接相关并可能对俄罗斯和德国都怀有敌意的国家提出建立一个“黑海-波罗的海联邦”。

要建立柏林-莫斯科轴心，首先就要阻挠在东欧组织“警戒线”，就要积极反对在德国煽

- 128 -

动恐俄情绪，在俄罗斯煽动恐德情绪的人。俄罗斯和德国不应以相互影响区域内的地区利益为导向，单方面支持该地区政见相似、种族亲近的那部分人，而应共同提前解决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制定在这个地区重新分配影响力版图的总体方案，然后严厉镇压东欧国家企图修改俄德计划的所有地方性倡议。与此同时，要争取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清除任何伪装的“警戒线”，精心消除中间国家对其潜在独立于地缘政治强大邻国的幻想。有必要在友好的俄罗斯和中欧（德国）之间建立一条直接而清晰的边界，即使是在柏林-莫斯科轴线上建立一个单一战略集团的前景中，这条边界也必须保留其作为限制文化、种族和宗教同质性界限的地缘政治意义，以便尽力避免民族或宗教在边境地区扩张。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之间的关系等，首先不应视为双边关系，而应视为有德国参与的三边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德国与那些东欧国家（人民）的关系；这些关系也应该具有三方性质，这些东欧国家有义务加入俄罗斯一边（并且在所有情况下排除来自大西洋和美国的外来干预）。例如，德国-乌克兰关系必须是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关系；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关系，必须是德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关系；德国-波兰的关系，则必须是德国-俄罗斯-波兰的关系等。

莫斯科-柏林轴心将有助于解决俄罗斯和德国今天面临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联盟中，俄罗斯可以直接获得高科技和强大的工业投资，确保欧洲共同参与俄罗斯土地上

的经济发展。同时，绝不会出现对德国的经济依赖，因为德国将不是作为慈善的一方，而是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俄罗斯的发展，从莫斯科那里获得战略庇护，保证德国摆脱美国主导而获得政治自由，并在资源上独立于受大西洋主义控制的第三世界能源储备（这是美国对欧洲进行能源讹诈的基础）。今天的德国是一个经济巨人，却是一个政治侏儒。俄罗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政治巨人，却是一个经济瘸子。因此，莫斯科-柏林轴心将有益于治愈双方的病痛，为大俄罗斯和大德国未来的繁荣奠定基础。从长远看，这将形成一个坚实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建立整个欧亚帝国，而欧亚大陆西边是欧洲帝国，东边是俄罗斯帝国。同时，这个大陆结构各个部分的福祉将服务于整体的繁荣。

作为莫斯科-柏林轴心形成的初步步骤，从俄德战争历史的黑暗面中仔细清除相互关系的文化和历史视角是有意义的，这些黑暗面是大西洋游说团体在德国和俄罗斯成功进行颠覆活动的结果，并不表达我们大陆人民的政治意愿。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好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东普鲁士）归还德国，以放弃可怕的自相残杀战争的最后一个领土象征。为了防止这一行动被俄罗斯人视为地缘政治投降的又一步，欧洲向俄罗斯提供其他的领土附加条件，或特别是在那些一味寻求加入“黑海-波罗的海联邦”的国家中为俄罗斯提供扩大战略影

- 129 -

响区的其他形式，这样做是合理的。东普鲁士的归还问题应与俄罗斯领土扩张和战略扩张密不可分，德国除了同意维持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军事基地外，还应在外交和政治上为加强俄罗斯在西北和西部战略要地的实力做出贡献。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作为潜在的“警戒区”所经历的地缘政治转型，应该不是在恢复普鲁士之后进行，而是在为友好的俄罗斯和中欧之间最终确定边界时，作为这一过程的要素同时进行。

俾斯麦的“德国在东方没有敌人”这句话应该再次成为德国政治学说的主导，而相反的格言应该被俄罗斯统治者接受：“在西方边境，在中欧，俄罗斯只有朋友”。然而，为了使这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愿望，有必要确保地缘政治及其法律成为德国和俄罗斯做出所有重大外交政策决定时的主要基础，因为只有看清这一点，最紧密的俄德联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才能被完全实现、充分理解和彻底承认。否则，诉诸历史冲突、误解和争端将挫败任何为重要的莫斯科-柏林轴心打造坚实可靠基础的尝试。

4.3 莫斯科-东京轴心。泛亚计划。致欧亚三边委员会

新帝国必须对其东部组成部分有明确的战略。因此，对于欧亚帝国来说，欧亚大陆东部边界与西部的问题具有同样战略意义。

基于“共同敌人”的基本原则，俄罗斯应该争取与那些承受大西洋超级大国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国家结成战略联盟，这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具有与大西洋主义相反的地缘政治计划，并拥有足够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成为新集团的关键地缘政治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印度实现最大程度的和解似乎是绝对无条件的，因为印度在种族、政治和战略参数方面是我们在亚洲的天然地缘政治盟友。非殖民化后，印度千方百计避免加入资本主义阵营，实际上引领了“不结盟国家”运动，在狭小的“无主区”地缘政治空间中寻找机会，以对苏联毫不掩饰的同情坚持“第三条道路”政策。今天，当俄罗斯废除了僵化的共产主义教条时，与印度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完全没有障碍。

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大陆。然而，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仅限于印度斯坦和印度洋半岛南部的一个小区域。印度必然会成为其东南前哨新帝国的战略盟友，尽管必须考虑到印度文明

- 130 -

不倾向于地缘政治动荡不安和领土扩张，此外，印度教传统不具有普遍的宗教维度，因此这个国家只在亚洲的有限部分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还比较薄弱，无法完全依赖它，因此现阶段与它结盟也解决不了新帝国的任何问题。印度将能够作为欧亚大陆的战略前哨，这就是它的使命真正结束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考虑它的精神文化，了解它可以帮助澄清欧亚帝国最重要的形而上学地标）。

印度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盟友，但不是主要盟友。在当今世界，两个地缘政治现实声称是欧亚大陆真正的东极：中国和日本。但这些国家之间有着深厚的地缘政治对抗，这种对抗由来已久，与两个文明的类型相对应。因此，俄罗斯应该选择一件事。问题不能这样提出：中国和日本同时出现。这里需要一个选择。

乍看之下，中国是一块大陆，其文明具有传统的威权（非商业）特征，而在现代中国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保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似乎最终应该促成了选择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日本岛国。然而，历史表明，在地缘政治上，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在欧亚大陆最重要的基地是中国，而不是日本，而日本则与相反方向的中欧国家保持着同盟关系。

为了理解这个悖论，人们应该仔细查看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最近两次世界大战的地理位置。在北半球，通常可以区分四个地缘政治区域，对应于世界冲突的主要参与者（国家或国家集团）。远西、大西洋主义，将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该区域具有完全明确的地缘政治方向，与世界历史上的“海洋”、“迦太基”路线完全一致。这是文明最为活跃的空间，也是所有反传统、“进步”转变的源泉。

第二个区域是中欧、德国、奥匈帝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空间从东方直接毗邻大西洋集团，具有反大西洋的、大陆的、陆地方向的所有迹象，并且在地理上倾向于东方。

第三个区域是俄罗斯本身，它位于大陆的重心，对欧亚大陆的命运负责。俄罗斯的陆地性的、非自由的、“保守”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第四个区域是太平洋地区，以日本为中心，快速而充满活力地发展，同时拥有僵化的传统价值观体系 and 对其地缘政治角色的清晰认识。与此同时，日本本质上是反西方和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的价值体系与“渐进式”大西洋主义人性的理想直接相反。

- 131 -

西方世界（大西洋主义），以其最深刻的意识形态（麦金德、马汉等）为代表，非常清楚，对全球大西洋主义的最大威胁是合并欧亚大陆从中欧到太平洋的所有三个区域。以及俄罗斯在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进步主义”方面的核心作用。因此，大西洋主义战略家的主要任务是将三个欧亚地区与其近邻和潜在盟友对立起来。俄德和俄日冲突都是由大西洋主义者主动挑起的，他们在欧亚各国政府内外都采取了各种外交手段和权力手段。大西洋主义的反对者，从豪斯霍弗开始，最终得出结论，只有拒绝强加于三个欧亚地区的逻辑，才有可能有效地反对大西洋主义，这就要求俄罗斯人断然拒绝对德国和日本的恐惧症，日本人和德国人断然拒绝对俄罗斯的恐惧症，而不管这些“恐惧症”的支持者提出什么样的历史旧案。

同时，日本作为整个太平洋空间的象征，在这些反大西洋项目中至关重要，因为日本战略地位、发展动态、价值体系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日本战略地位，使得日本成为与西方文明进行全球斗争的理想伙伴。中国在这幅地缘政治图景中并没有发挥特殊作用，首先被剥夺了政治独立（英国殖民化），然后被剥夺了地缘政治活力。只有在毛泽东主义活跃的时期，中国自身才表现出纯粹的基于土地的欧亚倾向，当时“农民社会主义”、全中国盛行民族主义和明显的亲苏主义。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以不同意苏联模式的发展为借口，再次回到了动摇欧亚远东地区利益，与俄罗斯冲突升级，这种可疑的地缘政治状态中。毫无疑问，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从毛泽东时代向亲大西洋模式的最后转变，最终导致中苏决裂并转向西方。同时，现代中国的“大西洋化”比俄罗斯成功得多，因为没有政治民主化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得中国能够在不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依赖西方金融集团，同时保持极权制度和表面上的政治独立。自由主义是通过极权主义手段强加给中国的，这就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政党寡头政治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并与国际大都市贸易精英融合，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和国家财富私有化。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现实，因为这是以他们与西方深度妥协为代价的，这样的成功，与保障政治独立的地缘政治概念明显不相容。而且，由于中国旁边有两个严重的竞争对手，经济强大的日本和战略强大的俄罗斯，所以新的自由主义中国将再次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远东回归纯粹的大西洋主义，将政治独裁与潜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结合起来。此外，从纯粹务实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建立单一集团的战略联盟将立即把日本从俄罗斯人身边推开，从而使关键的太平洋地区再次成为敌对地区，而陆海对抗的地缘政治是否最终成功，就取决于太平洋地区是否参与共同欧亚计划。

- 132 -

在新帝国中，东部轴心应该是莫斯科东京轴心。这是东方的，即欧亚主义亚洲部分的绝对必要性。正是围绕这一轴心，形成了欧亚大陆亚洲政策的主要原则。日本是太平洋诸岛中的最北端，地理位置优越，在战略、政治和经济上向南扩张。围绕日本的太平洋地域联盟是所谓“泛亚计划”的主要概念，这一计划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实施，只是因为轴心国在二战中战败而中断。今天有必要回到这个泛亚项目，以破坏美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并

剥夺整个大西洋主义者最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基础。根据一些未来学的预测，未来太平洋地区将成为总体上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因此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斗争远比为将来而战更迫切。

泛亚计划是新帝国东方方向的中心。与日本结盟至关重要。与莫斯科北京轴心相反，莫斯科东京轴心应该是一个优先开放的帝国建设视野，这最终将使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趋于完整，最终将削弱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帝国，并可能彻底摧毁它。

日本人的反美主义，清楚地记得核种族灭绝，清楚地意识到几十年来政治占领的耻辱，这是毋庸置疑的。“共同敌人”的原则在此可见一斑。在美国人塞尔日·弗里德曼（Serge Friedmann）的书中，这场“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书名为《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Coming War with Japan"））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日美之间的经济战争已经打响。建立欧亚帝国的俄罗斯没有比这更好的盟友了。

莫斯科东京轴心也在解决两国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俄罗斯与一个拥有高科技技术和巨大金融潜力的经济巨人结盟。然而，日本缺乏政治独立、军事战略体系和直接获取资源的途径。日本缺乏的东西，俄罗斯有很多；俄罗斯人缺乏的东西，日本人有很多。通过联手建设大陆帝国，日俄两国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空前强大的地缘政治中心，覆盖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本身，未来将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日本可以得到战略保护，并直接获得欧亚资源，作为交换，日本可以迅速有效地帮助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进行技术拓展和开发，为建立独立的区域有机体奠定基础。日本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将解决俄罗斯的许多问题。

此外，俄罗斯和日本可以共同重组欧亚大陆的远东部分。在这方面，基于血统统一、种族类同，以及精神亲近、宗教同源，蒙古-日本接触强度不断增加。蒙古（甚至可能包括目前处于中国占领下的内蒙和西藏）、卡尔梅克、图瓦、布里亚特构成了一个欧亚佛教飞地，可以作为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强大的连接元素，为莫斯科东京轴心提供中间联系。一方面，这些地区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在文化和种族上与日本密切相关。佛

- 133 -

教集团可以在远东建立稳固的地缘政治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远东将成为太平洋泛亚联盟的大陆联系。如果在莫斯科-东京轴心实施之初不可避免地发生对华关系恶化，佛教因素将被用作西藏和内蒙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扩大欧亚及大陆空间，而损害亲大西洋的中国。

一般来说，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实施泛亚工程的地缘政治“替罪羊”。泛亚工程既可以通过鼓动中国内部（西藏人、蒙古人、新疆的穆斯林人口）的分裂主义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操控地区矛盾，并支持中国国内潜在的佛教徒（及道教信徒）游说团体，以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他们反大西洋主义的、纯粹大陆的势力来实现。未来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效忠欧亚帝国的政权。此外，应向中国提供一个专门向南、针对台湾和香港的区域性地缘政治载体。向南扩张，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在北方和东方所失去的政治影响力。

新帝国东部地区的中国在同西方进行比较时，不应同英国比较，而应同法国比较，因为在积极反对欧亚计划的情况下，与欧亚帝国的关系将遵循两个标准：中国将不得不被视为地缘政治对手看一下，后果自负，但在中国国内建立亲日同时又亲俄的强大政治游说团体，未来中国本身就可以成熟、平等地参与欧亚大陆项目。

莫斯科-东京轴心，连同西部的莫斯科-柏林轴心，将创造一个与大西洋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模式直接对立的地缘政治空间，如今大西洋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是三边机构，即三边委员会。由美国最高政治机构的圈子创建的“三边委员会”，作为全球新结构，意味着三个地缘政治区域的战略联盟与我们上面谈到的四个地缘政治要素中的三个完全对应。该委员会的三个方面，旨在履行“世界政府”的职能，对应于：

- 1) 美洲区（美国，远西，纯大西洋主义），
- 2) 欧洲区（欧洲大陆，中欧，但在法国和英国，而不是德国的主持下），
- 3) 太平洋地区（统一在日本周边）。

因此，“三边”寻求构建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模式，其中欧亚大陆（=俄罗斯）两边将被美国可靠的地缘政治伙伴包围，即覆盖地球北部地区的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处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同时，在大西洋主义者的潜在欧亚对手（欧亚大陆）和大西洋主义的中心（美国）之间，存在两个辅助的地缘政治空间（欧洲和日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正是在“三边委员会”代表的建议下开始的，他们试图最终使中国重返大西洋主义政策的主流。

- 134 -

欧亚项目提出了与三边计划完全相反的东西。新帝国是一个反三边的，新帝国反其道而行之，是三边计划的倒置模式。它是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面向美国的三个地缘政治区的联合体。美国所依据的逻辑是寻求在地缘政治上控制欧洲和日本，按照同样的逻辑，了解这种力量平衡对美国力量的所有战略利益，俄罗斯在建立新帝国的同时，应该尽一切可能努力与欧洲和日本建立强大的战略联盟，以实现自己地缘政治的稳定和权力，并保障所有欧亚人民的政治自由。原则上，我们可以谈论建立我们自己的欧亚“三方委员会”，其中包括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的分支机构，但是，参与其中的不是大西洋主义和亲美派的政治家，而是具有国家导向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他们了解当前世界事态的地缘政治逻辑。同时，与大西洋主义的“三边”不同，欧亚“三边委员会”自然不应该有法国人，而是由德国人作为欧洲的主要代表。

考虑到日本因素在欧亚计划中的战略必要性，很明显，归还千岛群岛问题并不是俄日同盟的障碍。在千岛群岛，就像在加里宁格勒地区一样，我们正在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领土象征，二战同盟国和整个过程是大西洋主义者的完全胜利，他们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对手，同时令苏联极度疲惫（当这种地缘政治立场强加于苏联时，这不可能不导致未来改革崩溃），同时直接占领了欧洲和日本。千岛群岛提醒人们注意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荒谬和违背自然

的自相残杀，将其迅速遗忘是我们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千岛群岛必须归还日本，但这应该在欧亚远东新组织的总体流程框架内进行。此外，在保持俄罗斯和日本现有政治力量结盟的同时，无法办理千岛群岛归还事宜。以建立欧亚帝国为导向的政治家才能真正代表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但是，欧亚精英现在就应理解归还千岛群岛的地缘政治需求。

4.4 莫斯科德黑兰轴心。中亚帝国。泛阿拉伯计划

欧亚帝国在南方的政策也应该以牢固的大陆联盟为指导，在战略上、思想上和文化上满足欧亚反美主义的总体趋势。“共同敌人”的原则也应该是这里的决定性因素。

欧亚大陆南部有几个地缘政治实体，理论上可以充当新帝国的南极。由于印度和中国应该归属于东方地带，并与泛亚一体化的前景联系在一起，所以只剩下伊斯兰世界，从菲律宾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马格里布”国家，即西北非国家。一般来说，整个伊斯兰区是与欧亚帝国相关的自然友好的地缘政治现实，因为伊斯兰传统比多数其他欧亚教派更加政治化

- 135 -

和现代化，并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主义与宗教之间的精神不相容。大西洋主义者认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是他们潜在对手，因此，伊斯兰世界就是欧亚帝国潜在的忠实盟友，他们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即从长远来看，完全可以终止西美方的全球统治地位。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一体化的伊斯兰世界作为整个欧亚帝国的南部组成部分，从中亚延伸到西非，宗教统一，政治稳定，并且以忠于传统、忠于精神的原则为基础制定政策。因此，从长远来看，南方的伊斯兰帝国（“新哈里发”）可能与西方的欧洲帝国、东方的太平洋帝国、处于中心的俄罗斯帝国一起成为新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当前，伊斯兰世界极度分裂，内部存在各种思想倾向、不同政治潮流，以及相互对立的地缘政治计划。最全球化的有以下几种趋势：

- 1) 伊朗原教旨主义（大陆型，反美，反大西洋和地缘政治活跃），
- 2) 土耳其世俗政权（大西洋型，强调泛突厥路线），
- 3) 由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苏丹，部分由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宣扬的泛阿拉伯主义（在每种情况下都相当多样化和有争议的项目），
- 4) 沙特瓦哈比式的原教旨主义（在地缘政治上与大西洋主义一致），
- 5) 各种版本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接近左翼泛阿拉伯主义的模式）。

很明显，伊斯兰世界中纯粹的大西洋极，无论是“世俗的”（如土耳其的情况）还是伊斯兰的（沙特阿拉伯的情况），都不能在大陆帝国全球计划中发挥欧亚大陆南极的功能。剩下的是“伊朗原教旨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左派）。

从地缘政治恒定因素的角度来看，伊朗当然在这件事上有优先权，因为它满足所有欧亚

参数，它是一个大陆大国，与中亚紧密相连，激进反美，遵循传统主义，同时强调“社会”政治倾向（保护“穆斯塔扎夫”，即保护“赤贫者”）。此外，伊朗在大陆地图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建立莫斯科-德黑兰轴心为新帝国解决了大量问题。通过将伊朗纳入帝国的南极，俄罗斯将者立即实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错误的方式）追求的战略目标，即有权通往温暖海洋。俄罗斯缺乏通往暖洋的通路，这一战略方面的问题，自英国殖民时代以来，一直是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的主要王牌，英国利用俄罗斯无法直接进入大陆南部海岸，完全控制了亚洲和东方。俄罗斯所有试图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的愿

- 136 -

望都是为了希望参与欧亚大陆沿海地区的政治组织，而英国在那里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轻而易举地压制了俄罗斯通过控制这一沿海地区进行扩张的任何企图。然而，即使俄罗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大西洋主义者对直布罗陀的控制也将始终是真正大规模海军行动的障碍，并阻止俄罗斯削弱英国的实力。只有在大陆上与俄罗斯相邻并直接进入印度洋的伊朗，当时和现在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首先获得战略准入伊朗海岸的海军基地，欧亚大陆就将完全不受“巨蟒圈”战略的影响。所谓“巨蟒计划”，就是从实施传统大西洋主义计划开始，通过夺取整个欧亚大陆，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沿海领土来“扼杀”欧亚大陆的大陆扩张。

创建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就立即将“巨蟒”从其最脆弱的地方切断，并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内外获得越来越多的桥头堡开辟了无限前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另一方面是前苏联中亚的问题，今天三种地缘政治倾向在此竞争：“泛突厥主义”（土耳其，大西洋主义）、“瓦哈比主义”（沙特阿拉伯、大西洋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伊朗、反大西洋主义）。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中亚讲突厥语的民族中大部分不可能存在“泛阿拉伯主义”。与之同时存在的强大的亲俄倾向也应该被考虑在内，但很难想象这些民族自觉觉醒的伊斯兰地区如何能够不流血、无痛苦地再次加入俄罗斯。很明显，在“非莫斯科”的倾向中，新帝国只能依靠亲伊朗的方向，这才能使该地区脱离大西洋主义者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此同时，强大的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将消除亲俄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伊朗类型）之间的所有矛盾，使它们成为同一个地缘政治趋势，同时既面向莫斯科，也面向德黑兰。与此同时，莫斯科-德黑兰轴心将自动意味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内战的结束，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推动了内战，而伊斯兰-伊朗原教旨主义倾向和对俄罗斯吸引力之间的矛盾有使得这两个国家四分五裂。自然，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小民族的紧张局势也愈演愈烈，大西洋“影响力代理人”的活动也在增加，这些影响力直接或（通过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间接地试图破坏亚洲内关键中心区域的稳定。

在地缘政治上，伊朗是中亚，就像德国是中欧一样。莫斯科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它的极点，必须在新帝国的框架内向德黑兰委派在这个地带引导“伊朗和平”（Pax Persica）的使命，组织一个强大的中亚地缘政治集团，能够在整个地区抵制大西洋主义者的影响。这意味

着泛突厥的扩张，以及沙特的金融和政治入侵都将戛然而止。伊朗在传统上对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怀有敌意，它将比俄罗斯能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能，俄罗斯只有在伊朗战略支持帮助下才能在这个复杂的心脏地带解决他们的地缘政治问题。但是在这里，就像在德国一样，我们不应该谈论建立伊朗帝国或中亚伊朗化。我们应该谈论建立“中亚帝国”，在联邦的基础上，可以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种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南部地缘政治集团，从而创造战略

- 137 -

上同质，但种族和文化多样化的伊斯兰实体，又与整个欧亚帝国的利益密不可分。

在莫斯科轴心问题上，亚美尼亚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传统上是外高加索地区不稳定的中心。应该指出的是，亚美尼亚人是雅利安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雅弗特人本性和与印欧人的血缘关系，尤其是与亚洲人，即与伊朗人和库尔德人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人是基督教民族，他们的一性论传统正好符合东方教会总体意愿（尽管东正教认为这是一种异端倾向），而且他们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联系。亚美尼亚人占据了具有极端战略意义的土地，因为从土耳其到阿塞拜疆，再到中亚的道路要经过亚美尼亚和阿耳扎赫。在莫斯科-德黑兰轴线上，埃里温自动成为最重要的战略纽带，将俄罗斯与伊朗联系起来，并将土耳其与内陆地区隔绝开来。在莫斯科总计划中，巴库可能从安卡拉转向德黑兰，德黑兰将迅速解决卡拉巴赫（Karabakh）问题，因为所有四方都非常关心立即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建立稳定秩序。（否则，即如果保留阿塞拜疆的亲土耳其倾向，这个“国家”将在伊朗、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之间被肢解。）几乎同样适用于高加索的其他地区，车臣、阿布哈兹、达吉斯坦等。只要大西洋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与欧亚俄罗斯发生冲突，这里总是充满冲突的不稳定地区。将伊朗地缘政治线纳入此处将立即消除出现在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大西洋主义“影响力代理人”正试图影响该地区的冲突，并恢复和平与和谐。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中亚重组项目，可以用最好的方式保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因为中亚帝国不会建立在人为的政治结构、虚构的“后帝国合法性”基础上，而是建于国家同质性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中亚所有领土（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将和平过渡到莫斯科直接管辖，并使得当地俄罗斯人口密集。而那些种族构成有争议的领土，将在一个特定的帝国内，根据俄罗斯-伊朗项目获得特权。因此，通过欧亚地缘政治计划，俄罗斯人将能够实现一个看似是“小（种族）民族主义”的目标，但这种民族主义本身永远无法实现。

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在该计划中有必要将“替罪羊”的角色强加给土耳其，因为该计划根本不会被考虑土耳其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此外，可能应该强调的是，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支持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自治要求，以便将在种族上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民族从大西洋世俗控制中争取出来。作为对土耳其的补偿，应当让土耳其通过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利雅得向阿拉伯世界的南部方向发展，要不就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亲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根本上改变地缘政治路线，并从长计议，加入反大西洋和欧亚国家中亚集团。

莫斯科德黑兰轴心是欧亚地缘政治计划的基础。伊朗伊斯兰教是进入欧洲大陆最佳的伊斯兰教模式，莫斯科应该优先支持的正是这个模式。

欧亚与南方联盟的第二条线是泛阿拉伯项目，覆盖小亚细亚和北非的部分地区。该集团对大陆地缘政治也至关重要，因为该地区在控制欧洲西南海岸方面具有战略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从战略上考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离开过该地区。在控制中东和北非的过程中，大西洋主义者传统上把欧洲大陆置于政治和经济压力之下，而且现在也仍然在这样做。

但是，泛阿拉伯计划与共同欧亚帝国的融合应该委托给纯粹的欧洲力量来执行，回到一项欧非计划，从纯粹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两个大陆，而是一个大陆。欧洲帝国对深入渗透非洲大陆南部极为感兴趣，未来应该依靠泛阿拉伯集团，将非洲完全控制到撒哈拉沙漠，并在未来尝试对整个非洲大陆进行战略渗透。从欧洲-非洲计划的角度来看，地中海并非真正的“海”，只是一个内陆“湖泊”，就抵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而言，地中海既不是屏障，也不是什么防线。在阿拉伯非洲之外，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多种族项目，帮助按照民族、种族和文化特点重组非洲，而不是构建一个充满矛盾的现代非洲国家后殖民集团。一个细致入微的泛非（非阿拉伯）国家项目可能成为泛阿拉伯一体化计划的地缘政治补充。

鉴于纯粹的伊朗原教旨主义模式不太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普遍接受（主要是由于什叶派、雅利安版本的伊朗伊斯兰教的特点），泛阿拉伯项目应该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反大西洋集团，伊拉克和利比亚将成为优先两极。解放了的巴勒斯坦（在某些条件下也是叙利亚），即这些阿拉伯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清楚美国的危险，他们最激进地拒绝西方强加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同时，在泛阿拉伯计划中，“替罪羊”首先将是沙特阿拉伯，它过于根植于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无法自愿加入对欧亚大陆友好的泛阿拉伯集团。至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情况有些不同，因为这些国家的亲大西洋统治势力不去表达民族倾向，又没有完全控制局势，而只是依靠美国的刺刀和金钱。一旦泛阿拉伯解放战争激烈开打，所有这些政权必将顷刻瓦解。

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最和谐的泛阿拉伯区域建设与其说是俄罗斯的事，不如说是欧洲、中欧、德国的事，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帝国的事。俄罗斯（更准确地说，苏联）只有在它独自代表一个欧亚国家面对美国主义时才干预阿拉伯问题。当存在欧亚导向的强大欧洲基地情况下，即创建了莫斯科-柏林轴心后，这一职能应委托给柏林乃至整个欧洲。俄罗斯在伊斯

兰世界的直接关注恰恰应该是伊朗，俄罗斯人的重要战略利益，甚至狭隘种族利益都依赖于伊朗的联盟。

莫斯科优先利益的中心是与俄罗斯一起控制中亚的伊朗（包括控制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残余或“亲伊朗革命后的土耳其”）。与此同时，俄罗斯应该利用在泛阿拉伯“左翼”

政权（主要是伊拉克和利比亚）中的传统影响力，来使阿拉伯国家更靠近伊朗，并尽快忘记人为的和受大西洋主义激发的两伊冲突。

4.5 多帝国的帝国

新帝国的建设是一个包含许多次级层次的超级工程，它将与俄罗斯人民世界的、全球的文明使命相呼应。这个新帝国，即欧亚帝国，将有一个复杂的、有差别结构，这个结构各个部分之间会有不同程度的相互依存和整合。很明显，新帝国既不是俄罗斯帝国也不是苏联帝国。

这个新帝国的主要整合时刻将是与大西洋主义的斗争，并强硬反击自由市场、“海洋”和“迦太基”文明，为大洋主义服务的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结构今天就是体现了这一文明。为了这场斗争的成功，有必要建立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大陆集团、一个单一的战略集团。统一战略大陆边界将是整合新帝国的主要因素。在军事战略意义上，这个帝国将成为单一和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将对帝国内部所有次级组织施加政治限制。作为新帝国的一部分，所有集团在政治上都将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服务于大西洋的地缘政治利益，禁止退出战略联盟，禁止损害大陆安全。在这个层面上，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新帝国才是一个完整的地缘政治实体。

在下一个较低的级别，新帝国将是一个“大空间联盟”或二级帝国联盟。四个主要的二级帝国应立即加以区分：西方（围绕德国和中欧）的欧洲帝国，东方（围绕日本）的太平洋帝国，南方（围绕伊朗）的中亚帝国，以及在中心（围绕俄罗斯）的俄罗斯帝国。中心位置占据此项目的主要位置很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个巨型大陆块所有其他组成部分的领土凝聚与和谐都取决于中心位置。除了指定的集团，印度、泛阿拉伯世界、泛非联盟之外，还将存在其他独立大空间，还可能有一个中国的特殊区域，其地位仍然难以大致确定。每个二级帝国都将基于特定的种族、文化、宗教、政治或地缘政治综合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在各种情况下都可能各不相同。这些二级帝国自身的整合程度也将是一个变量，取决于创建各个二级帝国的特定意识形态基础。

在这些二级帝国中，联邦原则也将起作用，但与较小的种族、国家和地区有关，这些

- 140 -

地区或多或少可以近似称为“国家”或“州”。当然，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战略上的（遵循整个大陆新帝国的原则），其次是涉及到它们将被纳入的那些大空间的具体情况。而在这件事上，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历史、精神、地理和种族特征，将采用极其灵活的区分原则。

例如，大俄罗斯人，可以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框架内的一个独立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许塞尔维亚人等，也是如此。但同时，他们又都与具体国

家系统所体现的斯拉夫-东正教类型管辖权密切相关。同时，俄罗斯帝国将依赖欧亚帝国，即新帝国，其战略利益将凌驾于东正教斯拉夫人的民族、种族利益和宗教利益之上。

也可以法国人为例，他们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样，将仍然是欧洲帝国内的一个民族或“国家”，受共同的欧洲帝国传统、基督教和属于欧洲帝国的约束，并都属于印欧人种。但欧洲帝国本身依然将服从整个欧亚大陆新帝国的战略要略。

在中亚、太平洋空间、阿拉伯世界、黑非洲、印度等地区也是如此。

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新帝国的主要“替罪羊”正是美国，新帝国的所有参与者将毫不妥协地破坏美国的权力（直至彻底摧毁这一地缘政治结构）。在这方面，欧亚计划涉及欧亚帝国向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扩张，以使其脱离北方的控制（这里可以使用西班牙因素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因素的传统替代方案），以及在美国境内挑起各种不稳定和分裂主义（有可能依靠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者政治力量）。古罗马的公式“迦太基必败”将成为欧亚帝国的完美口号，因为它将吸收欧亚大陆整个地缘政治全球战略的精髓，并唤醒其使命。在一个共同的大陆集团框架内，想要明确每个人民、每个“国家”、每个“大空间帝国”地位的细 节，这只有在地缘政治统一之后，在创建必要的轴心之后，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欧亚各国人民和欧亚各国才能完全自由地解决其内部问题，而不受制于大西洋势力的压力。大西洋势力在欧亚大陆根本上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阻止和平、和谐、繁荣、独立、尊严及传统的鼎盛时期。

- 141 -

第 5 章 帝国欧亚中俄罗斯的命运

5.1 国家意志的地缘政治魔法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考虑：全球的、地球的、地缘政治的、文明的（这在前几节中讨论过）和狭义的国家、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这将在这部分讨论）。大陆帝国建设的宏观计划与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路线如何相互关联？关于这一点，有些已经说过。在这里，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帝国建设方向”、“大陆主义”、“欧亚主义”所有这些术语和相应的计划往往会吓跑那些对俄罗斯历史象征意义不甚了解、不深入研究民族历史趋势含义的俄罗斯人，在理解什么是人民和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时，他们习惯于用平庸的日常琐事来操作。这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引起了许多误解，引发了空洞的讨论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事实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其全球性；与其说它与血缘有关，不如说与空间、土壤、陆地有关。在帝国之外，俄罗斯人将失去他们的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民族。

但是，实施欧亚计划绝不能让作为帝国“轴心”民族的俄罗斯人出现民族消蚀。伟大的俄罗斯人需要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否则欧亚大陆中心将会失去其文明的及文化的确定性。换句话说，在超国家的地缘政治帝国框架内，必须有特殊的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来确保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新帝国的特殊性应该在于一个事实，即鉴于俄罗斯人在地缘政治一体化中的核心作用，这不应伴随在非俄罗斯领土上的“俄罗斯化”，因为这种“俄罗斯化”一方面会扭曲帝国的意义，将其降低到一个巨型“民族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这种“俄罗斯化”反而会使俄罗斯社群消失。

关于大陆集团内的俄罗斯人民，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的作用不是“孤立主义”的（即与“小民族主义”的计划相反），也不是种族扩张主义者（即与“种族帝国主义者”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斯拉夫主义者相反）。从这两个计划中，各自都必须采取一方立场，而摒弃另一方立场。在战略层面，我们将真正谈论“扩张主义”，但不是种族的扩张主义，而是地缘政治本质的扩张主义，这种扩张主义显然排除了任何形式的俄罗斯或斯拉夫种族主义。相反，在纯粹的民族层面上，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孤立主义”，同时拒绝政治孤立主义和国家孤立主义。俄罗斯人将作为单一的民族社群存在于一个超国家的帝国复合体空间中。民族现实将在人民内部得到巩固，超民族使命将在帝国内部得到体现。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既保持健康的国家核心，又最大限度地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换言之，民族因素将在民族与政治的全新结合基础上确定，这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历史的任何阶段都不曾存在过。只有在建

- 142 -

国初期，而且在相当有限的领土内，俄罗斯的种族同质性才存在过。沙皇模式是建立在一定的“俄罗斯化”原则之上的，苏联人扩大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界限，却反而忽视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素质。在新帝国，这些因素必须以新的比例发挥作用，与现代地缘政治条件和民族学条件相适应，也必须在俄罗斯人民中建立稳定的民族政治平衡。

新帝国的俄罗斯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 1) 作为国际联邦帝国政治实体的伟大国家之一，
- 2) 作为将欧亚大陆整合到这个国际联邦帝国的发起者。

因此，俄罗斯人发现自己处于特权地位，因为从种族方面来看，作为帝国几个或多或少平等的种族组成部分之一，他们在地缘政治上成为整个政治进程的中心。这种双重功能使得俄罗斯人在进行同样帝国建设行动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增加其族外影响力和巩固族内力量。建立帝国是维护、加强和团结俄罗斯民族的唯一途径，而无需诉诸民族间冲突、战争和修定政治边界。在建立新帝国的过程中，欧亚大陆的所有政治边界作为政治边界都将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有机的民族边界，没有像国家边界那样严格的分隔意义。这些种族边界与现代情况下的“边界”一词的含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们将具备一种民族文化基础、宗教信仰基础，而不意味着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仅仅因为受到整个帝国战略利益的限制，这些民族族群将不会拥有完整的政治主权，反过来，帝国在其境内维持和平与和谐具有切身

利益。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帝国的框架内，俄罗斯人不会得到他们自己作为族群的政治表达的民族国家，而将获得民族统一，并得到一个巨型大陆国家，他们将在其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仅仅推进这样一个项目，就会立即消除那些潜在冲突的威胁，这些冲突逐渐成熟是由于俄罗斯人目前在独联体内各个新生“国家”间四分五裂。建立帝国的倾向立即将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或者鞑靼斯坦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的比例问题转化至与种族完全不同的层面。这个比例不再是一个政治国家问题，只有对某一方造成一定的政治损害和领土得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分裂、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分裂主义、对车臣的军事镇压、乌克兰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分裂、克里米亚问题等），并成为单一政治空间内各民族共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俄罗斯人的种族融合不会被认为是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而破坏

- 143 -

“哈萨克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而是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文化和民族过程，它不会侵犯、但也不会提升任何一方，因为根本不存在“哈萨克民族国家”或“俄罗斯民族国家”。苏联模式与这个计划有些相似，但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民族”的概念在其中被认为是一种雏形，是一种历史返祖，而且被剥夺了内部政治问题的地位。相反，在新帝国的框架内，没有直接国家表达的民族，将被承认为帝国内部所有事务的主要政治价值和最高法律实体。

总结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运作全球地缘政治计划，乍一看与实现俄罗斯人狭隘的民族目标无关，实际上这样做将最佳地满足俄罗斯的特定国家目标。通过放弃微不足道的目标（“俄罗斯联邦框架内的俄罗斯国家”），不再试图通过自相残杀的血腥战争，靠征服和吞并来增加寸地尺天，而是为欧亚大陆的人民提供机会建设一个平等的大陆集团，俄罗斯人民才能达到举足轻重的目标，否则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放弃了民族国家，我们将获得人民和大帝国的统一。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才可以不仅将俄罗斯人民从政治软弱和民族堕落中拯救出来，在其宏伟的全球成就范围内唤醒它，并最终给予它真正应得的东西。

5.2 俄罗斯民族主义。种族人口统计和帝国

从狭义的民族意义上讲，俄罗斯正处于人口困境之中。从长远来看，这对国家本身和未来的帝国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因为其他国家取代俄罗斯成为大陆联盟主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陆集团偏离其自然的文明使命，会引起欧亚大陆的混乱和冲突，会剥夺地缘政治结构中最重要文化和政治成分。

与欧亚南部的人口增长相比，俄罗斯人如此薄弱的人口地位尤其令人担忧，相反，欧亚南部的人口在数量上正在迅速增长。如果这些趋势以现有比例继续下去，俄罗斯人将不可避

免地被排挤出帝国中心地位，民族的同质性就会受到侵蚀，俄罗斯民族要么被吸收到南方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要么被将变成只在保留地中值得存在的遗迹。除此之外，俄罗斯人还没有在欧亚大陆的广袤地区建立紧凑的定居点，目前他们仅仅在政治上和行政上控制这些地区。最后一个因素可能会导致欧亚帝国的种族失衡，并促使南部人口激增，向俄罗斯领土（尤其是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

- 144 -

这个问题应该马上解决，但要特别强调的是，它的解决不能先于帝国的创立，也不能跟随这个创造。从一开始就实施地缘政治计划必须同时采取旨在俄罗斯人口增长和民族重组的行动，以使俄罗斯民族获得高人口密度的完整“生存空间”。这一目标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来实现，既应直接导致预期结果，又应在预先确定该领域的经济措施。

政治解决办法只能是突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概念。然而，这种民族主义必须使用文化-种族术语而不是国家的术语，特别强调诸如“民族性”和“俄罗斯东正教”等范畴。此外，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应该具有完全现代的声音，避免任何尝试直接恢复历史陈规，那只会导致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民粹主义、种族、伦理宗教类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国家地位”和“君主制”。所有俄罗斯人都应该被灌输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即每个人的个人自我认同是次要的，它是从民族自我认同中衍生出来的价值。俄罗斯人必须意识到，首先，他们是东正教徒，其次是俄罗斯人，最后才是人。由此确定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优先等级。首先，是对作为单一教派东正教的民族自我意识，然后是清晰理解不仅包括生者，还包括祖先和后代，整个俄罗斯民族有机体的不可分割性、完整性、整体性和统一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才是作为独立最小单位的特定个人的经历。

实践中，在政治上的实施这种民族主义应该意味着俄罗斯人的全面教会化，以及将所有文化机构转变为单一教会的延续，不是在组织和行政方面，而是在精神、知识和道德方面都是这样。这样的教会模式应该不允许文化、科学同世俗的生活基础相隔绝，而是让文化、科学参与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将务实和分散的技术发展变成以实现教会的中央主教盟约为目的，变成实现超物质精神计划的附属工具。只有以这种激进的方式，俄罗斯人才能真正回到教会的怀抱，这是他们历史民族存在的基础，在其主要特征上，塑造了所谓最高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正是东正教世界观的彻底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才能使人们回归其精神源泉。任何仅仅将教会相对地复兴为一个狭义的宗教信仰机结构，任何仅仅限于恢复狂热崇拜和外在仪式，都将徒劳无功。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框架内，教会所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俄罗斯文化、科学和思想的总和。只有这样，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提升，进而将人口增长问题转变为一种基于东正教伦理的精神任务，例如，禁止避孕和流产。

下一个层次是实际的种族认同，即将人视为一体之魂的想法。此外，这个单一有机体应被理解为超越时间的存在，不受空间或时间范畴的限制。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诉诸民族的

现在，还要诉诸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同时被视为单一精神存在的整体。每个俄罗斯人都应该认识到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在其超越历史整体中的这种“存在”，并做到人人皆知。身为俄罗斯人，必须将之视为天生注定的崇高使命、难以置信的无价之宝、至高无上的人类尊严。宣传这种民族排他性(没有丝毫的仇外心理或沙文主义)应该成为人民政治教育的中心。首先，在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上应确保人口猛增。人们应该受到教诲：通过生下俄罗斯孩子，每个家庭都参与到国家的神圣任务中，因为这样做将充实全民精神财富和思想财富。孩子应该被理解作为一种国家资产，对一个大国而言，就像物理学所表示的内能。俄罗斯的孩子首先应该被看作俄罗斯人，然后才被看作孩子。

考虑到当今困难的人口状况，有必要使用任何政治和思想手段，尽快启动全国性宣传。同时，必须将民族主义倾向推向极限，使得宏伟强悍的民族顷刻大彻大悟。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宗教、伦理和意识形态支持，任何单独的经济措施都不会产生积极的人口结果。人口下降可以停止为零，然后只有在适当的意识形态帮助下才能引发上升过程，该意识形态将专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转变他们的思维，将成百上千的特性引入日常领域，或明或暗地将人们导向民族利益。在俄罗斯民族的框架内，俄罗斯民族主义应该是唯一的、完整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和层次，但在涉及“国族”范畴，而不是“个人”范畴的一切方面，必须始终保持不变。最重要的是，必须提出一个激进的口号：“国族就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

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也必须得到纯粹经济措施的支持，因为实现民族目标也需要纯粹物质工具。将支持母亲、多子女家庭，并为大家庭外出工作的男子提供社会保障。但这种经济成分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条件下才会产生作用，国家意识形态不仅要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人的人口增长，而且要以纯粹的国家方式来引导经济，把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换句话说，对生育的经济支持是经济总趋势的一个特殊情况，总体而言，这种趋势应该确切地来自国家利益，而不是来自个人的利己动机或乌托邦式的抽象含义。

乍一看，转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似乎会引发民族冲突，恶化俄罗斯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引发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的确，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将其主张扩大到经典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要求，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其他族群和教派的代表几乎都不想生活在俄罗斯民族主义东正教国家。但是，与信奉国家意识形态的俄罗斯东正教人民一起生活，在一个

单一的大陆帝国的框架内，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保持统一，但其内部结构却具有灵活性和差异性，这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困难，因为总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存在，在这个更高的权威面前，各民族宗教团体具有平等的地位，并受到帝国和谐、正义和公正原则的指导。新帝国在民族层面的计划恰恰包括这样一个事实：不仅俄罗斯人民要取得胜利并建立明确表达的民族-宗教意识形态，而且将成为帝国一部分的所有其他民族也适用于这一点。因此，将

出现一个“积极民族主义”集团，且都具有帝国取向的自下而上共同点。

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实现最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将被消除；邻国人民不会感到受到俄罗斯民族的羞辱或压制，因为文化，帝国人民之间的种族和信仰界限将没有政治意义。俄罗斯人将生活在他们的国家现实中，鞑靼人将生活在他们的现实中，车臣人将生活在他们的现实中，亚美尼亚人将生活在他们的现实中，等等，即使我们谈论的是居住在其他民族内的民族飞地或少数民族，他们也是生活在自己民族的现实中。摆脱了国家地位和边界问题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强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它们既能相互接触的自由，又能有种族隔离的自由。

为了使俄罗斯人民在当前困难条件下得以生存，为了让俄罗斯民族人口获得增长，为了改善其在民族、生物和精神方面最困难的状况，有必要转向最激进形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没有它，所有技术或经济措施都将无能为力。但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只有在与地缘政治大陆帝国的原则有机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5.3 胜利后的俄国问题

显然，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应该考虑俄罗斯人在欧亚帝国可能战胜大西洋主义之后他们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当然，这是一个如此遥远的前景，以至于现在认真分析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然而，应该考虑到大西洋主义的崩溃几乎可以在欧亚帝国建立的任何阶段发生，因为西方的地缘政治稳定完全基于正确和精巧处置地缘政治范畴的问题，而不是仰仗真正的工业、经济或军事实力。大西洋主义的结构其实是极其脆弱的，一旦，比如中欧、太平洋地区或者欧亚大陆南部，其中一个战略轴心被打掉，乍一看那么强大、稳固的整个大西洋主义巨大建筑顷刻就会土崩瓦解。在“三边委员会”的地缘政治战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个欧亚项目所阻碍的时刻，我们可以预期整个大西洋联合体的运作将出现严重故障，进一步的事件可能会迅速展开并使得大西洋联合体崩溃，就像苏联帝国及其附属国崩溃一样。因此，尽管战胜大西洋主义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前景，但应该就俄罗斯人在假设的后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制定几条观点。

- 147 -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失败会给欧亚帝国本身带来很多问题。此刻，国家和人民在地缘政治上统一为一个新帝国的计划的主要因素将消失。“共同敌人”的原则将消失。这种凝聚力将失去意义，甚至欧亚帝国继续存在的意义也将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欧亚大陆对大西洋的新两极世界秩序可能会开始转向多极模式。同时，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即只有在战胜大西洋主义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多极模式才有可能。只要大西洋主义仍在声称具有普遍实力，就不可能谈及任何多极前景。只有在新帝国的框架内，在全球欧亚计划的框架内，在与大西洋主义的战略对抗过程中，而不是在此之前，才会出现或多或少

平衡多极化出现的客观前提。只有实行分化的帝国模式，与目前只涉及国家和个人的法律地位（“人权”）的主导体系相反，在人、族群、宗教、民族的某些有机、文化和精神范畴背后，肯定一个政治主体国家的地位，多极化的胚胎才会形成。多极世界中的“文明冲突”（用亨廷顿的话）只有在这些文明能够建立起来并在反大西洋战略联盟背景下赢得存在的权利时才会成为现实。目前，只有大西洋主义的、西方的、自由市场的这一种“文明”，在反对着所有其他历史的、有机的、文化的模式。

大西洋主义的崩溃将把新帝国及其各个部门的人民置于一个严重的问题面前：是继续保持地缘政治统一，还是将帝国内的大型文明集团整合为独立的地缘政治现实？但无论如何，各国之间的民族差异和教派差异将会凸显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保留帝国结构作为解决所有内部矛盾的最和谐的制度。与曾经存在的欧洲公共法（Jus Publicum Europeum），即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的“欧洲民法”类比，后大西洋时代的欧亚帝国可以基于类似但扩展的欧洲公共法信条。在失去了军事战略意义之后，帝国大陆综合体可以充当最高法律权威，这将消除欧亚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欧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这将是一个理想的做法。

但人们也可以假设大陆统一崩溃，并形成了欧亚空间中俄罗斯-斯拉夫（更广泛的东正教）、欧洲、远东、中亚、伊斯兰等几个文明集团。现在当然无法预见每个文明集团和其他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预见这些文明集团的边界和结构。然而，从这种假设的角度来看，今天应该可以有一个模型来设计俄罗斯国家结构，该模型考虑到在遥远的未来（只有在大西洋主义结束之后），俄罗斯人独立参与世界历史，这个世界在经历了大西洋主义长期的异常之后，已经回到了有机、自然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必须准备好

- 148 -

建立自己的国家或形成一个更广泛的自然民族国家形态，由传统、文化、宗教和命运统一在一起。俄罗斯国家的问题可能会全面出现，但这只涉及后欧亚时期，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并仅仅是个假设。

但是现在，俄罗斯人必须全力以赴巩固国家，复兴人民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以使国家最终形成，人民全面觉醒，以便在未来（如果有必要）不但抵御敌人，并抵御帝国主义的盟友，这些盟友有他们自己在历史上预设的民族世界观，由此能够捍卫我们的民族真相。俄罗斯人不仅要在帝国背景下保持自己的身份，还必须肯定这一身份、激发这一身份，并将其深化到极致。从长远来看，在大西洋主义崩溃之后，俄罗斯人必须准备好坚持自己的文明使命，捍卫他们自己普遍的、深思熟虑的国家道路。

尽管如此，俄罗斯人无论如何都会发现自己在欧亚帝国地域中处于战略中心位置，因此，在后大西洋时期（如果帝国仍然存在的话），在帝国的文明优先事项方面，他们将处于特权地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帝国将同俄国的思想联系起来，俄国的思想，从定义上讲，确实是末世论的，是普世的，它与巨大的空间和宇宙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如果大陆集团开始

解体，由于民族主义时期和帝国建设的蓬勃进程而重新获得力量的俄罗斯人，将再次处于地缘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被解放的大陆人民和国家中占据中心地位，这将使俄罗斯国家、俄罗斯帝国成为可能，并成为建在强大民族土地上可持续的、稳定的地缘政治现实。

今天应该考虑这两种可能性。

- 149 -

第 6 章 帝国的军事方面

6.1 优先考虑核能力和洲际能力

在军事战略意义上，只有在前苏联的核力量以及所有类型的战略和太空武器仍然掌握在欧亚集团手中的情况下，新帝国才能真正创建。这不仅是形成未来欧亚大陆生存能力的主要条件，也是创建欧亚帝国的根本条件，因为只有在莫斯科具有战略潜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俄罗斯周围的国家和“大空间”的一体化，才能建立欧亚大陆各轴心，而这将是整个计划严肃性的主要保证。正是维持大西洋主义（北约）和俄罗斯（苏联的军事战略继承者和新欧亚集团的中心极点）之间的战略平衡，才使新帝国的政治计划变得庄重严肃并切实可行。

目前，前苏联的战略潜力在核武器、核潜艇、一些军事空间计划和战略航空方面仍与北约保持一定比例的可比性。一旦这种平衡明确地向大西洋主义者倾斜，欧亚帝国将变得不再可能，俄罗斯最终将变成一个简单的“地区大国”，从而其领土和影响力必将大幅减少。在那之后，任何地缘政治轴心和政治计划都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只有在现阶段，冷战势力在战略领域的结盟尚未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政策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欧亚大陆才能显示其应有的分量。事实上，是否可能体现自由和独立的地缘政治，直接取决于是否能保持俄罗斯和大西洋主义潜力的战略可比性。一旦明显打破了这一比例，俄罗斯就会从地缘政治的主体变成地缘政治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不得不听命于他人调遣，在本质上，选择角色身份和优先事项时变得身不由己。

这种情况使得欧亚计划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前苏联）军队的质量和潜力。由此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依赖莫斯科暂时的政治局势。相反，军队的素质（当然，主要是在战略武器方面）是俄国一切政策的基础，是轴心，因此，军队的结构应该预定政策的大致轮廓，并确立纯粹的政治方针。只要战略平衡保持在一定程度上，军队仍然是俄罗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国家的政治地位、它的分量、它的能力和它在这种情况下的未来直接取决于军队。

目前，在大西洋主义的压力下，俄罗斯军队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即把整个军事理论从大陆-苏联结构调整地区-区域结构。这意味着，作为俄罗斯的“潜在对手”，开始

考虑不再是美国和北约国家，而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国家，以及俄罗斯联邦内部可能转向分裂主义的那些地区。这种新军事理论的转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与唯一合理

-150-

的、武装部队的立场完全相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在敌人”正是那些在逻辑上应该成为俄罗斯人的天然“盟友”的国家。换句话说，“潜在盟友”被视为“潜在对手”，而俄罗斯主要地缘政治的“潜在对手”大西洋集团则被完全被忽略了。

军事问题直接取决于地缘政治选择。如果俄罗斯将其未来视为一个帝国，作为一个新大陆集团的整合者和一极，其武装部队必须专注于核武器和战略武器，而不是更为局部性的武器。帝国计划中的主要军事行动将从“大陆战争”的角度发展，因此，洲际导弹（主要是核弹头）、战略航空、航空母舰和核潜艇，以及各种形式的太空军事计划都将获得一个特殊的角色，这是作为美国战略防御协议（COI, SDI）的替代品而开发的。优先开发此类武器将有助于完美开展大陆一体化，并对其他欧亚集团和国家而言，同俄罗斯结盟将充满吸引力并具有根本意义。正是这些类型的武器，直接关系到俄罗斯能否在大陆层面打地缘政治牌，因此在更具体的层面上，通过与中欧和日本发达地区的合作，解决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当西方（和日本）经济强大但军事政治薄弱的国家被迫补贴美国经济和工业以换取对美式和平的战略指导时，不应忘记，正是被美国奉为“保护西方和民主免受苏联极权主义侵害的保证”的核因素，是战后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目前已经可以提供类似于欧洲和日本的东西，此外，为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对这两个“潜在帝国”的政治成熟做出贡献，而不是像美国、大西洋统治的情况那样，削弱和严格控制欧洲和日本。即使在纯粹务实层面上，也只有在地缘政治上主动利用战略因素，并借助相应类型的武器，才能克服俄罗斯经济危机。为了获得“更多好货”，更容易做的不是重新配置军工综合体去生产平底锅，而是继续并加强生产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在适当的政治支持下，通过制造几艘潜艇，就可以用纯粹和平的方式，将涉及若干国家的整体发达工业带到俄罗斯，而通过重建军工厂去生产洗衣机，俄罗斯将会给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

以“区域”方式对整个军队进行重新配置意味着发展所有非战略性常规武器。如果能够合理并且一以贯之地进行这样的军事改革（这在我们的情况下很难相信），那么俄罗斯人将获得一支有效的机动部队，为大陆条件下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并能够势如破竹地解决大陆上诸如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或车臣那样规模的军事冲突。苏联军队在局部冲突中的效率低下，这在阿富汗战争和改革冲突中可以观察到，这是苏联武装部队建设的战略重点的结果，该部队以全球核冲突为导向，而不是着眼于中低强度的局部战争。这是很自然的。军队结构调整以“区域导向”为重点，即在“中低强度战争”的框架内选择精确的成功军事行动作为主要

- 151 -

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摧毁战略武器，因为今天没有一支军队，即使是最富有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也能够同时在战略性和区域性两个方向上同时有效地进行建设。（美国人

在局部冲突中的无能已经不止一次被证明，从越南开始，到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结束。)因此，乍一看，军队的“积极”转型，据说符合时代精神，从长远来看却意味着终结俄罗斯人的战略安全，意味着部分丧失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意味着丧失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的严肃保障，还意味着未来完全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改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态。

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在洲际层面的战略潜力，即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尽管是简约版的超级大国地位。为确保这种情况，你可以牺牲一切来达成任何政治、地缘政治、经济和领土妥协。只要保持战略潜力不变，今天的任何让步，明天都将可以修改为有利于俄罗斯人。只要一切保持不变，俄罗斯领导层支持西方的所有政治步骤在理论上都是可逆的。

俄罗斯人今天的命运及其宏伟的未来不在于有多少俄罗斯人最终离开了俄罗斯联邦，也不在于我们目前的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如何，而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武器水平，在军事上捍卫自己的独立，使其免受来自俄罗斯唯一的、天然的“潜在敌人”，来自美国 and 北大西洋集团的侵害。所有其他问题都从这里开始。这也是确定是否仍有可能实施全球欧亚帝国计划的基础。

6.2 大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武装力量？

创建欧亚帝国的角度来看，军事综合体的发展等级显然遵循主要的地缘政治规定：

1) 优先考虑发展与捍卫领土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空间武器，以致于确保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传统形式的军事安全力量会望之却步，或徒劳无功，完全失去其效用。在这里，开发俄国版的战略防御协议（SDI）至关重要。开发“大气层”武器，对影响人们心理因素的非传统型武器进行实验也非常重要。这种昂贵且知识密集的武器领域，实际上不适用于局部冲突，但其实是国家和民族真正安全的最重要轴心。没有这些研究和相应的结果，人民在“潜在对手”面前实际上失去了防护，所有“独立”、“主权”和“地缘政治计划”的愿望都落得烟消云散。

2) 其次是航母核武器、导弹潜力和战略航空。这种针对与大西洋极发生潜在冲突的洲际军备领域，对那些有海上边界可靠保护、免受所有其他形式军事入侵的地区会构成持续的 - 152 -

威胁。正是苏联火箭科学的发展当时在美国引起了如此大的恐慌，这并非巧合，正是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使苏联和华约在二战后得以存在如此之久，尽管这对陆地边界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极为不利。只有洲际武器才使得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大陆”，这类武器提供了某些理由，使得苏联能同真正的美国大陆在战略上平起平坐。

3) 下一个重要级别应该是海军。这种武器与洲际导弹和战略航空一样，旨在与美国“潜在对手”（N1，运载火箭）发生碰撞时执行全球军事任务。与此同时，在建立大陆集团的前

景中，俄罗斯海军应该成为在（俄罗斯和苏联传统上被剥夺之处的）南部和西部建立一个巨大的战略港口系统的起点。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在这方面至关重要。海军应该在结构上面向在海上条件和沿海地区，即在尽可能远离陆地基地的空间内进行作战行动。这应该成为潜在军事冲突中作战行动的优先形式，因为如读者所知，成功战略主要的必要性是在潜在敌人的领土或中立领土上进行作战行动。同时，有必要提前预见地缘政治特征和战略策略细节，使海军现有模式适应南部大海大洋和西大西洋的条件。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迟早会失去对俄罗斯帝国的意义，因为它们只是“区域大国”的重要战略要地，其形成本身就等于俄罗斯的战略自杀。

因此，对于大陆集团来说，控制印度洋和大西洋远比控制二级港口要来得重要，二级港口很容易被海峡或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狭窄地峡封闭。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更关注远东和北海的模式，俄罗斯应该准备好在印度、伊朗和西欧复制类似模式，因为这些领土才是作为帝国（而不是地区大国）的俄罗斯真正的地缘政治边界。

4）地面部队在帝国视角中是最不重要的，被要求担当“内务部队”角色，而不是发挥真正重要的战略价值。在真正的洲际冲突中，地面部队应只会发挥辅助作用，这决定了它们在军事组织发展层次中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由于它们的机动性，与大陆陆地基地的缺乏联系，它们可以积极参与危急的洲际行动。因此，空降部队的发展应优先于陆军其他地面部门。

俄罗斯武装部队和未来新帝国的这种结构总体上再现了战后时期纯苏联军队的模式。苏联军队是自然地缘政治过程的结果，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军队领导层身上，他们对历史

- 153 -

的地缘政治逻辑做出了充分的回应，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却不允许苏联党的领导人按照苏联的国家和战略发展唯一不言而喻的逻辑行事。地缘政治扩张及战略扩张的前景被铭刻在俄罗斯地理位置的根本结构中，而军队比其他人更全面、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苏联武装部队在确定“潜在对手”、选择开发某些类型武器的优先事项以及为军队配备最新技术方面都朝着绝对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与此同时，过度的意识形态压力和苏联后期社会的普遍衰败也影响到了武装部队，他们似乎瞬间忘记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利益（这与所有俄罗斯人在国家自由和安全上的国家利益不谋而合），个别错误转移了对主要战略问题的注意力。

当前的军队重组，从“俄罗斯是一个地区大国”的概念出发，实际上颠倒了新帝国应该存在的、苏联武装部队曾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

在俄罗斯联邦的“地区”军队中，优先考虑地面部队，尽管空降部队也与其他军事部门有所分离。

接下来是海军，改装和削减主要以牺牲航空母舰和核潜艇为代价，在实际上没有战略意义的黑海舰队周围，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爆发了一场毫无结果的丑闻，因为最初的条款和目标

都是错误的。

对航空和火箭科学的关注更少，而战略航空和洲际导弹正在被完全摧毁。与此同时，正在实施放弃核武器。

在地区冲突中部署太空武器的计划完全是多余的，这些武器正在被冻结和削减，因为从狭隘的“地区”角度来看，它们只是国家预算支出中没有任何理由的、一个巨大而毫无意义的项目。

比较两种军队建设优先级的模式，我们看到它们是截然相反的。

一支军队（第一支大陆型军队）旨在保护大陆集团、欧亚大陆、俄罗斯在其真正的地缘政治范围内免受“潜在对手”的侵害，“潜在对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美国和大西洋主义集团。这样的军队专注于确保俄罗斯人的真正利益，是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保障。此外，这样一支军队可以有效实施全球欧亚计划，这是唯一能够使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缘政治地位稳定和安全，并解决最重要经济问题的一项计划。

俄罗斯需要第二支军队（“区域”型军队），这里俄罗斯只被理解为俄罗斯联邦，且这支军队只对解决地方和内部政治问题感兴趣。这样的军队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真正保障。它

- 154 -

最初关注与邻近国家和人民的潜在冲突，使俄罗斯人不断遇料会有来自“敌对邻国”（“前兄弟人民”）的打击。它的结构剥夺了俄罗斯人与中欧和日本建立适当地缘政治关系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不足以保护这些地缘政治结构免受美国未来潜在的侵略。此外，这样的结构迫使俄罗斯人将欧亚大陆未来地缘政治轴心的所有三个参与者——柏林、德黑兰、东京——归为“潜在对手”，并因此引发这些国家把俄罗斯也当成“潜在对手”。重组军队是否将伴随和平主义的信念并不重要。在地缘政治中，在做出最负责任的决定时，重组军队超越了纯粹的政治考虑，一个特定国家的武器性质比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的官方和非官方声明更能说明问题。

- 155 -

第7章 技术和资源

7.1 技术缺陷

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与地缘政治上对立阵营的国家相比，技术严重落后。事实是，大西洋主义者的技术飞跃是通过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有效分配角色来确保的。一方面，美国把自己集中在一个纯粹的军事战略极点，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金融和技术方面，而不必担心要在“高新技术”方面去直接投资军工企业。美国在军工企业中往往只使用现成的高科技，而这些高科技是在欧洲、日本等国家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托管”下

的国家因受地缘政治的庇护而向庇护者“技术进贡”。就苏联而言，它将几乎所有技术发展都完全集中在其军工企业框架内，这使得开展研究和开发最新项目变得更加困难；它们似乎是一开始就是为集权的行政系统准备的，并专注于计划目标，从而大大缩小了技术创新的范围。换言之，同一个中央集权结构同时承担两项任务：大力打造行星军事战略综合体，为该综合体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发展平行领域的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信息程序、计算机技术等整个领域与军工企业紧密相连，这剥夺了它有时必要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台湾、韩国等地缘政治“附庸”，美国技术水平将大大低于目前的水平。

苏联的技术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俄罗斯人正在充分体验苏联在这一领域失败的后果，因为俄罗斯工业和经济对西方专利、技术等依赖每天都在加剧。同时，对于任何寻求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高效、有竞争力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国家来说，一定程度的技术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就俄罗斯帝国的前景而言，高技术水平对于确保所有地缘政治和经济扩张所依赖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尤为重要。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弥补和克服苏联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尽管当前事实是遗留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在科学活动中人才流失、国家资助减少、军工企业转产、衰退和改组等方面）？

有三种假设的可能性。首先是俄罗斯放弃其所有独立的地缘政治主张，完全向大西洋主义投降，并作为服从的“奖励”，从美国人手中获得一些“高科技”，获得一些过时而且非战略机密。这条路径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为例进行了测试，以这种方式真正实现

- 156 -

了经济、金融和工业的飞跃（所谓的“亚洲虎”或“太平洋虎”）。就俄罗斯而言，美国会比对欧洲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会更加谨慎，因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可能在某个时候再次使它成为美国强大的“潜在敌人”。很自然，即使在完全投降和彻底拆除军工企业的战略条件下，俄罗斯人获得“高科技”的机会也会受到各种可能的阻碍和破坏。这条路似乎是一条死胡同。

第二种方式，是“小民族主义”支持者的特点，即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最大利用内部资源的效能获得技术飞跃。这意味着用极端的、近乎极权主义的方式动员全体人民，而且与西方关系将急剧恶化。如果同时一切都仅限于被理解为“区域大国”的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那么这种尝试注定会失败，因为将出现与苏联相同的问题，俄罗斯人将不得不同时保护自己免受作为“潜在对手”的超级大国的影响，并发展诸如高科技等精巧领域的研究。由于稳定且组织严密的苏联无法应对这一点，充满危机、局势不稳的俄罗斯联邦将更无法应对这一点。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得不引入“极权主义”成分，这必然会引起内部的深刻抗议。因此，应该丢弃这条路径。

最后一种选择是从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但不是从美国）借用高科技，以换取建立战略联盟，并获得俄罗斯资源。这里有成功的机会，这样可以为俄罗斯人保留相对于美国一定

的独立性，同时避免国家过度紧张，避免采取独裁和严厉的措施。虽然这样的过程会立即激怒美国，而且威胁俄罗斯，最重要的是，威胁其“不忠的附庸”，但如果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仍然可以与美国抗衡，并且俄罗斯意识形态不是公开的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这最后一种选择。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将用高技术交换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而美国在全世界都严格控制着这类资源。俄罗斯资源、中亚、西伯利亚等对这些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总的来说，美国在这件事上相当独立。矿产、原材料、能源，加上强大的战略军事赞助，这些结合起来，很可能促使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并为俄罗斯提供该领域（连同安装和生产组织）的最高成就。未来，这些事情的国家方向会逐渐完善，但无论如何，这里需要一个初步的推动力。

第三种方式完全符合欧亚大陆的总体规划，要在更实际的水平上将这一规划具体化。事实上，这意味着创建柏林莫斯科东京地缘政治轴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地理计划，也是解决俄罗斯技术落后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 157 -

7.2 俄罗斯资源

俄罗斯是其他国家的天然资源供应国。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让我们更详细地考虑资源出口的地缘政治意义和资源供应的一般作用。

地球上资源的全球分布存在一定的不平等。北方四个发达地区中，有两个地区可以获得资源，并且在必要时能够提供资源自给自足（美国和俄罗斯），另外两个正在经历严重的资源短缺（欧洲和日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两个资源贫乏区的控制是由与另外两个资源区的关系决定的。同时，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试图控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领土的资源，并利用它们来影响发达国家。美国试图为自己节省自己的资源，并且极其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源，尽管如果有必要，即使没有在这一领域的殖民战略，美国为自己创造资源，做到自给自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俄罗斯传统上控制自己的资源出口。两个大国的这种立场差异，对双方来说，都有利有弊。美国总是有不可触碰的战略储备，但与此同时，殖民地的资源基础在理论上总是有失控的可能。就俄罗斯而言，资源供应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资源位于其领土上，但在出口的同时，它总归是在消耗着自己的战略储备。

从创建大陆集团的角度来看，这种客观事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俄罗斯人谋取利益。在初期阶段，俄罗斯可以向东西方潜在合作伙伴提供资源，作为与美国关系恶化的补偿，这在欧亚项目的第一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可以与欧洲和日本建立直接的陆地联系，而不受海洋和沿海控制的影响，控制海洋是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王牌。当然，这种出口不会是单边援助，因为这个过程必须被纳入一个总体的地缘政治计划，包括

欧洲和日本在财政和技术上积极参与俄罗斯的战略发展，此外，这个地缘政治计划还包括俄罗斯大规模扩展它在东西方的政治边界和防务边界。

未来，人们应该专注于将美国赶出非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并相应地重新分配资源丰富的领土，以有利于欧亚伙伴和俄罗斯自身。该计划与大西洋主义者的“蟒蛇计划”截然相反，“蟒蛇计划”使得美国对南欧亚、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严格控制，以防止为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组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区。当有可能将大西洋主义的“蟒蛇”赶回美洲大陆时，欧亚大陆的整个“贫瘠的南方”将成为更发达的欧亚北方的天然补充。阿拉伯石油、非洲矿产和太平洋资源将能够绕过美国直接流入欧亚集团国家。这样，俄罗斯不仅能够开始为自己积累资源，而且还将向南发展获得新区域。欧亚欧洲将南移成为欧非大陆，日本将在太平洋

- 158 -

建立“新秩序”，日本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计划实施这一方案了。俄罗斯自身，利用它已经拥有的技术经验，或利用将在（大陆建设的第一阶段）向集团内技术先进的合作伙伴提供资源而获得的技术经验，将能够积极参与开发中亚和东亚的新油田，并逐步冻结那些对其战略未来至关重要的油田。

在资源方面，创建“反三边”（柏林、莫斯科、东京集团）的计划无论从近期还是从远期来看似乎都是极其现实的，因为西方轴心和东方轴心（柏林和东京）的过渡时期将经历来自美国的最严重压力，将被俄罗斯的资源潜力所缓解，俄罗斯能够通过出口矿物为欧洲和日本在过渡时期的全面政治和战略复兴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之后，这些“大空间”本身将能够加强其在南北方向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在这一过渡时期将能够获得有效的油田开发技术设备，并沿着最简单的路线测试从欧洲的西部和日本的远东所提供的开发手段和技术模型。无论未来事态如何发展，未来的这一因素都将大大加强俄罗斯人的战略自给自足。

当然，目前解决俄罗斯资源问题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没一样对俄罗斯有利。今天，俄罗斯人以倾销价格出售资源，要么直接向美国出售，要么通过其中间商（美国垄断公司或由大西洋主义者隐含控制的跨国公司）向西欧国家出售，以获取虚幻的货币和外国商品。作为替代，“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普遍不切实际的要求，即完全停止资源出口，把资源的开发和消费完全留给俄罗斯自己解决。停止资源出口的计划使得国家所有的力量如此捉襟见肘、十分紧张，以至于这个计划只能在政治独裁的条件下加以实现，这在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里的情况与高科技的情况相同。只有“第三条路”——既不支持有利于美国的资源出口，也不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出口——在当前形势下才是真正的出路。

同样，一切都取决于迅速建立欧亚大陆集团的政治需要。

- 159 -

第 8 章 “新帝国”的经济方面

8.1 “第三条道路”经济学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姗姗来迟。“改革者”所说的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必然性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苏维埃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效率和竞争力，但逐渐变得死板和僵化，必定崩溃，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许多有效和积极的方面都被埋在了它的废墟之下。

俄罗斯经济转型始于改革，这一转型的逻辑基于对经济的二元论。一方面，存在僵化的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即“国家全面干预”，国家干预生产和分配的最细微差别，压制任何私人主动性并排除所有市场因素。这种结构僵化不仅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得繁琐、笨拙（因此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失败），而且也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有效参与经济进程的前提。马克思在其经济哲学手稿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堕落提出了警告，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下的异化”。

然而，对这种集中经济的批评很快就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即绝对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法则”、“看不见的手”、“自由贸易”等辩解。从过度集权开始，自由主义改革者（如果只是理论上）决定转向过度自由主义。如果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在其后期阶段在与对立的地缘政治集团竞争中削弱了国家的自给自足，那么市场改革真正破坏了这种自给自足，这只能被称为“背叛国家利益”。改革是必要的，但苏联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元逻辑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平面上，因为争论变成纯粹理论性的，而对俄罗斯地缘政治自给自足的考虑被放到了后台。以芝加哥男孩计划和冯·哈耶克的理论为风格的自由主义改革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保守”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的恢复主义经济计划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这都是两个乌托邦抽象模型之间的争论，其中“俄罗斯国家利益”问题处于背景地位甚至处于第三位。

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因为苏联经济学家所受教育的特殊性，他们习惯于只处理两种经济模式，即（他们暂时捍卫的）教条式苏联社会主义和（他们暂时批评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以其研究和发展的形式来看，从未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样的标准相关联，因为这个主题（尽管形式不同）是军队和意识形态结构（尤其是格鲁乌特种部队和克格勃）的优先事项。改革的领导者将主要焦点转移到经济上把“民族及国家的安全与权力”的问题

- 160 -

从括号中去掉。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该国就陷入了一个错误表述的问题的陷阱，任何解决方案在给定条件下显然都是死路一条。

严格来说，人民不是必须在自由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自由资本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及结合市场要素与计划要素、服从国家繁荣与国家安全主要需求的一种特殊经济学说（“第三条道路”），这三者之间做出选择。经济学中的这种“第三条道路”绝不是一种折衷，也不是融合其他两种经济模式的不同点，而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

学说，其历史悠久，实践案例众多。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在公众争议中几乎没有被提及。如果顽固拒绝认真考虑这一选择，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国家被破坏、被削弱，经济遭到破坏，俄罗斯日益寄生依赖于海军和国际银行，经济和工业联系崩溃等等。目前，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市场，停留在解决最重要经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框架内，任何事情都不太可能被纠正。

经济中的“第三条道路”与瑞典模式或瑞士模式都不相同，这与一些开始意识到当前局势僵局的政客的想法相反。瑞典和瑞士都不是完整的地缘政治实体，也没有严肃的战略主权，因此，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确保真正自给自足所需的大部分国家级的、工业和军事部门。这些国家中，社会导向结构和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取得了某种妥协，但这是一种纯粹的人为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得以实现，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是完全非政治化的，并且在欧洲力量的地缘政治结盟中刻意放弃担当积极角色。俄罗斯在规模上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瑞典”或“第二个瑞士”，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地位上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参考这样的例子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幻想是那些靠直觉为俄罗斯寻求“第三条道路”模式的人所特有的，那就是中国及其改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一种“虚幻的错觉”，原因是缺乏关于中国改革性质和进程的客观信息。中国的经济转型只是表面上类似于“第三条道路”的模式。事实上，那只是将一个与苏联大体相似的社会转变为纯粹的自由制度，但政治上没有民主变革，即同时保持统治精英对政治局势的极权控制。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由共产主义官员任命制的政治极权主义，顺利地转变为同样是官员任命制的经济垄断极权主义。这种官员任命制从一开始就寻求切断任何自下而上进行经济竞争的可能性。一种“异化社会”模式顺利过渡到另一种“异化社会”模式，政治剥夺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为对同一社会群体的经济剥削。

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改革正是由“三边委员会”制定的，其代表从 80 年代初就已经

- 161 -

同意中国那些被任命官员的意见，未来将中国纳入世界主义影响范围，并授予中国“区域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大西洋主义者的这一举动受到针对苏联的冷战战略的制约，但也受到另一制约，那就是希望支持日本在远东的传统竞争对手，同时又想限制其经济扩张。

经济学中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中找到了它的经典体现，他提出了“大空间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原则。这一理论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以及“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进行经济殖民化的逻辑后果；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对“富人”而言，是有利的，而对“穷人”而言，则是有害的。李斯特由此得出结论，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某些阶段，有必要诉诸保护主义、国家控制和海关限制，即在国际层面限制“贸易自由”原则，以达到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和战略实力的水平。换言之，对李斯特来说，经济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任何诉诸“市场自治逻辑”的行为都只是为了掩饰富裕国家在经济上（随后在政治上）扩张到贫穷国家，损害贫穷国家，继而奴役贫

穷国家。这种方法立即为“市场”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运作设定了明确的界限。有趣的是，德国“经济奇迹”的作者拉特瑙，以及维特、列宁，甚至凯恩斯，都完全根据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学说制定了他们的经济原则，尽管使用的语言更接近于纯粹资本主义词汇，或共产主义词汇。

李斯特所建立的经济等级制度可以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公式：经济生活中，在规模上与私人、个人利益相当的那些方面，应该受市场原则支配，并以“私有财产”为基础。我们指的是住房、小生产、小土地持有等。随着各种经济活动的重要性逐步增加，生产形式必须具有集体所有制特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财产”和个人因素可能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必须有一个“合作”或“共同”的标准。最后，与国家及其战略地位直接相关的经济领域应该由国家机构控制、补贴和管理，因为这是高于“私有财产”或“集体利益”的权益。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决定社会的经济、产业和金融形象的不是精英，不是市场，也不是集体；这种社会形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国家的特定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原则上不能过于教条，随着国家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经济等级制度中三个等级之间的比例是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例如，在和平时期，在繁荣时期，私营部门和集体可以一起成长，而公共部门可以缩小。反之，在国家历史的困难时期，当全民独立性受到威胁时，国有部门的权力应当获得增加，而不得不牺牲一些集体经济形态，进而也不得不排挤一些私人企业。

- 162 -

非常有趣的是，历史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刻使用的正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模型。因此，即使是激进捍卫“自由贸易”原则的美国，在“经济萧条”时期开始时，也会周期性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并由国家补贴工业部门。新政的实施阶段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美国人几乎逐字逐句复制了李斯特的原则，尽管他们以“经济绝缘”理论的作者凯恩斯的软化版本提出这些原则，总的来说，无非是“大空间经济专制”理论的新名称。顺便说一句，李斯特本人长期居住在美国，观察了早期资本主义建设的过程。基于这些观察，他制定了适用于德国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但是，当然，最宏大的结果来自李斯特学说在纳粹德国的实施，他的思想在没有来自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任何修正的情况下完全付诸实践。

“第三条道路”经济学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金融要素与生产要素的比例。显然，早期的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的发展，将金融体系置于次要的、从属的角色。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倾向于金融资本对生产的支配地位，而生产又成为次要因素。“劳动”原则的支配地位迟早会导致政治暴力，“资本”原则的支配地位迟早会导致经济暴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是自主的，脱离了特定的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金钱是自主的，也失去了与价值的联系，变成了信用-利息的假象。“第三条道路”坚持劳动与价值（例如黄金储备，更广泛地说，资源）的残酷联系，赋予消费和商品流通领域从属的、次要的、纯粹工具性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劳动和价值的结合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确保“国家权

力”和国家主权作为这种经济学说的整体结构。可以用“既不奢侈也不贫穷”、“对合理的最低限度的满足”这一公式简单地表达这一想法。这意味着工作方式比苏联社会主义下更灵活、更自由的，但个人致富机会比资本主义下更有限。这种模式使国家在战略领域不依赖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系，但同时剥夺了劳动过程的强制性质，并将其与物质对等物联系起来。

正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经济版本是当今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它反对肆无忌惮的自由主义和新共产主义者的复辟计划，他们不想认真纠正过时且被证明是无效的教条。如果不是在某个瞬间曾经同希特勒政权有关，这个计划原本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类型”。在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提出李斯特理论（而由西斯蒙第、熊彼特、杜蒙等著名经济学家加以发展），这一事实就将是一项伟大成就，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解决最紧迫问题的答案，并能立即走出“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死胡同。此外，从社会主义中幸存下来的自由改革和结构的积极方面都可以完美地参与到这个经济计划中。但是，要想使得所有这一切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必须有意识地加以研究，并建立起理论发达的教义主体，而不是仅仅根据个别案例或具体情况

- 163 -

采取实用主义的行动。“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必须有自己堪比“自由党”或“共产党”那样明确的政治表达。任何惯性很大的集中制、实用主义和妥协，显然都注定要失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的思想应该成为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相同的符号。“第三条道路”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教条的载体，他们准备充分，信念和意识方面又可以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媲美。“第三条道路”经济的原则与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的原则一样严格和明确。所有必要的推论和应用都可以通过自然和合理的方式由上述原则推导出来。

“第三条道路”的经济趋势、“大空间自给自足”的原则，都以应用这种模式的民族国家获得最大体量为前提。李斯特坚持认为，在人口数量、资源和工业不足的国家实施这些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只是一种幻像。在此基础上，他曾提出“关税同盟”、“海关一体化”是当务之急，旨在将德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和金融集团，因为只有这样的空间里，才可以谈得上与英国和法国当时这些发达的殖民大国进行有效竞争。

现阶段，主权国家的标准是美国和门罗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即由美国控制的整个美洲大陆。很明显，今天只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对应者才能同这样一个跨大西洋的“大空间”并驱争先。因此，“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已经在其理论中预设了地缘政治一体化，其中主体不是“国家-民族”，而是帝国的现代类比。否则，要么国家力量过度紧张（苏联解体的原因），要么依赖更强大、更独立的邻国（欧洲、日本等）。这种考虑表明，尽管该理论合乎逻辑自成一体，但能否成功实施却直接取决于更一般的地缘政治计划，即取决于新帝国建立之初。只有在这样的规模和数量上，经济中的“第三种道路”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此外，这种经济模式将是欧洲大陆所有潜在参与者都能接受的最佳理论，因为即使是自由主义作家（例如，《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作者米歇尔·阿尔伯特）也强调了“莱茵-日本”模式（具有

“第三条道路”经济的许多特征）和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特征的根本区别。如果俄罗斯也走这条路，欧亚链将以最自然的方式闭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提出一个新版本的关税同盟，这是一个与当前地缘政治条件相对应的“欧亚海关一体化”项目，仅此一项就可以在今天与大西洋集团进行激烈竞争，并带领欧亚大陆人民走向繁荣。

8.2 经济区域主义

集中制原则是苏联经济的核心。作出所有重要、次要和完全不重要决定的最高权力机构都在莫斯科，那里是法规和指令的发源地。这种集中制造就了经济低迷，无助于区域主动

- 164 -

性的发展，制约了区域经济潜力的自然增长。此外，苏联经济到处都在复制生产组织和金融关系的标准模式，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或区域的当地特征、民族特征或文化特征。这种死板的制度是苏联经济落后和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

取代共产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他们的理论项目实际上仍然保留了旧的状态，只是从现在开始，集中制不再是计划的，而是市场的。但是，和以前一样，主要的经济决策依旧是集中做出的，主要的经济路线都经过莫斯科，自由政府在莫斯科严格控制着该地区的整体改革进程。一种既定（即计划的）方案不切实际所复制出来的形式，到处都被另一种（即市场的）形式所取代，但经济结构中的集中制原则却保持不变。顺便说一句，市场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惯性很大的集中制，当时莫斯科政府官员试图严格控制地区的经济发展。

对这种情况进行清醒的分析，并将俄罗斯的情况与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主要是莱茵-日本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集中制）经济方法，转向一种纯粹基于各区域、各州、各地状况的经济模式。苏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是人为制造的。这种相互联系更多地基于自愿的计划方法，而不是基于最大效率原则，往往阻碍了区域经济的自主发展。提升至绝对化的计划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随着这样一个共同网络的瓦解和自由主义者的上台，许多工业部门普遍自食其力，注定要退化和灭绝，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优先发展资源开采工业上，其产品可立即销往国外。莫斯科自由主义者所垄断的虚假市场结构将所获得的西方商品再次通过集中制方式分配到各地区。因此，区域经济遭受的损失更大，矛盾的是，随着共产党人的离开，区域经济对中央的依赖性只增不减。

“第三条道路经济”计划的实施应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这里的集中制必须主要是战略性的，政治性的，而绝不是经济性的，因为只有当帝国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拥有经济自主权，并以最自由、最自然的方式发展时，才能实现帝国的最大经济效应。就像在欧亚大陆项目的整体背景下，它的每个部分都应该努力在其层面上尽可能做到独立和自给自足，所以在俄罗斯的框架内，应该创造、建立一个极其灵活的区域经济，不去考虑中央的利益或规划的要求，

而是考虑最适合特定区域经济潜力最为自然的发展。当然，经济的战略方面——资源、战略原材料、军工企业应该集中管理，但在其他行业，以及在融资方面，应该给予地区最大程度的自由。

- 165 -

基于特定地区的文化、民族、宗教、地理、气候等条件，不仅要区分经济或产业方向，还要区分经济结构本身。事实上，在帝国的领土上，可能存在从最大市场到几乎共产主义的不同经济秩序的地区。那些拒绝银行系统的人（穆斯林）应该设计他们的金融模型来排除以利息为基础的工业融资，而在其他地区，则相反，银行也可以得到发展和繁荣。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达到每个地区或每个州都能自给自足的水平，首先满足居民最紧迫的需求，比如住房、食品、衣物和健康。同时，要先实现区域自治，提供最需要的东西，然后才能建设项目，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技术，促进工艺和产业发展。每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弹性和灵活的自给自足系统，以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以及在可能发生的任何危机时，无论地区间的关系或中心的经济状况如何，都能为区域内全民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

经济的全球战略方面应该与为全民自给自足而工作的区域结构完全隔离开来。这一人口的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取决于该地区某一战略产业的优先发展。换言之，必须遵守“任何情况下必要保证最低限度生活条件”的原则，该地区只有在控制好维护那些与全局战略产业无关的独立经济结构之后，才能将精力集中于该战略产业上。在这种情况下，为生产在所有方面都具有优势的进口产品而重新配置某一种生产类型、淘汰陈旧或低效产业、迁移或重新定位厂区，做所有这一切，绝不应该影响该地区总体生活水准，并且从一开始就应该在原则上保证做到这一点。

中央的权限将仍然只是战略性生产和计划，并且不是作为经济轴心来实施，而是作为现存自治经济区域网格上的某种全局性上部构造来实施。而这两个领域不应有任何方式的相互影响。住房、社会保障或食品供应决不能依赖于位于该地区的工业或战略企业经济状况（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有必要实现各地区的经济独立，直到最小的地区，决不能由战略生产部门的人员参与解决该地区所有的、哪怕是最紧迫的经济问题。这一原则应该在战略规划事务中占主导地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国家一级，而且即使在最广泛的经济自由条件下也必须如此。

区域主义也应该投射到金融体系中，例如，德国地区银行和土地银行的经验，那里小型金融机构通常仅限于一个或几个村庄，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高效奇迹，因为对贷款的控制在此规模上极为便利（这使得金融服务变得多余），而贷款量、利息和还款期则根据特定的自然社区条件予以确定，并且不代表定量的、不顾实际的机械管理要素，而代表至关重要的道德管理要素。

- 166 -

一般来说，区域金融体系可以具有最原始的形式，适应民族文化和地理景观的逻辑。最

重要的是要避免资本的集中，尽可能分散在自治的区域性金融结构之间，使其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相反，使经济依赖它。

甚至可以引入两种平行且不重叠的金融体系，两种“货币”：一种用于装备战略性的一般帝国领域，另一种用于区域需求。第一种是根据具体的融资和生产原则进行严格的国家规划，另一种是区域市场和区域金融基金。一种是国家资本，另一种是各州的资本。私有财产应该就是各州、区域资本的最小组成部分，而国家资本原则上不应该与私有财产有任何瓜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国家财产、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划清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帝国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灵活性和自给性。

总体而言，经济应以终极的战略上中央集权制加上终极的区域性多元化和“自由主义”为根本原则。

- 167 -

第9章 结论

试图以最笼统的方式勾勒出欧亚大陆的计划，以突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在欧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全球性，以及最具关键性的时机，当然，这需要最详细的发展，本主题的各个要点、各个方面还需要大量工作，通过争辩予以澄清，并加以说明。然而，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要尽量准确地展示有关俄罗斯人民地缘政治未来的唯一模式。在明显走投无路之处，这一模式可以把俄罗斯人民带到一个与其使命，及其民族、精神和宗教主张相对应的全球性文明水平。这个项目中的许多内容可能看起来是面目一新、独树一帜、不同寻常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但触及国家未来所有重大需求，面对可能的批评指责，我们不得不将争辩驳斥搁置一旁，并避免广征博引、罗列数据。所有这些，都将根据轻重缓急一一完成。目前，最重要的是标出“第三条道路”的大致轮廓，这是可以带领我们伟大人民、我们伟大国家走出混沌深渊，攀登到俄罗斯天国光辉顶点的唯一途径。

- 168 -

第五部分 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

第 1 章 主题与方法

1.1 俄罗斯的内部地缘政治取决于其全球功能

要分析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问题的地缘政治，不能不考虑俄罗斯在地缘政治整体地位中更普遍的全球性图景。只有牢记俄罗斯在全球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有效、一致地分析和描述其内部地缘政治结构。与欧洲的“内部地缘政治学派”（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等人）不同，该学派倾向于将地方和区域问题与考虑全球范围内的力量配置隔离开来，就俄罗斯而言，不能忽略其全球意义，因此，所有其特定的内部问题只有在一个更普遍、更完整的地缘政治领域的框架内才能得到充分阐述（更不用说其解决方案了）。

俄罗斯不仅仅是大陆国家之一。它属于所有地缘政治学基本原理的范畴。俄罗斯是中心地带，是“历史地理枢纽”，是陆地。俄罗斯是欧亚大陆。它的这种意义不取决于集团、意识形态、政治取向和政权的具体情况：大陆性是其历史、地理及地缘政治的命运。就俄罗斯而言，不能提出“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之间的选择问题。它是一股欧亚力量，也不能不是一股欧亚力量。只有在地理上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俄罗斯才有可能拒绝履行其在地球整体中的角色，因为如果俄罗斯国家拒绝在维护欧亚大陆块的同时履行这一使命，那么在同样的边界上迟早会出现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它将承担“历史地理枢纽”的功能。只要俄罗斯存在，它就仍然是欧亚大陆在全球范围内的轴心。

这个特性决定了考虑其内部地缘政治问题的角度。这些问题仅存在于以下方面：如何以及基于什么自然（或人为的）先决条件下来保持俄罗斯的最大地缘政治规模，尽可能增加此规模，以最好地确保俄罗斯全球地缘政治扩张的可能性来分配所有内部地缘政治因素？

这样的问题表述本身就为分析奠定了条件，有必要强调和优先考虑研究：

- 1) 各区域出现向心趋势的可能性；
- 2) 将中心的空间影响力扩展到外围及更远地区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明确区分地缘政治中心和地缘政治边缘概念的两个基本标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的精髓所在。

- 169 -

1.2 国内地缘政治和军事学说

军工企业在俄罗斯空间的地缘政治组织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为在许多（尤其是人口稀

少的)领土上,平民定居点与军营和军事基地联系在一起。这也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位置有关,也与所谓“国防工业”的需求有关。俄罗斯的整个地缘政治格局取决于军事学说模式。

反过来,这种军事学说有两个组成部分。领导层的政治取向(可能会根据内部和外部政治因素而改变)和地缘政治常数,这些常数建立了可能改变政治进程的框架。第二个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立场)明确肯定了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大陆的重要性,即俄罗斯的主要“潜在对手”正是大西洋集团。这就自然而然导致了整个军事学说的大陆导向,无条件优先使用战略武器,并且专注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冲突。此外,该政权的政治设计将是什么并不重要。意识形态对抗完全没有必要重复地缘政治对抗。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并可能会影响政治路线的表述,或者软化,或者相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持续存在的地缘政治对抗。地缘政治并没有预设军事学说的最终公式,而是设定了军事学说的框架,一旦违反这一框架,就会立即引发全面的社会政治危机和国家领土崩溃。

即使在意识形态方面完全理解大西洋主义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军事学说仍然应该将美国和西方阵营定义为第一号潜在敌人,并仅在此原则基础上构建武装部队的整个结构。而这反过来又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的整体结构。

俄罗斯的军事学说必须绝对是欧亚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从这样的角度负责地分析俄罗斯的内部地缘政治,并勾勒出优先发展的载体。没有这一点,任何分析都只能预测俄罗斯地区的灾难性退化、领土解体、破坏性的连锁反应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自我清算。从理论上讲,不能排除这种事态的发展,而俄罗斯联邦的现代“军事学说”并未将美国和北约集团列为“潜在对手”,而是将其列为俄罗斯和欧亚集团地缘政治方面的潜在盟友,对此还给出了许多理由。然而,从更一般的历史和地理角度来看,这种事态应该被视为一种“短期异常”,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会很快消除,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时期的多余部分。我们可以用“灾难的地缘政治”来描述这一情景,这将突出“历史地理枢纽”崩溃的各个阶段。但大西洋阵营应该对这样的立场更感兴趣,因此如果海权大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这些模型是很自然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不能不属于欧亚大陆,因此应该以积极的前景为导向,以大陆二元论与文明二元论发展的正常历史规律与正常地缘政治规律来分析当前和未来形势。在

- 170 -

这种情况下,应该承认(即使目前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的“军事学说”符合总体的大陆逻辑,而且这一学说的确是基于严格的地缘政治常数而建立。

在随后的展开过程中应牢记这一情况。

1.3 中心和外围

心脏地带的历史中心并不是一个永久的地理区域。俄罗斯现在的首都莫斯科同时继承了斯拉夫首都(基辅、弗拉基米尔)的路线和成吉思汗草原总部的路线。作为森林和草原的

地缘政治综合体，俄罗斯同时拥有两种历史和地缘政治传统，它们整体构成了俄罗斯道路的独创性。

圣彼得堡时期也与领土扩张有关，尽管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位置体现了国家的欧洲取向，即“地缘政治西方主义”。在圣彼得堡时期，俄国人的领土扩张和以前相比，有机性更少，人为性却更多。尽管亚洲和西伯利亚的许多欧亚民族根据古老大陆传统，接受了“白王”的权力，但这种综合的性质并不那么明显。

莫斯科在地理上最适应俄罗斯的欧亚使命。莫斯科与构成俄罗斯原始地貌的所有主要地域的距离都相等。它到极地之北、东欧之西、草原和亚热带之南、针叶林之东的距离大致相同。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应该被视为“正常的”欧亚首都、大陆中心。在这方面，目前的事态总体上与地缘政治常数相吻合。莫斯科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自然首都。

然而，粗略分析一下当时的俄罗斯地图，立刻就会发现这个位置有些不对称。事实是，在乌拉尔山脉之外（然而，乌拉尔山脉并不是俄罗斯的天然内部边界，因为山脉低矮，山脊两侧气候大致相仿），一个相当均匀的针叶林带向内陆延伸数千公里，一直抵达西伯利亚深处，从而使莫斯科成为唯一的“欧洲俄罗斯”的中心。然而，这种纯粹的定量观点被其他地缘政治考虑所平衡。

首先，西伯利亚并不代表直到乌拉尔的俄罗斯特有气候和地形起伏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巨大空间只是东部地貌不成比例的延伸，地貌的规模远远超过俄罗斯本土的区域图景。于是，就地貌而言，巨大空间感被局限于仅和气候相关的有限性质。

其次，在人口方面也完全一样不成比例。乌拉尔山脉以东居住着与欧洲俄罗斯每个地貌区域同样数量的人口，这些地貌区域都具有明显的自然特征。

第三，西伯利亚区域在通讯、城市、联络等方面的发展。也无法与它的区域相比。

- 171 -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作用不能与其面积大小成正比。这是一个特殊的“储备空间”，是欧亚大陆最后一个“未开发”的部分。

因此，考虑到西伯利亚的特殊品质，莫斯科确实被认定为“历史地理枢纽”的地缘政治中心。注意：正是西伯利亚（尤其是东西伯利亚）未被开发的性质迫使麦金德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加入了“勒拿之地”（“Lenaland”），即位于勒拿河以东的空间，成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实体，严格来说，西伯利亚不属于中心地带。

但斯宾格勒（Spengler）已经注意到西伯利亚是一个地理空间的那一刻，它的作用可以逐渐变得清晰，并在历史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预见到西伯利亚可以发展出一种独特文化，从而终结“西方的衰落”及其“浮士德”式的文明。同样的想法也得到了俄罗斯“亚洲人”的支持，他们是欧亚人的一个极端分支，他们认为东方（亚洲）不仅比西方重要，而且比欧亚大陆本身更重要（尤其是伊万诺夫（V. Ivanov）和一些“太平洋主义者”，帕齐菲克、豪斯霍弗学派的库尔特·冯·贝克曼（Kurt von Beckmann）等）。因此，从长远来看，西伯利亚

的人口和信息发展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以及与其他俄罗斯（或欧洲）地区保持平衡，可以假设莫斯科的地理位置将失去其中心地位，并且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中心将向东转移。

但目前它只能被视为未来学的观点。（在关于俄罗斯东部的章节中有更多阐述）。

从中心（莫斯科）可以将光线绘制到俄罗斯周边土地的各个区域。这些射线不是线段，因为它们长度不是固定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会影响具有可变值的区域，具体取决于许多历史因素。此外，与地缘政治中心（莫斯科）的物理距离并不总是对应于“地缘政治距离”。这些距离不仅取决于数量，还取决于联系的质量，取决于区域实体的独立性、及其形式、文化和种族特性。

可以将所有这些向中心会聚的光线减少为四个主要类别或“内轴”：

- 1) 莫斯科 - 东部
- 2) 莫斯科 - 西部
- 3) 莫斯科 - 北部
- 4) 莫斯科 - 南部

另一方面，相应的外围空间是“区域”或“地带”，每一个都具有特定性质和特殊结构。这些地带可以分别称为“俄罗斯东部”、“俄罗斯西部”、“俄罗斯北部”和“俄罗斯南部”。

- 172 -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之定义，不是指种族，而是指地缘政治的意义，强调该地区与中央“大陆轴心”莫斯科的联系。

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主题的主要内容将是阐明这四个“外围地带”的地缘政治结构以及连接它们与中心的“射线”的性能和本质。区域结构将在以下章节中更详细地讨论。现在可以用最一般的术语来考虑射线的性质。

1.4 内部轴线（“地缘政治辐射线”）

四个地缘政治轴线将莫斯科与“俄罗斯空间”的外围连接起来。这些辐射线具有不同的特征。

这些辐射线可以分为两对，一对是莫斯科向西和莫斯科向南，另一对是莫斯科向东和莫斯科向北。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前两束辐射线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它们依赖于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体系，该体系具有相当大的领土范围，将俄罗斯的大陆块与理想的海岸线边界分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边界是将俄罗斯中部与海岸线分开的宽阔地带。在这方面，这两条辐射线代表了俄罗斯最脆弱的方向，沿着这些轴线的整个地缘政治动态极其紧张、复杂，具有许多层次和维度。

莫斯科西部和莫斯科南部的轴线结合了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因为在这里俄罗斯-欧亚

大陆地区顺利进入其他国家控制的区域，其中一些国家属于对立的全球集团，即属于海权阵营。

第二对两束辐射线：莫斯科北部和莫斯科东部的辐轴线与第一对截然不同。在这里，俄罗斯的边界与海岸线重合，没有“缓冲国”，因此这些地区的政治动态仅限于国内政治话题。在北部和东部，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地缘政治边界。而这种情况下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现状。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北部和东部具有海洋边界，是“历史地理枢纽”的后备区和受到完善保护的区域，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为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组创造额外的空间平台。

“西”和“南”轴心与“北”和“东”轴心之间的差异不是历史偶然的结果。地理地貌本身，以及后来各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地图，都是一个矩阵，随着政治历史的发展，矩阵中就会填满国家的特定内容。在俄罗斯西部和南部外缘以及邻国相邻领土上，发达盛开的文化、国家和民族已经发展起来，拥有自己的政治和精神传统、国家地位等。这是从一侧进入边缘

- 173 -

地带的区域。在这里积极发展了“分离主义”客观的和人为的先决条件，而这反过来又在全球范围内认同了海权战略。

相反，俄罗斯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地貌极为同质，没有发达的政治和国家传统或长期失去建立帝国的历史主动权（例如，阿尔泰土耳其人、布里亚特人等）。在这里，莫斯科可以自由出海，但海路品质适中。它们几乎不通航，寒冷，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冰覆盖，由于通道不畅而与中部地区隔绝，港口不发达。某些战略优势被相应的战略劣势所抵消。

两对辐射线在地缘政治上完全是对称的。俄罗斯北部和东部海岸海岸线漫长，再加上人口稀少、交通不发达。西部和南部边界则以陆地为基础，而且人口稠密，地貌多样，面积广大。

因此，俄罗斯中心与外围的地缘政治关系分为两种类型，即具有纯内轴线、而（北面、东面）为连续海岸边界的类型，和具有半内轴线、而（西面、南面）为“条带”（“带状区域”）性质陆地边界的类型。“西面和南面”充满活力有利于融入国际关系、外交等领域。“东面和北面”活力受到内部政治问题制约。然而，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一景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目前一个“独立”国家所在的地方，地缘政治家看到的是一个“未来的省份”，反之亦然，一个国家领土的沿海部分在某个时候可能成为另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即新的“主权”国家）的沿海立足点。

由中心向外围的辐射线，“大陆扩张的冲动”，会不断遭遇来自抵抗势力的压力。大西洋集团靠着那些已经受到海权严格控制的沿海地区，试图限制莫斯科向外的能量，利用边远民族或邻国的“分离主义”倾向。在南部和西部，这种对立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是非常明显。在北部和东部，反对势力不是那么明显可见。尽管如此，反对势力仍然以大西洋主义者战略军事实力（尤其是核潜艇）的形式存在于沿海地区，在某些关键时期，这一势力可以表现为对俄罗斯国内事务的直接政治干预，支持（或挑衅）在种族和文化方面主张分裂的少数民

族。

- 174 -

第2章 向北之路

2.1 分析的模型

莫斯科向北部的地缘政治辐射线，大致来说，是从一个中心发出、沿北冰洋漫长的海岸线发散，分解成整个光谱。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复杂的模型，其中出现三个问题：

- 1) 北方各个扇区之间的比例；
- 2) 它们与中心（莫斯科）的关系；
- 3) 与俄罗斯空间（南部、东部、西部）其他区域的关系。

将地缘政治问题同时分为若干部门、若干问题来分析。同时，主要任务是不要忽视“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的整体复杂性和更广泛的全球背景，如果可能的话，要考虑到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细节。

中央对北方的地缘政治要务是尽可能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控制。鉴于北极圈内人烟稀少，居住在那里的民族缺乏发达的政治和国家传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在这里退居幕后。最重要的方面是对海岸的军事控制（军事、空军和海军基地）、信息通信、能源供应以及食品和住房供应。

2.2 俄罗斯北极的地缘政治特征

北部领土的气候特征表明其定居点是一个点，而不是“条带”。因此，这些定居点中心的作用正在增长，其价值最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其他领域所谓的“领土”。定居点的这种“中心”和“领土”身份在北方最为明显，因为其他中间地带不仅不适合居住，而且冻土层、寒冷、缺乏村庄、缺乏道路等，都会是致命的危险。

因此，在地缘政治上，北方是一个位于北极地区的点系统，是一个分散在（气候和地形）相当均匀空间上的离散定居点。绝大多数北方土地是冻土层，即北部沙漠，植被稀疏（只有地衣）。这是永久冻土带。

北方空间的性质与“水元素”有些接近。在其中，领土之间的边界实际上没有重要意义，因为控制一块或另一块土地不会带来任何特殊优势。考虑到人烟稀少的地区，驯鹿放牧民族之间“争夺游牧营地”的问题自动被排除。

- 175 -

北方人口是各种古老的欧亚民族，他们在这些地区生活了数千年，没有任何特定的文化、

迁徙或种族动态。有趣的是，分裂也发生在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北部，沿着种族界限进行：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丹麦，一直到英格兰、爱尔兰和冰岛，居住着“发达的”印欧血统民族（年轻族群）；从芬兰和卡累利阿一直到楚科奇，俄罗斯北部居住着比欧洲北部人口更古老和古老的民族（乌戈尔人、古老的土耳其人和楚科奇、爱斯基摩等的古亚洲人）。此外，随着沿北冰洋沿岸向东移动，民族的古老性增加。较年轻的印欧人（或土耳其人）在欧亚大陆最有人居住的地区动态地移动，将原住民“转移”到北方。

从西到东：在卡累利阿人和芬兰人（他们仍然积极参与现代历史，尽管是次要角色）之后，更古老的涅涅茨人和科米人，然后是汉特人和曼西人，多尔甘人，鄂温克人，然后是楚科奇人和爱斯基摩人。东西伯利亚的一大片区域被雅库特（萨哈）占领，但雅库特人（土耳其人的一个分支）居住在北极圈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而该地区的北部几乎无人居住。

从乌戈尔人到爱斯基摩人，俄罗斯北方的空间向我们展示了文明的历史时间片段。

“俄罗斯北方”的概念是一个梯形，重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轮廓。它向西变窄，向东变宽。在俄罗斯和芬兰的边界上，这片领土沿子午线覆盖了大约 10 度，而楚科奇和堪察加已经覆盖了 20 度。但这种空间扩张对领土的地缘政治特征影响不大；就人口特征而言，就发展程度而言，就通信质量和定居频率而言，这个地理上向东扩展的梯形呈现了一个镜像，因为“狭窄”的西侧北部地区的开发和人口多于对面的东翼。

如果说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保护区”，那么北方，尤其是西伯利亚北部，就是西伯利亚本身的“保护区”，是欧亚大陆最远离文明的地区。这是一块冰冷的未开发土地，在地图上正式描述过，但不代表任何历史标志，没有任何全球文化维度（至少在可预见的过去、可研究的历史范围内）。这种情况与“北方”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在那里，他被赋予了“大祖宗”、“应许之地”、“远古世外桃源”的品质。在当前的历史时刻，它却是一种相反的东西：冷酷、不友好、对人有敌意、超然的空间与偶然点缀着文明的人为中心。

2.3 北+北

在行政上，北部大部分土地是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区，只有卡累利阿、科米和雅库特除外，它们的政治地位比较独立（属于共和国）。在政治上，这些地区的位置如下（从西到东）：卡累利阿，摩尔曼斯克州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米共和国和涅涅茨自治区、亚马洛-涅涅茨自治区、泰米尔（多尔加诺-涅涅茨自治区）、雅库特北部地区、楚科奇自治区、马加丹地区、科里亚克自治区和堪察加。

所有这些领土在地缘政治性质上的相似性，使得它们有充分理由在某种一体化结构基

础上形成一定的领土战略集团。所有这些领域都面临着类型相似的问题；它们的发展轨迹相同。这种自然的相似性，即使在最粗略的地缘政治分析中也十分突出，表明需要进行一定的整合。这种“北极土地”条约的整合，可以包括从精神文化到实践、到经济几个层面。

您可以初步勾勒出此类集团的大致方向。

它的文化基础可以是纯粹的欧亚理论，将传统文明重新想象成一种社会结构的积极模式，并保留珍藏浩若繁星的记忆。这意味着北方民族的古代风气（欠发达、落后、原始等）非但不是缺点，还是精神上的优点。古老民族不仅不需要“再教育”，不需要融入“现代文明”，相反，需要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尽可能接近他们的悠久传统。此外，应该让国家部分承担责任，维护这些传统，并试图确保国家在战略上控制这些土地。

同时，应该采纳北方是人类最古老家园“神话”传说，“北方精神复兴”计划 值得称道，必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同时，重点应放在北极年的季节性特征，即极昼和极夜，这被印度教徒和古代波斯人视为“众神之日”。生活在北极条件下（包括生活在整个欧亚北部），人类都回到特殊宇宙韵律下。因此，这就是北极地区的精神意义和治疗意义。

在物质层面，特别是与南方移民，主要是与俄罗斯人，相关的生存条件方面，北部所有中心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考虑各处气候的不同特征，开发出城市和村庄的最佳模型。在这方面，需要利用非传统能源（太阳能、风力发电厂等）的最新技术，构建永久冻土、通信和运输系统方面的专门技能，发展区域间航空运动等。最初，应该有一个总体北极发展计划，制定一个单一且最有效的方案，使定居者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使它们的生活更具活力，相互之间保持更多联系。

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合乎逻辑的做法是留给北极地区自身来确定解决方案，但是由中央为整个项目提供国家支持。研究确定“北极方案”，是北方人自己的事。

由于北方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后备的储备地”，因此该地区应为南方人口可能大量迁移做好准备。这涉及到北方新定居点问题的另一方面。鉴于人口的变化过程，这迟早将变得

- 177 -

有必要，最好现在就开始为此创建结构性的先决条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方面。北方是俄罗斯巨大的战略军事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安全区。许多导弹基地和战略航空基地都集中在这里；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是俄罗斯最大的海军基地。这种局面并非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抗的随意性造成的。无论如何，北方在军事意义上的战略重要性对俄罗斯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观察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利益。由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结构的大陆性质，以及自然地意识到身为反对“海洋大国”的大陆阵营，在俄罗斯北部的军事存在意义重大。这些军事设施的主要意义是保护沿海地区免受可能遭受的海上、空中入侵，并确保在必要时通过北极对美洲大陆进行核打击。这是俄罗斯到美国的最短距离。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片领土是发展导弹防御的优先区域。

目前，北方提供了俄罗斯总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占有重大比重。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它在军

工联合体中的核心重要性。特别是许多矿物质，盐、镍等，主要都在北极地区开采。但是在北方，产业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滞后相比，存在巨大反差。地缘政治的逻辑要求积极调整这样的局势。此外，在北极公约的框架内这样做是最方便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指定北方的首府（或几个首府），以聚集智力与技术潜力，并且将主要的经济、金融和工程杠杆集中到在那里。这将使北方从中央获得相当大的独立性，在细枝末节上不受控制，为区域的灵活发展和工业与经济的快速反应做好准备。

显而易见，在所有这些层面上，有必要实现北方一体化。这在精神、种族、文化、军事战略、工业、社会和金融方面都很重要。这种多层次整合的结果（目前仅存在这种可能性）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其中自治和区域独立性的显着增加，但并不会削弱与中央的战略联系。从长远来看，发展北方将成为通往未来的道路，这是（在地缘政治基础上）全新理解“空间”一个跳板。

地球北部将再次从贫瘠的荒漠变为极地天堂，这将增强大陆在全球的比重，并在传统与发展相结合、忠于根基、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上，打造“未来欧亚”的社会典范。

2.4 北方+中央

北方地缘政治的第一种分析方法（北方+北方）是基于将此“极地梯形”排除在外，将其视为单个连接区域、独立空间图形。这样的北方愿景更有可能制定出最为灵活的发展模式，

- 178 -

因为最稳定的地缘政治结构是由（在有限意义上）自立的、自给自足的自治单元所组成的结构。但即使是这样的相对自给自足也需要一定的领土规模。俄罗斯北方的“梯形”具备了形成俄罗斯内部独立“大空间”的一切必要条件。此外，这种一体化自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家不可避免的战略集中制所带来的不足。

第二种地缘政治方法是分析沿中央-北方轴线运作的系统。这个轴线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北部地区行政组织中唯一的主要轴线。北部的不同地区与不同中心直接隶属于莫斯科，莫斯科控制了这些地区发展的所有主要方向。这种毫不含糊的集中制无法最为有效地开发北方的内部地缘政治潜力，并且故意使地区仅着眼于整个国家的规模，而从事片面的专业化发展。这样做确实有可能维持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但却显著减缓了开放内部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逻辑表明，中央与外围（在此特殊情况下指的是北方的莫斯科）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应该分为两部分：

- 1) 在宏观政治和战略隶属方面实行严格的集中制；
- 2) 由于最大的文化和经济自主权，最大程度地解放内部能动性。

换言之：战略集中主义+文化经济区域主义。

为了制定这种地缘政治角色分配的最有效模式，“北方首府”的问题再次出现，这一首

府可以作为中央与各地区之间的中级管理机构。来自基地、军事单位、港口等的所有军事通信都将汇聚到这一点。此外，“北方政府”可以设在这里，这是“极地梯形”各部分政治协调的灵活实例，直接隶属于莫斯科，但代表整个北方发言。这可以是“北方人民议会”和相应的行政机构。此外，最重要的是实现军事领导与地区代表的和谐结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战略控制的中央集权性质与北方土地的地区意志表达结合起来。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首府，莫斯科的军事代表与“北方人民”的文职代表，虽上下有别，但通力合作，可能成为最有效、最灵活，又与整个欧亚空间的中央组织紧密相连的理想模式。同时，在这样的融合过程中，北方人民之间民族不和与文化摩擦微乎其微，这是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造成聚落分散、混杂，且部族稀少。

应该在北方进行检验这种基于纯粹地缘政治前提的空间重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此项目的一切条件都是显而易见的：北方所有地区都属于俄罗斯、领土和人口紧张、迫切需要重组工业和经济体系，其中一些已经脱离了国家“劳动力分配”总体体系、人口危机、北方

- 179 -

人民情况危急、能源供应系统失控、通信崩溃、必须改革武装部队等。

莫斯科关于北方的态度直接取决于北方地区总体上整体一体化的程度，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俄罗斯有一个沿着纬度平行延展的地理结构。其发展的主要趋势恰好是沿着纬度而动态变化。俄罗斯国家建立在沿纬度空间的整合之上。出于这个原因，俄罗斯境内的主要通信和联络系统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开发的。纬度过程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开发西伯利亚和“奔向海洋”的过程中。因此，俄罗斯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直接取决于纬度一体化的完整性和动态性。如果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就其大陆战略价值而言，必须沿着南北轴线发展。这主要适用于超越其边界的扩张，因为任何沿垂直方向的地缘政治空间组织都在战略上提供了最大程度的自给自足。但在俄罗斯内部，如此彻底的自给自足是完全不合适的。相反，这里应该坚持最终的战略上的中央集权制，坚持各区域空间与中央的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制定以下地缘政治规律：在俄罗斯境内，以东西一体化轴线为优先；在俄罗斯境外，以南北轴为优先。（更细致的是，该规律制定如下：由俄罗斯在种族和政治上严格控制；俄罗斯的空间需要在宽度上整合；而在俄罗斯国内土地上，聚居着历史上固定的政治分离主义传统的其他民族，则需要沿经线的整合。）沿经线的活力使政治实体的性质和其东西两侧邻近区域的都不同。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但对这个国家的个别部门来说则是多余的。相反，沿纬度平行线的活力将加强中央与边远地区的联系；这对国家的内部政治组织很有用，但会导致各州之间层面的冲突和失衡。

根据这一模式，应该坚持要求北部地区沿纬线整合，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气候和地形区域，而不是应该坚持将纯粹的地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同一种族）临近处进行整合，只是感到这块地方属于（南部、东部或西部）其他区域。北部沿纬线整合将有助于其文化和经济发展，但将阻碍为潜在的政治和战略主权创造先决条件。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最积极地

解决中央和边远地区的问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关键。

2.5 芬兰问题

与俄罗斯北部有关的唯一国际问题是卡累利阿(和芬兰)问题。卡累利阿民族接近芬兰，并通过文化和历史统一与芬兰联系在一起。基于沿纬度整合的逻辑，卡累利阿问题乍一看似乎是一个反常现象。有两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个是根据地缘政治原则将卡累利阿-芬兰边界绝对化，让卡累利阿共和国沿着南北轴线与拉多加奥涅加湖周围的原始俄罗斯地区整合。这种发展方式是不自然的，只有在最坏的情况下才应采用，因为沿纯粹政治边界的行政区划界线会人为破坏民族团结，永远不会给

- 180 -

一个地区带来地缘政治上的稳定。卡累利阿-芬兰边境是一片容易通过的森林和沼泽地，而且长度很长，这使问题更加严重；要可靠地保护这种边界极其困难、繁琐，而且费用高昂。

第二种方法涉及创建一个卡累利阿-芬兰地缘政治区，在文化上，以及部分而言在经济上求得统一，但代表欧亚中心的战略支柱。在欧洲语言中，在冷战时期出现过“芬兰化”一词。它被理解为一个名义上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中立国家，但在战略上倾向于苏联，即到中心地带。芬兰作为一个国家极其不稳定，且远非自给自足，从自然和历史上看，它正进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这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有所体现。欧亚中心可以接受卡累利阿-芬兰联盟的广泛自治权，唯一条件是对波的尼亚湾进行战略控制，并在芬兰-瑞典和芬兰-挪威边境部署欧亚边防部队。鉴于芬兰-瑞典和芬兰-挪威的边界在地形上的统一性远低于卡累利阿-芬兰的边界，因此边界的长度将减半。此外，俄罗斯将有机会从北方控制波罗的海。

第二种方法在所有方面都更可取，大陆中心应该在该州边界的所有种族和文化混合区使用这种策略。分裂的民族团结自动意味着边界地区的不稳定，边界线的不稳定。大西洋主义的手对手迟早会试图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的目的进行种族融合，即加强对边缘地带的控制，削弱心脏地带。因此，大陆军队应该积极主动地使用类似的战术，不要害怕将文化甚至经济主权拱手让给边疆人民，以换取战略存在和政治忠诚。

无法直接通过军事扩张或政治扩张来实现稳定边界时，应该选择使用这种中间程度的灵活性。海权统治不断成功使用这种选择来反对欧亚大陆。

2.6 北方和非北方

俄罗斯欧亚大陆北极海岸的地理特征将北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相关性问题简化为更简单的南北公式，因为纬度问题（即与西部）仅出现在卡累利阿的案例中。唯一的例外是雅库特问题，它在这里与众不同，因为虽然雅库特问题有极强的人为性质，但仍然在历史上具有

强烈的政治分离主义传统。这一方面也体现在麦金德后来对欧亚大陆的分类中，他单挑出“勒纳兰”，“勒拿河的土地”，雅库特（萨哈），作为构成下面这一整个地区的轴心，这个地区从拉普捷夫海一直延伸到阿穆尔地区和南部的阿尔泰。但应单独考虑雅库特的情况。

让我们从“北部梯形”的西部开始。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和卡累利阿共和国在这里脱颖而出。与芬兰一起，这一切最有效地整合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地理与地缘政治扇形，

- 181 -

其中摩尔曼斯克地区和摩尔曼斯克本身将具有战略优先权和军事决策中心的特质，而卡累利阿-芬兰空间将被赋予广泛的文化与经济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摩尔曼斯克地区可以扩大，而牺牲芬兰北部地区和芬兰拉普兰地区。摩尔曼斯克（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和卡累利阿-芬兰空间之间的平衡将是欧亚大陆发展的具体表现，是冷战结束后所产生条件下“新芬兰化”的实例。

我们将在专门讨论俄罗斯西部的章节中进一步考虑向该集团南部移动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这种情况下的基本战略轴心将是摩尔曼斯克-莫斯科轴心。

下一个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在这里，我们应该打破一般规则，指出不仅沿北纬整合，而且沿经线整合的重要性。事实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正好位于俄罗斯中欧部分的上方，因此，从白海到黑海这一垂直扇区作为俄罗斯整个可能拥有主权的想法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个地域本身就是俄罗斯的。因此，阿尔汉格尔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处于战略性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一地位符合维护中央利益的北方战略一体化原则。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轴心是国内整个“地缘政治射线”中唯一一个不仅具有军事战略性质的结构。在这里，有必要实现与南方（直至莫斯科）的最大程度和多样化的整合，以尝试从沃洛格达州（相对而言）人口稠密地区平稳过渡到波莫里定居点。俄罗斯人向北方的迁移，他们积极掌控、开发和转型应该正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始。这个最大的港口与北方所有其他定居点相比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此选择阿尔汉格尔斯克作为“北极公约的首府”是最合乎逻辑的。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轴心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和优先的。整个“北极公约”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取决于这个（来自整个北方）的单一经向整合的质量和动态。

在东部，北方地区包括两个行政实体，涅涅茨自治区和科米共和国。这些空间相互整合没有任何禁忌，尤其是考虑到涅涅茨自治区人口稀少。靠近阿尔汉格尔斯克，可以在一个共同项目的框架内对该地区进行最积极和最优先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新地岛和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的开发。在洲际对抗的背景下，这些北极土地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这些是距离北极最近的俄罗斯领土，因此也距离美国最近，被用作军事战略基地。与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的情况一样，最北端的地区以军队为主，而更南端的民政管理更为发达。整个区域以沃尔库塔为中心，主要的通讯和通讯线路汇聚于此。

沃尔库塔是一个大型工业和战略中心，距离亚马洛-涅涅茨州不远，没有类似规模的中心。因此，沃尔库塔也可以控制喀拉海沿岸的巨大领土。直至叶尼塞河和鄂毕河盆地。在这

一地区，亚马洛-涅涅茨州在地理上靠近汉特-曼西斯克州，两者都属于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扇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科米共和国的“北方梯形”南部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乌拉尔北部地区与乌拉尔其他地区（以及伏尔加北部地区）的整合过程不仅不合适，而且坦率地说是有害的，因为鞑靼斯坦位于西南部（科米-佩尔米亚克区之外），那里分裂倾向由来已久。鞑靼斯坦地处俄罗斯国土的中部，并不构成任何特别的危险，但在所有类似情况下，“分离主义逻辑”迫使人们寻找出海或进入外国领土的出路，在此进行的任何纵向整合过程迟早会变得极其危险。这里有必要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情况不同），并试图从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剥离整个北乌拉尔地区及其东西两侧的邻近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梯形”必须与位于南边的整个大陆空间严格分开。

还有东线的叶尼塞盆地的土地，在行政上属于泰米尔和鄂温克自治区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北部，即前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在这个地区，诺里尔斯克脱颖而出，可以定义为整个巨大地区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沿南北轴线的经向整合动力，因为从鄂木斯克到贝加尔湖的西伯利亚南部人口稠密，沿该方向的整合不会造成任何特别的危险。这个地区位于中部领土上，该地区或多或少均匀定居区域的结束，是麦金德的“勒纳兰”（“Lenaland”），即“无人区”的开始。这个区域和东部越来越多地域是浩瀚的大陆沙漠，北部是杳无人迹的苔原，南部则是密不透风的针叶林。这就是“潜在空间”。从南方看，它被俄罗斯和古代突厥-蒙古民族部分掌控，政治文化相对发达。但在北方本身，它代表着“无人区”。这种局面不能一蹴而就，因此，以诺里尔斯克市为中心的巨大空间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俄罗斯大陆东北部的“内部边界”，是中部在北方的战略前哨。这在逻辑上导致需要专门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的诺里尔斯克。控制北部泰米尔（和北地群岛）和南部叶尼塞盆地的功能落在这一任务上。此外还有一个稍窄的区域，即中央对欧亚大陆“远东北部”，对勒纳兰的更精确、更集中的控制。

麦金德的“勒纳兰”包括雅库特、楚科奇、堪察加、马加丹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地区、阿穆尔地区和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整个空间分为两个地缘政治区域，一方面是“北方梯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南雅库特、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南半部。这两个空间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南部，尤其是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沿岸，人口相对密集，政治传统古老，是相当活跃的欧亚民族聚集地。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同时从气候的角度来看，这个南部地区是南西伯利亚的延续。

完全相反的是莱纳兰的北部。这是欧亚大陆最不发达、最为“狂野”的部分，那是一个巨型大陆层，基础设施简陋，处处人迹罕至。整个地区唯一的主要中心是马加丹，但它是一个与广阔的科雷马和北雅库特大陆几乎没有联系的港口。楚科奇的阿纳德尔也不是完全意

义上的中心，也不与大陆相连。该部门是一个独立的大陆，受到海洋边界的出色保护，拥有丰富矿产，但同时欠发达，甚至完全未开发，处于潜在状态。西伯利亚的这一部分是被历史遗忘的地域，而斯宾格勒关于“即将到来的西伯利亚文明”的未来学预言，倒是和这里更为贴切。“旧世界”这片独特区域，在文明史上默默无闻，也还没有以任何方式显示出它的地缘政治功能。

这个地区的这种不发达状况是在所谓“文明汇流理论”*基础上得到解释的，这一理论认为，当一个地区的主要河道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互交叉（汇流）时，该地区的文化就会发展得更快。西伯利亚（尤其是东西伯利亚）是确认这一原则的经典案例，因为在该地区，所有大河都流向同一方向而没有相交。然而，发育迟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负面特征。历史滞后（基于对其他领土和国家历史的理性理解）有助于积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成为空前起飞的关键。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看，勒纳兰的北半部被视为单一的地缘政治综合体。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未来的地缘政治实体能够围绕哪个中心发展？它将遵循什么方向？麦金德对是否能将勒纳兰归类为“历史地理枢纽”的一部分表示怀疑，这一事实表明，可能需要寻求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这足以让大陆战略特别关注这个扇区。

很明显，最大的任务是将这一地区纳入“北极公约”，由中央（莫斯科）控制，并与北部地带的其他次级中心建立联系。但是这里有两个障碍：

1 该地区的中心缺乏可以建立集成系统的一些主要战略点；

2 雅库特（萨哈共和国）在该地区的轴心位置，这相当复杂，因为雅库特人存在“分离主义”，尽管这仅仅是名义上的，但毕竟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北极梯形”的北半部与南部之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变得具有戏剧性，这是由于雅库特战略位置特殊，它拥有所有先决条件，使之能成为自主于莫斯科的一个独立地区。之所以能确保达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共和国领土的经向结构以及技术上与其他西伯利亚地区隔离。在一定情况下，雅库特可以成为大西洋主义战略的主要基

* “汇流”根据文意译自 *потамическая / potamic*（源自希腊文 *Ποτάμια* 河流）-- 译者。

地，海权国家将以此为起点重组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并试图将其变成典型的、由“海洋强国”控制的边缘地带。大西洋主义者对太平洋地区的关注日益增加，麦金德高调地将勒拿兰划入一个特殊类别，然后在大西洋主义者斯皮克曼和柯克的地图中将这片领土纳入边缘地带。这一切表明，该地区与中央联系松散，反大陆势力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试图将其从欧亚大陆控制下夺走。

对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1) 严格限制雅库特的法律和政治主权。

2) 将雅库特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区域, 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拉普捷夫海沿岸和东西伯利亚海沿岸区域与勒拿河大陆盆地在行政上分开。重要的是要将雅库特边界与太平洋沿岸尽量分开, 并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战略控制。

3) 由莫斯科代表对整个这片领土建立特别严格的控制。

4) 将雅库特的工业和金融整合到非雅库特地区, 尽可能使该地区依赖于中央, 或者依赖于它对西伯利亚北部与南部的表现。

这些步骤的前提是重组这片领土, 创造全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全新的中心和全新的径向联系。换句话说, 不用等待按照大西洋主义的愿景重组勒纳兰, 只要这个地区仍然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我们就应该立即着手按照欧亚模式建设大陆性的勒纳兰。

南北关系问题对这一地域有特殊的解决方案; 这里不仅要限制沿这一轴线接触, 而且要重组整个北方空间, 将雅库特人的北极地区和沿海地区与其大陆空间分开。这不仅是一场预防性的地缘政治行动, 而且是一场地缘政治攻击, 一场针对勒纳兰、针对西伯利亚未来、针对其大陆和欧亚命运的阵地战。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可能具有国内政治意义。决不能让它获得国际意义并成为一项外交政策。

2.7 总结

作为俄罗斯一部分的欧亚大陆北部地带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 其重要性将随着全球动态的发展而稳步增加。同时, 这一地区对于俄罗斯维护其全球地缘政治地位、“历史地理枢纽”地位尤为重要。

只有当大西洋主义、海权主义被定义为北方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时, 北方的整个体系才会获得真正的战略内容。由于拒绝在军事学说或国际政治层面承认地缘政治二元论, 整个

- 185 -

话题立即失去了意义。其中不仅俄罗斯北方的迅速退化不可避免, 而且从长远来看, 会导致北方分裂甚至个别地区被俄罗斯排除在外。

当前地缘政治进程的总体节奏是这样的, 按照上述地缘政治常数对北方进行地缘政治重组的问题是一个高度热门和紧迫的问题。即使为了维持现状, 也有必要立即开始对所有这些空间进行地缘政治重组。

俄罗斯的命运与北方的地缘政治命运直接相关。这条规律是其未来地缘政治的基础。

北方是未来, 北方是命运。

- 186 -

第3章 东方的挑战

3.1 “国内东部”（概念范围）

分析俄罗斯东部的地缘政治问题，我们采用与北部相同的方法，将问题分为三个部分：

- 1) 中部 - 东部
- 2) 东部各地域之间的联系
- 3) 这些地域与俄罗斯其他地区和地缘政治区的联系。

但首先有必要定义“俄罗斯东部”的含义。我们必须立即强调作为纯粹地理概念的东方与文化的、文明的、历史的东方之间的区别。因此，文化东方习惯上包括北非、中东、西亚、中亚直到巴基斯坦，再到菲律宾（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所有领土，而习惯上还将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和印度支那，以及太平洋地区“远东”国家。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从地理上讲，这一切都代表着南方，从遥远的马格里布西部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远东地区。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本身的框架内，“东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现实，这是一个从伏尔加河地区（塔塔里亚）通过乌拉尔、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领土。这一地缘政治范畴可称为“俄罗斯东方”或“国内东方”。研究俄罗斯的内部地缘政治，正是这第二个概念，“国内东方”，位于中央（莫斯科）以东的地理领土应该被视为“东方”。

在这种情况下，高加索和中亚将属于“南”的范畴，将在相应的章节中加以考虑。

考虑到我们将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视为与俄罗斯联邦行政边界不重合的“开放系统”，基于“地缘政治轴线”的方法，地缘政治区域的划分往往落在邻国的领土上。国家，如果有一个地缘政治，种族和地理和景观统一。因此，乌拉尔南部和哈萨克斯坦北部，从阿克丘宾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大约在北纬 50°，都应该包括在俄罗斯“国内东方”内。此外，与俄罗斯相比，蒙古、新疆和满洲在地缘政治上也属于南方地区。因此，整个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图瓦、布里亚特、黑龙江地区和滨海边疆区（加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南半部）与位于“北方梯形”南部的西伯利亚中部地区一起进入“内陆东部”地带。

因此，“国内东部”应该被认为是一个从喀山和乌拉尔延伸到太平洋的矩形。

- 187 -

3.2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带（结构）

在气候上，俄罗斯东部与北部截然不同。这是一个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在伏尔加河地区和乌拉尔，以及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区，主要分布着森林区。从哈萨克斯坦北部到贝加尔湖，有一片逐渐变窄的楔形草原。阿尔泰和阿穆尔地区是低山山脉。大多数地区人口稠密，代表着那是有利于生活及管理的地形。

俄罗斯国内东部地区的民族构成如下：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分散在各民族共和国中，而在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则较为密集。可以区分几个民族区，大体上与相应的自治地区和共和国相吻合。

鞑靼斯坦位于伏尔加河地区，这是一个相当单一的民族国家结构，保留了政治独立的传统并与俄罗斯有一定的竞争。这是最脆弱的（就维护俄罗斯的完整性而言）地区，因为鞑靼人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使“鞑靼分裂主义”问题仍处于次要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鞑靼斯坦的地理位置处于大陆空间的中间，没有海上边界或靠近非俄罗斯国家。只要这种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存在，它就不会对俄罗斯构成任何特别的危险。但无论如何，鞑靼人的历史传统需要更多地关注该地区以及实施中央对喀山的这种政策，因此鞑靼斯坦的地缘政治体系将与纯粹的俄罗斯地区相连（可能在领土上不相邻）。与此同时，相反，应该阻止与巴什基里亚、乌德穆尔特、莫尔多维亚和马里埃尔的整合进程。此外，强调鞑靼斯坦在文化和民族方面的领土划分是有道理的，因为鞑靼人在种族、文化和宗教因素方面都是一个民族。鼓励俄罗斯移民到这个共和国也是有道理的。

鞑靼人是土耳其人和穆斯林，这使他们成为突厥-伊斯兰世界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中央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整个南方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将在相应的章节中讨论）。通过同化或通过积极的地理隔离，不可能将塔塔里亚与这个现实完全分离。因此，“鞑靼问题”作为单独的条目包含在更广泛的俄罗斯和伊斯兰教问题中。解决所有类似情况的共同点是寻求“历史地理枢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平衡。在这方面，反大西洋主义在所有情况下无一例外地是一个共同点，使建立一个长期的全球联盟成为可能。就鞑靼斯坦而言，应特别强调鞑靼民族的自然大陆特性，其历史命运与欧亚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当前条件下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相结合时，一种自觉自愿的联合是比民族信仰差异更深层次的必要性。

更广泛地说，欧亚强权俄罗斯建立在斯拉夫和突厥元素结合的基础上，这产生了大俄罗斯民族，与心脏地带一致，成为“大陆国家”的轴心。因此，未来，这两个民族，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乌戈尔人和蒙古人）仍然是欧亚地缘政治的支柱。他们的未来在于政治和

- 188 -

民族融合的发展，因此，强调民族文化差异，特别是希望用从政治上去看待这些差异，与俄罗斯人和鞑靼人的历史命运逻辑相矛盾。这个话题应该成为莫斯科和喀山之间关系的轴心，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游说团”，在政治上（或形而上学政治上）表达欧亚大陆的利益。

几乎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位于鞑靼斯坦南部的巴什基里亚。那里还居住着一个自称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唯一不同的是，巴什基尔人没有像鞑靼人那样有明显的分离主义传统和发达的民族认同，鞑靼人是整个伏尔加河地区最活跃和最“先进”的民族。出于这个原因，鞑靼-巴什基尔关系对俄罗斯“国内东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毫无帮助，中央应尽一

切可能将巴什基尔融入俄罗斯人居住的南乌拉尔地区，并而避免其倾向喀山。同时，强调区别纯巴什基尔文化的独创性、独特性以及与其他突厥-伊斯兰形是有意义的。加强塔塔里亚和巴什基里亚之间的地缘政治联系，对俄罗斯来说极其危险，因为巴什基里亚南部行政边界离哈萨克斯坦北部不远，（在地缘政治形势最不幸的发展中）理论上可以成为突厥-伊斯兰分裂主义的跳板。在这种情况下，心脏地带带有被大陆空间中间的突厥（亲土耳其，即亲大西洋）楔子割裂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塔塔里亚向南的方向，试图与巴什基里亚融合，甚至巴什基里亚与奥伦堡地区的和解，都是极其不利的趋势，中央的大陆政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种趋势。巴什基里亚应该加强与古比雪夫和车里雅宾斯克沿纬度的联系，而与喀山和奥伦堡沿经向联系则相反。

此外，从南乌拉尔（车里雅宾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片土地上，俄罗斯人生机勃勃，奋发图强。从西到东，一条地缘政治轴线清晰地出现，历史上与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道路相对应：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克麦罗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这整条地带是发达的工业区，像新西伯利亚这样的城市也是主要的知识中心。同时，在民族成分上说，这几乎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区。类似的情况在贝加尔湖东侧再次出现，沿着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线，从赤塔到哈巴罗夫斯克，再往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以说是从南乌拉尔开始的同一条地带的延续。唯一的差别是布里亚特，它在北部与贝加尔湖接壤，打破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原本均质地带的连续性。

这条纯俄罗斯人口地带的南面是一个由突厥（蒙古东部）人口大量混杂的平行区域。它始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从阿克秋宾斯克经过哈萨克斯坦地域，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然后在俄罗斯境内的阿尔泰（突厥民族的摇篮）、哈卡斯、图瓦和布里亚特继续前进。同时，从阿尔泰到外贝加利亚（赤塔），这条突厥-蒙古地带逐渐平稳过渡到蒙古，没有明显的地理边界，但实际上是存在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偏南的地带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战略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被视为“俄罗斯东部”向南的延续。唯一的例外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满洲），位于蒙古东部边境至乌苏里江。从

- 189 -

逻辑上讲，它必须由俄罗斯进行战略控制，否则必然成为“地缘政治历史枢纽”与边缘地区，在地缘政治领土立场上发生冲突的借口，而中国无疑属于边缘地区的范畴。（在这一点上，任何地缘政治家都没有怀疑过）。

同样的地缘政治原则也适用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命名地带：整个领土部门必须积极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领域，这里的优先方向将是沿车里雅宾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纬线长轴（经向短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上述纬线长轴线在特殊地缘政治区域的延续）。所有这些巨大的空间是俄罗斯作为一个真正的欧亚大国的主要战略优势。由于这条南西伯利亚走廊，俄罗斯有机会将中心地区与太平洋沿岸牢固地连

接起来，从而为西伯利亚的全面发展和莫斯科通往太平洋的最终出口提供了一条潜在的高速公路。这个地带是控制整个欧亚大陆（包括欧洲）的杠杆，因为组织起从远东到遥远西部的高科技大陆通讯将使我们能重组全球现实，从而使得外部对海洋的海权控制失去其关键意义。未来西伯利亚的资源将与欧洲大陆和发达日本的高科技连接起来，那必将终结海权统治的全球霸权。

西伯利亚的沿纬度一体化（车里雅宾斯克-哈巴罗夫斯克轴线）是只有俄罗斯拥有的最重要的战略优势。未来整个地缘政治历史都可以从这个地区的发展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斯宾格勒的预言就会成为现实。

在狭义的“内部”意义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体化发展也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扩大控制沿经线区域。南部“突厥-蒙古”地带将与稍北纯俄罗斯领土相连，伴随着俄罗斯的车里雅宾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轴线的经济一体化和战略统治将使得上述区域获得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自治。此外，诸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自治区和共和国、蒙古，可能还有中国满洲里的某些地区，这些不同性质的实体都应包括在这一进程中。

同时，在北方也假设了类似的沿经线发展方向，其不同之处仅在于那里土生土长的非俄罗斯人口稀少得多，政治不发达，没有新的政治主权历史经验。在汉特-曼西斯克地区、鄂温克地区，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带向北扩展的界限是由“北部梯形”内部整合的平行过程确定的。这种内部整合具有简单的、纯纬度的特征，它不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车里雅宾斯克-哈巴罗夫斯克轴线）复杂的地缘政治功能，这一轴线区域具有三个发展方向（沿纬度线、向北和向南），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遇到既定的且相当独立的政治形式（国家）。因此，这两个地缘政治进程将以不同的节奏发展，“俄罗斯西伯利亚”发展

- 190 -
之间的特定边界向北与“北梯形”的整体融合将取决于不可预知的因素。

事实上，所有这些发展的地缘政治方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和出人意料的事情，因为它们只是延续着俄罗斯东移和形成欧亚强国的大规模历史进程。俄罗斯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并非偶然，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的版图也遵循着清晰的地理逻辑。这条道路对应于森林和草原的地形边界，而俄罗斯国家本身就是以森林和草原地缘政治综合为基础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探索者沿着与草原（或森林-草原）接壤的北部针叶林“边缘”迁徙，定居在最适合居住和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上。从车里雅宾斯克到贝加尔湖，这个地貌区域是一个逐渐变细的楔形。而从贝加尔湖到太平洋沿岸，这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北方森林地带，不知不觉地逐渐变成了热带森林。与此同时，高地和山脉的比例也在增加。

从贝加尔湖到阿穆尔（黑龙江）河口的这片区域再次回到了我们在分析“北部梯形”的雅库特区域时已经出现的“勒纳兰”问题。

3.3 勒拿兰的阵地战

与（在分析俄罗斯北部的地缘政治时）雅库特的情况一样，在接近延伸到叶尼塞河以东的东西伯利亚时，我们面临着许多地缘政治问题。展望未来，我们注意到，当我们分析“欧亚南部”东段时，我们将第三次遇到困难。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看，在贝加尔湖之后，与欧亚大陆所有更西部的地区相比，地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那里，在北部的大陆森林和南部的热带（山地）森林之间，必然有草原地带，形成了天然的对称性，清晰可见中部地区、第一（草原）外围圈以及热带森林和山脉的起伏边界。这样的景象从摩尔多瓦一直延续到阿尔泰，到北部草原层，然后便完全消失。就东西伯利亚而言，我们处理的是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区域和景观区域，需要不同的位置解决方案。与意想不到的景观“挑战”（在山脉、丘陵和山岗的背景下，大陆森林向热带森林的平稳过渡）相平行，揭示出一个极其不幸的民族政治画面，在该地区存在着几个内在和外来的民族实体，而他们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忠诚度并不那么明显。在俄罗斯人对整个勒拿兰地区的定居极为稀少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极为惊人。

一是布里亚特领土。它打破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带的连续性，从贝加尔湖向北突出。布里亚特人是喇嘛教徒，在俄罗斯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试图在其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面向蒙古和西藏的神权国家。就其本身而言，这还没有引起关注的理由，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雅库特南部边界与布里亚特北部边界的领土接近。雅库特人属于突厥族，显着基督教化，但经常保留古老的萨满教传统。同时，一些团体也信奉喇嘛教。在雅库特有出海口，布里亚

- 191 -

特又与蒙古接壤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构成出现潜在地缘政治集团的危险，该集团比鞑靼斯坦或一些北高加索民族具备更多先决条件，从而引起地缘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后者的分裂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些地域靠近太平洋沿岸，那里的俄罗斯人本来就非常稀少，海权势力可能控制沿海地区（或者从勒拿兰到太平洋这片潜在走廊的区域），那么危险会因此而加倍。最后，雅库特南部与中国东北边界被阿穆尔州一条相当狭窄的地带隔开，这就变得有理由要求从印度洋、中国南部沿海开辟一条直通北部拉普捷夫海的地缘政治走廊，这会使情况更加恶化。

所有这些潜在的地缘政治格局都非常令人担忧。毫无疑问，这样的画面对大西洋主义战略家来说似乎极具诱惑力，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勒拿兰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独特战略机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脆弱的位置，任何削弱俄罗斯对该地区的控制可能会立即导致一大块欧亚大陆不可逆转地脱离这一历史地理枢纽。为了防止这些事件的发生，仅仅加强位于远东或阿穆尔地区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有必要采取大规模的地缘政治步骤，因为我们谈论的恰恰正是一场潜在的阵地战。应该特别注意：

1) 强化中央代表在雅库特南部的战略存在很重要。通过来自更西部地区的人们定向迁移和系统“殖民”土地来实现。

2) 对贝加尔湖以北的土地也应该这样操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存在危险的边界线将会分得更开。

3) 同时，要大力发展伊尔库茨克州北部和整个阿穆尔州，实施计划，对这些区域有目的地进行“殖民化”。

这三项措施必须以加强在指定区域的军事存在和加强向西部和东部的战略、经济和技术扩展为后盾。采取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消除“俄罗斯腰带”变得更狭窄的危险性。

4) 要加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阵地压力，对此地区采取预防性施压，以初步防止中国向北方扩张的任何地缘政治入侵。

5) 有必要在人口和战略上尽可能地加强位于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之间的区域，以便在这里建立一个巨大的屏障，防止潜在的来自海权（来自海洋）或中国的（来自陆地）地缘政治侵略。

6) 重要的是要加强所有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激活俄蒙关系，因为蒙古是贫瘠的，否则没有吸引力，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方面关键的和最重要的领土。俄罗斯在整个蒙中边界，

- 192 -

特别是在其东部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勒拿兰被分离出去的地缘政治风险。

回想一下，北方的地缘政治打算只从北方，从北冰洋沿岸，将特别努力集中在同一扇形区域。把地缘政治战略及其并行实施结合起来，将使俄罗斯为遥远的未来奠定阵地基础。那时，这些土地的重要性将极其明显，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意义将取决于是否能控制这些土地。

尽管勒拿兰稍后会受到更多关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现在就应该开始了。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制定出正确的地缘政治模式和正确的战略模式，冲突开始后解决起来会困难得多，甚至不可能解决。

在地缘政治中，重大战斗总是在升级为公开的政治冲突或国际冲突之前很久就已经获胜了。

3.4 西伯利亚首府

西伯利亚一体化项目提出了这一过程的地理中心问题，即关于哪个地点有可能成为莫斯科在乌拉尔以外区域的全权代表，而且对所有其他地区又都具有吸引力。新西伯利亚不仅是全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也是具备全俄规模最重要的知识中心，它最适合这个角色。

从新西伯利亚出发，西轴线可到乌拉尔首府叶卡捷琳堡，东轴线到伊尔库茨克，然后是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因此，整个“俄罗斯西伯利亚带”最重要的交流功能落在

了新西伯利亚，它是其中的主要环节。莫斯科新西伯利亚轴心正在成为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中关键生命线，这是发自中央的离心能量和发自外围的向心能量所通过的“轴线”。

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地区直接与莫斯科紧密相连，而不是使其成为俄罗斯中部与西伯利亚之间交流的中间行政层级，这是有道理的。新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这座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应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力，因为二级地缘政治轴线应该从这里向东南西北整个西伯利亚发散。

仅对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南部地区的这种二级集权制作出例外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区域，与勒拿兰问题和争夺控制权的阵地斗争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应给予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特殊地位，应与莫斯科直接挂钩(如叶卡捷琳堡)。

为了与“北部梯形”进行互动，可以方便地组织新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战略轴心和哈巴罗夫斯克-马加丹战略轴心。因此，东方将在战略上与北方相连。

- 193 -

东方与北方一样，是未来地缘政治的跳板。欧亚大陆的命运就在这里。同时，“俄罗斯西伯利亚”得天独厚的气候，也更容易从这里开启打造新大陆模式的宏伟工程。应该在这里建设新的城市，铺设新的公路，开发新的土地和矿藏，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同时，重要的是在项目中首先将两个原则和谐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救济、景观、民族文化因素，最后是生态，另一方面是技术和战略标准。古老的传统应该与最新的技术发展相结合。有必要考虑这些土地最古老的人类聚居地，并将其与工业和军事基地发展的选择联系起来。

这种逻辑导致了在西伯利亚出现一个新中心的开放前景，该中心尚未显现和构想。而随着整个俄罗斯东部的发展，随着太平洋实现“未来之海”，可能会出现将整个欧亚大陆的首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转移到这些土地上的问题。尚存的新千年辉煌之都。

总有一天，莫斯科将失去其“居中”的意义，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将变得过于“西部”。那时，西伯利亚新首府的问题将不仅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将具备欧亚大陆的，甚至是全球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即只有在勒拿兰的阵地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前景，否则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复兴是不可想象的。

- 194 -

第 4 章 南方地缘政治新秩序

4.1 南方“地缘政治新秩序”

南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地缘政治与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全球使命的联系比北部和

东部的问题更重大。如果即使考虑在地缘政治上属于俄罗斯内部领土的北方和东方，外交政策因素也不断出现，那么，在分析南方（以及西方）问题的情况下，仅谈论俄罗斯“内部地缘政治”则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俄罗斯所有内部现实都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如果不完全违反整体地缘政治图景的严密性，将这两者分离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南方来说，“历史地理枢纽”只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将地缘政治扩展到印度洋沿岸。这意味着沿经线发展的核心意义和独特之处，意味着对南北轴线确定无疑的有效控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领土与欧亚大陆南部海岸线之间的整个空间是一片条型地带，其面积必须减少到零。一个边缘地带，不是一根线，而是一条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海权影响力的一种表现，这与大陆一体化的基本推动力截然相反。如果俄罗斯北部和东部的欧亚大陆边缘的面积减少到零，而这里的大陆在地缘政治上是完整的（唯一剩下的就是维持阵地现状，提前防止这条线在海权推动力影响下被剥离），那么边缘地带在南部（和西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俄罗斯的东部和北部，边缘地带有一条实际的线，但有一条潜在的地带，而在南部和西部，则相反，有一条实际的地带，但有一条潜在的线。在第一种情况下，主要的当务之急是防御和防护、保藏、保存事态和预防地缘政治行动。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指的是关于积极进攻的地缘政治，是关于扩张，即完全“进攻性”的战略。

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南部，俄罗斯必须建立一个基于大陆一体化原则的“地缘政治新秩序”。因此，南方所有既定的政治形态，伊斯兰国家、印度、中国、印度支那，显然应该被视为大陆阵地演习的战场，其最终任务是将所有这些中间地带同欧亚中心与莫斯科进行密切的战略连接。

由此产生从中央向外围的“开放式辐射线”概念，这些辐轴线并不停留在俄罗斯自身边界，而会一直辐射到南部大洋沿岸。落在俄罗斯领土上的那部分“辐射线”是有符合实际的；那些落在战略上与俄罗斯团结一致国家的辐射线是有半符合实际的；一些辐射线落在自行其是走自己地缘政治道路的国家，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落入大西洋主义直接控制区域的国家，那些辐射线段符合潜在的实际。欧亚地缘政治在这个方向上的一般逻辑归结为：确保整个辐射线长度上变成符合实际的或半符合实际的。

- 195 -

在此基础上，从小亚细亚到韩国的整个欧亚大陆海岸都应该被视为潜在的“俄罗斯南部”。

4.2 区域和边界山脉

地缘政治向南扩张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属于俄罗斯或与俄罗斯结盟的国家（独联体）行政边界内那些地区的组成结构。因此，对符合实际和半符合实际的地缘政治辐射线外围的分析，一刻也不应偏离由地缘政治规律所决定的最初趋势。

“俄罗斯南部”，在较有限的意义上，是以下区域：

- 1) 从塞尔维亚到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半岛北部；
- 2)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南部和东部；
- 3) 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州（新罗西斯克港）；
- 4) 高加索地区；
- 5) 里海东部和北部海岸（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
- 6) 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 7) 蒙古。

欧亚大陆已经建立起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控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被视为进一步向南扩展地缘政治的基地，而不是俄罗斯的“永恒”边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存在不受心脏地带控制的沿海地带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即使是那些目前与欧亚中心紧密相连的领土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和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出现的独立政治实体，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说明拒绝向欧亚大陆南部海岸以外地区的扩张（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必然导致莫斯科可靠的边界向北退缩，退回欧亚大陆深处。但是，削弱大陆的存在，从未造成真空，也从未“解放”领土的主权，因为它们的省级地位显然排除了它们的地缘政治专制。莫斯科的陆权影响自动被大西洋主义的海权影响（以某种形式）取代。

因此，“俄罗斯南部”整个内部地带的结构最初应被视为潜在攻击的桥头堡。

然而，由于几乎所有边境地区都位于山区（通常是高山地区），这一事实使事情变得复杂。

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是巴尔干山脉，高加索以东，然后是科佩达格和兴都库什山脊，然后是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俄罗斯-欧亚大陆南部边界的山地地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方的整个历史，目前是大西洋主义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王牌之一。古印欧人将整个欧亚

- 196 -

东部分为两个部分，图兰北部（欧亚山脉以上的一切）和伊朗南部（位于欧亚山脉以下）。事实上，这种划分严格对应于现代地缘政治术语心脏地带（图兰）和边缘地带（伊朗）。几千年后，俄罗斯南部前线提出了同样的地缘政治问题，这是“草原游牧民族与波斯定居农民”辩证关系的特征。

但此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不再迁徙的斯拉夫北部森林添加到草原图兰，平衡和固定了图兰游牧民族的活动状态。定居的印欧人（斯拉夫人）从北部封闭了草原，他们的文化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伊朗南部的原型。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作为森林和草原的综合体，在品质上优于图兰，因此，伊朗问题（比非俄罗斯中亚更广泛）获得了不同的文明和地缘政治意义。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沙阿政权的大西洋主义海权政治彻底决裂以来，这一点尤其明显。

所有这些地缘政治方面都表明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决“欧亚山脉”的问题，它应该

失去战略边界的功能，不再成为大陆一体化的障碍，而是大陆一体化的桥梁。

改变俄罗斯南部山区功能（及其战略范围）的需求是未来欧亚地缘政治的支柱。没有这样的初步行动，欧亚大陆永远无法实现统治现实世界，更不可能接近海权国家并同他们进行真正的平等对话。

4.3 巴尔干地区

由于俄罗斯的大部分南部土地及其战略区域都落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与俄罗斯文明不同的土地上（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除外），因此地缘政治轴线必须严格沿经向发展。因此得出结论：应促进所有纵向（经向）整合进程，并应防止所有横向（纬向）整合进程；也就是说，在民族和政治方面与实际的俄罗斯空间截然不同的领域中，人们所采取的原则，应该与在民族-文化同质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直接相反。

让我们概述“俄罗斯南方”（广义上）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形式，依次考虑从西到东所有当地的地缘政治体系。

巴尔干半岛。这里有四个特殊区域：

- a) 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最西端，并面向大西洋方向，纯粹边缘地带）；
- b) 塞尔维亚（位于东部，明显面向欧亚大陆）；
- c) 保加利亚（更偏东方，具有“黎凡特式边缘地带”元素，土耳其和欧亚大陆综合体最清楚地代表了这种模式）；

- 197 -

- d) 希腊（东正教，但包括在大西洋主义集团中）。

该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的“地缘政治新秩序”（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基于促进沿南北轴线的所有一体化进程。这意味着应该尽可能地促进贝尔格莱德雅典和索非亚雅典之间的联系。由于整个巴尔干地区是一个民族混居、极其复杂的形态，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组成的泛斯拉夫南部联邦计划，在理论上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在不久的将来几乎是行不通的。此外，它暗示，纬度一体化过程是危险的，这在种族复杂的地区总是有问题的。例如，考虑一下本世纪初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东正教国家之间激烈的巴尔干战争，以及马其顿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潜在的大陆和欧亚东正教大国之间的争论焦点。因此，中世纪内曼吉奇人所建塞尔维亚“帝国”的例子可以看作是积极的地缘政治范式。此外，希腊在全球地缘政治项目中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功（特别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都得益于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王朝和早期的多利安式印欧斯巴达提供的能量。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小模型框架内，塞尔维亚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保加利亚人）代表了欧亚的推动力，充当了心脏地带理念的承载者。希腊位于南部，在地缘政治上它处于北部大陆推动力和它对边缘地带强烈的历史认同感之间。因此，希腊与巴尔干北部的所

有统一整合项目都有助于加强希腊的大陆内冲动，这可能基于和东正教俄罗斯的忏悔接近。

如果从长远来看，人们可以想象一个面向欧亚大陆的共同巴尔干联邦，那么最小的地缘政治计划可以制定为创建一个不规则的菱形索非亚、莫斯科、贝尔格莱德、雅典（再回到索非亚），其中两条辐射线从中央发出：俄罗斯-塞尔维亚语和俄罗斯-保加利亚，它们在雅典汇合。与此同时，马其顿问题可以通过给予它特殊地位来解决，以便消除所有三个东正教巴尔干国家和潜在的欧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之间的障碍。由此，莫斯科在马其顿问题上的切身利益合乎逻辑。

如果你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整个图景，从大西洋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很明显，对于海权政治来说，赋予所有地缘政治进程完全相反的特征是很重要的。

首先，“海上力量”必须支持巴尔干北部的亲大西洋主义势力（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此外，还要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从与希腊的地缘政治联盟中分离出来。为此，使用马其顿最为方便，它将能够摧毁该地区的所有大陆项目。如果您将土耳其与保加利亚问题联系起来，即有助于改善土保关系而损害保俄关系，那么整个欧亚大陆政策将在这里失败。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4.4 乌克兰主权问题

- 198 -

然后是乌克兰问题。乌克兰的主权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来说是一种负面现象，原则上它很容易引发武装冲突。没有从伊兹梅尔到刻赤的黑海沿岸，俄罗斯拥有如此长的沿海地带，不知道是谁控制的，它是否能作为正常和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也受到质疑。黑海并不能取代进入“暖海”的通道，由于大西洋主义者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稳定控制，其地缘政治意义急剧下降，但至少它可以保护中部地区免受土耳其潜在扩张的影响，是极其方便、可靠和便于防守的边界。因此，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实体（此外，它还试图加入大西洋联盟）是绝对反常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只有完全不负责任的步骤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乌克兰作为一个拥有某种领土野心的独立国家，对整个欧亚大陆构成巨大威胁，不解决乌克兰问题就谈大陆地缘政治是没有意义的。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的文化-语言或经济自治应该受到限制，它应该成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纯粹行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在沙皇帝国或苏联统治时那样）。但从战略上讲，乌克兰在严格意义上应该是莫斯科在西南的体现（尽管更多关于可能的重组模式将在关于西方的章节中讨论）。

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对地缘政治的绝对要求是，莫斯科完全和无限地控制从乌克兰到阿布哈兹领土的整个长度。你可以按照民族和文化的界限任意分割这整个区域，可以将民族和宗教自治权给予克里米亚小俄罗斯人、鞑靼人、哥萨克人、阿布哈兹人、格鲁吉亚人等，但

这一切都必须在莫斯科对军事和政治局势的绝对控制下。这些部门必须从根本上切断来自西方和土耳其（甚至希腊）的海权统治影响。黑海北部海岸应完全属于欧亚大陆，隶属于莫斯科的中央领导。

4.5 黑海和里海之间

高加索本身由两个地缘政治层面组成：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高加索共和国的领土。该区域毗邻从塔甘罗格到阿斯特拉罕的整个俄罗斯土地区域，即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所有俄罗斯土地，其中还包括作为楔子的卡尔梅克地区。

这个地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拥有巨大的社会活动力和古老的地缘政治传统，这个地区还直接与大西洋主义土耳其接壤，土耳其在战略上控制着边境地区，从地形的角度来看，边境地区都属于高加索山脉区域。

这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中最脆弱的地方之一，这些领土历来是俄罗斯心脏地带和土

- 199 -

耳其、伊朗之间残酷军事对抗的场所，这绝非巧合。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首先打开了通往“暖海”的通道，而边界向南（或北）的每一次（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移动，都意味着整个大陆的，即陆权的重大胜利（或失败）。

整个地区的三个沿纬度的地域，俄罗斯土地、俄罗斯境内的北高加索，以及高加索本身，也有进一步向南延伸的潜力。这个额外的、纯粹潜在的地带不仅位于俄罗斯之外，而且位于独联体之外，包括南阿塞拜疆（位于伊朗境内）和土耳其北部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由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这个区域给土耳其、伊朗带来的民族文化问题，就好像那些是（或曾经是）俄罗斯一部分的高加索族群一样。因此，大陆影响力向高加索地区深入扩展具有客观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黑海和里海之间，产生四个层次或形态，这表明中央采取了差异化方法。

第一层，即俄罗斯层，应在纬度方向上尽可能连接，形成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阿斯特拉罕的牢固结构 Rostov-on-Don Volgograd Astrakhan。这是整个俄罗斯空间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它的北部是俄罗斯中部，再往北则是最重要的北方港口和“北方梯形”的潜在首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由于与中欧地区的距离相对较近，并且由于人口密集和技术发展，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阿斯特拉罕三角区是俄罗斯在南部最重要的前哨。这可以替代欧亚中心，欧亚中心是一个深入内部、由连续领土连接的二级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应该成为欧亚大陆整体高加索战略的地缘政治核心，并为此在技术上、战略上和智力上得到加强。在这里建立一个行政和政治一体化、特别团结的俄罗斯区域是可取的。

与此同时，卡尔梅克北部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人口稀少。将这些北部草原地区包括在一个共同的一体化地带中是有意义的，在地缘政治上将这些地区直接“延展”到顿河畔

罗斯托夫和阿斯特拉罕之间，以便从底部闭合以伏尔加格勒为顶点的三角形。因此，在地理和地缘政治上，将再现在第一个千年开始时控制整个地区的古代可萨汗国的边界。我们可以有条件地将这种地缘政治形态称为“可萨三角”。

在从纯俄罗斯区域“可萨三角”的过渡过程中，应该遵循纬度（水平）逻辑，虽然与北方和中央本身（莫斯科）密切相关，但一体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特征。整个北高加索及其以南的一切都应完全服从经向定位。“可萨三角”的战略中心应形成独立的地缘政治链条，严格向南展开。从罗斯托夫经克拉斯诺达尔到迈科普、苏呼米和巴统。从斯塔夫罗波尔到基斯洛沃茨克、纳尔奇克、奥尔忠尼启则、茨欣瓦尔和第比利斯。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哈奇卡拉。

应该支持任何外高加索民族地区沿纬度划分，并加强纵向一体化。因此，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将活动频繁的分离主义车臣剥离达吉斯坦（和印古什），关闭通往里海的出口。如果

- 200 -

车臣只剩下南部和格鲁吉亚接壤，那么它在地缘政治上将受到四面八方的控制，并有可能从东正教格鲁吉亚一侧控制它。在某种程度上，达吉斯坦和印古什也应该与格鲁吉亚联系起来，这可能导致建立一个经济发达的自治北高加索地区，但在战略上完全由俄罗斯和欧亚大陆控制。北高加索地区普遍的重新布局也可以解决奥塞梯问题，因为新的民族结构（例如，统一的奥塞梯）将失去民族国家结构的意义，获得纯粹的种族和文化、语言和宗教意义。按照同样的经向逻辑，将阿布哈兹直接与俄罗斯联系起来很重要。

所有这些步骤都指向一个地缘政治目标 加强欧亚大陆陆权复合体，并在与大西洋主义的决斗中稳扎稳打争取全球胜利。因此，整个计划可以称为“高加索地缘政治新秩序”。它意味着拒绝将现有政治实体视为“民族国家”的传统方法，即严格固定的行政机构，具有永久的边界和完整的权力结构。“高加索地缘政治新秩序”的前提是对当前政治现实的彻底重新布局，从国家-国家或民族-民族关系模式转变为纯粹的中央-边缘地缘政治体系，边缘结构应该不是由政治决定，而是由民族文化差异决定。

这可以通过创建“高加索联邦”的计划来实现，该联邦将包括独联体的三个高加索共和国和俄罗斯内部的自治实体。同时，该中心将让整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自给自足，但它会确保最严厉的战略中央集权制。这将导致一个极其灵活的系统，它不是基于暴力、占领或高加索多样性的统一，而是基于对大陆命运统一性和共同性的认识。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传统可靠盟友，在地缘政治上发挥着特殊作用。亚美尼亚是防止土耳其向北部和东部扩张到中亚突厥世界区域的最重要战略基地。相反，在进攻性地缘政治方面，它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社区很重要，它不断向南延伸到土耳其领土，古代亚美尼亚的重要部分及其主要圣地亚拉腊山就坐落于此。种族和语言上的血缘关系将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联系在一起，这是另一个可以用来在土耳其引发地缘政治动荡的主要种族因素。同时，创造一条横跨整个高加索地区，可靠地将亚美尼亚与“可萨三角”连接起来的

陆路走廊极为重要。

亚美尼亚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很重要。基于和伊朗的历史与种族亲缘关系，亚美尼亚可以成为将欧亚推动力从中心传播到伊朗边缘的最重要纽带之一。这意味着创建一个莫斯科-埃里温-德黑兰轴心。

阿塞拜疆也应该与伊朗（但绝不是土耳其）联系在一起，强调什叶派与伊朗南阿塞拜疆的民族亲和力和历史联系。因此，最重要的经过埃里温的莫斯科-德黑兰战略轴线将由莫斯科-巴库-德黑兰轴线加以复制，形成菱形，主要是对称于巴尔干菱形。总的来说，巴尔干

- 201 -

和高加索之间有许多地缘政治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规律的作用最为明显：纬度过程引发可怕的冲突，经度关系导致稳定和可持续性。这在南斯拉夫战争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卡拉巴赫问题本身与马其顿问题有些相似。因此，为了稳定整个地区，莫斯科应该与卡拉巴赫建立最直接的联系，以使这片领土成为整个高加索地缘政治体系的平衡点。为此，理想情况下，卡拉巴赫谈判应该有四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俄罗斯和伊朗，但所有大西洋主义参与者除外，由于地缘政治原因，他们不适合在该地区有任何政治存在。

4.6 中亚地缘政治新秩序

中亚被认为是欧亚大陆的一大块，从哈萨克草原北部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沿岸。该区域从前苏联中亚诸共和国向南延伸，穿过科佩达山脊和帕米尔山脊到达伊朗平原，向东南延伸到阿富汗。中亚是一个地缘政治空间，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将心脏地带引向其珍视的印度洋目标。如果莫斯科设法在这个方向上赢得与海权的阵地战，许多平行的问题将自动得到解决：融入印度大陆集团、战略支持伊拉克对抗土耳其、通往中东的直接走廊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该地区成为欧亚南部地缘政治重组问题的核心。

请注意，中亚不仅在政治和地缘政治上，而且在种族上都被一系列山脉分割开来。中亚前苏联地区（塔吉克斯坦除外）居住着逊尼派突厥人，他们是图兰的继承人，其中许多人仍然以游牧和牧民为主。“非苏联”中亚伊朗、阿富汗（甚至与民族文化相关的巴基斯坦）居住着定居的印欧人。因此，地缘政治统一具有明确的种族界限。

整个区域分为三个部分：

- 1) 哈萨克斯坦中部（北纬 50 度线以南，因为“俄罗斯东部”所含土地位于其以北）；
- 2)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沙漠和吉尔吉斯斯坦山区（这些纯粹是图兰的土地）；
- 3) 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这是“阿丽亚娜”延伸意义上的伊朗，即“雅利安人的土地”）。

中亚的欧亚新秩序是建立在将所有这些土地从北到南以严格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轴心连接起来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往常一样，重要的是仅在经线方向上构造空间，这有助于各个区域的纵向会聚。

- 202 -

从北方开始，我们正在讨论整个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南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支撑结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一致而周到地融入一个共同的大陆集团是大陆所有政策的基础。同时，从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严格中断土耳其对该地区的任何影响，防止任何来自大西洋主义土耳其的“图兰”一体化项目，并向前“苏联”中亚地区提供纯粹沿纬度的地缘政治发展，反对印欧北部（俄罗斯）和印欧南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图兰一体化是地缘政治欧亚主义的对立面，包括将陆权力量分裂为三个部分：西部（欧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之南西伯利亚和远东）和南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种“图兰主义”旨在分裂森林和草原的种族与地缘政治联盟，正是这一联盟诞生了俄罗斯国家和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而在伊朗和阿富汗方面，它撕裂了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团结。基于此，心脏地带必须向土耳其和“泛图兰主义”承载者宣布一场艰难的地缘政治战争，其中伊斯兰雅利安伊朗将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盟友。中亚应该在俄罗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两个全球印欧现实之间垂直“拉伸”。同时，要千方百计突出突厥空间的地方自治主义文化倾向，支持自治区的地方主义势力，加剧宗族、部落、“兀鲁思”等之间的摩擦。在这一地区的任何地方，都应该尽量关闭位于突厥地区以外，或者严格沿经线方向的领土、地区、工业中心、经济圈、战略目标。因此，例如，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在领土上不应向东部方向（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进行整合，而应在北部（哈萨克斯坦）和南部（土库曼斯坦）进行整合。按同样的原则，应该重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地区，像撒马尔罕、费尔纳河谷和在历史上和民族上与塔吉克斯坦领土的联系不亚于乌兹别克斯坦领土的那些地区。

塔吉克斯坦应该成为整个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战略的地缘政治枢纽。这个区域结合了整个俄罗斯“*Drang nach Süden*”，“奔向南方”的最重要方面。塔吉克人是印欧血统的穆斯林，在种族上与伊朗人和阿富汗人接近。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该地区“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塔吉克斯坦是俄罗斯和苏联的一部分，即被整合入大陆的、欧亚地缘政治体系。因此，这个古代粟特多山小国的命运，象征着在中亚建立欧亚新秩序的成功（或失败）。

不应将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实际边界视为亘古不变的。这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地缘政治任务，因为完全取消这里的任何严格限制，将战略边界移至遥远的南方，并在民族文化、部落和区域边界的基础上重建整个中间地带，将符合心脏地带的利益。阿富汗没有完全中央集权国家的传统。那里居住着许多游牧部落和定居部落（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等），他们更多是因宗教（伊斯兰教），而不是因国家和政治相聚而居。因此，俄罗斯在

- 203 -

地缘政治上重返阿富汗是必然的，也是由地理环境本身决定的。唯一的需要依靠的，与其说是军事力量，不如说是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战略，是双方准备建立有意识的、自愿的战略联盟，以共同应对海权、“西方势力”，“大西洋主义”，这会主动拉近俄罗斯人和穆斯林的距离。塔吉克斯坦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主要基地的作用，其领土成为地缘政治实验室，两种不同方向的推动力在其中汇合：印欧欧亚南部的伊斯兰推动力和来自北部心脏地带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推动力。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或其他地方，应该制定俄罗斯-伊斯兰联合战略，以重组更北部的“图兰”。这片土地要做出划时代的决定，以创建新欧亚大陆，其中一方面是草原和北部森林之间，另一方面是同一草原（图兰）和伊朗之间成功综合将最终不可逆转地得到解决。

因此，顺理成章地从欧亚中心：莫斯科、杜尚别、喀布尔、德黑兰引出另一道曙光，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现实应沿此形成。

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的部分地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非常接近，与中国（新疆）几乎汇合到一处。尽管这些区域几乎无法通过，因为它们所处的帕米尔山脉高不可攀，但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本身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此处居住着伊斯玛仪派，这是一个伊斯兰异端教派，是什叶派最极端的表现，即伊斯兰教最为印欧（从精神角度来看）的版本。巴达赫尚的伊斯玛仪人定居在巴基斯坦附近地区，这个邦（虽然正式逊尼派）在种族上是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这表明他们当然更接近该宗教框架内的印欧倾向，如果不是坦率地说“什叶派教徒”，那么就是“隐匿什叶派教徒”。不远处是印度克什米尔，也居住着印度穆斯林和湿婆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也居住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因此，巴达赫尚的宗教特殊性及其战略地位使心脏地带能够积极参与解决集中在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如巴印战争、中国潜在的维吾尔伊斯兰分裂主义、西藏的民族解放斗争、旁遮普省南部的锡克教运动等。这个亚洲关键节点的所有线索都汇聚在塔吉克斯坦，或者更确切地说，汇聚在巴达赫尚。从这里开始，莫斯科霍罗格（巴达赫尚首府）的另一个独立轴心就出现了。此外，由于巴达赫尚与塔吉克斯坦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民族宗教和宗族矛盾），莫斯科应该将该地区单独列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现实，如马其顿或卡拉巴赫，因为霍罗格是一个巨大地区，其规模不仅超过塔吉克斯坦，而且超过了整个中亚，其重要性是问题的中心。

这个复杂的区域应该在陆权统治模式的基础上，利用俄罗斯“历史地理枢纽”的最积极影响进行重组，即与海权大西洋主义元素在这方面的计划相反。众所周知，正是英国支持了印度穆斯林的分裂运动，才导致了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印巴冲突也有利于大西洋主义者，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利用地缘政治矛盾，加强在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使整个地

- 204 -

区依赖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战略存在。目前，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已被牢牢地包含在海权控制的边缘地带。塔吉克斯坦和巴达赫尚的地缘政治角色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并在整个空间内组织欧亚大陆一体化体系。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考虑到最细微的民族-宗教和

文化-语言细微差别是极其重要的，而在军事战略领域，则必须争取严厉且无可争议的中央集权制。

政治上，原教旨主义伊朗的反美主义和印度的严格“中立”为欧亚战略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余的取决于莫斯科的地缘政治意愿，更广泛地说，取决于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意愿。

4.7 中国的没落

中国是俄罗斯在南方最危险的地缘政治邻国。在某些方面，它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但如果土耳其公开是北约成员，其战略大西洋主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与中国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的地缘政治最初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属于边缘地带，即太平洋（东侧）的“沿海地带”，另一方面，它从未成为海权国家，相反，它始终专注于大陆原型。因此，将中国称为“中间帝国”是一种稳定的政治传统，而这个术语恰恰是大陆型陆权政体形成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洋被印度支那半岛隔开，许多开放型海权导向国家如鲜花盛开遍布这一半岛。

在西方对东方的开发（殖民）过程中，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而由清朝最后几代皇帝的亲英傀儡政府统治。从 19 世纪初到 1949 年（中共战胜国民党），中国的地缘政治遵循纯粹的大西洋主义倾向（同时，中国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海权国家，而是作为西方的欧亚沿海基地）。共产党的胜利改变了局面，在短时间内（1949-1958），中国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欧亚亲俄政权。但由于历史传统，欧亚阵线很快就被抛弃，中国更倾向于“自给自足”。仍然需要等待，直到欧亚导向继续削弱，而潜在的大西洋主义，以及中国作为边缘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身份变得明显之时。这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与世界主义“三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了积极谈判。这意味着中国重新进入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结构。

不否认中国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再次走上欧亚联盟之路，但不必特别指望这一点。纯粹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与西方交往对中国的好处远大于与俄罗斯的交往，俄罗斯无法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而这种“友谊”只会束缚中国在远东、蒙古和南西伯利亚操纵地缘政治的自由。此外，中国的人口增长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领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似乎极具吸引力。

- 205 -

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原因有二：作为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基地，其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正在寻找“无人区”。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心地带都存在地缘威胁，这一威胁的地域极其危险。中国占据了勒拿兰以南的土地。

此外，中国具有封闭的种族和文化特殊性，在历史上，从未参与过欧亚大陆的建设。

无论政治细节如何，所有这些考虑，都使得中国成为俄罗斯在南部和东部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这应该被视为地缘政治公理。因此，俄罗斯在其“内部”南方地带最东段的地缘政治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向南的影响范围，并制造尽可能广泛的“边界区”。未来，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应该一路延伸到印度支那，但通过互利联盟来实现这一点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就是中国与伊斯兰亚洲（土耳其除外）和印度的根本区别。如果欧亚与欧亚其他南部地区的联盟应该基于考虑共同利益，也就是在认识到共同地缘政治使命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自愿联合，那么对中国而言，我们考虑的是，以施加地缘政治强大压力，以领土分裂、疆域破碎，以重新划分国家政治行政区划归属相威胁。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土耳其。中国和土耳其是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韩国、越南和日本是潜在的地缘政治盟友。这涉及使用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针对对手，应该努力造成伤害，针对盟友，必须揭示地缘政治目标的共性。

现在很容易推断出俄罗斯在从巴达赫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空间中“内部地缘政治”的优先事项。

这里的主要模式是将中国北方领土与更南方的土地分开。地缘政治分析立即为此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西北是新疆，是政治自治历史最悠久的诸国之地。历史上曾有诸国在此相互取而代之。此外，目前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维吾尔人，这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中国人通过直接军事压力、直接殖民统治、压迫当地居民、镇压他们捍卫宗教和民族自治的一切企图维持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在西伯利亚开发项目的框架内，俄罗斯沙皇之间已经有了将新疆并入俄罗斯的想法。关于边界线的这一想法应当再次回归。新疆以南延伸昆仑和西藏，我们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西藏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有着特殊的人口、特殊的宗教、古老的政治与民族传统。北京在这里的权力也是人为的，建立在直接暴力之上，就像在新疆一样。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很有兴趣，积极支持这些地区的分裂主义，并在整个地区开展反华民族解放斗争。未来，所有这些领土都将和谐地融入欧亚大陆联邦，因为地理和历史都不会将它们与大西洋主义联系起来。新疆和西藏必须进入陆权地带。这将是积极的地缘政治

- 206 -

决策，即使中国不放弃其反欧亚地缘政治项目，这样做也能为俄罗斯提供可靠的保护。没有了新疆和西藏，中国潜在的地缘政治就不可能突破并进入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同时，不仅这些领土将完全从中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甚至这些地区局势最初阶段的不稳定性也将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收获。

东部是俄罗斯战略盟友的蒙古部分。在这里，重要的是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在蒙古政治中可能出现亲中因素。蒙古大草原和沙漠完美地保护了南西伯利亚免受中国侵犯。同时，应强化蒙古和新疆与西藏的联系，以便为整个地区的新格局创造先决条件，重点是逐步取代中国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为此，可以提出蒙藏联邦的项目，其中还包括布里亚特、图瓦、哈卡斯和阿尔泰共和国。这些民族的喇嘛教传统对莫斯科的统一是反华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

工具。

南方地带的最后一个区域是位于中国东北的满洲里领土。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对中国而言）薄弱的地缘政治联系。在这片领土上还存在过具有政治独立传统的古代国家。早在 20 世纪，日本又重新建立了以哈尔滨为首都的满洲国，哈尔滨是日本侵华的大陆桥头堡。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满洲里存在一个不受中国控制的特殊政治国家是非常可取的。由于日本本身就是欧亚大陆潜在的地缘政治盟友之一，因此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努力。

西藏-新疆-蒙古-满洲里共同构成俄罗斯的安全带。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土地处于我心脏地带控制之下，同时利用俄罗斯潜在的地缘政治盟友印度和日本，以及遭受北京独裁的当地民众。对于中国本身来说，这一地带是潜在的“北上”进入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战略跳板。围绕南面紧邻勒拿兰的这片土地，将不可避免展开世界主要势力的地缘政治对抗性的阵地战。俄罗斯应该从中国攻下这个桥头堡，把中国推回南方，作为地缘政治补偿，允许它沿南北轴向南，发展印度支那（越南除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4.8 从巴尔干到满洲

欧亚大陆应该在从巴尔干半岛到中国东北的整个空间向南方“施压”。整条安全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安全区。居住在这个空间不同区域的人民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是不同的。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有使它们更接近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方案的因素。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正统；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历史上属于单一国家；对第三种人来说，这是民族和种族的亲和力；对第四种人来说，这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对第五种人来说，这是一种务实的算计。南方的这种多样性，决定了需要极其灵活的地缘政治和极其发达的论据来

- 207 -

证明这种需要是正当的连接与结盟等。这里没有一个标准是优先考虑的；不能只依赖民族、宗教、种族、历史、利润等因素之一。在每种情况下，都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同时，最高标准仍然是地缘政治及其法律，它们应使所有其他考虑服从于地缘政治及其法律自身，而不是仅仅成为基于某些单独和独立原则的外交（或国内）政策工具。只有这样，欧亚大陆才能实现稳定，俄罗斯才能可靠地确保其大陆安全和执行其陆权使命。

- 208 -

第 5 章 西方的威胁

5.1 两个西方

组织欧亚大陆西部空间的问题是构成所有地缘政治科学基础的主题。西欧是欧亚大陆

的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是最完整、最明确、历史上最可辨认的。考虑到俄罗斯自身是一个心脏地带，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就是“沿海文明”领域的全球主要对手，它完全承担了完整的制海权功能，并将其历史命运与海洋联系在一起。英国处于这一进程的最前沿，但所有接过工业化、技术发展和“商业体系”价值标准接力棒的其他欧洲国家也迟早会进入这个海权国家集合体。

在历史上形成西方最终地理格局的过程中，首要地位从英格兰岛转移到美洲大陆，尤其是转移到美国。因此，在制海权战略、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最大体现就是美国及其控制的北约集团。

全球力量的这一地缘政治最终将大西洋主义和制海权的极点固定于大西洋之外的美洲大陆。欧洲本身（甚至西欧，包括英国本身）从海权国家的中心变成了美国的“缓冲区”、“沿海地带”、“战略附属物”。这种制海权轴心的跨洋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如果说一个世纪前欧洲（英国和法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对手，那么二战后该地区失去了独立的战略意义，变成了美国的战略殖民地。这种转变严格地对应于“从海洋看”，这是任何海权国家对大陆的典型殖民态度的特征。早些时候，欧洲的“沿海”性质是一种潜在的特征，是由“英格兰岛”的特殊地缘政治形态激活的，那么现在它完全符合当前力量分布情况。美国，这个几乎是人为投射出的欧洲地缘政治现实，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极点，绝对意义上的西方，将欧洲从一个大都市变成了一个殖民地。这一切完全符合海权地缘政治的经典逻辑。

因此，目前，对俄罗斯来说最广泛意义上的全球西方地缘政治问题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作为美国的西方和作为欧洲的西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现实有不同的含义。作为西方代表的美国是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全面对手，是倾向于直接反对欧亚大陆的极点，是大西洋主义的总部和中心。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与美国的地缘政治阵地战一直是所有欧亚地缘政治的精髓，当时美国的作用变得越发明显。在这方面，心脏地带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在全球各个层面、各个地区对抗美国的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试图尽可能地削弱动摇、诱使堕落、蒙蔽误导并最终击败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尤为重要，要将无序的地缘政治

- 209 -

引入美国国内现实，鼓励各种分裂主义、各类民族、社会和种族冲突，积极支持所有破坏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稳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宗派团体。同时，应当支持美国政治中的孤立主义倾向，这些（通常是右翼共和党）圈子认为美国应该将自己限制在其内部问题上。即使“孤立主义”是在门罗主义原始含义的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将其影响力限制在南北美洲之内，这种情况对俄罗斯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这并不意味着欧亚大陆同时应该放弃破坏拉丁美洲世界的稳定，试图将某些地区摆脱美国的控制。应该同时对美国施加各种程度的地缘政治压力，就像大西洋主义的反欧亚政策一样，同时“赞助”战略集团（华沙条约）崩溃过程、国家统一（苏联）解体过程，进而，种族-领土的分裂过程，打

着俄罗斯区域化的幌子，逐步进行解体，直至彻底毁灭。心脏地带被迫以同样的方式对付海洋霸权。这种对称是合乎逻辑并且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对于美国的俄罗斯“外部地缘政治”的中心任务，因此更详细的分析超出了这项工作的范围。

第二个现实，也称为“西方”，有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欧洲，其地缘政治意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传统大都市，欧洲第一次发现自己处于战略、文化、经济、政治等殖民地的境地。美国的殖民主义和过去更明确但更僵化的形式不同，但其意义始终如一。欧洲目前没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意志，其功能仅限于作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辅助基地，以及最有可能与欧亚大陆发生冲突的地点。这种情况自动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反美路线成为欧洲国家共同的地缘政治选择，将它们团结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项目下。欧洲在马斯特里赫特的统一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和独立有机体而出现的第一个信号，欧洲声称要重新获得其历史意义和地缘政治主权。欧洲不想成为俄罗斯人，也不想成为或美国人。冷战结束后，这将充分体现出来。

现在问题来了：总的来说，欧亚大陆对其西部半岛的态度是什么？

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欧亚大陆显然有兴趣让欧洲摆脱美国大西洋主义的控制。这是一个优先事项。在西方，俄罗斯必须拥有海上边界，这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发展的战略要务。正是没有这样的边界，而是在中间出现了一条人为建立的、只得强行穿越欧洲的陆地路线，才最终导致了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失败。因此，任务是不再重蹈覆辙，并且纠正局面。只有当海洋成为其在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的战略边界时，欧亚大陆才能摆脱海上力量，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只有这样，文明的对决才能平等进行。

- 210 -

因此，俄罗斯有两个选择：军事占领欧洲，或者对欧洲空间进行重组，使这个地缘政治部门成为莫斯科可靠的战略盟友，保持其主权、自治和自给自足。第一个选项太不现实了，不应该认真讨论。第二种选择虽然困难，但可行，因为欧洲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度过的半个世纪，在欧洲意识留下了严重的印记。

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出现作为俄罗斯战略盟友的友好欧洲。否则，大西洋对手将想方设法拆散并分裂欧洲集团，引发类似两次世界大战的冲突。因此，莫斯科应尽可能为欧洲统一做出贡献，尤其是通过支持中欧国家，主要是德国。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盟，即巴黎-柏林轴线（戴高乐的计划），是建立新欧洲主体最合乎逻辑的支柱。德国和法国有着强烈的反大西洋主义政治传统（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政治运动）。这是潜在的，暂时隐而不露，在某个时刻，她会用她所有的声音表明自己。另一方面，莫斯科现在应该以这条路线为指导，而不是等待事态的最终发展。

莫斯科的任务是把欧洲从美国（北约）的控制中夺取过来，促进欧洲的统一，在莫斯科柏林主要外交政策轴心的标志下加强与中欧的一体化联系。欧亚大陆需要一个对盟友友好的欧洲。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本身（没有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构成严重威胁，与中

立欧洲的经济合作将能够解决俄罗斯和亚洲的大部分技术问题，以换取资源和战略军事伙伴关系。

从这一外部地缘政治任务出发，还应分析俄罗斯西部地区的内部政治形势。

5.2 破坏警戒线

分析“俄罗斯西部”地缘政治的主要模式是：“欧洲是欧洲人的，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在这里，一般来说，人们应该以与伊斯兰世界相同的方式行事，新的边界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地区应该重新划分，但在所有情况下，主要任务仍然是在西方建立友好的中立实体，拥有最大的民族文化、经济和社会自由，但战略上依赖于莫斯科。目标是将整个欧洲“芬兰化”，但我们必须从重组紧邻俄罗斯的空间开始。

这里立即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警戒线。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家非常清楚俄罗斯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结盟的战略危险，并且传统上寻求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海权统治最有效的方法是“警戒线”，那是几个边境国家组成的狭长地带，对东西邻国都怀有敌意，并与大西洋主义极点直接相连。这种“警戒线”的作用传统上由波兰和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南的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等国扮演。这种“警戒线”的构想是由地缘政治家麦金德 - 211 -

世提出的，并在二十世纪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实施得非常成功。此外，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都达到了目标，在两个大陆强国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开始了冲突，结果大西洋主义者获得了战略胜利。美国之所以能在西方领先，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血流成河，尤其是德国和俄罗斯（大西洋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筋疲力尽。

显然，即使现在，这样的“警戒线”也会出现，由那些弱小的、愤怒的、历史上不负责任的民族和国家创建，这些民族和国家狂热要求、卑躬屈膝地依赖海权统治的西方。

我们谈论的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出现的地缘政治地带，这一地带由无法完全进入欧洲，但又被莫斯科和欧亚大陆强烈排斥的国家组成。新“警戒线”成员的申请者是波罗的海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波兰（包括西普鲁士）、白俄罗斯（天主教反欧亚少数派在游说这个想法）、乌克兰（尤其是西方东仪天主教）、匈牙利、罗马尼亚（也受到东仪天主教徒的影响）、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很明显，我们几乎到处都在谈论东欧的天主教部门，传统上属于西方的影响范围。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与在地缘政治历史上不止一次作为破坏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以及最近的苏联大陆结构的杠杆的国家打交道。

欧亚大陆的任务是确保这条警戒线不存在。这符合欧洲和俄罗斯的利益。这些组织本身，如果我们将它们视为国家组织，它们是难以为继的，在种族和宗教上相互矛盾，在战略和经济上不发达，资源匮乏。换句话说，这些虚构的国家只有作为大西洋主义人为支持的战略区

域才有意义。到处都有将他们与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东正教，或对斯拉夫血缘关系的认识，或俄罗斯人口的存在，或历史上的接近，或同时存在几个组成部分等），但也有相反的因素将它们带来更接近西方（天主教、合并教派、种族差异、主权政治传统等）。只要这些阵型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就不能偏爱这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成为“警戒线”这个词的完整含义。与东方的融合受到某些因素的阻碍，与西方的融合则受到其他因素的阻碍。因此，这些国家不断挑起国内外的不稳定，这正入海权国家下怀，成为欧亚地缘政治和大陆集团前进道路上的持续障碍。

消除“警戒线”的唯一方法是基于纯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肿瘤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将领土并入其他国家。我们可以讨论在那些国家的地方建立联邦，或者地缘政治取向明确的若干国家。在种族、文化和信仰上团结的小实体更容易融入大型地缘政治集团，并且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存在强大的盟友关系的情况下，新的边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门槛，或者关系的破裂。而且，只有没有“警戒线”，才能让这些泛欧亚关系正常化，将“都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空间变成欧亚合作、协作、战略伙伴的区域。

- 212 -

5.3 波罗的海联邦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虑与俄罗斯相邻的整个西部地带。整个空间被分成几个部分。北部是斯堪的纳维亚带，从挪威到芬兰。关于芬兰，我们在专门讨论北方的章节中考虑了一般的地缘政治项目。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创建卡累利阿-芬兰民族领土实体，拥有最大的文化自主权，但战略性上融入欧亚集团。挪威和瑞典以及波罗的海共和国属于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比卡累利阿-芬兰问题更广泛。

在这里，我们面临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地缘政治这个更普遍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最方便的方法是追随瑞典地缘政治家鲁道夫·契伦（他发明了“地缘政治”一词），将整个波罗的海地区视为中欧的北部延伸，并围绕德国构建。契伦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缘政治要想得到发展，除了在种族、文化和地理共同性的基础上同德国建立战略联盟外，别无他法。但是整个结构的连接元素应该是普鲁士，这个德意志国家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教派。新教-斯堪的纳维亚集团应该是普鲁士柏林北部的延伸。因此，所有这些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整体的空间，都离不开恢复普鲁士统一的地缘政治。当时，普鲁士并不存在，它的土地分布在德国、波兰和俄罗斯之间。因此，缺失了建立一个“中立的”政治上和莫斯科友好的波罗的海联邦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按照欧亚原则组织这一地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纯理论层面上，这个问题分两个阶段解决：

1) 一个新的民族忏悔空间正在历史普鲁士边界内重建。发起者是莫斯科和柏林。这意

味着轴心人物对俄罗斯的忠诚，这将给这种教育带来生命，失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普鲁士的一些土地（加里宁格勒地区）。

2) 在普鲁士周围，波罗的海国家形成单一集团的战略统一进程开始了。该区块包括挪威、瑞典、德国、爱沙尼亚、芬兰-卡累利阿、丹麦，可能还有荷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享有特殊地位。一个强制性条件是所有国家从北约撤出并在波罗的海建立非军事区。未来，战略控制权将移交给莫斯科和“中立”欧洲的武装部队，即移交给欧亚防御联合体。

这个体系中唯一薄弱的部分是波兰和立陶宛，那里的主要教派是天主教。这些土地是针对欧亚大陆的海权地缘政治的主要杠杆，并有可能建立一个大陆集团。此外，历史上曾有波兰立陶宛公国政治独立的先例，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斯宾格勒）甚至提到存在一种特殊的“波罗的海文明”，一般来说，它在地理上与波兰和立陶宛的历史边界是一致的。只是某些

- 213 -

历史条件不允许这个文明完全发展，致使其“流产”（如斯宾格勒所言）。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积极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是这样表述的：波兰-立陶宛空间或者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现实存在（然后它将成为以普鲁士为轴心、亲欧亚的波罗的海团结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或者它的碎片将被整合到其他地缘政治集团中，而它本身将被肢解并粉碎在萌芽状态。该地区的任何基于天主教的融合都会在东方（莫斯科）、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新教世界）和西方（德国）之间产生紧张关系。因此，在波兰和立陶宛，欧亚大陆的主要地缘政治伙伴应该是坚持这些国家政策的非天主教导向的力量、世俗“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新异教徒”、“种族中心主义者”、新教徒、正统宗教界、少数民族。此外，波兰-立陶宛关系中的种族紧张局势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因素，应该加以利用，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使其雪上加霜。

如果重新建立普鲁士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与波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只能向南走（因为波罗的海地区将处于德俄控制之下），于是立陶宛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因为它是天主教世界的最北端，在波罗的海有很长的海岸线，将俄罗斯空间与中欧的北端隔开，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显然，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家不会不利用这种情况，并试图使立陶宛成为不和的根源，成为欧洲重组的主要障碍。通过加强整个地区的战略团结，并通过连接瑞典-丹麦从西北关闭这整个地区，有可能只是部分地限制立陶宛地缘政治位置对欧亚计划的负面影响。

5.4 天主教斯拉夫人进入中欧

再往南走，我们进入斯拉夫-天主教或合并教会区域，从波兰穿过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沃尔希尼亚、加利西亚、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克

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地缘政治上 与这个空间相邻的是匈牙利、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分别居住着天主教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合并教会也存在于东正教的罗马尼亚。这个以斯拉夫为主的空间，尽管与俄罗斯在种族和种族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未将自己与东斯拉夫国家联系起来，更不用说与莫斯科的欧亚帝国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族裔亲属关系不是地缘政治一体化的充分基础。这一因素的模糊性在历史上引起了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比欧洲范围更广）的冲突和战争，并阻碍了天然、一致地组织起中欧地缘政治整体。

文化上的斯拉夫天主教民族是在奥匈帝国发展起来的，只有在维也纳本身失去其超国家的帝国地缘政治使命的想法，并越来越认同种族“日耳曼主义”时，才与之产生了种族摩擦，并导致其崩溃。唯一的例外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斯尼亚，斯拉夫人最初意识到他们与德国天主教开始时的精神差异，这表现在胡斯战争、改革势力膨胀和宗派主义爆发（以 - 214 -

波斯尼亚-波戈米尔-塞族为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都属于中欧，应该围绕中欧的中心发展，自然就是围绕德国发展。莫斯科对这些地区的直接影响永远不会成为优先事项，因为种族的亲近只是强调文化历史、精神信仰方面的差异而已。

基于这些考虑，俄罗斯需要放弃对东欧国家的直接控制，将其交给德国控制。同时，莫斯科不应被动地坐等这件事自行发生，而应积极推动这一领域的有机进程方面做出贡献，以便与柏林一起成为整个进程的发起者和实施者，从而在解决所有微妙问题上获得地缘政治利益。与此同时，有必要放弃对乌克兰西部、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某些地区的统治地位，因为这些地区合并派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人口稠密。这同样适用于白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莫斯科拒绝对某些领土进行直接的政治支配，作为回报，莫斯科应该获得在整个中欧地区最西端边界上战略存在的权利。这是整个东欧重组的本质。莫斯科应该同意为整个天主教-斯拉夫空间提供在柏林的领导下融入中欧的机会，即按照南北原则关闭该区域。唯一重要的是从这个整体中排除立陶宛（出于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以便整个中欧结构应该受到两个方面（俄罗斯和德国）的严格保护），完全排除西方的制海权，因为否则这整个地带将南辕北辙，变成“警戒线”（尽管创建它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警戒线”）。

5.5 白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结盟

在东欧宗教结构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北向南，东正教人口如何越来越向西迁移，从而排挤着天主教人口。塞尔维亚的一些土地延伸到亚得里亚海沿岸，此外，阿尔巴尼亚人中有一定比例的东正教徒（独立阿尔巴尼亚的创始人是东正教牧师范诺利）。

这些领土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中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具有双重地缘政治性质；地理上属于中欧南部，文化和信仰上属于俄罗斯-欧亚大陆。这些民族的精神认同是由南方反对伊斯兰教和西方反对天主教形成的，他们的民族观念与正统信

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既不能将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控制权完全放给德国，也不能宣布其对这些国家直接施加政治影响。此外，俄罗斯与摩尔多瓦的关系和俄罗斯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更不用说乌克兰了）。俄罗斯与塞尔维亚有着最密切的历史联系，但不可能在此基础上采取整合整个地区的策略，因为塞尔维亚传统上与东正教邻国的关系也相当紧张。此外，我们在南方一章中介绍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总体情况。在这里，应该更具体地考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占据的领土。

- 215 -

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形势十分清晰。除了一小部分被波兰化的白俄罗斯人（天主教徒和合并派天主教徒，以及波兰人）外，绝大多数人口显然属于俄罗斯地区，应被视为欧亚中部的民族主体，即作为文化、宗教、种族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语言的特殊性，一些民族和文化特征不会改变整体情况。因此，莫斯科应该以最密切的方式与白俄罗斯融合，同时不要忘记促进白俄罗斯人的文化和语言认同是构建整个欧亚融合体系中的重大关节点。对于属于一个国家的民族，应该像对待边境民族或邻国一样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白俄罗斯为防止离心和颠覆倾向，需要采取的唯一痛苦步骤是，将天主教徒和合并派天主教徒居住的某些地区单独列为一个特殊行政类别，直到给予他们足以进入中欧空间的充分自治权。不惜一切代价将白俄罗斯完全置于莫斯科直接和严格控制之下的愿望，将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本身及其西部邻国都将面临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余烬，在这种情况下（与立陶宛不同）可能会决定去解决所有相关各方的利益。

白俄罗斯应被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因此应沿东西轴线与白俄罗斯进行融合，这在所有同种族区域的内部组织中都是一个优先事项。俄罗斯真正的西部边界应该在西部很远，因此，在完整的地缘政治图景中，白俄罗斯的土地更可能属于中部地区而不是西部郊区。

5.6 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分解

乌克兰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构成模式非常相似。然而，在这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规模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一个巨大的领土实体，在数量上超过了许多欧洲大国。分裂主义和政治主权倾向在乌克兰更为活跃。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它既没有具普遍意义的文化特质，没有地理独特性，更没有种族排他性。乌克兰的历史意义体现在它的名字“乌克兰”，即“郊区”、“边境地区”。在基辅罗斯时代，今天的乌克兰领土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中心，当时弗拉基米尔（后来的莫斯科）是东郊（“乌克兰”），诺夫哥罗德德在北部。但随着俄罗斯从斯拉夫国家转变为欧亚帝国，最大中心的地缘政治功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的意义。莫斯科成为帝国的首都，基辅成为欧亚和中欧影响汇聚的次要中心。没有任何文化综合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更古老、更纯粹的俄罗斯东正教阶层受到了

西欧充满活力的更为“现代”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西部的波兰和西南部的奥匈帝国。毫无疑问，乌克兰的文化和语言是不寻常及独一无二的，但这些文化和语言毫无普遍意义。哥萨克定居点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乌克兰民族，以独立、特殊的伦理、经济和社会结构而著称。

- 216 -

但所有这些要素不足以实现地缘政治独立，从乌克兰的河流地图可以看到，其主要河流（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等）相互平行流动，解释了乌克兰建国的缓慢发展。

出于这个原因，乌克兰的独立存在（尤其是在其现代边界内）只能作为“警戒线”才有意义，因为地缘政治方向相反的因素不会让这个国家完全加入东方集团或完全加入西方集团，也就是说，既不加入俄罗斯-欧亚大陆，也不加入中欧。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乌克兰是欧洲制海权战略的傀儡，并为其地缘政治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的作用类似于波罗的海共和国。在此基础上，一度认真讨论了创建“黑海-波罗的海联邦”的计划。即一个典型的颠覆性地缘政治形成的“警戒线”，其作用是挑起东欧的不稳定，并为一系列武装冲突准备先决条件。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于目前的边界内，这无疑是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安全巨大的打击，这无异于入侵俄罗斯领土。

无法接受一个统一的乌克兰进一步存在下去。这片领土应该根据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现实的范围划分为几个区域。

1)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河以东从切尔尼戈夫到亚速海的所有地区）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主要是大俄罗斯族群和东正教小俄罗斯人。所有这片领土肯定都靠近俄罗斯，在文化、历史、种族、宗教上都与俄罗斯相连。这个发达、技术先进的地区很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地区，拥有广泛的自治权，但与莫斯科结成无条件和最强大的联盟。在这里，沿经线方向整合更可取，哈尔科夫地区与更北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地区）适当的俄罗斯领土相连，并将此结构继续向南扩展。

2) 克里米亚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实体，民族混居是其传统特征。小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定居于克里米亚的格局非常复杂，代表了三种相互敌对的地缘政治推动力。大俄罗斯人坚决支持莫斯科（比乌克兰其他地区甚至东部地区更积极）。相反，小俄罗斯人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通常更倾向于土耳其，对俄罗斯颇有敌意。不应考虑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地缘政治取向，因为土耳其在各个方面都是俄罗斯直接的地缘政治对手。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克里米亚直接并入俄罗斯会引起小俄罗斯民众的极度负面反应，并将给这个半岛通过乌克兰领土融入俄罗斯体系造成问题，这通常是不现实的。将克里米亚留给“主权乌克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并在克里米亚内部产生种族紧张局势。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结论表明有必要给予克里米亚特殊地位并确保在莫斯科直接战略控制下的最大自治，但要考虑乌克兰的

- 217 -

社会经济利益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民族文化要求。

3) 乌克兰中部, 从切尔尼戈夫到敖德萨, 也就是基辅所在的地方, 是另一个完整的地区, 小俄罗斯族群和语言在种族上占主导地位, 但东正教是主要的信仰。这个东正教小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现实, 在文化上类似于东乌克兰, 当然也肯定包含在欧亚地缘政治体系中。

4) 乌克兰西部是多样化的。在其北部是沃伦, 这是一个独立地区, 南部是利沃夫地区(加利西亚), 再往南是外喀尔巴阡山脉(西部山脊), 最后是比较拉比亚的东部。所有这些地区都是相当独立的地区。合并派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沃利尼亚占主导地位, 该地区在文化上属于中欧的天主教地缘政治部门。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的情况几乎相同, 尽管这些更偏南的土地代表了不同的地缘政治现实。历史上, 沃伦与波兰有关, 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与奥匈帝国有关。乌克兰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人口混居, 小俄罗斯人与大俄罗斯人, 和罗马尼亚人与摩尔达维亚人交错而居。这个地区几乎完全是东正教, 是一个东正教地带, 从大俄罗斯斜向巴尔干半岛到塞尔维亚。从比萨拉比亚到敖德萨的整个区域应该归属于乌克兰中部的地缘政治空间, 因此将其包括在第聂伯河左岸的经向地带中更为合乎逻辑, 其西部边界从罗夫诺沿线延伸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南北轴线再沿德涅斯特河向南延伸至敖德萨。

因此, 西乌克兰, 在其狭义概念上, 由沃伦、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三个地区组成。领土相近, 但它们在地形(外喀尔巴阡山脉, 就像斯洛伐克一样)、种族构成和政治传统上都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今天积极影响乌克兰的总体政治气氛, 积极奉行反莫斯科、亲西方的地缘政治路线, 应该给予很大程度的自治(直到政治自治), 以便像在中部和东部区域做过的那样, 将这些“颠覆性”的领土从东正教和一般来说亲俄罗斯的全乌克兰地域中分离出来。俄罗斯在这些纬度平行线上的战略边界不能取决于乌克兰-波兰、乌克兰-匈牙利或乌克兰-斯洛伐克边界的位置。这个战略边界应该位于西部, 至少在中欧的西端, 最好在大西洋沿岸。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这一地区的整个地缘政治重组才得以进行, 因为, 作为东欧地缘政治变革的发起者和德国的主要合作伙伴, 俄罗斯应该首先坚持这样一个条件, 即必须在整个地区将大西洋主义的控制清除出去, 并在这里建立起欧亚大陆防御体系, 其中包括俄罗斯与整个欧洲之间的战略性军事合作。

沃里尼亚、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可以构成一个共同的“西乌克兰联邦”, 其融合程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任意设定。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在乌克兰中部(实际上基辅土地)和乌克兰

- 218 -
西部, 以避免不和谐的中欧天主教或统一对东正教领土的影响。

乌克兰因素是俄罗斯西部地区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在其他地方, 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生存能力遭到破坏的危险是潜在性的, 欧亚地缘政治体系的阵地斗争只为自己设定预防目标, 那么存在“主权乌克兰”这一事实, 则是地缘政治层面对俄罗斯宣布地缘政治战争(但这不是乌克兰本身的问题, 而是大西洋主义和海上霸权的问题)。关键不在于乌克兰本身有意识地选择了大西洋主义“警戒线”的角色(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的确是刻意的举动), 乌克兰

实际上开始履行了这个角色，因为它不主动打开融入与莫斯科的整合进程，或（至少）不分裂为独立的地缘政治成分。

乌克兰问题是莫斯科面临的最严重的主要问题。如果北方和“极地梯形”的问题与遥远的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未来有关，如果开发西伯利亚和勒拿兰战役在不久的将来很重要，如果最终重组亚洲南部的阵地战略与俄罗斯有关，那么西方的地缘政治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中心，即“乌克兰问题”，需要莫斯科立即做出反应，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对俄罗斯造成真正的战略打击，“历史地理枢纽”根本没有权利不对此做出回应。

考虑到莫斯科与基辅的简单一体化是不可能的，也不会提供一个稳定的地缘政治体系，即使这种情况不顾一切客观障碍真正发生，莫斯科也应该按照唯一合乎逻辑和自然的地缘政治模式积极参与重建乌克兰地区。

5.7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在什么标志下融合？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是一个地缘政治区域的两个部分，居住着单一东正教族群，达契亚人的后裔，他们讲拉丁语组的语言，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斯拉夫环境的文化、语言和种族元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应该为自己的目的而努力实现这一融合，以便将这一空间纳入其直接的战略控制区。罗马尼亚的文化通常是典型的东正教模式，这一模式将这些土地与欧亚大陆直接联系了起来。这些土地完美融入俄罗斯的唯一障碍是语言因素和与这一地区在地缘政治上亲近天主教区域。此外，在罗马尼亚西部的巴纳特，有很大比例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合并教徒。

穿过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中部，有一条连续的东正教人口居住地带，将俄罗斯的土地与巴尔干半岛地区欧亚大陆的前哨塞尔维亚连接起来。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单一的战略和文化区域，事实上，变成一个国家，这符合欧亚大陆的利益。这就要求莫斯科充当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一体化的发起者，最初应该将东正教和欧亚大陆定为这两国一体化的标志。同时，必须由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斯拉夫东正教民族、从东方和西方封闭罗马尼亚

- 219 -

东正教飞地，从而确保领土一体化的连续性，而且这个一体化与其说是基于种族，不如说是基于宗教和文化血缘关系。同时，这样一个从德涅斯特到黑山的“东正教集团”，其中心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罗马尼亚，应该与柏林合作得到发展，柏林得到中欧更西部地区，从普鲁士出发，通过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和奥地利，然后到克罗地亚，也就是到达亚得里亚海。如果我们再加上德国向北的波兰和东普鲁士的东部边缘，那么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向西的自然延伸将是合乎逻辑和可接受的，而不会破坏中欧的地缘政治平衡，这在地缘政治上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

5.8 条件：土壤，不是血统

所有这些行动都遵循欧洲地缘政治的总体图景，其中明确区分了中欧（在德国的支持下）和狭义的西欧地区。俄罗斯与西欧没有直接接触点，因此在该地区（其中法国是关键要素）实施欧亚战略取决于在柏林-巴黎轴线上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结构。但西欧的欧亚因素不可能直接与莫斯科的路线相呼应。莫斯科只通过柏林出现在这里，欧亚大陆主义和反大西洋主义倾向在这里用一个术语“亲德”来描述。对于法国人来说，不能要求一种比“亲德主义”更鲜明的“欧亚主义”，因为西欧通过德国大陆主义来理解心脏地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一个“地缘政治抽象概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该对西欧问题漠不关心。让整个欧洲摆脱大西洋主义的影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意味着莫斯科应积极推动西欧与中欧的结盟，即与德国的结盟。

同时，首先要向德国自身提出一个基本要求：考虑到柏林在中欧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是公开的，所以中欧地区的所有一体化进程，以及西欧所有旨在将欧洲列强转向德国的转型，都必须排除德国人在文化、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欧洲应该是欧洲人的欧洲，中欧应该是中欧人的中欧，即欧洲人民的整个语言、种族和精神认同应该得到蓬勃发展并受到柏林的鼓励，柏林的优先事项应该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和社会的，而不是种族的。由于俄罗斯与中欧民族（斯拉夫人）的种族血缘关系，莫斯科还对许多中欧民族负责。此外，不止一次地导致了欧洲的血腥冲突的，正是德国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种族的傲慢。在整个欧洲地缘政治重组过程中，俄罗斯必须担当保证人，确保柏林将严格区分地缘政治和种族，“土地和血统”，以刻意排除像希特勒冒险这样的悲剧。在欧洲地缘政治重组的问题上，柏林自己必须无情地镇压任何德国民族主义的迹象；开展所有进程的基础，必须是最严格地遵守“各族人民的权利”，遵守其文化、宗教和语言完全自主。

- 220 -

莫斯科应该对自己和盟友提出同样的要求。只有在积极的方面，作为肯定的现实，作为国家的自我认同，民族原则才应该得到地缘政治中心的鼓励和积极支持。当然，不能指望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会完全消失，民族自我肯定的消极面一定会出现，但此时地缘政治中央集权制原则应该作为超民族的最高仲裁者积极发挥作用，以整个欧亚大陆重要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为基础，解决内部问题。

这一原则适用于应建立欧亚新秩序的所有地区，无论是俄罗斯内部还是外部。但就西方和欧洲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地区的种族问题是震撼 20 世纪所有最可怕冲突的核心。

- 221 -

第六部分 欧亚分析

第 1 章 正统地缘政治

1.1 基督教徒居住地的东西方

确定东正教地缘政治细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在谈论东方教会。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内，在地理上与欧亚大陆西北、中东和北非重合的美洲被发现之前，在东正教空间和天主教空间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当然，这种分界并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东正教世界在精神和品质上都与东方有关，而天主教则是纯粹的西方现象。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 1054 年教会最终分裂之基础的神学表述本身，必然带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元素。

关于“和子句”（*filioque*）的争论，即圣灵只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的争论⁷⁷，在神学术语中预示着两种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即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和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的东方文明。西方对《尼西亚信经》关于通过“和圣子”的修正案，最终巩固了所谓“从属主义”的理性主义神学的方向，即引入神圣现实的等级从属关系，轻视三位一体的神秘和超级智慧的本质。

与“和子句”问题平行的一个重要的分歧点是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观念和教皇的最高神学权威。这也是天主教“从属主义”的后果之一，它坚持严格、直接的等级制度，即使在那里以圣灵拯救世界为标志的事情上也是如此。这样的立场完全违背了地方教会的语言自主权，一般来说，也违背了东正教传统上精神实现方面的最终自由。

最后，将教会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罗马拒绝了关于帝国的教父式教义，帝国不只是一个世俗的行政机构，正如教皇所想象的，帝国大致服从于教会的权威，帝国还是一个神秘的救赎论有机体，积极参与末世场景，正如使徒保罗所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所提到的，作为“敌基督者到来的障碍”、“拦阻者”（*κατεχον/katechon*/卡特康）。

神圣行动的超理性（用否定法所得神秘神学的首要地位），地方教会的精神和语言自由（追溯到五旬节那天使徒的语言），以及帝国和皇帝神圣作用的教义（东正教神学理论），是

⁷⁷ 回想一下，东正教相信圣灵只来自圣父（尽管圣子知道），天主教徒声称也来自圣子那里，在拉丁语中 *filioque* 的意思是“和子句”。

确定东正教与天主教相反的细节要点，在这些方面，天主教实际上否认了基督徒。

所有这些分歧在最终决裂之前很久就很明显了，但有可能在 1054 之前仍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从那以后，基督教徒居住地的地缘政治二元论就完全确定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世界就

开始各走各的路。

直到 1453 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之日），东正教在地缘政治上把自己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天主教世界席卷了西欧。在那之前，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是两个基督教的“大空间”（用地缘政治术语来说），拥有各自的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并具有明确固定和毫不含糊的神学特性，反映和预先确定了教会与所有知识教条独特性以及逻辑联系之间的差异。西方以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主义神学为基础，东方延续了神秘神学、忏悔主义和修道思想工作的路线，这在伟大的阿索斯静修士圣格雷戈里·帕拉马斯（St. Gregory Palamas）的文本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

帕拉马斯反对托马斯·阿奎那是反映基督教东方和基督教西方地缘政治二元论本质在神学上的习惯做法。塔博尔之光的神秘沉思，权威的和谐性、地方教会礼仪上的含混用语（东正教），这些就是在反对理性主义神学，反对教皇在欧洲国王的世俗事务中的命令，反对将拉丁语作为唯一神圣礼仪语言的主导地位（天主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地缘政治对抗，具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不同的心理主导和不同的特定政治结构。

这是对东正教地缘政治学基础最简要的概述。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和东正教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他们的结构，保护他们的政治和精神影响的界限，捍卫他们的独立性。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东正教有两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

- 1) 非基督教世界，它们的压力既表现为蛮夷对帝国外围的袭击，也表现为伊斯兰化土耳其人的巨大压力；
- 2)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它不仅被视为“拉丁异端”的土地，而且是一个背道、叛教的世界，是一个知晓真理、明白救赎的那些人的国家，但这些人却被抛弃，却遭背叛。

在对东正教地缘政治地位的这样一幅初步而完整的图景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拜占庭崩溃后的许多世纪里，东方教会和东正教国家会担心的所有那些地缘政治问题。拜占庭皇帝在某些时候面临着“土耳其头巾或拉丁主教礼冠”的双重威胁。考虑到对西方和罗马神学的特殊态度，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些在没有给出第三种情况下选择支持“土耳其头巾”的东正教徒。顺带提一下，许多东正教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上帝对拜占庭地缘政治步骤的惩罚，拜占庭试图在所谓的“佛罗伦萨联盟”中承认“和子句”的说法来接近罗马（尽管在大使返

- 223 -

回君士坦丁堡时因这样承认“和子句”而遭到谴责）。

1.2 后拜占庭东正教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整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仍然是东正教的领袖，但整个结构的和谐被打破了。让我们回想一下，东正教的基石之一是关于帝国的救赎功能学说，由于东正教帝国（以及相应的东正教皇帝瓦西列夫斯）不复存在，教会

被迫进入一个新的、特殊的，且相当矛盾的存在时期。从那一刻起，整个东正教世界被分成了两部分，它们不仅在地缘政治上，而且在神学上都存在深刻的差异。

后拜占庭东正教世界的第一部分是那些发现自己处于非东正教国家政治控制区域的教会，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直到这个帝国崩溃之前，这些教会在行政上进入所谓的东正教“米利特”，包括东正教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被认为是这些东正教中的至高无上的人物，尽管与他一起的还有亚历山大大牧首（居住在埃及的东正教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大牧师）和安提阿的大牧首（现代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领土上的东正教阿拉伯人的领袖）。耶路撒冷的小宗主教区以及塞浦路斯和西奈山的自治教会具有特殊的地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在整个东正教世界中的精神主宰，尽管没有像天主教那样直接的等级制度，而且自治教会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⁷⁸。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位于法纳尔（Phanar）区，这个词来自这个宗主教区的希腊神职人员的统称，“法纳里奥”（Phanariots）。让我们注意到，自 1453 年以来，这部分的东正教世界在地缘政治和神学层面上都处于模棱两可的位置，因为东正教缺失国家地位，这直接影响了东正教对政治历史的末世愿景，并意味着教会存在于世界，如同陷进“叛教之海”，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毁灭之子”的神秘降临。当局不可避免地拒绝东正教的政教和谐，这使希腊东正教教会（以及其他与政治命运相关的教会）变成了不同于最初的东西。这意味着它的神学和地缘政治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它的神圣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成熟的东正教学说清晰认识神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使俄罗斯走上了自 15 世纪以来一直走的与“第三罗马莫斯科”理论密切相关的道路。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是后拜占庭东方基督教的第二部门，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甚至精神性质。

在俄罗斯建立宗主教区和宣布莫斯科为“第三罗马”，直接关系到东正教的神秘命运。

⁷⁸ 另外，我们应该考虑保留其亲戚的格鲁吉亚东正教教堂脱离土耳其人的独立。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俄罗斯仍然是唯一一个现存的东正教政治和东正教教会的地缘政治“大空间”。俄罗斯成为拜占庭的继承者，既有神学的原因，也有地缘政治层面方面的原因。只有在这里，东正教的三个基本参数才全部都得以保留，这与拉丁西方和非基督教政权的政治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连同“阻止毁灭之子到来”的神秘地位，莫斯科继承了君士坦丁堡全部地缘政治使命。就像拜占庭一样，俄罗斯面临着两个敌对的地缘政治现实，有着同样的“拉丁主教礼冠”，和同样的“土耳其头巾”。但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历史责任落在了俄罗斯沙皇、俄罗斯教会和俄罗斯人民身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这一责任被转移到莫斯科身上，这一事实赋予了整个局势一场特殊的末世戏剧，这种戏剧不仅反映在过去五个世纪俄罗斯人的心理上，而且反映在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教会地缘政治取向的细节上。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民作为“直接承载上帝意志之子民”的概念也形成了。

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与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世界的关系，以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对于莫斯科宗主教的地位。关键是非俄罗斯东正教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要么承认俄罗斯是“救世方舟”、新的“圣地”、“拦阻敌基督者到来的人”，因此服从莫斯科的精神权威，或者，相反，否认存在这样一个“东正教王国”的可能性，并将莫斯科视为非法篡夺拜占庭的末世功能。根据这一选择，莫斯科必须与其他教会建立关系。可以说，事实上，从那一刻起，东正教世界就分成了地缘政治和神学两部分。众所周知，反莫斯科路线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范围内获胜，这意味着法纳利奥的希腊神职人员在不存在政治投射问题的情况下，调整了东正教的教义。换句话说，希腊东正教改变了它的本质，从一个完整的精神和政治学说变成了一个完全宗教的个人救赎教义。从现在开始，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成熟的两个版本东正教之间的对抗，在莫斯科的情况下是成熟版本的东正教，在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下是退化版本的东正教。

此外，希腊东正教品质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使其更接近罗马的路线，因为教条矛盾的三个主要点之一（“拦阻者”问题）自行消失了。法纳里奥派希腊神职人员与梵蒂冈的精神和解，伴随着他们与土耳其政府的政治和解，在土耳其政府中，许多东正教希腊人传统上担任着高级职位。存在这种分裂，加上与俄罗斯教会争夺对东正教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剥夺了希腊东正教独立的地缘政治使命，在奥斯曼当局和教皇使节政治阴谋的更普遍非东正教背景下，使其成为次要地缘政治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自 15 世纪以来，“东正教地缘政治”一词几乎与“俄罗斯地缘政治”一词相同。

同时，如果认为整个非俄罗斯东正教世界都被法纳利奥派的政策所控制，那是错误的。

- 225 -

在它的各个部分，也存在着相反的情绪，承认东正教俄罗斯在神学和末世论的首要地位。这对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些人中，传统上，亲俄派和法纳里奥派的地缘政治倾向相互竞争。这在 19 世纪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东正教民族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他们的国家和政治独立。

1.3 圣彼得堡时期

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和巴尔干东正教民族独立斗争开始之间，发生了一件对东正教具有最广泛意义的重要事件。我们所说的是俄罗斯的分裂以及紧随其后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就在这时，俄罗斯的东正教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200 年左右坚不可摧的东方教会教义基础从此动摇。事实是，首都从莫斯科转移到圣彼得堡，废除了宗主教区，并建立了主教会议，意味着俄罗斯不再是神学和末世论意义上教条合法的东正教帝国。事实上，从适当的东正教地缘政治模式转变为一种新教国家。从现在开始，俄罗斯东正教也变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现

实，只是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与俄罗斯国家部分重合。但是，尽管人人皆知，教条式背景已经动摇，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一般逻辑，虽然是在不同层面上，却仍然延续着最初的路线，因为世俗和纯粹的政治利益开始明显地支配宗教和末世论问题。同时，在西方本身，传统的天主教模式也让位于加强纯粹的民族政治形态，以及国家民族，因此，面对更实际、更商业化、更狭隘的政治利益时，神学问题则被抹去而消失在背景之中。然而，除了出现新教国家外，由教会分裂所确定的地缘政治联盟则总体上保持不变。

新教在地缘政治上严格分为两个部分：普鲁士路德教和盎格鲁-瑞士-荷兰加尔文主义。尽管两次反对罗马的抗议活动在表面上相似且同步，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却有着几乎截然相反的意义。路德派阵营，主要集中在普鲁士，在教条和神秘的基础上，以“新约”为前提，从激进化的角度批判梵蒂冈，一般来说，这再现了传统东正教对天主教的那些主张。路德普鲁士在地理上位于东正教俄罗斯和天主教西欧之间。加尔文教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国教（然后又极大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它是基于强调旧约的方法，并从这些立场批评罗马。地理上的加尔文教及其衍生的教派都被欧洲和大西洋彼岸的极端西方所吸引，这绝非巧合。

罗曼诺夫家族的后彼得大帝俄罗斯更接近普鲁士模式。也就是说，它背离了东正教的教条，在中途停下来又偏向于天主教，而且天主教逐渐被民族国家所取代。与此同时，主要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集中在一方是俄罗斯和另一方是奥地利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在宗教层

- 226 -

面上，这是东正教反对天主教（奥地利）和加尔文主义（英格兰）。专制主义和革命的法国在这中间发挥了特殊作用，努力传播共和思想和启蒙运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罗斯与奥地利有一些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反对土耳其方面），那么英国的战略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俄罗斯的战略相反，直到英国人支持奥斯曼帝国。

尽管如此，即使是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也继承了拜占庭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尽管“第三罗马”概念的教条完整性受到了侵犯。“上帝子民”的方式是成熟的，神学上是健全的，但从现在起，只能谈论靠惯性延续这种方式。在这种转变的同时，物质利益和狭隘的政治利益开始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宗教因素本身经常被用作这种或那种政治行动的借口，其目的则完全是为了国家的世俗利益。

1.4 东正教民族的民族解放

在 19 世纪，许多东正教民族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等，他们开始积极摆脱土耳其人的政治控制。宗教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动机之一。

新东正教国家的出现和奥斯曼帝国的毁灭是几个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结果：

1) 土耳其人政治权力的衰落使希腊人和其他巴尔干人的民族感情得以发展，这反过来

又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法国作为“现代主义思潮”的摇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俄罗斯作为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对手，积极利用局势从内部削弱敌人；俄罗斯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代理人集中精力支持东正教的要求，同时伴随着来自俄罗斯的外部地缘政治压力。

3) 东正教民族开始了一场独特的宗教复兴，为政治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想法伴随着具有末世论性质的救世主那样的预感。

这一时期形成了大希腊（或称伟大理想（Megale idea）、大保加利亚、大塞尔维亚（“铭文”）、大罗马尼亚等政治及意识形态观念。

1.5 伟大理想（Megale Idea）

大希腊的支持者努力从土耳其人手中完全重新征服希腊领土，恢复“新拜占庭”，恢复王权，让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回归他在所有东正教世界中的领导角色。由于激烈的斗争和民族

- 227 -

起义，希腊人得以在 1830 年夺回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摩里亚半岛周围的一个独立小国，在 1913 年巴尔干战争之后，其领土实际上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实施“伟大理想”与其他东正教民族的地缘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希腊人要求吞并马其顿、色雷斯等领土，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声称拥有这些领土。该计划的高潮是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但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希腊被阿塔图尔克击败后，整个项目以灾难告终，阿塔图尔克击败了希腊人并迫使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希腊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绝不会受到法纳里奥（Phanariot）神职人员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欢迎或鼓舞，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奥斯曼帝国，而不是支持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或巴尔干半岛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且，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对于法纳里奥派在俄罗斯以外东正教世界的精神霸权来说，是一场灾难。因此，希腊民族主义和“伟大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东正教特征，但最初是由一些特殊的共济会类型的秘密组织推动的，在这些组织中，俄罗斯势力的代理人，同时，法国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在摆脱土耳其统治的关键时期，希腊的东正教思想是与俄罗斯和其他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侨民的财产，这种思想财产是和那些相关的某种宗教结构相当的。令人好奇的是，在基因和政治上与法纳里奥家族有联系的希腊贵族，在获得独立后，更倾向于奥地利和德国，而在“伟大理念”中成熟的希腊资产阶级却是与俄罗斯结盟的坚定支持者。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出，官方的希腊后拜占庭东正教与梵蒂冈路线之间的某种统一。

1.6 “铭文”

大塞尔维亚的构想，是以巴尔干一个庞大国家作为历史先例为基础的，这个国家由塞尔维亚的内曼吉奇王朝于 14 世纪建立，并在塞尔维亚解放斗争中再次得到复兴。起初，叛逆的塞尔维亚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了一小块领土舒马迪亚，之后，他们开始为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个独立的、由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王朝统治的斯拉夫国家而战。从 1815 年开始，塞尔维亚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然而，这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方向，分别体现在奥布雷诺维奇和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这两个塞尔维亚王朝上。奥布雷诺维奇虽然是东正教，却以邻近的奥地利为导向，来自离奥地利最近的伏伊伏丁那的一些政界和知识界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王朝完全被俄罗斯吸引。1903 年，并非没有俄罗斯特种部队参与，奥布雷诺维奇王朝被推翻，塞尔维亚转向亲俄路线。到 1920 年，一个巨大的巴尔干国家南斯拉夫，在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的领导下成立，将许多巴尔干人民联合在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下，包括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东正教马其顿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此外，在南斯拉夫北部，天主教匈牙利人落入塞尔维亚人的控制之下。然而，这种地缘政治结构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因为南斯拉夫的非东正

- 228 -

教民族（并非没有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势力代理人的帮助下），开始反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统治和东正教的宗教首要地位。这种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势不两立，当时亲德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实际上对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进行了种族灭绝。

1.7 大罗马尼亚

大罗马尼亚计划也出现在东正教环境中，不仅是为了彻底摆脱土耳其的控制（尽管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从未正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是为了反击法纳里奥派希腊神职人员的政策，这些人想方设法让罗马尼亚神职人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俯首听命。在这种情况下，反土耳其和反法纳里奥的情绪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这得益于罗马尼亚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属于俄罗斯领土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从 18 世纪开始，罗马尼亚的统一趋势愈演愈烈。统一是指将东正教从属于梵蒂冈，同时保留东正教的仪式，但实际上，在这种方法中，梵蒂冈在地缘政治上独占鳌头，东正教显然是输家。因此，东正教认为合并派主张是天主教的一种策略性举措，旨在以牺牲东正教人民为代价，扩大其在东方的传教、政治和精神影响力，这并非巧合。而在罗马尼亚本身，特别是在特兰西瓦尼亚普遍存在的合并派，最初伴随着拉丁化的文化倾向，赞美罗马尼亚的罗马式本质，赞美其语言的拉丁语根源等。罗马尼亚的合并派教义依赖于天主教的奥地利，而东正教自然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这表明希腊东正教法纳里奥派实际上在罗马尼亚执行了亲土耳其的政策，这与奥地利-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地缘政治利益相矛盾。大罗马尼亚的想法具有明确的东正教内涵，罗马尼亚人在这面旗帜下为民族独立而战。同时，重要的是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具有公开的反希腊特征，在宗教领域，合

并派天主教，加上对拉丁文化的定位，则倾向于罗马和西欧，而罗马尼亚东正教则追随亲莫斯科线。有趣的是，在 1948 年罗马尼亚苏维埃化之后，正式的无神论共产主义政权采取了罗马尼亚东正教的明确立场，令合并教派听命于它，并在一定程度上镇压天主教少数民族。

1.8 大保加利亚

东正教运动的发端，以及同时保加利亚人的民族复兴，可以追溯到 1870 年，当时，在俄罗斯的压力和支持下，保加利亚成立了总督区，旨在生活在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团结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对抗奥斯曼帝国，在精神上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和法纳里奥派希腊神职人员的统治。

在获得地缘政治独立的同时，保加利亚发展了民族主义项目“三海保加利亚”，其中包括吞并马其顿、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东正教在传统上是亲俄的，但在历史上某些时候，为了实现狭隘的国家目标而偏离了这条路线。就像罗马尼亚的合并派、奥布雷诺维奇

- 229 -

王朝在塞尔维亚、希腊贵族和其他一些东欧势力站在中欧一边一样，保加利亚东正教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对抗俄罗斯。

有趣的是，随着巴尔干半岛出现新的东正教国家，它们的地缘政治方向在俄罗斯和奥地利之间不断波动，即动摇于俄罗斯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此外，一些有争议的领土，主要是马其顿，是这种稳定的二元论的正式理由。因为马其顿问题，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升温，而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对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自动使另一方投入奥地利的怀抱。

1.9 东正教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人的定居点是拜占庭和天主教世界之间的传统边界。这个民族有 4 种教派：逊尼派阿尔巴尼亚人（突厥化阿尔巴尼亚人）、贝克塔什阿尔巴尼亚人（苏菲组织的成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该组织具有部落性质，而不仅是发起人）、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和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尽管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是少数，但正是这一群体站在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阿尔巴尼亚独立国家的出现要归功于东正教主教范诺利，他于 1918 年成为第一位阿尔巴尼亚统治者。范诺利是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东正教积极支持他的所有努力。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不分信仰，团结起来，并控制了整个国家，无论是否承认，但他们的主要对手和竞争者与其说是天主教徒，不如说是传统上扎根于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再以阿尔巴尼亚为例，我们在后拜占庭东正教世界面临地缘政治二元论，希腊和俄罗斯教会的地缘政治利益是对立的。

范诺利在十月革命后保持亲俄倾向，为此被阿尔巴尼亚未来的国王艾哈迈德·佐格推翻。在法西斯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期间，阿尔巴尼亚东正教受到亲天主教当局的迫害，但在“苏维埃化”之后，东正教再次获得来自共产主义当局的国家支持。直到 1967 年，在“文化大革命”和毛派偏离期间，苏维埃阿尔巴尼亚才宣布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无神论的国家”，并开始直接迫害任何教派的信徒。

1.10 东正教国家的地缘政治游说团体

对巴尔干东正教国家地缘政治趋势的总体回顾揭示了一个重要模式：在每个这样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地缘政治游说团，其性质与某些宗教特征有关。

首先，到处都有亲俄罗斯的游说团体，面向俄罗斯东正教的地缘政治，而俄罗斯东正教又继承了“莫斯科第三罗马”说法（尽管有所保留）。这个游说团体反对罗马以及与它的任何和解（因此反对奥地利、匈牙利和天主教德国，即反对中欧的天主教部门），但同时，反

- 230 -

土耳其和反“法纳里奥派”希腊神职人员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希腊本身），这个游说团体不仅包括东正教的圈子，还包括一些共济会类型的秘密社团。

其次，在这些国家也都有相反的游说团体，无论是否是东正教，它都同情与罗马和解，并以中欧、奥地利为导向，达到合并派，甚至天主教的程度。

第三，到处都有土耳其影响的痕迹，这在该地区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地缘政治具有南方取向，并基于巴尔干国家现代东正教的法纳里奥倾向，传统上与奥斯曼帝国政府有关。

南斯拉夫的崩溃为我们提供了巴尔干地区地缘政治联盟的一个例子。亲俄路线体现在贝尔格莱德和波斯尼亚塞族的立场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以中欧为指导，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 and 英国）积极支持土耳其人的后裔波斯尼亚穆斯林。与此同时，马其顿问题再次出现，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再次出现争议。阿尔巴尼亚问题，特别是科索沃的问题，正在以新的活力表现出来。今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悲剧和反俄情绪再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合并派和亲天主教的游说团体，只有它们才能成为这些地区反莫斯科情绪和拉丁倾向的载体。

1.11 俄罗斯东正教和苏维埃

东正教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如此，苏维埃时期还是从革命前的俄罗斯继承了一条地缘政治路线，该路线在最重要的方面与

俄罗斯教会的地缘政治完全吻合。它可以有条件地被定义为“谢尔盖主义”，这是以莫斯科宗主教谢尔盖的名字命名，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成为即使在今天仍未平息的教会内部争端的起点：“你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指的是斯大林的无神论反基督教政权）。这个“谢尔盖”公式远没有东正教保守派想要呈现的那样自相矛盾和荒谬。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俄罗斯的教会生活中带来了极大变化，其象征意义是惊人的。同时，恢复了宗主教区，将首都转移到莫斯科（象征性地回归“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想法）。俄罗斯沙皇莫斯科住所科洛缅斯科耶奇迹般地获得“君主”图标，这标志着在圣彼得堡时期 200 年之后，沙皇权力在其超自然维度上恢复了神秘的、救赎的和末世的功能。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继承了整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强化了国家，扩大了边界。与此同时，通过迫害和苦难，教会在精神上得到了复兴，恢复了被遗忘的、炽热的宗教感情，恢复了忏悔的实践，恢复了为基督殉道的壮举。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东正教俄罗斯的完全对立面，认为“谢尔盖主义”的因循守旧，就是顺从敌基督，就是背道叛教。这种方法排除了将苏联时期视为延续东正教地缘 - 231 -

政治的可能性。这种意识形态最鲜明的承载者是国外的俄罗斯东正教和宗派性的“真理东正教”，其立场源于认同随敌基督者到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末世论。奇怪的是，这种方法在政治上否定东正教，在类型上与法纳里奥派的立场一致，他们否认东正教需要与政治相关，而政治是成熟完整的东正教教义的基础。同时，这种方法与同情“白人”运动相结合，该运动在地缘政治上基于协约国、西欧，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而海外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心位于美国也并非巧合。在地缘政治上，这种“东正教”的反苏主义和“反谢尔盖主义”，与西方大西洋主义路线的传统不谋而合，这一路线就是针对俄罗斯（苏联、沙皇、父权制、现代主义、民主主义等），而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体系如何无关。

1.12 总结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的地缘政治被剥夺了它在 5 至 15 世纪“千年王国”时代所具有之明确的神学和末世论功能。200 年“第三罗马的莫斯科”与这个“神圣”时期相邻，对于东正教意识而言，这与成熟的传统时期是相同的。在分裂和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一个更加模棱两可的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俄罗斯仍然在最普遍的意义遵循以前的地缘政治路线，同时失去了教义的严谨性。整个后拜占庭时期的特点是东正教本身框架内的二元论，其中，与俄罗斯国家的地缘政治直接相关的俄罗斯东正教，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希腊-法纳里奥路线，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体现着一类东正教，与政治现实严格分离，并在整体奥斯曼系统的结构中大有作为。

俄罗斯本身采用拜占庭式的传统，与“拉丁主教礼冠和土耳其头巾”对抗，被迫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层面单独捍卫东正教的利益。这条路线迫使俄罗斯参与巴尔干政治，在巴尔干半

岛俄罗斯面临地缘政治的敌对倾向，包括持续不断施加的“法纳里奥”反俄影响。

最后，苏联时期的地缘政治，看似矛盾，却延续了俄罗斯国家的总体全球战略，扩大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传统上敌视东正教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这里不能谈苏维埃维持俄罗斯东正教教义的连续性，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那些教义证据在彼得大帝统治下就已经无可救药地丢失了，在东正教的“分裂”时期更是受挫动摇。如果从“谢尔盖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成功，视为俄罗斯教会和东正教的地缘政治成功，此超级大国征服了半个世界，传统上对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以及我们国家怀有敌意。毫无疑问，这最后一个论点是极具争议的，但严格来说，同样有争议的是，将罗曼诺夫的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认定为真正的东正教国家。尽管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明显的地缘政治连续性。

- 232 -

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没有沙皇也没有苏俄，只有一个垂死的、残疾的、被掠夺的国家，这个国家已经卖给了我们宿敌——西方。我们能够公正客观地理解东正教的整个地缘政治历史，确定它是亘古不灭的，并永世不变地写在这个希望被称为“俄罗斯”的新强权国家的牌板上。

- 233 -

第 2 章 国家和领土

2.1 三大地缘政治类别

关于世界新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多数争论都围绕着三个基本类别：

- 1) “民族国家” (“Etat-Nation”)，即历史上建立的传统中央集权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
- 2) 地区，即这种行政、种族或文化空间属于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 (Etat-Nation)，但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和经济自主权（例如，法国的布列塔尼、比利时的佛兰德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和巴斯克地区等）；
- 3) 大空间，“联邦”或“共同体”，将几个民族国家 (“Etat-Nation”) 联合成单一的经济或政治集团。

许多“欧洲主义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民族国家” (Etat-Nation) 的范畴，即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普遍过时了，应该把重点放在另外两种模式上，一方面是区域主义甚至自治主义，另一方面是把大陆地区统一成单一集团。重要的是，两极政治派别的观点在这里汇集：“新左派”认为民族国家 (Etat-Nation) 太“右翼”、太“极权”、太

“压制”、教育太“保守”，应该以进步的名义予以抛弃；而“新右派”则相反，同样的民族-国家（Etat-Nation）被称为过于“现代主义”、过于违反传统的欧洲历史阶段，真正传统的欧洲帝国被虚无主义和世俗的法国专制主义摧毁。此外，“新右翼”在地域主义中看到了回归民族传统。回归民族文化分化原则，这是整个“新右翼”思想的轴心。

另一方面，有相当广泛的政客类别，相反，他们坚持“民族国家”（Etat-Nation）的价值观。再一次，坚持国家集中制可以团结“右派”和“左派”。但是，通常，在这个职位上的，不是“新”的左、右派，而是“旧”的左、右派。典型情况下，在法国，欧洲统一的反对者是三股政治力量：勒庞的国民阵线（极右翼）、马尔凯共产主义者（极左翼）和具有民族同情心的社会主义中间派让-皮埃尔·舍文曼。由此可见，在同一个地缘政治项目的框架内，相距最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同情仍然可以结合在一起。

然而，每种政治力量对现代社会地缘政治结构的三个基本版本都有自己的理解。构建一个图表，说明这三个不同力量的项目如何评估他们各自未来的意识形态，这将很有趣。为了

- 234 -
清楚起见，我们会讨论极端立场，当我们的讨论接近政治中心时，这些立场当然会出现细微差别，也会出现模糊不清之处。

2.2 左派和右派的地域主义

左翼意识形态的总体目标是削弱国家、行政和政治结构对公共生活的影响。这意味着权力下放的原则，即从一个权力中心逐渐演变为多个权力中心，并在未来发展为大量权力中心。这一理论曾由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提出。左派试图削弱并逐渐废除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形式的政府，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缘政治方向所针对的是保护传统国家，包括保护其边界、官僚机构、压制性机构等。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左派的主要意识形态取向，即“人文主义”，即单个个体的价值，而不是限制其自由的超个体结构。在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现代欧洲地区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当稳定的社会经济去中心化趋势，放弃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国家民族原则。

这种左派的自由主义倾向，既极端地否定了“国家”这个概念，也否定了作为历史遗迹的“民族”这个概念。这些原则受到“人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反对，“人权”早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慈善口号，而是变成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意识形态情结，公然反对作为民族、人民、国家、种族等成员的人之集体存在的传统形式。因此，左派强调区域主义，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国家领土的行政独立使价值标准更接近个人，从广义社会类别中消除了无条件权威和控制功能的光环。

显然，左派的这种趋势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者，即“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背道而驰。对这些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者来说，体现在 Etat-Nation（民族国家）中人民的历史

统一和政治统一是最高价值。在经常积极发展政治进程的几乎所有国家中，民族国家主义者和地域自由主义者之间互相对抗，一直就主要地缘政治项目进行激烈争论。

但也有与传统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右翼地域主义”。这种地域主义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只是使其成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达到平等的工具，它早已失去了神圣的功能，变成了针对真正的文化、伦理和种族传统遗存的一种压制工具。右翼地域主义者”在权力下放视为一个机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们遵守礼仪、崇拜宗教的生活方式、传统工艺，并在纯粹现代世界到来之前恢复具备传统文明特征的政府形式。事实上，这样的“右翼地方主义”与“俄罗斯土壤主义”^{*}的概念完全吻合。原则上，右翼也隐含着某种“自然的”差异主义，这是各省居民的特征，他们对外国人的反应比大城市的居民更加尖锐，也更富敌意。

^{*}土壤主义(Soilism, Pochvenism /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是一种俄罗斯社会思潮，类似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相反。它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其追随者被称为土壤派作家。——译者

- 235 -

因此，出现了第二条政治对抗路线：“右翼地域主义者”，他们不停呼吁民族的种族纯洁，以及“左翼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将“进步”、“自由”价值观引入社会的最佳方式是国家集中制，它保护社会，免得“排除万难获得进步”后那些残存势力死灰复燃。

2.3 新的大空间：世界主义还是帝国？

在超国家一体化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矛盾的政治布局。一方面，有一个“世界主义计划”，涉及彻底废除传统国家，建立一个由单一中心控制的全球文明场所，可以有条件地称为“世界政府”。原则上，这样一个项目是自由主义倾向的逻辑结论，这种倾向寻求摧毁所有传统的社会结构，人为地创造一个单一的“普遍”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由人民组成的，而是由“个人”组成的，不是由国家组成的，而是由技术官僚协会和产业劳动者组成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的世界主义者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者（莫奈、库登诺夫-卡里格里等）和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等）都梦寐以求的“欧洲合众国”。后来，同样想法启发了《马特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设计师和“新世界秩序”的思想家。

但与这种世界主义观点平行，不是墨守成规的那些政治力量提倡另一种选择。我们指的是新帝国的理论家，他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传统帝国悲剧性崩溃的结果，而传统帝国只能完全对应于真正神圣的社会组织，其基础是性质分化，是精神等级制度，是共同的宗教基准。这样一种对“新的大空间”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纯粹定量的整合方法（如世界主义者），而是来自某种精神的和超国家的原则，这种原则将超越现有的历史结构，并将它们统一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神圣的综合中。根据具体情况，“帝国计划”的基础要么是宗教因素（支持奥-维纳斯英雄帝国复国的天主教徒），要么是种族因素（欧洲帝国的意识形态者，因印欧民族

的起源统一而联合起来，特别是法国的“新右翼”），要么是地缘政治因素（比利时人让·提里亚尔的理论），要么是文化因素（俄罗斯欧亚民族的计划）。

因此，这里也有相反的政治两极，这两极看到了相似的地缘政治现实，但视角相反。

	左翼（民主派）	右翼（保守派）
小空间	区域主义，分离主义	种族主义，传统主义，土壤主义
中空间	开明的中央集权国家	民族国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大空间	世界主义	帝国

- 236 -

因此，在每个地缘政治项目中，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反方法，在围绕基本问题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这两种方法各自都先确定了所有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由于这种方案，就可以对彼此相距甚远的势力之间的各种政治联盟进行分门别类。

2.4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现代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普遍问题与俄罗斯直接相关，我们在俄罗斯遇到相同的基本地缘政治项目。区域主义、民族国家和大空间这三个类别在我们的地缘政治现实中有直接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在民族共和国、民族地区的情况下，还是在纯领土实体要求完全自治的情况下（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其他共和国项目），区域主义都对应于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

中央集权国家模式是由地缘政治项目“俄罗斯联邦中的俄罗斯”的支持者所倡导的。

主张恢复苏联，主张在苏联框架内重建俄罗斯帝国，主张建立欧亚帝国，都属于新大空间思想家的范畴。

与一般计划一样，特定项目的支持者不一定坚持相同的政治信仰。此外，每个项目可以有两个极点的符号，通常定义为“右”和“左”。

让我们试着勾勒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右”和“左”的立场与三种地缘政治选择的关系。

极端“左”翼的分裂主义倾向被那些同样促成了苏联解体的势力所利用。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认为苏联国家是“反动”和“极权主义”的堡垒，他们早就提出了“十四世纪边界内的俄罗斯”等想法，这意味着俄罗斯领土在种族原则和纯粹的地理原则上被分割成独立的碎片。对于这样的“左派”来说，俄罗斯民族的团结和俄罗斯国家的强大不仅不代表任何历史价值，反而被视为人类普遍“进步”的障碍。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者为一区域主义计划辩护，他们公开希望俄罗斯联邦解体。

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版本与对立的极端民族主义阵营中某些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

认为俄罗斯人需要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纯洁原则和种族孤立主义原则、精悍的单一民族国家。这就是创建“俄罗斯共和国”的想法。居住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非俄罗斯族群中，建立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计划基本上是类似的。

俄罗斯联邦框架内“左翼”版本的民族国家纲领体现了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俄罗斯领导层的诉求，他们坚信运用中央集权的手段进行改革是最有利的，因此想将俄罗斯所有地区

- 237 -
都置于莫斯科的强硬路线之下。根据这些势力的观点，中央集权制是改变俄罗斯社会政治现实的最佳和最快的方式，以使其成为“普遍的”、“进步的”，实际上是“西方的”和“大西洋主义的”标准。在区域主义中，“左翼”中央集权主义者自然会看到实现其目标的危险性，因为分散权力和区域自治可能有助于创建这样的政权，这些政权将拒绝自由改革的逻辑，并会提出其他待选的（满足一定条件的“右翼”）社会政治计划。这些势力也不会接受帝国扩张的计划，因为复辟苏联可能会导致相应的意识形态后果。

一场由“右翼”国家主义者发起的运动正在积极聚集力量。这些爱国者已经接受了苏联的解体，他们相信，从俄罗斯联邦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俄罗斯国家将有助于团结全国，并组织一个强大而独立、自给自足的空间。“右派”政治家既反对分裂主义，也反对帝国主义，认为俄罗斯联邦的分裂意味着俄罗斯人丧失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帝国扩张会引入许多外来因素，从而威胁俄罗斯人的国家统治地位。

在重建帝国的理论家中，也存在两极分化。以戈尔巴乔夫及其游说团体领导的“左翼”俄罗斯世界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在独联体和更广泛的欧亚空间内尽快创建“统一的民主空间”。

对新型大空间的“右翼”理解体现在反对派的政治纲领中，与政权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这个反对派的大多数代表，无论是民族共产主义者还是传统帝国主义者，都认为俄罗斯联邦框架内的俄罗斯不仅是一个领土不足的地缘政治实体，而且在保护俄罗斯作为大国战略利益方面，是一项根本错误的决定。“右翼”欧亚主义源于从纯粹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即认为俄罗斯如果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大陆”，那就是偏离其历史使命和地缘政治使命。

因此，我们可以将俄罗斯未来国家的地缘政治计划的所有选项简化为一个考虑到各种势力意识形态取向的方案。

	俄罗斯保守派，爱国者	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
俄罗斯地域主义	“俄罗斯共和国”	“民族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分裂主义
俄国中央集权制	俄罗斯联邦的爱国者	“独裁中心下的自由主义改革”
欧亚大空间	“欧亚帝国”、	“左翼世界主义”、

	“复辟苏联”	“团结的民主空间”
--	--------	-----------

第 3 章 近邻的地缘政治问题

3.1 大空间法则

地缘政治的基本法则是大空间原则，由麦金德和豪斯霍弗确定，卡尔·施密特发展。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不仅取决于其军事实力、科技发展和经济基础，还取决于其国土疆域面积和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经典著作数百卷，证明主权问题直接取决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独立和自给自足。那些真正争取主权的人民和国家，首先要解决该区域的自给自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位于战略上保护免受其他国家组织可能的攻击（军事、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地区、非常大的国家才能拥有这种自给自足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抗的时期，对国家集团、大空间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怀疑，一个国家“不结盟”的代价，是由于边缘化和被排挤到边缘而被排除出全球地缘政治领域。此外，尽管没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直接支持者那么激进，但所有“不结盟”仍然选择支持某一阵营。一个超级大国的毁灭，当然会严重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空间。但同时，大空间法则的力量却丝毫不减。相反，今天“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计划越来越广泛，其意义是将整个地球表面变成由美国中心控制的单一大空间。

3.2 美国治下的和平与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

亲美的“大西洋主义”大空间计划，创建全球“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建立单一“世界政府”的“新世界秩序”，这些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同义词。今天在西方国际政治中，首先是美国，正在制定和实施的，就是这样一个计划。显然，世界主义的大空间概念，无论对哪个民族和国家而言，都完全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国家与政治的真实主权。此外，与世界主义项目中计划给各国的自由度（主权）相比，两极世界框架下，两个大空间中任一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都能得到更多自由度（主权），这仅仅是由于全球对抗，迫使两个大空间中任一方不仅压制卫星国，还都会收买各自的卫星国。世界主义未来学家的单一全球大空间意味着任何类型的主权都将踪影全无，因为对支离破碎的“小空间”，强力的（军事或经济）镇压将成为唯一的控制方式（由于没有可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贿赂和欺骗的需要会自行消失）。

当前的形势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曾经是大西洋西部地缘政治集团一部分的国家和人民）提出了一个可行的选择，要么在大西洋主义者的领导下融入一个单一的大空间，要么组织一个能够抵抗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新型大空间。真正的地缘政治主权问题与这种选择直接相关，但同时，在这两种情况下，任何个人或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主权。在采用世界主义模式时，任何主权通常都被刻意排除在外，因为“世界政府”成为唯一无可替代的权力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世界新秩序”的全球伪帝国才是拥有主权的。它的所有部分都变成了殖民地。在组织一个新的大空间时，我们是在一个大的地缘政治实体框架内处理相对主权问题，因为这个可能的大空间在决定确定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方面将是相对自由的。这意味着加入这个集团的国家和人民将至少能够依靠民族文化主权，而“世界新秩序”的世界主义版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整详尽，将适用于殖民地、类似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制度向世界上所有人推广。

3.3 俄罗斯悖论

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直到最近还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式存在，提出倡议来破坏欧亚大空间的，正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来自欧亚大陆的首都莫斯科。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率先发起将欧亚集团纳入世界主义计划。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改革”、“新思维”等思想意味着完全采用单一大空间模式，并有意识地从两极世界向单极世界过渡。首先，社会主义阵营被摧毁，东方集团被砍倒。然后继续进行地缘政治的自我清算，那些今天通常被称为“近邻国家”的地区被俄罗斯弃若敝屣。

尽管如此，俄罗斯作为欧亚岛的心脏，作为心脏地带，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它可以比任何其他地区更好地抵抗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并成为另一个大空间的中心。但俄罗斯在自我清算其地缘政治的事实迫使它暂时离开了地缘政治对抗的核心角色（但愿是短时间的）。因此，有必要考虑创建另一种大空间的其他可能性，以便拒绝世界主义计划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会采取一些独立步骤，而不是等待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上警觉醒悟。（顺便说一句，世界主义的那些步骤只能加速这种觉醒。）

3.4 俄罗斯仍是“历史枢纽”

在暂时瘫痪的俄罗斯之外，选择反世界主义者的地缘政治时，应该考虑俄罗斯土地和俄罗斯人民关键的战略与地理功能，这意味着要反对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俄罗斯政治空间的

- 240 -

现代世界主义者，而不应该变成普遍的恐俄症。此外，在文化、宗教、经济和战略上，俄罗斯人的基本地缘政治利益与另一种反世界主义和反大西洋主义大空间的前景相吻合。出于

这个原因，俄罗斯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全国性倾向必然会与俄罗斯境外所有反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一体化计划保持一致。

3.5 中欧和欧洲帝国

新“大空间”的可能替代方案之一是欧洲，某些政治和意识形态圈子以欧洲对抗西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首先是对抗美国。这样反西方的欧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因为这样的计划在历史上已经实施过多次，尽管每次都存在一定的错误或扭曲。因此，在 20 世纪，轴心国是这样一个欧洲的支柱，尽管德国领导层中某些圈子的亲英主义和恐法情绪（以及其他情况）阻止了全面实施该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也曾做出过类似的尝试，法国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它现在还不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尽管如此，当美国军队不再以“苏联威胁”为理由存在欧洲大陆，而是美国公开占领欧洲时，今天，反西方、传统的帝国欧洲的想法变得越来越重要。欧洲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是美国不可忽视的对手，欧洲人来自深层的天然地缘政治利益产生着由下而上的压力，随着这种压力不断增加，欧洲国家的世界主义和亲美精英可能会退缩，欧洲将开始独立的地缘政治生活。在欧洲，政治解放和寻找意识形态替代思想的趋势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创建一个独立的欧洲大空间的机会也在增加。

3.6 德国是欧洲的心脏

要建立欧洲大空间，就应该围绕欧洲强国中最为大陆化的国家。也就是围绕德国，准确地说，是围绕中欧而建。传统上，德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倾向是对立的。这涉及地缘政治的大陆和殖民地两方面。德国一直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征服，并试图在传统、等级和土壤价值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单纯陆地、大陆型、自给自足的文明。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为代表的中欧是大罗马帝国在欧洲的最后痕迹，由此可以追溯欧洲文明在其国家、社会方面的历史。严格来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大空间，将西欧和中欧联合成单一的地缘政治有机体。今天，欧洲帝国的概念与德国和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国家直接相关。

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立即得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结论。对于所有“近邻”的西方国家（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只有加入以德国为导向的中欧集团（当然，

假设俄罗斯本身的情况没有变化)，才有可能建立反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西部地区将有机会成为欧洲大空间的东部边境地区，并能够拥有一些表面的主权（尽管比在俄罗斯中的主权，或者在可能以反世界主义的俄罗斯为中心的新欧亚集团中的主次要小得多）。

欧洲帝国将能够保证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文化、语言和经济自主权，并将它们从一种平均的世界主义体系中拯救出来，这种体系甚至会破坏自由市场、财阀结构中些微的差异、自给自足和对国家认同的保留。但是，这里不会涉及任何政治和国家独立。更何况，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帝国，总是会面临德国民族主义爆发的威胁，这危如累卵，正如希特勒“泛日耳曼主义”一样会顷刻瓦解。

3.7 “加入欧洲”

最重要的是，西乌克兰和爱沙尼亚接近于这一前景，因为只有这些地区在历史和宗教上真正属于西方文化，并认为它们的地缘政治利益与中欧相同。至于其他“近邻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与中部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属于俄罗斯欧亚地区，如果有什么文化差异，那只是细枝末节，绝不意味着从东欧到中欧的地缘政治集团变化，那些文化差异问题可以在民族文化自治（但不是国家自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就立陶宛而言，它一直在东欧的地缘政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对俄罗斯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是西方文化的承载者，但相反，在中欧的关系中，它却与波兰一起，表现为一支东方力量，捍卫波罗的海的斯拉夫独立，以免受德国的压力。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近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要么成为德国人，要么成为俄罗斯人，而在很长时间内，它唯一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立陶宛人，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地缘政治先决条件来满足现代化提出的主权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拉脱维亚也可以这样说，尽管与立陶宛不同，拉脱维亚在地缘政治史上从未发挥过任何独立的作用，它是波罗的海外部影响的外围。

至于摩尔多瓦，这个领土实体也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地位，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一样，没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和国家传统。然而，历史上罗马尼亚（包括摩尔多瓦的一些土地）被包括在俄罗斯-欧亚大陆和中欧（以奥匈帝国为代表）的地缘政治集团中，因此罗马尼亚与中欧结盟是有例在先的。尽管绝大多数摩尔达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所以他们更接近东方和俄罗斯。

- 242 -

3.8 “自由”的限制和失去的优势

“近邻”的西方国家加入欧洲帝国并加入其毗邻的中欧，这一前景是可能的，而且在历

史上是合理的，尽管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不包括爱沙尼亚，那里作为条顿骑士团的殖民地，居住着沉默和顺从的本土乌格罗-芬兰工人的后代，也不包括西乌克兰），俄罗斯-欧亚大陆的东部集团，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要可取得多。因为在文化上，这些地区与东欧的联系比与中欧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在俄罗斯继续放弃其一体化使命的情况下，西方“近邻国家”与中欧的联盟可以作为反世界主义地缘政治方向的过渡形式。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这些国家成为假想的“欧洲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将不会获得任何政治主权，因为提供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庇护的大空间，反过来要求其公民放弃政治上的民族独立，放弃追求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外交政策的权利，而这与帝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不管这如何影响“小民族主义”的代表，在我们的情况下，只有超级国家、大陆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拥有主权。

3.9 “警戒线”

西方“近邻国家”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大西洋因素，它直接作用于这些国家，并强加给这些国家有利于世界主义和美国主义的政治举措。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让我们按顺序开始。

只有在地球上没有其他大空间的情况下，美国才有可能真正统治世界。由此可见，美国地缘政治的主要目标是破坏潜在的、强大的地缘政治集团，并为其形成设置种种障碍。在历史上，我们在英格兰人身上就见到过这样的政策先例，它一直在非洲大陆着力建造一条甚至多条“警戒线”。“警戒线”是位于两大地缘政治实体之间国家和人民的领土，它们的联合或相互进入大空间可能构成对一个感兴趣的大国（以前是英国，现在是美国）的危险竞争。

“警戒线”国家通常同时是两个大陆大国冲突的根源，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独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被迫寻求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大地缘政治力量的政策实质是把“警戒线”变成两个相邻大空间之间的紧张地带，通过对“中间”国家的政府施加外交影响，来引发冲突升级。最激进的“警戒线”是“中间”国家争取完全独立于两个大陆邻国的情况，这实际中意味着变成“遥远”第三大国的殖民地。

- 243 -

“警戒线”最著名的例子是在 20 世纪初，位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并由英国控制的一些国家。他们击败了中欧大空间和俄罗斯-欧亚大空间，充当西欧国家的直接代理人和管理人。在其他更局部情况下，同样举动多次重复。如今，由于地缘政治的直接需求，美国被迫将“警戒线”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安全顾问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1992 年 3 月）明确指出，“有必要防止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一支可以抵抗美国的战略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表明，“警戒线”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是“最重要的战略领土，俄罗斯人的这一尝试应该会遭到北约国家的武装回击”。这

是德国和俄罗斯共同利益区内，第三大国地缘政治逻辑的理想例子。

3.10 从行省到殖民地的转变

“警戒线”政策可以用“近距独立，远距依赖”的公式来表示。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可能有真正的独立或主权，尽管目光短浅的“小民族主义”可能在外行的水平上暂时把这种“对第三大国的殖民依赖”视为“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还应该记得，在我们治理良好的世界里，小国不仅可以取得胜利，还可以进行全面的、一致的斗争。

“近邻”国家由于各种地缘政治环境的意愿而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其中，它们的内部独立斗争只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如果发挥过任何作用的话），有可能成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世界主义政策”的“警戒线”，这意味着失去邻国的信任，遭受“双重背叛”的诅咒。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从行省转向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民族文化将会发生什么，通常令人难以想象，因为世界主义将取而代之，提出一种普遍的殖民替代制度，一种文化的“可口可乐化”。作为统治者，“警戒线”将有傀儡防守。这些国家将被完全剥夺政治独立，其人民的安全将不断受到大陆邻国的威胁，这些大陆邻国会毫不迟疑采取报复行动。

因此，对于“近邻”国家来说，成为“警戒线”的前景意味着失去任何地缘政治独立性，因为“警戒哈巴狗”可能会去挑衅“大陆象”，哈巴狗本身将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完全受制于海外主子们的“新世界秩序”（以及“大象”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

对于“近邻”的西方国家而言，“警戒线”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公式是“既非德国，也非俄罗斯”（即“既非中欧，也非欧亚大陆”）。由于今天的德国作为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具有纯粹的潜力，因此可以合理假设，在“近邻”西方国家的“独立”（“主权”）

- 244 -

概念，应该被视为过渡到服务于世界主义和美国主义。至少，这是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换言之，“近邻”的西方国家，真正在争取“独立”（而不是被莫斯科的背信弃义的政策“注定要独立”），很可能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为美国服务的“警戒线”的角色。对于那些传统上与德国有敌对关系的“国家”尤其如此。

来自“近邻”的“警戒线”国家绕过中欧，与西方（西欧）结盟，这是其大西洋主义、世界主义倾向的最明显标志。

原则上，“近邻”的东方国家也是如此。然而，为了充分了解他们的地缘政治前景，有必要更详细地了解东方的地缘政治力量。

3.11 亚洲面临选择

在东方，有以下几个潜在的地缘政治力量可以自称成为大空间：中国、伊朗、土耳其和

阿拉伯世界。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下这些大空间中每一个与“近邻”东方国家的关系。

不得不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是一个特殊的话题，几行字也讲不完。由于东方的“近邻”是伊斯兰教传播的区域，在伊斯兰地缘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出现之前，与中国形成单一大空间的前景就淡出人们的视线。至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但这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因素作为整合因素会急剧激活。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有三个具有全球前景的地缘政治因素与“近邻”的东方国家相关，而且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大陆的、伊斯兰的，但是革命的伊朗；世俗的、大西洋主义者、职业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以及阿拉伯“沙特”神权统治版的伊斯兰教。当然，在阿拉伯世界中，还有其他地缘政治机会（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但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声称，自己是一个与中亚国家有关的整合大空间。一般来说，对沙特阿拉伯的定位，在地缘政治上，可以有条件地等同于对“阿拉伯（非社会主义）伊斯兰教”的定位。

“近邻”的东方国家在亚洲集团内具有三种可能的地缘政治一体化前景。

3.12 “伊斯兰革命”的大陆视角

今天的伊朗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在亚洲西部扮演着中欧的角色。伊朗人自身有着与西方和东方都截然不同的特点，这里的“西方”指的是“欧洲世俗的世俗文明”，“东方”指的是“印度、中国和……俄罗斯”。

- 245 -

伊朗伊斯兰教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强大力量，具有鲜明的反世界主义倾向，并决心开展一场全球世界伊斯兰革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伊朗是一个纯粹的大陆国家，在战略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有机会成为庞大欧亚集团的核心。

中亚各共和国向伊朗靠拢（首先是拥有石油的阿塞拜疆以及核大国哈萨克斯坦），很可能为真正的大陆主权创造先决条件。亲伊朗联盟将是中亚版的中欧（比较：中亚和中欧），因为这些大陆地区的历史先例、意识形态原则，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同质性，为强化亲伊朗联盟的实力和效力打下了充分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亲伊朗的大空间可能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反过来又开辟了连续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土的地带。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直接接壤。

3.13 “泛突厥主义”陷阱

倾向土耳其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这种倾向往往伴随着“泛突厥主义”（因为“近邻”的中亚民族主要是“突厥族”）。

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在奥斯曼帝国遗址上，并非作为帝国的延续，而是对帝国的拙劣模仿。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没有建立一个多中心的帝国多国伊斯兰结构，

而是创建了一个东方版本的法国 *Etat-Nation*，即民族国家，具有世俗、无神论、职业化和民族主义的体制。土耳其是东方第一个同其精神、宗教和地缘政治传统彻底决裂的国家。事实上，今天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是大西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东部前哨，是亚洲东部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警戒线”。土耳其提供的地缘政治模式是融入西方世界和无神论的世界主义文明。但由于土耳其自身在努力进入“欧洲”，仍然只是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殖民地，而不是欧洲大空间的真正成员（理论上可以假设土耳其参与了中欧集团），然后，倾向土耳其，意味着那些“近邻”国家，作为“警戒线”，作为欧亚大陆东部（连同伊朗、中国和印度）与爆炸性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殖民隔离垫”，融入世界主义计划，不断寻求摆脱世界主义的傀儡领导。

土耳其的道路是为大西洋主义超级大国服务的道路，是接受由“世界政府”控制的全球大空间世界主义模式的道路。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土耳其打出的“泛突厥主义”这张牌表面上带有传统主义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土耳其宣传部门确实正在积极鼓吹“从雅库特到萨拉热窝的大土耳其”项目。同时，应该指出，只有彻底改变今天土耳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进程，才能认真对待这些项目，这意味着不亚于一场革命，不亚于地缘-246-政治利益的180度转变。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应该注意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但与此同时，在当前传播的这种前景，可以导致非常具体的地缘政治结果，这就是将“近邻”的东方国家，从伊朗转向选择世俗的、无神论的社会模式，逐步融入亲大西洋主义的“警戒线”。“泛突厥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一样模棱两可，这就像所有将民族标志置于人民和国家地缘政治之上的，置于地域和宗教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一样。

3.14 石油美元和世界主义

沙特阿拉伯是纯阿拉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据点，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代表了特殊“瓦哈比”模式的威权主义、道德主义和“纯粹主义”穆斯林，在类型学上非常接近基督教的新教形式。东亚的沉思、禁欲主义和宗教热情在这里被仪式主义和几乎世俗伦理的主导地位所取代。根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海达尔·杰马尔（Heydar Jemal）的说法，“沙特阿拉伯目前的状态是‘大陆伊斯兰教’世界的直接对立面”。在地缘政治上，瓦哈比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完全符合特定版本的世界主义计划，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 and 军事福祉基于美国的支持，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护沙特国王的王朝利益。军事支持的一个例子是对伊拉克的战争。经济“支持”如下所述。沙特阿拉伯的整个经济都是石油。所有阿拉伯石油传统上都是通过英美之手进入世界市场。欧亚矿藏的开采及其开发，在理论上可以与沙特展开竞争，使欧亚国家富裕起来，并使欧洲和日本独立于美国。因此，美国通过控制阿拉伯石油来控制欧洲经济，而沙特国王以美国的石油美元为经济基础，他们利益休戚相关。

沙特瓦哈比神权政治多次成为建立阿拉伯大空间的障碍，因为这违背了王朝的利益和大西洋主义者的利益。沙特人更有理由害怕欧亚大陆的伊斯兰大空间。革命的伊朗通常被认为是沙特人的头号意识形态敌人。因此，亚洲出现伊斯兰大空间是截然违背沙特阿拉伯在“近邻”东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意味着，亚洲共和国打着“瓦哈比主义”旗帜的阿拉伯伊斯兰一体化道路，实际上也将被纳入世界主义计划，但不是世俗民族主义版本的“泛突厥主义”，而是道德和神学的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路也不过是被纳入了“警戒线”。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诱惑”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宗教因素（和金钱）。

综上所述，可以说，“近邻”的东方国家只有一条积极的道路来创造新的大空间，这就是以德黑兰为重点的“伊斯兰革命”之路。这样做，就可以化解民族冲突，并恢复宗教传统

- 247 -

和宗教制度。在地缘政治层面，这将意味着建立一个强大的大陆集团，完全有能力抵制这些地区的世界主义项目。此外，即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也会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连锁反应，威胁到世界主义者，令他们失去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再则，这样的地缘政治联盟必然会唤醒中欧（伊朗在西方的天然和主要盟友）和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反世界主义势力。

3.15 至少两极或……死亡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这个问题非常尖锐：要么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新世界秩序”，在那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将成为冷淡而顺从的“齿轮”，既为世界主义专家治理所操控，也为世界主义“迪斯尼乐园”那种无神论的唯利是图模式所操控，要么是立即创建一个针对大西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反对派，并将潜在的反世界主义、传统和陆地民族和国家组织成一个（或几个）替代集团。今天形势如此危急，以何种方式，或者在何种迹象下会出现另一个大空间几乎已不重要。如果这一大空间真的出现了，如果它真的反对世界主义，那么仅这一点就足以扩大和增加地缘政治选择，并能提供多种可能，以增加世界主义反对派的内部自由度。应该永远记住，对美国来说，“主要任务是防止出现地缘政治替代方案”（任何替代方案）。因此，所有反世界主义势力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论点是绝对公平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地缘政治的一个替代方案”（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

今天的情况如此严重，没有必要在“好”和“最好”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俄罗斯能够恢复地缘政治独立并摆脱大西洋主义的领导，那就太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国家将有一个绝好机会，重新进入俄罗斯欧亚大陆，这一次不再会有含混模糊的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意识形态负面因素。此外，当前“近邻”的自愿和自觉回归，将是即将到来的文化、宗教、语言、经济，甚至可能是政治自治（但不是国家自治）的保证。这将是最简单和最好的选择。此外，在这个灾难性的过渡时期，世界主义者所暴露出来的真正的殖民目标，当然将成为俄罗斯-欧亚大陆的盟友和卫星国数量（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进一步增加的先决条件。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引爆反世界主义地缘政治计划的，就可能是另一个大空间，要么是德国旗帜下的中欧，要么是伊斯兰革命旗帜下统一的中亚。原则上，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仍有可能发生反世界主义的起义，尽管在军事上，这些潜在的大空间还不足以与超级大国竞争。

- 248 -

对于“近邻”国家来说，大空间问题位居中心，并至关重要。今天，国家、宗教、文化、自由、繁荣和安全的整个未来取决于如何选择地缘政治取向。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今天，所有负责的人都必须明白，采用世界主义模式意味着彻彻底底摧毁其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历史面貌，并终结其民族历史。

- 249 -

第4章 内战前景

4.1 国家利益和世界主义游说团

俄罗斯可能发生内战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今天有必要从分析的角度研究这个可怕的问题，而超越那种危言耸听的情绪和和平主义的劝告。最糟糕的事情（如果俄罗斯确实爆发了内战）是完全没有准备好，迷失在复杂而矛盾的力量部署中，甚至会误导最敏锐、意识形态上最坚定的爱国者。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民族和国家政治存在的所有其他重要方面一样，我们必须首先提醒我们确定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总体轮廓的基本点。国家和民族存在的主要条件是主权、独立和政治自由的原则。国家主权诉求与国家利益具有相同含义。在世界政治史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使命和作用，自由而全面地履行民族国家使命，正是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社群存在的主要意义。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国家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条文密不可分，历史上对民族国家形成的外部压力可能从未如此强大和持久。此外，世界主义理论，即几乎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主要学说，已经成为这样一种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不应该存在民族-国家形态，没有主权，没有国家利益。世界主义的世界共同体是由世界主义精英领导的，他们管理的不是社会，而是单独个体的数学总和。因此，世界主义最初针对各种民族国家形态，其主要任务是废除划分为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而否定历史上形成的一切有机的社群-社会形态。

当然，世界主义因素不仅针对俄罗斯（其他国家和国家也是它的障碍），而且俄罗斯作为最强大的地缘政治实体，直到最近还是阻止世界主义控制从西方逐渐蔓延到整个世界的

主要堡垒。当然，苏联体系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世界主义的特征，而西方世界主义的计划之一正是将苏联逐步“进化”，融入“新世界秩序”的全球体系。这个众所周知的趋同理论很可能是那些开始改革的力量力量的主要参考点。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让俄罗斯“世界化”的温和做法并未奏效，随后，世界主义对俄罗斯的政策就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施压手法和公开颠覆的活动形式。苏联严酷的超快崩溃剥夺了“趋同理论”支持者的控制杠杆，而世界主义政策转

- 250 -

向了公开侵略的、散布恐俄的形式。

世界主义目标是理解俄罗斯现状的极其重要的切入点。如果早期对俄罗斯的外部影响是由其他民族国家组织施加的，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国家的权力，或在各种国际冲突中将俄罗斯争取到他们一边；如果说早先俄罗斯的潜在对手（公开的和隐蔽的）是地缘政治力量，在结构上与俄罗斯本身大致相当，那么现在主要的外部因素已经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压力，它没有任何明确的民族国家或地缘政治轮廓，代表着一个超国家的、全球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项目，其背后是拥有巨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隐形操纵者。当然，传统的外交政策因素也在继续发挥作用（世界主义项目尚未完全实施），但与世界主义整体压力相比，它们的意义和分量相形见绌，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例如，今天俄罗斯与德国、日本或中国的关系不再是两个政党的问题，而至少是俄罗斯、另一个国家和世界主义游说团体这三个，直接或通过他们在政治实体中的“影响力代理人”采取行动，澄清双边问题。与此同时，“第三力量”，即世界主义，最常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为它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结构比“古老的”民族国家的相应机制更加精简和有效。

因此，在俄罗斯，无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外交政策中，在通过某些决定的背后，在组织某些进程的背后，在确定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某些方向的背后，都可能区分出两个基本因素：即世界主义“影响力代理人”，以及受民族国家利益指导的团体。综上所述，很明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上述两极是背道而驰的：一些人试图将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最小化，使其自给自足（直到在“世界新秩序”的世界主义背景下完全无法依靠自己），而另一些人则相反，倾向于肯定、加强和扩大民族-国家主权，以最大限度地使国家脱离全球世界主义结构，根据定义，就是同任何货真价实的自给自足社会针锋相对。当然，在现实政治中，这两极几乎从未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大多数权力结构是两种趋势同时存在的混合系统，但是，尽管如此，这两极决定主要的权力趋势，这两个趋势不断对抗，尖锐对立，但又被从政“外行”的妥协、天真幼稚、不够聪明或贪污腐败所掩盖。

因此，我们在俄罗斯当前政治图景中确定了两个极端。它们对应于俄罗斯内战可能性的两种不同观点。这两种力量最终将成为潜在冲突的主要对象、主要对手、主要方面，尽管他们的对抗可能隐藏在更加私密和复杂的角色分配之下。俄罗斯第一次内战的一个例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和反民族势力不是打着各自的旗号行动，而是在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社会、

- 251 -

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体系下行动，隐藏着真正的地缘政治动机和趋势。为了不重蹈覆辙，有必要客观地分析新内战的可怕前景，超越对政治或意识形态同情。

4.2 实力部署的选项

我们挑选出俄罗斯内战的主要状况，确定不同种类内战的活跃力量和直接动机，并概述其假设的变化形式。

1) 第一种内战（最不可能）也许会沿着对抗的路线发展：民族国家力量反对世界主义游说团体。

事实上，这种角色的分离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两者的主要方向完全不兼容。世界主义者千方百计削弱俄罗斯的主权，破坏其经济和政治独立，使其依赖于世界主义的全球机构，剥夺其自由履行国家使命的机会。相反，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想要加强自给自足，实现最大的政治独立以及经济和社会自给自足。自然，这两种趋势不可能和平相处，因为它们各个方面事无巨细都格格不入。

然而，这种选择（“世界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成为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内战，因为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无法向群众灌输狂热主义，也无法至少动员相当一部分人口来捍卫自己的理想。在和平环境中，惰性、冷漠、处处被动，这些会有助于世界主义者；但在发生血腥冲突、枪击杀戮情况下，有必要诉诸人类心灵的更深层次，有必要唤起狂热并付出牺牲。相反，民族主义者在与世界主义者进行公开和广泛的武装对抗时，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地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当然，除非冲突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局限于由世界主义者严格控制的特殊中心。

换言之，按照“世界主义民族主义者”的设想，内战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全面内战，因为纯粹的世界主义者没有，也不会有足以能组织起群众反对民族主义者的基础。如果爆发这样的冲突，那么它的结果将是斩钉截铁的：民族国家力量将迅速加以处理，认定该游说团体的反民族本质，并同用爱国思想武装起来人民站在一起面对面地反对这一游说团体。原则上，这样的内战几乎不会流血，而且时间很短，在消灭了世界主义者后，内部冲突的根源将被消除，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就像在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一样，将严格在国家利益的范围内发展。

- 252 -

但世界主义游说团体未必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立场，及其实质无异于自杀，这意味着它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事变。所以这个选项几乎是不可置信的。

2) 第二种内战定义为如下方式：俄罗斯联邦反对一个（或几个）近邻共和国。由于前苏联领土上新国家的结构极度不稳，这种情况很容易产生。绝大多数这些国家没有多少稳定的国家和民族传统，这些国家的边界完全是任意的，与自然发展社会的种族、社会、经济或

宗教的领土不相一致，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深刻的内部和外部危机。原则上，他们将无法获得任何真正的主权，因为他们的战略能力不允许他们在不求助于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捍卫自己的独立。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这自然不能不影响他们对俄罗斯人口（或亲俄人口）的态度，以及对俄罗斯本身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可能会受到近邻共和国的挑战，俄罗斯联邦将被迫以某种程度的侵略性应对。这一过程很可能具有连锁性，因为爆发任何影响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族裔间冲突或领土纠纷，都将不可避免地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产生共鸣。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主义游说团体在俄罗斯（以及新共和国）的目标不会公开发生直接冲突。这场战争的主要敌人将是俄罗斯人的邻国。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义游说团体完全没有必要为俄罗斯联邦的失败而战。这种被美国战略家称为“低强度战争”（甚至是“中等（！）强度的战争”）的冲突，如果破坏了俄罗斯的，乃至更广泛地，破坏了欧亚大陆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局势，它就很可能满足世界主义游说团体的利益，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旷日持久的，和模棱两可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不一定会得到满足，即使内战是在爱国和民族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就像阿富汗的情况那样，俄罗斯与周边地区的武装冲突只会削弱俄罗斯在这些邻国的影响力，并削弱邻国与俄罗斯联合成一个欧亚地缘政治集团、这种一体化冲动的吸引力。同时，俄罗斯联邦人口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人口在文化和社会类型上的相似性，将使这场冲突成为自相残杀的真正内战。就那些斯拉夫共和国而言（首先是乌克兰），这也将是一场民族内部的悲剧。

因此，这种内战是自相矛盾的和模棱两可的。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中，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主权的紧迫性，不一定会得到加强，而世界主义的、恐俄主义的游说团体甚至可能从中受益，在俄罗斯联邦周围制造一条“低强度战争”地带，在国际层面诋毁俄罗斯人，破坏国家的业已岌岌可危的社会经济稳定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应该充当俄罗斯人和邻国亲俄

- 253 -

民族防御者。但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俄罗斯必须特别关注扩大其地缘政治和战略的影响力。即使俄罗斯人设法从邻国手中夺回部分原本属于俄罗斯的土地，其代价也可能是出现新的敌对国家，这些国家将被抛入俄罗斯主要对手的阵营，即世界主义者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所需新的帝国一体化将被无限期推迟。

3）第三个选项在结构上与第一个选项相似，只是在这里，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族群代表之间的内战可在俄罗斯联邦本身的框架内开始。⁷⁹ 这一场景可能与前一种类似：俄罗斯人民在任何民族地区或内部共和国都受到外国人的侵略；民族团结鼓励其他俄罗斯人参与冲突；其他民族的非俄罗斯地区因种族原因卷入武装对抗；内战呈现“低强度战争”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说更加危险，因为其结果可能会侵犯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或者至少会激起针对俄罗斯异族人的种族敌意，这些人从而受到“压制”。同时，其他国家和民族实体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与俄罗斯人的冲突中，这会使冲突变得旷日持久。这样的冲突

将使俄罗斯人的地位从民族国家转变为狭隘种族国家，这将进一步缩减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素价值，随着华约和苏联解体，俄罗斯已经失去其帝国性质。

这种内战通常与俄罗斯的民族利益相矛盾，因为它实际上将使俄罗斯空间进一步分裂成种族部分，使得这一过程合法化，这将在未来使得帝国人民曾经的地缘政治价值缩减到单纯种族的、几乎是“部落”的水平。对于旨在破坏俄罗斯民族国家专制的强硬的恐俄世界主义来说，这种选择将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向俄罗斯人灌输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狭隘的民族自我认同，这将不可避免地缩小俄罗斯的战略范围。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义者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民族自我意识的爆发也会打击“影响力代理人”。对于俄罗斯爱国者来说，这样的冲突对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

4) 第四个选项也是俄罗斯国内的内战，但不是基于种族冲突，而是基于区域、行政-领土的矛盾。莫斯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上的中央集权政策必然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强大对抗，而这些地区在解体的总体过程中正在努力获得最大的自治权。在这里，正如在种族摩擦的情况下，苏联帝国崩溃剥夺了集权和一体化思想的合法性、证据和吸引力。此外，中央现行的政策，采用了前体制指令式的极权主义风格，实际上放弃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后半部分，即援助及对社会的行政支持。

⁷⁹ 请注意，本文发表于 1993 年 12 月，即车臣战争开始前一年。

中央还想像以前一样，想要夺取并控制，但现在它实际上不给予任何回报。在经济上，这些地区只会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它们的能力范围正在缩小并依赖于中心。但除此之外，这些地区的政治特点也使这一情况雪上加霜，和首都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相比，在这些地区，世界主义改革的反民族特征更令人痛苦。

这些地区已经迈出了走向分裂主义的第一步，尽管这些企图被中央镇压了。然而，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俄罗斯南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俄罗斯人想要建立一个摆脱莫斯科政治和经济独裁统治的“独立国家”。这可能基于纯粹经济的权宜之计。绕过莫斯科出售区域资源或当地生产的商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大大改善当地情况。另一方面，“区域革命”也可以提出政治任务，譬如反对中央的极端自由主义政策，维护社会保障，加强意识形态的民族性。所有这些都使得在这个层面上发生内战的可能性确切真实。在某些时候，地区可以认真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当然会引起中央反对，因为中央不想失去对领土的控制。

这样的内战，在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程度上不亚于前两者。的确，一方面，各地区希望脱离改革中心莫斯科的诉求，带有一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征，符合人民的利益；中央世界主义力量公开反对各地区，他们捍卫的不是民族利益，而是反民族利益，因为自由主义者控制整个俄罗斯领土，首先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设计者。但另一方面，地区分裂主义将导致俄罗斯国家领土解体，削弱国家力量，并在团结一致的俄罗斯人民内部制造裂痕。如

果世界主义者减弱了对俄罗斯的控制，地区分裂主义可能会故意挑起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削弱民族国家自给自足最终将导致国家领土解体。

国家力量在这件事上，应该从完全相反的逻辑出发采取行动。只要中央的力量强大，就应该认同区域的要求，支持他们从中央获得自治的愿望。但与此同时，从一开始，就应该强调，基于重建帝国的前景，需要各地区在战略和政治进行整合。随着中央世界主义游说逐步弱化，爱国者应该渐渐改变方向，坚持不容许国内发生冲突，并敦促各地区团结起来。

尽管如此，区域内战绝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前两种情况。

应特别指出下面一点。第五种内战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布局不是按照意识形态、民族和领土的界限，而是按照社会经济的界限，例如，“新富人”对抗“新穷人”。原则上，不排除这种选择，而且产生这一选择的所有先决条件将来都可能会发展起来。但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纯经济因素显然不占优势。尽管发生了可怕的经济灾难，劳动阶层普遍贫困，

- 255 -

而“新俄罗斯人”却荒唐地富裕起来，但俄罗斯社会还没有从经济角度提出自己的要求。地缘政治、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和适宜性是无可比拟的。是他们能够带领群众上广场并迫使他们拿起武器。经济危机是国内冲突的绝佳背景，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大灾难的推动力，但推动力的主要路线还是来自其他非经济方面。今天对国家、民族、爱国主义和自由的诉求，将日常生活纯粹物质方面的需求相对降低，使之成为次要目的。但即使在物质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存有疑虑，它也无法持续地以热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形式来表达其诉求。最有可能的是，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经济因素只是伴随左右而已，而非起决定性作用。

4.3 分析总结

不幸的是，俄罗斯有可能爆发内战。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主义计划之间的根本矛盾很难和平友好地解决。为了能够认真谈论这些势力之间的“共识”或“休战”，必须要么彻底摧毁民族国家倾向的承担者（这只有在同时摧毁俄罗斯国家本身和俄罗斯民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要么终结世界主义游说团的代表。

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发动内战或在其领土上建立“低强度战争”地带随时可能成为世界主义游说团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毫无疑问，世界主义游说团的代表们将尽一切可能让自己躲在阴影中，在其他旗帜下（包括分裂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说长论短。

俄罗斯联邦对邻国的内战、俄罗斯联邦内俄罗斯人口对异族人口的内战，以及地区对中央的内战，这三种不同种类的内战，对所有真正关心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国家利益的人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所有这三种内战，即使某些领土仍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都可能导致俄罗斯地缘政治和战略空间进一步分裂。因此，在这三种情况下，爱国者都必须想尽

办法防止内战。更不用说从道德角度来看，内战对他们毫无好处。如果是这样，那么假设是世界主义者将参与挑起此类冲突（如果他们开始引发冲突），这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世界主义游说团体来说，俄罗斯爆发内战，可能会在几个方面受益。俄罗斯人开始直接参与军事冲突，将允许来自中央的自由主义者：

- 1) 以“救国”为借口实行政治专政，强行除掉政敌；
- 2) 冲销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使经济功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下；

- 256 -

3) 转移公众对“改革者”活动的注意力，这些人的活动在今天变得越发明目张胆，越发危机四伏；

4) 大陆团结一致反对西方和世界主义计划的大西洋主义统治，有意识阻止俄罗斯人未来可能同邻近的民族国家欧亚实体、欧洲实体结盟。

这一切都让人相信，俄罗斯强硬的世界主义拥护者迟早会诉诸“内战”，在自由主义政权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尤其会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义游说集团内部必然会发生“结构重组”，其中一部分会出现在爱国的，甚至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口号之下。

很难确切说出第一次爆炸何时发生。它取决于许多自发的和人为的因素。但即使这种情况暂时没有发生，这种事态转变的潜在威胁也将更为危急，因为俄罗斯不但存在世界主义游说团，他们还控制着国家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杠杆。

只有世界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种“内战”可能是短暂的，几乎是不流血的，并且对爱国者，对俄罗斯有利。此外，国家力量在国家与其内部敌人的直接冲突中必然获胜。事实上，这不会是完全词义上的“内战”，而是短暂爆发的主动对抗，其结果可能导致全面内战，如果不完全摧毁，内战将会被无限期推迟。但为此，有必要激起世界主义游说团体亮出自己的旗号，为了明确界定和准确命俄罗斯民族国家利益，爱国力量也必须团结起来。这绝对不容易做到（几乎不可能）。一方面，世界主义者本身并不天真，他们不至于公开谈论他们对所处国家的仇恨和摧毁所处国家的愿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力量的代表往往无法清晰而前后一致，但同时简短而令人信服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基础。之所以受到阻碍，就是由于坚持过时的苏联共产主义陈词滥调、情绪高昂冲昏头脑、分析思维能力低下、忽视地缘政治基本原则等因素。

如果妥协的双方完全对立，那么真正的国内和平就不能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只要世界的价值体系占主导地位，那么它的所有侧面都是右翼，左翼，中间派，各有不同，不要质疑大方向。是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是可能的，但代价是国家的死亡和国家力量被彻底排除在对话之外。如果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占主导地位，那么就有可能谈论在民族资本家、民族社会主义者、民族共产党人、民族君主主义者或民族神权主义者之间寻求妥协，但在这种情况下，反民族势力、世界主义者势力、恐俄势力将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并且在意识

形态上被置于法外之地。

- 257 -

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可怕的国内冲突。如果我们仍然有能力影响事件的进程，做出选择，那么我们必须选择比较不那么邪恶的。

- 258 -

第 5 章 南斯拉夫冲突的地缘政治

5.1 南斯拉夫的象征意义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是欧洲最严重、最大规模冲突的发源地。至少在 20 世纪是这样的。巴尔干是欧洲所有主要地缘政治集团利益交汇的纽带，因此巴尔干人民的命运象征着所有欧洲人民的命运。南斯拉夫是欧洲的缩影。在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中，可以找到与大陆上最强大军队完全相似的力量。。

塞尔维亚人代表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俄罗斯（=欧亚大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代表中欧（即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土耳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也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残余。最后，马其顿人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混合族群，这是大东正教南斯拉夫（基于统一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象征，尽管本世纪初存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项目，但在历史上未能发展。

5.2 三股欧洲势力

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欧洲的地缘政治地图分为三个基本区域。

第一个范围是西部。主要以法国和葡萄牙为代表的西部大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包括英格兰和跨大西洋非欧洲的美国。尽管西部大陆（法国）、西部岛屿（英格兰）和西部跨大西洋区域（美国）之间可能存在内部矛盾，但相对于其他欧洲地缘政治实体而言，欧洲西部最常作为单一的地缘政治势力。

第二个范围是中欧（Mittleuropa）。它包括德意志民族前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些国家，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从前的国土。中欧的特点是与欧洲的西部和东部都存在地缘政治对抗。

最后，第三个范围是俄罗斯，它在欧洲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欧亚大陆的所有东方民族。

一般来说，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可以挑出第四个伊斯兰地缘政治区，但这个地缘政治集团是非欧洲的，而且在 20 世纪它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不是太大，，尽管在未来，伊斯兰世界有可能再次（就像在中世纪一样）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

- 259 -

欧洲大陆上的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创造了永久的紧张地带，一方面是欧洲西部和中欧（Mitteleuropa）之间，另一方面是中欧和俄罗斯-欧亚大陆之间有条件且不断变化的边界。

简而言之，人们可以挑出一定数量的地缘政治联盟，或者相反，可以挑出一定数量构成恒定欧洲国际政治的对抗。

欧洲西部可将中欧作为最接近东方的邻居予以对抗。这种地缘政治趋势最明显地体现在专制主义的法国（民族国家）与奥匈帝国的对抗之中。后来，这种矛盾表现在法德之间无数的冲突中。另一方面，法德地缘政治联盟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这一想法启发了维希和戴高乐。这表明西方在与中欧的斗争中有时可以与欧洲东部（俄罗斯-欧亚大陆）结盟。在其他情况下，俄罗斯成为欧洲西欧和中欧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

中欧（德国）与东部地缘政治邻国的关系，既可以处于对抗状态（这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欧洲西部），也可以处于联合状态（这总是给欧洲西部带来危险）。

最后，俄罗斯在欧洲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偏好既可以是反德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英国甚至美国在逻辑上成为盟友），也可以是反西方的（那样，俄德联盟是不可避免的）。

粗略地说，这些是欧洲政治主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分析巴尔干问题时绝对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因为所有这三种趋势在南斯拉夫冲突中相互碰撞，造成新的欧洲大战的潜在威胁。

5.3 真正的克罗地亚人

克罗地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传统上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个完全融入德国中欧天主教部门的民族。他们自然是地缘政治命运与这个欧洲集团密切相关。因此，克罗地亚人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吸引力绝非偶然的机会主义随意性，而是顺应了这个民族历史存在的逻辑。奥匈帝国的崩溃和南斯拉夫的建立是欧洲西部和中欧长期斗争的结果，这解释了法国人对塞尔维亚人实用主义的支持。（一种选择是：西方与东方一起对抗中欧）。那些欢迎创建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他们的地缘政治和宗教传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共济会机构，专门接受旨在让西方势力于欧洲获胜的“法国大东方”及其地缘政治计划指导，这并非偶然。人们追本溯源发现，在创建南斯拉夫的过程中，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若干势力结盟那样，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潮流，曾经成功利用东方力量（塞尔维亚和大俄罗斯）对抗中欧。

- 260 -

在南斯拉夫建立期间，克罗地亚人成为这种政策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后来遇到作为解放者的德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乌克兰天主教徒、东仪天主教徒，他们总是被吸引到受中欧影响的地区）。但是法国提供的欧洲西方力量对塞族人的支持（顺便说一句，这种

支持也主要通过共济会渠道进行)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因为塞族人本身反过来又成为巴尔干地区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实体的人质,其完整性只能通过武力控制来维持。

随着当前东欧集团(即俄罗斯-欧亚大陆的整个势力范围)在改革时期的危机,南斯拉夫的一体化力量有所减弱,克罗地亚人(连同斯洛文尼亚人)毫不迟疑地宣布他们与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地缘政治并不相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有意而为,另一方面成了东方在中欧的前哨。

因此,克罗地亚人在地缘政治层面捍卫中欧应该保持自己的原则,即独立、自主和领土统一的欧洲地区。尽管应该指出的是,将克罗地亚变成法国式独立的、同一种族的巴尔干侏儒民族国家(Etat-Nation),这想法故意在中欧空间的地缘政治统一中埋下了地雷,中欧空间能够和谐存在,但只应作为一个灵活但完整的结构,而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微型国家聚拢的小团体。换句话说,克罗地亚人的地缘政治倾向只有在超越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全面发展,这意味着和平解决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问题。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将地缘政治层面转移到纯粹的种族层面,失去了它的正当性,其标志也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5.4 真正的塞尔维亚人

塞尔维亚人的地缘政治观点具有明确的亲俄、欧亚特征。塞尔维亚通过宗教和种族因素与俄罗斯直接相连,并在欧洲南部延续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塞尔维亚人的命运和俄罗斯人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命运是相同的。因此,塞尔维亚人要想回到欧洲使命的本源,就需要转向东方,转向欧亚大陆,并了解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意义和目标。同时,应该真正成为塞尔维亚地缘政治指路之星的,不是天真和人为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哲学家康斯坦丁·列昂蒂耶夫(Konstantin Leontiev)早已完美证明其必然失败),而是以俄罗斯为轴心的大欧亚计划,即一种普世的大陆东正教新拜占庭主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的未来走向才能回归本源,不再作为大西洋主义者手中的傀儡,不再只是用来对抗中欧和德国世界。

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历史中可以追溯到一个持续的趋势,澄清这一趋势将有助于了解什么是对塞尔维亚带有积极意义的决定。这一趋势是这样的:东欧和中欧联合对抗西方总是对双方都有利。与中欧(德国)结盟以对抗西方的岛屿和海外(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还会有利于大陆西部(法国)。换言之,优先考虑地缘政治东方(甚至是相对东方,因为例如中欧

- 261 -

相对于法国来说是东方),几乎总是不仅对东方本身有利,而且对这个联盟的西方成员也有利。反之亦然,以西方导向为优先的地缘政治联盟(法国与英国和美国对抗德国,法国与德国对抗俄罗斯,等等)在一场又一场新的欧洲冲突和战争中陷于死结。

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可以说,塞尔维亚人的地缘政治取向应该转向保加利亚的地缘政治,保加利亚的地缘政治几乎总是将亲俄与亲德结合起来,在南欧创造一个政治稳定与和谐的

空间,这可以使中欧逐渐进入穆斯林南部,从而结束大西洋主义西方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而且,塞尔维亚必须承认西方曾经给予它的支持其实是含混不清的,其代价倒是在西方国家反塞尔维亚的那些制裁中清晰可见。只有在地缘政治上与其他东正教东欧民族(首先是与保加利亚)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亲俄的,同时又对中欧友好的集团,才能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地区,并且再也不去使用“巴尔干化”这一可耻的词语。

就像克罗地亚人的情况一样,如果这个塞尔维亚国家从共济会创建的南斯拉夫获取其对德国的恐惧感、对西方的倾向性,获取其“大西洋主义”,那么纯粹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Etat-Nation)的想法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5.5 真正的南斯拉夫穆斯林

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代表了欧洲的伊斯兰“奥斯曼”地缘政治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无疑是欧洲极端西方、大西洋趋势的代言人,而在南斯拉夫穆斯林中最能感受到土耳其的影响。如果说,试图利用欧洲东部(俄罗斯)对抗中欧的西方,仍然无法完全压制这个大陆地区独立的地缘政治自我表现,反而往往面临俄罗斯-欧亚大陆的扩张(或通过俄德联盟,或直接通过创建华沙集团),那么世俗的伪伊斯兰土耳其已成为大西洋主义政客手中的可靠工具。更广泛地说,大西洋主义对伊斯兰国家地缘政治的影响极其巨大。因此,南斯拉夫穆斯林的反塞族行动勾勒出欧亚大陆北方(俄罗斯及其地缘政治地区)与南方之间超乎想象的全球性大陆冲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冲突与南方本身的利益背道而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了大西洋西部手中的工具,用于让欧亚东部(以塞尔维亚人为代表)反对中欧(由奥匈及克罗地亚人代表)。

对于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唯一合乎逻辑的出路是转向伊朗并坚持其政策的连续性,因为目前只有伊朗在追求以独立、自治和大陆和谐为重点的地缘政治,并按照自己的逻辑相机行事,而不顾大西洋主义者在该地区的利益。通过转向伊朗,南斯拉夫穆斯林将能够获得适当的地缘政治视角,因为一个激进反西方的、大陆和传统主

- 262 -

义的伊朗是从俄罗斯-欧亚大陆到中欧,所有东欧集团的潜在盟友。此外,欧洲东部大空间向伊朗的倾斜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局势,并大大削弱美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这不仅将会使伊斯兰世界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而且还将把伊斯兰人民从盎格鲁-撒克逊大西洋主义者的经济和军事支配中解放出来。

只有南斯拉夫穆斯林有这样的定位,他们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存在才能变得和谐、合乎逻辑和没有冲突。可以说,这个问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穆斯林从土耳其转向伊朗。第二阶段:加强中欧与伊朗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联盟。第三阶段:结成东欧和中欧的地缘政治欧亚联盟。此外,这些步骤可以在各自层面上并行进行。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理

解，如果没有最严重的全球地缘政治变革，巴尔干小国人民的问题就无法在地缘政治上得到解决。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所有的世界大战都是从规模弱小但象征意义巨大的局部冲突开始的。

5.6 真正的马其顿人

现代南斯拉夫的马其顿问题恰恰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南斯拉夫”的人为性，它只是名义上的“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马其顿人是介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族群，信奉东正教，应该被列为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组成的真正南斯拉夫的自然组成部分。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存在两个雅各宾类型的斯拉夫国家，而不是单一联邦的、“帝国的”、欧亚导向的斯拉夫国家，这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小马其顿人民发现自己处于两个政治区域之间，而这两个区域的政治细节截然不同。

目前，雅各宾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保加利亚日益加剧，这使情况更加恶化，这不止一次使正统的巴尔干国家相互对抗，并阻止它们转向唯一真正的新拜占庭地缘政治。最初，大西洋主义游说团体（天主教和英国人）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尽管形式不同，但在现代保加利亚也能感受到。

本质上，西方在这里的策略与本世纪初一样。然后，在摧毁了奥匈帝国之后，西方打着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人的“巴尔干民族主义”牌，不允许建立一个庞大的斯拉夫社区。今天，西方同样的地缘政治势力再次对中欧和南斯拉夫的统一进行双重打击，在西方挑起克罗地亚分裂主义，在东方挑起马其顿分裂主义。

就马其顿而言，就像在所有其他巴尔干冲突中一样，只能通过组织欧洲大空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找到出路，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分离主义和创建侏儒伪国家。马其顿加入保加利亚也绝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准备一场新的，这一次是真正的国家间、斯拉夫间的冲突。

- 263 -

5.7 南斯拉夫战争优先事项

南斯拉夫冲突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要求每个国家、每个欧洲政治和地缘政治力量来决定和确定其在此问题上的优先事项。这不仅涉及不同人民、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情感、信仰、历史、种族或政治倾向。这还关乎欧洲的未来，关乎欧亚大陆的未来。

中欧优先的支持者和亲德派的者最初采取了亲克罗地亚的立场。这种选择是基于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南斯拉夫成立的原因，基于拒绝法国在中欧的共济会政策，基于理解在“雅尔塔时代”结束后需要自然重建单一中欧空间，而在“雅尔塔时代”期间，欧洲被人为划分为

两个,而不是三个地缘政治阵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克罗地亚人当中有许多欧洲民族革命者。

但偏爱中欧的逻辑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事实是,除了地缘政治东方在执行西方针对中欧的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外,在这个大空间中,一直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深厚的、陆地的欧亚地缘政治,即东正教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它关注的是它自己的大陆利益,关注的是遥远的未来那个新的神圣联盟。当塞尔维亚人的自我意识,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残酷的内部冲突过程中被完全唤醒时,当塞尔维亚人的鲜血再次从无意识的深处唤起最古老的地缘政治、民族及精神原型时,当大塞尔维亚、精神塞尔维亚的理念变得至关重要时,南斯拉夫工具性的使命就会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伟大的欧亚理念,即东方理念。

当塞尔维亚人与中欧(克罗地亚人)作战时,从巴黎到纽约的大西洋主义者到处都在为南斯拉夫联盟鼓掌,或者至少谴责克罗地亚人的“民族主义”和“亲法西斯主义”。一旦塞尔维亚人越过了某条界限,他们的斗争就呈现出为反对西方思想,即为反对大西洋主义而斗争的性质,塞尔维亚则立即被宣布为建设“新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继而对其实施严厉的政治惩处和经济制裁。

为了做出最终的选择,有必要再次转向上述我们已经制定的地缘政治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只有在东方优先,并选择欧亚大陆为积极方向,才能得到真正的大陆和谐。因为即使是中欧这个本身是积极的想法,在反对俄罗斯时,欧亚大陆也变得消极,并具有破坏性。在希特勒深刻而悲惨的错误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发起了反东方、反俄罗斯的扩张,最终证明这只对西方大西洋集团有利,它摧毁了德国,并在俄罗斯引发了危机的萌芽。因此,在南斯拉夫冲突中,地缘政治也应优先考虑塞尔维亚因素,但是,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塞尔维亚人顺应欧亚亲俄的地缘政治趋势,倾向于建立一个强大而灵活的南部斯拉夫集团,并意识到

- 264 -

中欧的重要性,为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德俄联盟作出贡献。塞尔维亚人的恐德症加上共济会的亲法主义,无论他们掩盖多么合理的借口,都永远无法为积极解决南斯拉夫问题提供依据。

换句话说,应该最优先考虑传统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植根于东正教信仰,意识到他们的斯拉夫精神遗产,并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和谐的亲俄地缘政治结构,具有明确的反西方和反大西洋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应该仔细考虑克罗地亚人的需求和他们对中欧地区的吸引力。如果克罗地亚人有反大西洋主义倾向,克罗地亚人将来可能会成为一支积极的欧洲内部力量。

还必须考虑将南斯拉夫穆斯林从土耳其转向伊朗的波斯尼亚因素,以便在此基础上“化毒为药”,在伊斯兰世界开启一种全新的欧洲政策,直接对抗美国在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军事帝国主义。

最后,马其顿人不应成为南部东正教斯拉夫人的争论焦点,而应成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的胚胎,这是迈向真正的大南斯拉夫的第一步。

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公正的地缘政治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在一场自相残杀的恐怖战争中，很难保持常识，血流成河能唤醒的只有愤怒和复仇的欲望。但有时，也许只有考虑到历史根源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冷酷、合理的分析，才能提供走出自相残杀战争僵局的正确途径，而情感上与一方或另一方团结，只会加剧血腥战争恶梦，只会使人更加绝望。此外，这样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挑起整个斯拉夫内部种族灭绝的真正敌人仍然隐藏在幕后，他们更愿意从远处观看一个斯拉夫民族如何摧毁另一个斯拉夫民族，散布不和，多年来阻碍联盟与兄弟和平的可能性，摧毁最强大但现在支离破碎的大陆大空间。

南斯拉夫大屠杀的真正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势力，他们奉行“在敌人的阵营中必须让他们互相对抗，决不允许出现统一、联合和兄弟般团结”的原则。复杂的南斯拉夫欧洲战争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理解这一点，以免这场战争最终成为对欧洲的一场战争。

5.8 塞尔维亚就是俄罗斯

南斯拉夫事件的重要性还在于，以巴尔干小国为例，俄罗斯可能爆发大规模大陆战争的情景似乎已经上演。所有卷入巴尔干冲突的地缘政治力量在俄罗斯都有对应的力量，只是空间体量上大得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渴望进入中欧，他们在地缘政治上和乌克兰人有相似之处，尽管乌克兰与大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不是几十年，而是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

- 265 -

除了东仪天主教会信徒和乌克兰天主教徒外，这里不存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紧张局势。尽管如此，从某些趋势来看，基辅的一些势力开始感到“为俄罗斯东方所累”，并努力向德国经济控制的欧洲空间靠拢。居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可能成为这些共和国“中欧”政策的人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命运将类似于克罗地亚塞族人的命运。

除其他外，这样的比较表明，在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中，俄罗斯应以其对中欧问题的基本认识为指导，这里所谓中欧主要是指德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要从“斯拉夫人血统兄弟团结”这个悲天悯地的口号着手（这种“团结”到底如何，可以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的战争大屠杀中看的一清二楚），而要从深入分析对俄德关系的逻辑入手，这是因为乌克兰乃至波兰都不是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而只是欧亚俄罗斯和中欧两个大空间当中的边界地区。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边境地区的冲突对西方地缘政治的另一股力量也极为有利。并非巧合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外交一直将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所有领土视为“警戒地带”，保护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免受来自俄罗斯-德国联盟令其深恶痛绝的影响。

塞尔维亚-穆斯林冲突类似于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伊斯兰之间可能发生的对抗，重要的是要注意，在俄罗斯-伊斯兰对抗的情况下，作为苏联一部分的那些穆斯林共和国是土耳其和伊朗具有竞争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区域。与南斯拉夫穆斯林一样，这种比较表明，

倾向伊朗的共和国更有可能与欧亚大陆的主要俄罗斯集团在地缘政治上求得和谐一致。相反，土耳其目前在该地区扮演大西洋主义政策的指挥者角色，其地缘政治因素必然与戏剧性的对抗局势有关。

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如果发生类似事件，对俄罗斯的威胁会是什么，而这些事件确实朝着同一方向展开，今天这一事实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整个区别只在于速度，速度越快，空间越狭窄，民族的人数也越少。为了防止在俄罗斯出现一个规模庞大、后果血腥的“南斯拉夫”，有必要提前回答基本的地缘政治问题，确定俄罗斯的大陆战略，要制定这样的战略，必须知晓俄罗斯的政治传统，理解俄罗斯-欧亚大陆“历史的地理枢纽”的主要地缘政治任务。同时，仅仅依靠惯性，被动顺势而为，不仅会破坏大陆安全的整体系统，还会尸横遍野、充斥全球。

- 266 -

第 6 章 从神圣的地理到地缘政治

6.1 地缘政治 - “中间的”科学

地缘政治概念早已成为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它们所依据的一般原则，使得分析任何特定国家和任何特定地区的情况变得轻而易举。

今天存在的地缘政治无疑是一门世俗、“异教”和现世化的科学。但是，在所有其他现代科学中，也许正是地缘政治与传统和传统科学保持着最大的联系。勒内·盖农(Rene Guenon)说，现代化学是传统炼金术去神化的结果，而现代物理学是神奇的。同样，可以说现代地缘政治学，是神圣地理学，这另一种传统科学世俗化、去神圣化的结果。但由于地缘政治在现代科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经常被列为“伪科学”，因此它的世俗化并不像化学或物理那样完美和不可逆转。与神圣地理的联系在这里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地缘政治处于传统科学（神圣地理学）与世俗科学之间的中间位置。

6.2 陆地和海洋

地缘政治的两个初始概念是陆地和海洋。正是土地和水这两个元素，构成了人类对地球空间的定性观念。在经历陆地和海洋、土地和水的过程中，人们接触到自己存在的基本方面。陆地就其自身而言显示的是稳定性、密度、不变性、空间。而水则显示流动性、柔软性、动态、时间。

这两种要素是世界物质本质最明显的表现。它们在人体外：一切都可以分成致密的、流

动的。它们在他体内：肌体和血液。（细胞水平也是如此。）

土地和水的普遍体验产生了天穹的传统概念，因为天空中存在上层水域（雨水的来源）也暗示存在地球、陆地和天上大本营的对称性和强制性要素。尽管如此，陆地、海洋是地球存在的主要类别，人类不能不从中看到宇宙的一些基本属性。作为地缘政治的两个主要术语，陆地和海洋，既适用于传统类型的文明，也适用纯粹的现代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集团。在全球地缘政治现象的层面上，陆地和海洋催生了海权和陆权两个词，即“制海权”和“制陆权”。

每个国家，每个帝国都将把自己的实力建立在这些领域的优先发展之上。帝国要么是“海权的”，要么是“陆权的”。海权国家假设存在首府和殖民地，陆权国家则假设存在“共同土地”上的首都和省份。在“海权”的情况下，其领土并不统一在同一个陆地区域内，这造成

- 267 -
了不连续因素。海洋既是“海权”的强项，也是其弱点。相反，“陆权”具有领土连贯的性质。

但地理和宇宙逻辑立即使这种看似简单的划分方案复杂化：“陆地-海洋”这对要素相互叠加时，给出了“海上陆地”和“大地-水”的概念。海上陆地是一个岛，即海洋帝国的基础，海洋统治的极点。大地水或陆地水是预先决定陆地帝国发展的河流。城市坐落在河流上，因此首都都是陆权统治的一个极点。这种对称性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和地理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岛屿和大陆的地位与其说是根据它们的实际大小来确定，不如说是根据典型的人口意识特征来确定的。因此，尽管北美幅员辽阔，美国的地缘政治本质上具备岛屿特征，而岛屿国家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却是具备大陆的思维模式。

另一个细节也很重要：从历史上看，海权统治与西方和大西洋有关，而陆权统治与东方和欧亚大陆有关。（因此，上述日本的例子，可以用该国受到更强大的“拉力”，即受到欧亚大陆更大的影响来解释。）

早在英国殖民扩张或葡萄牙-西班牙征服之前，海权统治就已成为大西洋主义的同义词。甚至在海上移民浪潮开始之前，西方人民及其文化就开始从位于大西洋的中心向东方迁移。地中海也从直布罗陀向中东渐趋发达，而不是相反方向。相反，东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发掘表明，这里存在着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这意味着欧亚大陆的中心是欧亚大陆人类的摇篮。

6.3 景观象征

除了陆地和海洋这两个全球范畴外，地缘政治还具有更具体的定义。在制海权现实中，海洋和海洋构造是分开的。因此，大海文明，例如黑海或地中海文明，在品质上与大洋文明，即岛屿国家及居住在开阔洋面沿岸的人民，有很大不同。一个更频繁使用的划分也是与大陆相关的河流和湖泊文明。

制陆权也有自己特定的形式。因此，人们可以区分草原文明与森林文明、山脉文明与山谷文明、沙漠文明与冰雪文明。神圣地理中的各种景观理解为与特定民族的国家、宗教和伦理意识形态特征相关的象征性复合体。即使在我们处理带普遍意义的普世宗教情况下，无论如何，它在特定民族、特定种族、特定国家中的具体体现，都将根据当地的神圣地理环境进行调整。

沙漠和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地缘政治缩影。正是在沙漠和草原上，制陆权的趋势达到了顶峰，因为这里的“水”因素已降至最低限度。从逻辑上讲，沙漠和荒漠应该是制陆权地缘政治立足点。

- 268 -

成吉思汗帝国可以被认为是草原帝国的典范，而在游牧民族直接影响下兴起的阿拉伯哈里发则是沙漠帝国的典型代表。

山脉和山地文明通常是古老的、零散的结构。山区国家不仅不是扩张的源头，相反，他们往往是其他陆权势力地缘政治扩张的受害者。没有哪个帝国是以山脉中心为其中心的。因此，神圣地理经常重复的主题是：“山中有鬼”。另一方面，在山区保存古代种族和文明遗迹的想法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的神圣中心就坐落在山区。甚至可以说，在陆权政治中，丛山往往与某种精神权威有关。

山脉作为祭司形象，平原作为皇家形象，这两个概念的逻辑组合是山脉的象征意义，即低海拔或中海拔。山丘是王权的象征，超过了草原的世俗水平，但不超越主权利益（就像不超越山脉那样）。山丘是国王、公爵、皇帝所居之处，但并非祭司安生之地。所有大型陆权统治帝国的首都均位于一个或数个山丘上（根据行星数量通常为七个山丘；或者根据原质（火、水、空气、土）的数量，外加以太，为五个山丘）。

神圣地理中的森林，在某种意义上，是靠近山地的。树的象征意义与山的象征意义有关（两者都表示世界的轴线）。因此，陆权政治中的森林也发挥着外围功能：它既是一个“牧师之地”（德鲁伊教团员、东方三博士、隐士），又是一个“恶魔之地”，即消逝岁月的古老遗迹。森林地带也不能成为陆上帝国的中心。

类似草原和沙漠，北部有苔原，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寒冷的气候使其不那么重要。这个“边缘性”在冰层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就像山脉一样，是古老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爱斯基摩人的萨满教传统的前提是孤独地迁移到冰上，在那里，另一个世界向未来的萨满教徒敞开大门。因此，冰是一个祭司区，另一个世界的门槛。

鉴于地缘政治地图这些初始而且最普遍的特征，人们就可以根据其神圣品质来确定地球上的各个区域。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特定国家甚至特定地区的局部景观特征。看似截然不同的民族，如果其栖息地的本土景观相同，也有可能看到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上的相似之处。

6.4 神圣地理中的东西方

神圣地理语境下的要点具有特殊的本质特征。在不同的传统中,在这些传统的不同时期,神圣地理的图景会随着这一传统发展的周期性阶段而变化。同时,要点的象征功能也经常变化。无需赘述,就可以制定出东西方最普遍的神圣地理规律。

- 269 -

在神圣地理学中,东方以“宇宙象征主义”为基础,传统上被认为是“精神之国”、天堂之国、圆满丰饶之国、最完整最完美的神圣“家园”。尤其,这一思想体现在《圣经》的文字中,指的是东方“伊甸园”。这种理解正是其他亚伯拉罕传统(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特征,以及中国、印度教和伊朗许多非亚伯拉罕传统的特征。古埃及人的神圣准则认为,“东方是众神之居所”,而“东方”(埃及语中的“neter”)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神”。从自然象征主义的角度来看,东方是太阳,是那世界之光,是那神与灵的物质象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地方。

西方具有完全相反的象征意义。这是“死亡之国”,“死者世界”,“绿色之国”(古埃及人如此称呼为)。用伊斯兰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西方是“流放之国”,“异化之井”。西方是“反东方”,是“日落”、没落、堕落之国、是从显灵到不显量、从生到死、从丰满到贫穷等的转变之地。西方是太阳落山的地方,是“落下”的地方。

按照这种自然宇宙象征的逻辑,古代传统组织了他们的“神圣空间”,建立了他们的崇拜中心、墓葬、寺庙和建筑,理解了地球上地理、文化和国家领土的自然及“文明”的特征。因此,迁徙、战争、战役、人口浪潮、帝国建设等的结构本身,就是由神圣地理学的原始范式逻辑决定的。民族和文明沿着东西轴线排列,具有等级特征;越接近东方,就越接近神圣,接近传统,接近精神丰富。而越接近西方,圣灵就越衰落、越堕落、越屈辱。

当然,这种逻辑不是绝对的,但同时也不是像今天许多“世俗”的古代宗教和传统研究人员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次要的和相对的。事实上,在古代民族中,神圣逻辑和坚持宇宙象征比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有意识、更有意义并更有效。甚至在我们这个反神圣的世界里,在“无意识”的层面上,神圣地理的原型几乎总是完整保存着,并在社会动荡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时刻被唤醒。

因此,神圣地理学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品质空间”的规律,东方是象征性的“本体加”,西方是“本体减”。

根据中国传统,东方本质为阳、阳刚、光明、阳光,西方本质为阴、阴柔、黑暗、月夜。

6.5 当代地缘政治中的东西方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神圣的地理逻辑是如何反映在地缘政治中的,地缘政治作为一门

纯粹的现代科学，只确定实际的事态，而将神圣的原则本身留在幕后。

- 270 -

拉策尔、切伦和麦金德（后来由豪斯霍弗和俄罗斯欧亚人）最初提出的地缘政治正是基于各种文明和国家的特征，这些文明和国家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家记录了一些事实，确定“岛屿”国家和“大陆”大国之间，“西方”、“进步”文明与“东方”、“专横”和“古老”文化形式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在现代科学中根本没有提出关于精神的形而上学和神圣理解的问题，地缘政治家就把它搁置一旁，宁愿用其他更现代的术语来评估这种情况，而不用“神圣”和“世俗”、“传统”和“反传统”等概念。

地缘政治记录了近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文化和工业发展方面，东西方地区之间的根本差异。图景如下：西方是“物质”和“技术”发展的中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它被“自由民主”倾向所主导，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世界观。在经济层面，优先考虑贸易和技术现代化。“进步”、“进化”、“历史的渐进发展”等理论最早出现在西方，这些理论与东方的传统世界完全不同（也与西方历史上，特别像在中世纪那样，存在着成熟的神圣传统的时期完全不同）。在西方，社会层面的强制具有纯粹的经济性质，思想法则和权势法则被金钱法则所取代。渐渐地，“西方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被塑造成“人权意识形态”的普遍公式，成为北半球最西部的北美地区，首先是美国的主导原则。在工业层面，这种意识形态对应的是“发达国家”的理念，而在经济层面，对应的则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些特征的总和，加上西方文明各个领域的纯粹军事战略统一，今天被定义为“大西洋主义”。上个世纪，地缘政治家谈到“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文明”或“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大西洋主义”类型，最纯粹体现了“地缘政治西方”的套路。

地缘政治的东方与地缘政治的西方截然相反。东方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是由社团、作坊类型、古老传统的生产形式主导（“发展中国家”）。国家最常用的不是经济强制，而是“道德”强制或简单粗暴的强制（思想法则和权势法则）。东方不是靠“民主”和“人权”，而是倾向于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即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权，唯一成为其制度核心的不是“个人”、“人”及其“权利”和纯粹的“个人价值”，而是某种非个人、非人类的东西，是“社会”、“国家”、“人民”、“思想”、“世界观”、“宗教”、“领袖崇拜”等。东方用最多样化的非自由主义、非个人主义社会，从专制君主制到神权政治或社会主义，来对抗西方自由民主。此外，从纯粹的类型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与“西方”（=“个性化的贸易”体系）和“东方”（=“非个体的强势”体系）的定性划分相比，特定政权的政治特殊性是次要的。这种反西方文明的典型形式是苏联、共产主义中国、1945年之前的

- 271 -

日本，或霍梅尼的伊朗。

有趣的是，最先使用“地缘政治”一词的作者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以这种方式说明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差异。“典型的美式句子”，契伦写道，就是“去吧”，字面意思

是“前进”。这反映了美国文明内在的和自然的地缘政治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这是西方模式的最终形态。俄罗斯人通常会重复“一无所有”（“ничего”）这个词（在契伦的文本中用的就是俄文）。这个词显示了东方特有的“悲观”、“沉思”、“宿命论”和“对传统的执着”。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神圣地理学的范式，我们会看到现代地缘政治的优先事项（诸如“进步”、“自由主义”、“人权”、“贸易体系”等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正面的概念）和神圣地理学的优先事项之间的直接矛盾；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如“精神”、“沉思”、“屈服于超人的力量或超人的思想”、“意识形态治国”等概念，在神圣文明中纯粹是正面的，并且在东方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仍然如此）来评估文明的类型。因此，现代地缘政治学（除了俄罗斯欧亚人、豪斯霍弗在德国的追随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以与传统神圣地理学相反的方式来评估世界图景。但与此同时，在描述文明地理图景的基本规律方面，这两种科学是一致的。

6.6 神圣北方与神圣南方

除了东西轴线上的神圣地理决定论之外，另一个在垂直方向上的轴线，即南北轴线的的问题也极为重要。在这里，与所有其他情况一样，神圣地理学的原则、基本要点及其相应大陆的象征意义与世界地缘政治图景有直接的相似之处，它要么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起来的，要么是某些地缘政治实体的领导人通过有目的行动，有意识地人为构建起来的。从“整体传统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为”和“自然”的区别通常是非常相对的，因为传统从来没有像笛卡尔或康德二元论那样，严格区分“主观”和“客观”（“现象”和“本体”）。因此，北方或南方的神圣决定论不仅仅是物理的、自然的、景观-气候的因素（即“客观”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某些个人头脑中产生的“想法”、“概念”（即某种“主观的”的东西），而是超越客观和主观两极的第三样东西。可以说，神圣北方、北方原型在历史上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北方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是北方的思想、“北欧主义”。

最古老、最原始层次的传统确定，北方具有高于南方的首要地位。北方的象征意义与源头有关，与原始的北欧天堂有关，所有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古代伊朗和索罗亚斯德教文献提到北方国家“雅利安瓦伊扎（Aryan Vaeja）”及其首都“瓦拉（Vara）”，古代雅利安人在光明的霍尔木兹德（Hormuzd）的敌人、邪恶的灵魂阿里曼（Ahriman）派来的冰川作用下，

- 272 -

被赶出了这里。古老的吠陀经也提到，北方国家是印度教徒祖先的家园，即位于遥远北方的白色土地什韦塔-德维帕（Sveta- Dvipa）。

古希腊人谈到北方乐土（Hyperborea），这是首都为图拉（Tula）的北部岛屿。这片土地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在许多其他传统中，人们可以找到悠久古老的北欧象征主

义的蛛丝马迹，这些踪迹屡屡被遗忘，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传统上与北方相关的，主要是中心，这个固定极点、永恒点的概念，不仅空间围绕它旋转，时间也围绕它循环。北方是夜不落日的土地，是永恒光明的空间。每一个神圣的传统都尊重中心，中点，对立面的交汇点，一个不受宇宙熵定律约束的象征性地方。这个中心的象征是万字符（强调中心的固定和不变以及外围的流动和可变性），它在每个传统中都有不同的称呼，但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象征着北方。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神圣传统都是统一的北方原始传统的投影，是适应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原始理念为了在历史中显现自身，便选择光明的一侧为北方，而理念任何后来的表现都只是恢复了原始极地天堂的象征意义。

神圣的地理中，北方与精神、光明、纯洁、丰满、统一、永恒相连。

南方则完全相反，象征物质、黑暗、混乱、剥夺、纷杂，沉浸于时间流逝和滋生成长。即使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极地地区也有一个漫长的半年昼和一个漫长的半年夜。这众神、英雄和天使的昼夜。即使是堕落的传统也记得北方神圣、精神、超自然的一面，将北方地区视为“精神”和“超凡脱俗力量”的居所。在南方，众神的昼夜分裂成凡人的许多日子，北方乐土原本的象征意义消失了，对它的记忆成为“文化”、“传统”的因素。一般来说，南方通常与文化相关，即在人类活动的那个领域中，无形的纯粹精神获得了粗糙可见的物质外廓。南方是物质、生命、生物和本能的王国。南方分解了北方传统的纯净性，但以物化形式保留了这一传统的痕迹。

神圣地理中，将北与南结对，并不能归结为善与恶的抽象比照。相反，它是精神理念及其粗陋的物质体现之间的对峙。在正常情况下，在南方承认北方至高无上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北方“启迪”南方，北欧使者给南方人传授传统，奠定了神圣文明的基础。如果南方拒绝承认北方的首要地位，一场神圣的对抗、一场“大陆战争”就开始了，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南方应该为这场冲突负责，因为它违反了神圣准则。例如，在《罗摩衍那》中，南部的兰卡岛被认为是恶魔之家，他们绑架罗摩的妻子西塔，向北部大陆宣战，打到其首都阿约提亚。

需要注意的是，神圣地理学中的南北轴线比东西轴线更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周期循环历史中最古老的阶段相关。南北大战、北方乐土（Hyperborea）和冈瓦纳（Gondwana

- 273 -

南方古大陆）指的是“上古时代”。在循环的最后阶段，它变得更加隐蔽。北方和南方的古大陆也在消失。对抗接力赛传到了东方和西方。

南北垂直轴向变为东西向之间的对抗，这是周期性历史最后阶段的特征，但保留了这两个神圣地理对子之间的逻辑和象征性联系。南北对（即物质-精神，时间-永恒性）被投影到东西对上（即传统和亵渎，源头和日落）。东方是北方向下的水平投影。西方是南方向上的水平投影。从这种神圣意义的转移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传统所特有的大陆视野结构。

6.7 北方人

神圣的北方定义了一种特殊的人类类型，它可能有它的生物、种族化身，但也可能没有。“北欧主义”的本质在于一个人有能力按他的原型、他的理念，建造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对象。这种品质不是理性原则的简单发展。相反，笛卡尔和康德的“纯粹理性”只是无法自然地跨越“现象”与“本体”之间的细微界限，而正是这种能力构成了“北欧”思维的基础。北方人不仅仅是血统、语言和文化上的白人、“雅利安人”或印欧人。北方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存在，他们被赋予了对神圣的直接直觉的人。对他来说，宇宙是一种符号的结构，每个符号都指向隐藏在视野之外的精神第一原则。北方人是一个“太阳人”，*Sonnenmensch*，他不像黑色物质那样吸收能量，而是释放能量，北方人从灵魂中倾泻出创造、光明、力量和智慧的溪流。

纯粹的北欧文明随着古代北方乐土（*Hyperborea*）一起消失了，但正是北欧文明的使者为所有现有的传统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个北欧“大师”的“种族”代表了各大洲和各种肤色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的起源。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古代斯拉夫人中，中华文明的奠基人中，在太平洋原住民中，金发白肤的德国人中，西非的黑人萨满巫师中，在红皮肤的阿兹特克人中，高颧骨的蒙古人中，都可以找到北方乐土崇拜的踪迹。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民族不拥有“太阳之人”（*Sonnenmensch*）的神话。真正的精神、超理性的头脑、神圣的逻各斯、看透世界秘密灵魂的能力，这些是北方最典型的品质。无论何时何处，哪里有圣洁，有智慧，哪里就存在无形的“北方”。

6.8 南方人

南方人，冈瓦尼型的，则与“北欧”型完全相反。南方人生活在各种影响、各种次生表现的包围之中；他在宇宙中，他崇敬宇宙却无法理解宇宙。他崇拜外在世界，但不崇拜内在世界。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精神的痕迹，保存这些精神在物质环境中的体现，却无法从象征者（外在体现）走向被象征者（内在精神）。南方人靠激情和冲动生活，他将内心感受置于精神之上（他根本不知道精神是什么），并将生命视为最高权威。南方人的特点是崇拜伟大

- 274 -

的母亲，认为那才是产生万物形色之根本。南方文明是月亮文明，它接收来自太阳（北方）的光芒，保存并传输一段时间，但周期性地与它失去联系（新月）。南方人是“月亮之人”（*Mondmensch*）。

当南方人与北方人和谐相处时，即承认他们的权威和他们的类型（而不是种族）优势，那就进入文明和谐盛世。当他们声称他们对现实原型的态度占首位时，就会出现一种扭曲的文化类型，可以将其统称为偶像崇拜、拜物教或异教信仰（此词负面的贬义含义）。

就像古大陆一样，纯粹的南北类型只存在于古代。在原始时代，北方人和南方人是相互对立的。后来，北方的整个民族都渗入了南方土地，建立了有时被称为“北欧”的古代伊朗、古代印度的文明。另一方面，南方人有时会带着他们芬兰人、爱斯基摩人、楚科奇人的文化类型等远赴北方。逐渐地，原本清晰的神圣地理全景变得模糊不清。但不管怎样，类型学上区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二元论，在各个时期、各个时代都是存在的，这与其说是两种不同文明的外部冲突，不如说是同一个文明中的内部冲突。从神圣历史某个时刻开始，不管在地球上哪个具体位置，北方类型和南方类型处处都针锋相对。

6.9 在东方和西方的南与北

北方人的类型可以在南方、东方和西方反映出来。在南方，北方之光催生了印度、伊朗或中国等伟大的形而上学文明，这些文明在“保守”南方长期保存了托付给他们的启示。然而，北方简单明了的象征主义在这里变成了繁杂多样的神圣教义、错综复杂典礼和仪式。而且，越往南走，北方的痕迹就越弱。在太平洋岛屿和非洲南部的居民中，神话和仪式中的“北欧”主题以极其零碎、简陋甚至扭曲的形式保存下来。

在东方，北方表现为一个古典传统社会，其基础是超个人明确优于个人，“人”和“理性”在超人和超理性的原则面前被抹去。如果说南方赋予文明“可持续”的稳定性质，那么东方就决定了文明的神圣性和真实性，而这种神圣性和真实性的主要保证就是北方之光。

在西方，北方表现在英雄社会中，西方固有的分裂化、个体化和理性化倾向战胜了自身，个人成为英雄，超越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人格的狭隘局限。在西方，北方拟人化为象征性人物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他一方面解放了普罗米修斯（一个纯粹西方的、无神的、“人文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帮助宙斯和众神打败了反对他们的巨人（也就是说，为神圣规范和精神秩序祈祷）。

- 275 -

相反，南方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反映在所有三个方向上。在北方，它给人以“古风”和文化停滞的效果。即使是北方的“北欧”传统本身，在南方、“古亚洲”、“芬兰”或“爱斯基摩”元素的影响下，也具有“偶像崇拜”和“拜物教”的特征。（这尤其是“斯卡尔德(skalds)时代”的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特征。）

在东方，南方势力表现在专制社会中，在这些社会中，正常而公平的东方冷漠地对待个人变成了否认伟大的超人主体。东方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在类型和种族上都与南方有关。

最后，在西方，南方表现为极端粗俗的唯物主义形式的个人主义，当每个个体达到反英雄堕落的极限时，他们只崇拜舒适和自私的享乐主义“金牛犊”。显然，正是这两种神圣的地缘政治倾向相结合，产生了最消极的文明类型，因为在这种文明中，两种方向相互重叠，在南方纵向和西方横向上它们本身都是消极的。

6.10 从大陆到元大陆

如果从神圣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象征性的北方明确地对应于积极的方面，而南方则明确地对应于消极的方面，那么在纯粹的现代地缘政治世界图景中，一切都要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相反。就“北方”和“南方”这些术语而言，现代地缘政治所理解的范畴与神圣地理完全不同。

首先，北方的古大陆北方乐土（Hyperborea），作为一个实体，好几千年前就不存在了，它仍然是一个精神现实，那些寻求原始传统的入门者常被引导去用心领会这一精神现实。

其次，古代北欧人种，远古时代来自极地的“白教”种族，与今天俗称的“白种人”完全不相符，今天的白种人这样称呼仅基于其身体特征、肤色等等。传统的北部及其原始人口“北欧原住民”早已不再代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现实。显然，即使是这种原始文化的最后残余，也早在数千年前就从现实中消失了。

因此，传统中的北方是一个元史学和元地理学的现实。关于“北方乐土种族”也可以这样说：它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而是纯粹精神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种族”。（“形而上学种族”的主题在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的著作中有详细阐述）。

南方大陆和整个传统南方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不复存在，其最古老的人口也不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整个星球从某个时刻开始都变成了“南方”，因为原始极地启蒙中心及其使者对世界的影响缩小了。南方的现代种族是与北方种族无数次混血的产物，而肤色早已不再是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形而上学种族”的主要区别标志。

- 276 -

换句话说，世界的现代地缘政治图景与世界在其超历史、跨时域部分的基本图景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陆及其人口已经与对应原始时代的那些原型截然不同。因此，一方面，真实大陆和真实种族（作为现代地缘政治的现实），与另一方面，元大陆和元种族（作为传统神圣地理的实际情况）之间，今天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几乎完全相反。

6.11 “富有的北方”的错觉

在现代地缘政治中，使用“北方”的概念时，最常见的是搭配定义“富有”的那些词，像是“富有的北方”，还有“发达的北方”。这被理解为西方文明的总和，它侧重于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富有的北方”之所以富有，不是因为它比“南方”更聪明、更有智慧或更有精神，而是因为它所建起的社会制度，其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与自然潜力，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与自然资源，从中获得物质利益。“富有的北方”在种族上与白人有关，而这一特征是各种公开或隐蔽的“西方种族主义”（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基础。“富有的北方”在物质领域的成功被提升为政治甚至“种族”原则，这正是出现在那些处于工业、技术和经济发展前沿的国家，即英国、荷兰，以及后来的德国和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和数量上的福祉等同于某一定性标准，以此标准为基础就出现了对南方民族（即不属于“富裕北方”民族）最荒谬的偏见，认为他们“野蛮”、“原始”、“欠发达”，而且“非人性”。这种“经济种族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殖民征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后来它的经过修饰的版本进入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原始和最矛盾的方面。此外，纳粹思想家通常只是简单地将关于纯粹“精神北欧主义”和“精神雅利安种族”的模糊猜测与英国式粗俗的、逐利的、生物性商业种族主义混为一谈。（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用物质和技术发展的范畴来代替神圣地理范畴，才是国家社会主义最消极的一面，才最终导致了它在政治、理论，甚至军事上的崩溃）。但即使在第三帝国战败之后，这种“富有北方”的种族主义丝毫没有从政治生活中消失。然而，它的信奉者主要是美国及其在西欧的大西洋主义合作者。当然，在“富有北方”的最新世界主义学说中，并没有强调生物和种族纯洁性问题，但在实践中，对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裕的北方”仍然表现出纯粹的“种族主义”傲慢，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罗森伯格路线正统派的特征。

实际上，“富有的北方”在地缘政治上是指那些与传统直接对立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数量为上、唯物论、无神论、精神退化、灵魂堕落的力量获得胜利的国家。“富有的北方”意味着与“精神北欧主义”、“北方乐土精神”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神圣地理中，北方的本质是精神

- 277 -

高于物质，光明、正义和纯洁最终彻底战胜兽性生命的黑暗邪恶，战胜了恣意的个人沉迷，战胜了污秽的自私自利。与此相反，世界主义地缘政治的“富有北方”意味着纯粹的物质福利、享乐主义、消费社会，尼采所称“最后的人”的那些无忧无虑、虚假人造的天堂。技术文明的物质进步伴随着真正神圣文化可怕的精神倒退，因此，从传统的角度来看，现代“发达”北方的“财富”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标准，评判优于现代“原始南方”的物质“贫困”和技术落后的标准。

此外，南方物质层面的“贫困”往往与南方地区真正神圣文明形式的保存成反比，这意味着精神财富有时隐藏在这种“贫困”背后。尽管“富有（和侵略性的）北方”试图将自己的标准和发展道路强加于每个人，但至少有两个神圣的文明在南方空间中继续存在至今。这就是印度教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对远东传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言辞的掩护下，看到了一些一直对中国神圣文明起决定性作用的传统原则。尽管如此，即使是南方地区，在那里居住的民族仍然坚持非常古老、几乎被遗忘的神圣传统，与奉行无神论和极端物质主义的“富裕北方”相比，似乎仍然是“精神抖擞”、“充实饱满”、“健康正常”的，而“富有的北方”本身，从精神上来说，是完全“不正常”和“病态”的。

6.12 “第三世界”的悖论

世界主义计划中的“贫穷南方”实际上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词。这个世界在冷战期间被称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暗示了前两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和欠发达苏联，对全球地缘政治来说比所有其他地区都更重要和更有意义。原则上，“第三世界”一词具有贬义，因为根据“富有的北方”功利主义的逻辑，这样的定义实际上将“第三世界”国家等同于“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基础，这些资源只能为北方民族自己的目的而予以征服、开发和利用。与此同时，“富有的北方”巧妙地利用了“贫穷南方”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特征，试图让那些在精神潜力上远远超过“北方”自身精神水平的南方力量和结构为北方纯粹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服务。北方几乎总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文明发展的周期性时刻有利于变态、反常和不自然的趋势（根据传统，我们现在处于“黑暗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卡利年代（Kali Yuga））。印度教、儒教、伊斯兰教，这些“非白人”民族的本土传统，成为“富裕北方”的物质征服者实现其目标的唯一障碍，但同时他们往往利用这些传统的某些方面，利用矛盾、宗教特点或民族问题来实现其商业目标。这种纯粹为了反传统的目的而功利地利用传统的某些方面，比直接否定整个传统更为邪恶，因为最大的歪曲就是使伟大的东西不发挥任何作用。

- 278 -

事实上，“贫穷南方”之所以在物质层面上是“贫穷”的，正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更看重精神的，它总是把现实中物质方面的因素放在次要的、无关大局的位置。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上的南方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物体保持一种纯粹的传统主义态度，一种平静、超然、最终冷漠的态度，与“富裕的北方”痴迷物质、贪图享乐、及时行乐妄想症形成鲜明对比。“贫穷南方”的人们，在正常情况下，虽然生活在传统中，但仍然活得更充实、更深刻、甚至更奢华，因为他们积极参与神圣传统，这赋予他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意义、强劲有力，而且丰富多彩，但这些早已被富裕北方的代理人剥夺得一干二净；而“富裕的北方”则被神经症、物质恐惧、内心空虚、漫无目标的存在所折磨，成了一支呆板的万花筒，那些画面虽然五光十色却空洞无物。

可以说，远古时期的南北关系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南北关系截然相反，因为今天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是南方，而北方则完全失去了传统。但是，这种说法仍然不能完全涵盖真实情况，因为真正的传统，不能允许激进的无神论“富裕北方”像对待“第三世界”那样，来贬低北方自己。事实上，南方只是靠惯性，零碎地、部分地把传统保存了下来。南方采取被动的立场，虽然做了抵抗，但那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北方精神到头来并没有完全传递到南方；南方曾经积累和保存了来自神圣北方的种种精神方面的冲动。原则上，在传统上的主动性不会来自南方。相反，北部地区先天就具备主动性，因此世界主义的“富裕北方”设法以这种主动的方式加强了其摧毁全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北方一直是并仍然是一个权力之地，

因此来自北方的地缘政治主动权具有真正的效力。

今天，“贫穷的南方”比“富有的北方”在各方面都更拥有精神上的优势，但同时它却不能真正替代“富裕北方”的世俗侵略，也无法组成一个激进的地缘政治项目，来瓦解全球现代空间的病态现状。

6.13 “第二世界”的作用

在“北富南穷”的两极地缘政治图景中，始终存在一个独立的，而且意义重大的附加成分。这就是第二世界。“第二世界”通常被理解为融入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第二世界”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富裕北方”，因为某些精神动机暗中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名义上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第三世界”，因为总体上苏联制度的核心是朝向物质发展，朝向“进步”，朝向其他纯属世俗的原则。在地缘政治上，欧亚苏联既位于“贫穷的亚洲”领土上，也位于相当“文明”的欧洲土地上。社会主义时期，全球“富裕北方”地带在欧亚大陆东部是开放的，这使南北轴线上的地缘政治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晰。

- 279 -

“第二世界”作为一种特殊文明的终结，为前苏联的欧亚大陆带来了两种选择：要么融入“富裕的北方”（以西方和美国为代表），要么滑入“贫穷的南方”，即变成第三世界。也可以采取折衷方案，部分地区归属“北方”，部分地区归属“南方”。与近几个世纪以来一样，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分配地缘政治空间的主动权属于“富裕的北方”，他们愤世嫉俗地利用“第二世界”概念的悖论，划定新的地缘政治边界，并重新分配势力范围。民族、经济和宗教因素只是世界主义者的工具，进行损人利己和深具唯物主义动机的活动。毫不奇怪，除了虚假的“人道主义”言论之外，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几乎公开的“种族主义”论点，旨在向俄罗斯人灌输一种对亚洲人和高加索南方人的“白人”傲慢情结。与此有相关的是一个反向过程，即“贫穷的南方”最终拒绝前“第二世界”的南部领土，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场关于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冒险，关于人们渴望传统、渴望宗教复兴的行动。

“第二世界”正在瓦解，他们沿着两条路线分解，一条是“传统主义”路线（属于南方的、惯性的、保守的类型），另一条是“反传统主义”路线（属于积极的北方、现代主义和唯物主义类型）。这种二元论在今天才做出规划，但很快就会成为欧亚地缘政治的主导现象，这一扩张是由世界主义预先确定的，因为他们就是按照“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来理解这个世界。直到人们对现代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提出质疑，加以理解，意识到其真正的形式，并识破了人道主义和经济性质的所有欺骗性陈述之后，人们关于拯救前苏联大空间的企图，关于保留“第二世界”独立的企图，关于（在纯粹现代意义上）保持南北边界平衡的愿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世界”正在消失。它不再在现代地缘政治图景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富

裕北方”对“贫穷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迄今为止第二世界仍然作为中间权威存在着，不存在这一中间权威后，南方同北方技术治国文明中激进的实用主义仍然共存。“第二世界”除了按照“富裕的北方”为它制定的规则完全分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命运，但只有通过彻底拒绝以世界主义方式看待南北对立轴心的全球逻辑，这才有可能实现。

6.14 北方计划的复活

“富有的世界主义北方”通过分裂和破坏“第二世界”，以全球化方式统治世界。这在现代地缘政治中被称为“新的世界秩序”。反传统的主动力量以经济落后为代价，巩固了对南方地区消极抵抗的胜利，保留并保护了残存的传统。“第二世界”内部的地缘政治能量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融入“文明北方地带”体系，最终断绝与神圣历史的联系（左翼世界主义计划），要么沦为被占领者。允许部分恢复某些传统（右翼世界主义项目）。今天的事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在不久的将来加以展开。

- 280 -

作为一个替代项目，人们可以在理论上制定一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转型路径，其基础是拒绝世界主义的南北逻辑，并在黑暗时代结束时尽可能地回归真正神圣地理学的精神。这是一个“伟大回归”的项目，或者用另一种术语来说，是“大陆大战”。

笼统地说，这个项目的本质如下。

1) “富裕的北方”不是反对“贫穷的南方”，而是反对“贫穷的北方”。“贫穷的北方”是理想，是回归北欧文明起源的神圣理想。这样的北方是“贫穷的”，因为它的基础是绝对的禁欲主义，是对传统最高价值观的彻底奉献，并为了精神而完全牺牲物质。在地理上，“贫穷的北方”只存在于俄罗斯的领土上，俄罗斯在本质上是“第二世界”，在社会上、政治上都反对以最“进步”的形式最终接受世界主义文明。俄罗斯的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是地球上唯一没有被“富裕的北方”充分开发的领土，这里居住着传统民族，是现代世界的未知领域。对俄罗斯来说，“贫穷的北方”之路意味着拒绝融入世界主义地带，拒绝将自己的传统仿古化，拒绝将其降低为民族宗教保留地的民间传说水平。“可怜的北方”必须是精神的、理智的、积极的和进取的。在“富裕北方”的其他地区，潜在反对“贫穷的北方”也是可能的，这可以表现为西方知识精英激进地破坏“商业文明”基本进程，表现为一场为了精神、正义和自我牺牲等古老而永恒的价值观而反对金融世界的起义。“贫穷的北方”开始与“富有的北方”进行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之战，放弃其项目，从内外破坏其计划，破坏其无可挑剔的效率，扰乱其社会政治欺诈。

2) “贫穷的南方”无力独立反抗“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欧亚）北方”结成激进联盟，展开反抗“北方”独裁统治的解放斗争。特别重要的是要打击“富裕南方”意识形态的代表，即打击那些为“富裕北方”工作的力量，他们主张传统国家的“发展”、“进步”

和“现代化”，这实际上只会意味着更大地背离已经所剩无几的神圣传统。

3) 欧亚大陆东部的“贫穷北方”和环绕地球的“贫穷南方”正在集中力量与大西洋西部的“富裕北方”作斗争。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永远终结了庸俗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终结了美化“白人技术文明”口号，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主义宣传。（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在他那部名著的标题中表达了这个想法：《欧洲，第三世界，同一场斗争》“L'Europe, Tiers monde, même combat” -- “第三世界和欧洲：我们要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当然，它是关于“精神的欧洲”，关于“民族和传统的欧洲”，而不是关于“商人的马斯特里赫特欧洲”。）真正神圣的北方智慧、活力和灵性使南方的传统回归到北欧源头，

- 281 -

并将“南方人”召集起来对抗唯一的地缘政治敌人。“南方人”的被动抵抗由此在“北方人”的全球救世主义中站稳了脚跟，这些北方人从根本上拒绝那些走上技术进步和物质发展道路的白人中那一支邪恶的和反神圣的势力。在“第三世界”与拒绝“富裕北方”计划的那部分“第二世界”团结一致的基础上，一场全球性超种族和超国家的地缘政治革命爆发了。

- 282 -

第七部分 地缘政治经典文本

哈尔福德·乔治·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历史的地理枢纽⁸⁰

(略)

⁸⁰ 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XXIII No. 4, 1904 (重印于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70 (4) 2004, 298–321); (这里的译文直接取自以下书籍。建议读者阅读原译作, 并可参阅该译作中所包括的多幅地图:)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林尔蔚 陈江译, 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09.

- 283 -

彼得·萨维茨基

欧亚性的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⁸³

(略)

⁸³ ГАРФ фонд П.Н. Савицкого № 5783 (ред.)

- 294 -

让·蒂里亚特 (Jean Thiriart)

超人共产主义 (给德国读者的信)⁸⁴

(略)

⁸⁴ 1982 年 12 月 这封信的正文于 1992 年由作者直接交给阿·杜金 (编辑)

- 299 -

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张力以及地球和海洋的对立⁸⁵

(略)

⁸⁵ Carl Schmitt "Die planetarische Spannung zwischen Ost und West", 1959 in "*Schmittiana-- III*" von Prof. Piet Tommissen, Brussel, 1991 (Ed.).

- 307 -

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陆地和海洋*

(略)

* 卡尔·施密特，陆地和海洋，林国基 周敏 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

- 325 -

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游击队理论 -- “政治的概念” 附识**

1962 年 9 月 13 日

(略)

** (德) 卡尔·施密特 (Schmitt, C.) 著 “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 附识” 见《施密特文集，政治的概念》，朱雁冰 译 刘小枫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Carl Schmitt, *Theorie des Partisanen*, © Duncker & Humboldt GmbH in Berlin, 2010.

- 356 -

卡尔·豪斯霍弗 (Karl Haushofer)

大陆板块：柏林-莫斯科-东京***

(略)

*** Karl Haushofer "Kontinentalblocke: Mitteleuropa - Eurasia -Japon" in "Ausgewählte Texte zur Geopolitik", Boppard am Rhein, 1979.

- 396 -

卡尔·豪斯霍弗 (Karl Haushofer)

经线和纬线的地缘政治动态#

(略)

"Newspaper Geopolitics", No. 8, 1943 Germany.

- 402 -

海因里希·乔迪斯·冯·洛豪森将军 (General Heinrich Jordis von Lohausen)

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地缘政治对立##

(略)

^{##} Heinrich Jordis von Lohausen, “Wien und Belgrad als geopolitische Antipoden”, in Sander, Hans-Dietrich (Hg.): *Staatsbriefe*. Heft 12/1992. 1992. 4° 40 S. 110 gr. Bestell-No. 18199212. Gh.

- 405 -

海因里希·乔迪斯·冯·洛豪森将军 (General Heinrich Jordis von Lohausen)

海湾战争--反对欧洲战争?*

(略)

*Heinrich Jordis von Lohausen, “War der Golfkrieg ein Krieg gegen Europa?” in Sander, Hans-Dietrich (Hg.): *Staatsbriefe*. Heft 6-7/1991. 1991. 4° 60 S. 160 gr. Bestell-No. 18199106. Gh.

416 -

让·帕尔维列斯科 (Jean Parvulesco)

第三个千年的地缘政治

(略)

- 420 -

艾默里克·乔普拉德 (Aymeric Chauprade)

大型游戏*

(略)

- 424 -

亚历山大·杜金

反对西方的其他观点

(略)

- 426 -

代替结论（第八部分）

元素启示录

（从地缘政治到历史哲学对卡尔·施密特元素论的反思）

1.1 只有两种文明元素

文明结构与陆地和海洋的一个或另一个元素的主导地位的联系是卡尔·施密特概念的轴心，也是这一概念最强大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面。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将神圣的四要素理论抽象应用于文化和历史分析，还是将陆地与海洋，土与水这两个要素的基本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自然）二元论分离出来。而这种二元论只有在被人类社会意识到，并理智地体验到时，才成为真正的历史因素。为了澄清，事实上，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指出施密特没有提到火元素及其哲学、文化和文明分析（这将在下面讨论）。而对于同航空学相关的空气元素，施密特声称它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法”（“nomos”），自己的文明类型，是对海洋文明认可的历史轨迹的技术延续。航空制权（Aerocracy）甚至更相关的航天制权（etherocracy），即技术发展的航空和航天阶段，并没有如世界海洋的开放及其挑战所引起的人类历史进程中那种全球性变化。

施密特巧妙的直觉非常正确地告诉他，宇宙既没有真正的挑战，也没有历史的答案，“航天制权”条件下的空间研究只是展示了一个被奴役的痛苦，而不是解放的技术管理文明的痛苦。乍一看，考虑到施密特隐含同情反制海权，他对要素的历史辩证法的这种方法，似乎应该成为纯粹保守主义学说的基础。我们很容易这样理解关于“全球东西方之间的张力”那篇文章的结束语：

“新的空间，新的挑战必将在我们地球上出现，而不在外太空出现。”

这是施密特的追随者最常做的事情，考虑到他在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太简单了。如果说新的挑战仅仅是在“解放的技术”和海洋文明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时代之后向陆地方向回归，哪怕是出于对技术或环境灾难的恐惧，那么历史辩证法的精神张力就失去了它的戏剧维度，几乎变成了一种自然的循环，与那种静态的两极张力相一致，根据施密特本人的说法，所有纯粹的人类精神历史都是基于克服这种张力的。陆海文明二元论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

- 434 -

施密特倾向于考虑过渡到航空制权，进而向航天制权过渡，这只是海洋战略的自然发展，而不是新革命时代的迹象。因此，可以说，水的要素在其普遍主义扩张中，正是以牺牲土地和传统上从属于它的空间为代价的，为其它两个要素——空气和太空（真空）——服务，从

物理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越来越稀薄的物质状态。换句话说，海洋的水要素通过空气和太空的从属要素表现出来，继续其“液化”的文明趋势；同时，我们回顾，正是这种趋势引发了“海洋存在”的历史辩证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解放和工业革命各个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像苏联这样的陆地超级大国在航空和太空领域的成功，地缘政治巨兽、大陆地块力量和大地之法（Nomos）的最后一个全球表达？正如施密特本人出色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历史功能：它是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学说，在概念上武装另类精英，成功地将一个古老的陆地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业和技术堡垒，能够成功顶住 70 年海洋文明的多重压力。东方集团使用航空制权和航天制权是延续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战略，以抵抗西方资产阶级文明。

因此，作为历史二元论的一方，海洋将诸元素都包括进促进全球过程中。如果说 1959 年施密特撰写《全球张力》(Planetary Tensions)这篇文章时，这一过程还处于起步阶段，那么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过程已经变得透明而明显。制海权控制了航空制权和航天制权。

在这里，我们来到了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点，这是绝大多数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试金石，直到最近人们才认为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们指的是东方集团的崩溃和改革。

1.2 大洪水的特殊性

这一事件是检验卡尔·施密特观点是否充分的关键。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可以按以下方式描述这个事件。

在 20 世纪，东方集团体现了陆地与海洋相对立的全球趋势。东方集团的终结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在这个阶段中，曾有可能有效利用概念框架，总结与海洋文明、与西方、与世界进行全球竞争的工业革命第二阶段，这些竞争对手以解放技术的无限发展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这终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充足性。陆地的力量已经失去了有效的防御概念，直到马克思对当代欧洲历史挑战做出的反应条件发生了彻底和不可逆转的变化。

- 435 -

苏联集团崩溃的一种解释是它在技术竞争方面的落后，而这种落后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充分应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换句话说，在与空间领域战略发明相关的高科技航天制权领域中，海洋赢得了与陆地的技术对决。

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海洋激发了技术突破的动力，并在后来产生了技术文明，它及时有效地从海洋本身借用了（就当时而言）最新的概念技术，海洋最终击败了陆地。这一过程与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结束完全一致。在理论层面，这一点从 1970 年代初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欧洲迅速退化。在实践中，重点在于改革。工业革命的第三阶段至少

需要一个新马克思和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这本可以是欧洲法西斯主义，但这种尝试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都被证明是失败的。德国被一个更文明一致的陆地大国（苏联）击败，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海洋的支持（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拿破仑开始，历史上发生多次）。没有新马克思，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新的马克思。

第二：东方集团的瓦解意味着真正的海洋全球化，正在从法官和控制者的角色转向独裁者（个人独裁）的角色。这就是世界主义，在西方支持下地球的文明整合。在宗教语言中，这一事件只有一个名称：大洪水，大地法终结，海洋法普遍统治。让我们也记住从大海中走出来的世界末日野兽¹⁰⁰。这就需要从两种要素对抗的时代最终过渡到一种要素被另一种要素征服并与之敌对的时代。可以说，这是“普遍性世界”的开始。海怪利维坦击败比蒙巨兽鲸熊。大白鲸战胜俄罗斯熊。

第三：从现在起，其余的要素都从属于海洋：被征服的陆地（被击败的敌人，*Hostis* 敌人）、空气和太空（天然盟友，与水的辩证法一致，*Amicus* 朋友）充当海洋的概念变体，是全球舰船的凑合的要素，世界岛（斯皮克曼的术语，而非麦金德的术语）。这是单一世界的时代、后工业社会、全球信息化和自动化的时代。用马克思最前卫、最直觉的语言来说，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的“资本的真实统治”。¹⁰¹现在是意识形态消失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的时代。

盎格鲁-撒克逊人接受了来自开放海洋的挑战，他们给出的答案体现在技术-工业掠夺上，这种挑战在现代西方文明中大量涌现，征服了整个世界，并在美洲的全球独裁统治中找到了

¹⁰⁰ 探索“假先知”或“另有一个兽”象征意义的地缘政治意义是很有趣的。关于他在《启示录》中是这样说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启十三，11）。这些东西。这“另有一个兽”属于这片土地。但在同样的地方，它强调“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启十三，12）。换句话说，我们谈论的是“大地之灵”，他走到了海洋要素的一边，走到了利维坦的一边。正如“从海中出来的野兽”本身是龙撒旦的代表，是他的替代品（即，大西洋主义是世界邪恶的历史表达），所以“另有一个兽”或“假先知”反过来已经是“海中野兽”的代表，即他的替代品。陆地权力的大西洋主义游说团正在执行这一功能。

¹⁰¹ See Jean-Marc Vivenza "From formal domination capital to his real domination", "Elements" No. 7. Жан-Марк Вивенза «От формальной доминанции капитала к его реальной доминанции», «Элементы» № 7.

- 436 -

最终形式，哥伦布发现的正是这个大陆，开始了“现代世界”。这一挑战在东方集团的瓦解、苏联的重组和解体中完成了它的历史表现。解放技术（*entfesselte Technik*）克服了所有外部障碍。海的力量现在是绝对的。它体现在技术官僚西方的霸权、美国的战略优势、流动资本的主导地位，以及传统价值结构的完全模糊。财产、继承、婚姻、住房，所有这些都失去了它在土地存在时代的意义，在大地法时代的意义。

1.3 一个被忽视的要素

尽管施密特谈到真正历史事件具有一次性的性质，更倾向于避免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和

系统化，但作为一名基督徒，他难以否认存在历史的终结，因此也无法否认某种目的论。他拒绝黑格尔或马克思的目的论并不意味着拒绝一般的目的论。作为一个绝对诚实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海德格尔相似），他不想限制自己或他人对真理的自由直觉，他相信这是人类最高的尊严和思想自由，而这些最终都会反映到政治（das Politische）和决策（die Entscheidung）中。在施密特的所有推理中，隐含着对基督徒来说很正常的末世论：他强调新时代的独特性，这在于它的全球主义，在他对“解放技术”和海洋存在的态度中很容易猜到注释中涉及启示录的那些观点。

很明显，施密特意识到了圣经关于因水域离开而创造土地的叙述与当前情况之间是平行的，当前情况是对陆地上海洋存在的反向攻击，即带有象征意义的水淹陆地。同时，重要的是，历史上永久存在的制海权趋势现在才进入其大洋阶段，并达到最大可能的规模。大洋制海权向平流层和太空的辐射只不过说明了制海权胜利的限度在哪里。

但是，回溯历史，我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陆地、土地上生存的习俗会成为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人类生存模式？再问一句，为什么如此稳定的陆地传统习俗结构（它不是因河流退缩而覆灭，不是因他人放弃有限制海权而被颠覆，也不是因游牧民族撤退而被推翻），最终却成为错综混乱的海洋要素的牺牲品？

《创世记》断言水先于陆地存在，暗示混沌与秩序相比具有某种首要地位，印欧神话中的许多故事中都证实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假设（就像在赫尔墨斯传统中的情况一样）地球是凝结的水，而就地理学而言，陆地是没有水的海洋底部。但是这片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领土、律法习俗（诺莫斯 nomos）、土地、大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古德意志人的中心地带（Mitgard）、秩序的堡垒、历史上的城邦并不是传统诺莫斯的原因，而是某种超然影响的结果，一种固定在自然界中的超自然痕迹，一种可以称为历史起源的印记。表示旱地的那个俄语单词，德文是 das feste Land（旱地），die Erde（陆地），将让我们更接近这股神秘的力量。这个俄文单词就是 Цыма（陆地）。它在词源上包含干燥程度的意思，这在其

- 437 -

他语言中是不存在的。而这种品质，反过来，唤起与温暖、热和火的联系，这是最后被遗忘的元素，第五元素，在古代分类中很熟悉，但由于某种原因在施密特的文明和历史分析中不存在。

然后，我们记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与古希腊城邦米利都的思想家泰勒斯和其他海洋主义哲学家相反，认可宇宙起源于火的革命性理论。相对于地球环境的元素而言，火无疑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元素。如果土、水和空气对于我们的星球及其居民来说是内在的，甚至平流层周围的宇宙真空也可以被认为是与环境相关的内在本质（太空），那么火、热、光就会出现我们来自外部，来自闪耀的牺牲之星，伟大的太阳。普通元素就是人的元素。火是诸神的元素，是属灵天堂的物质。而火的极性与所有其他元素的关系并不符合那种静态的、纯粹自然的方案，施密特在谈到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自然张力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模式，他正

确地将这种模式与人类历史辩证法中固有的张力区分开来。火所引发的张力是辩证法的本质，如果在自然起源的问题上能认同泰勒斯观点，那么在历史起源的问题上，只有赫拉克利特是对的。泰坦的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的礼物，降世的神圣之火，是历史性辩证法的神秘主题，是炼金术士的隐形代理，是同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之子，它通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循环，展现其太阳精神、天堂灵知的精彩。

超验之火驱散了原始之水，于是大地升起。超然火被地球人尊为主要原则，他们将其放置在他们的房屋中心（圣炉），他们的寺庙（圣坛）中心，他们的身体中心（崇拜心灵），他们世界的中心（太阳，给予空间方向和时间维度）。陆地的大地之法是火焰微妙影响的结果。人类通过陆地秩序回应超验者的挑战，从而进入历史，超越自然，成为自己。家庭是太阳的答案。这片土地及其文明是智慧地理解火的产物。

只要实现了火与土之间的联系，海洋挑战就不存在了。制海权由制陆权平衡，每当迦太基在扩张其本身文化信息和文明信息时，罗马灶神维斯塔就胜利粉碎诞生自海水泡沫的迦太基。当人们家中、心中、庙宇内的圣火熄灭时，就会听到利维坦的末日咆哮。而当这片土地失去了它的意义、它的中心、它的力量，土地从此注定要在末世决斗中输给大海。

当传统变得保守的那一刻起，当对超越之火的挑战给出的答案最终掩盖了问题，当大地的规范不再将其规范与天上的规范进行比较时，重组和屠杀比蒙巨兽就变得不可避免。归根结底，整个人类历史不过是一颗神奇之星的第一道闪光与大洪水之间的插曲。

1.4 圣象和土地

- 438 -

非常有趣的是施密特关于图像学的评论以及他对图像与西方联系的概括。这与火元素直接相关，因为视觉能力是现实光维度的一个元素，反过来，光维度又是火元素（与热一起）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接受我们所揭示的大地和太阳之间的起源联系，那么圣像、神圣的视觉形象和大地之法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清晰。自然地，环境的空间不动性、固定性、有序性往往以符号、象形文字、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火，仿佛从流动的现实抓住了某个片段，它变成了一个形象，一个圣象，一个永恒的东西。可以说，这从大量水的混沌中重复了原始土地的起源之谜。通过圣象，大地之法不断提醒人们关于它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圣像的崇拜和对绘画的普遍使用确实是传统的、世俗的、大陆存在的明显标志。

这种考虑有助于施密特深化评论西班牙历史使命。天主教西班牙在所有被其征服的土地各处布满圣母面容，执行着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即通过火来抵制海洋（并称其为海洋）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这种全球运行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历史功能：在这两种情况下，接受海洋的挑战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海洋对大地之法的有害后果，并试着把毒药变成药物。西班牙在与英国海盗的海战中失利，给全球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跨大西洋的岛屿上，盎格

鲁-撒克逊人播下了世界末日文明的种子，一种注定要体现利维坦所有末日、最终力量的文明。一艘大陆船从泡沫中出现，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它的欧洲原型。这个怪物注定要扑灭圣火，打破圣象，在地球上建立自己的“新世界秩序”。自然，这个新生怪物的主导世界观是极端的新教教派、浸信会、清教徒、摩门教等思想，其特点是极端程度的偶像破坏、教会现代主义和亵渎神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拉丁美洲游击队，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原文如此！）和天主教解放神学（原文如此！！）的混合，这是西班牙征服者为了阻止大洪水而雄心勃勃的全球手段今天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困难，施密特并没有完全理解。事实是，他提到了西方认同视觉形象和惯于圣象崇拜，也提到了东方否认视觉形象及破坏圣象崇拜。施密特本人举了几个例子，对这种无疑正确的识别进行了辩驳。让我们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这直接触及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俄罗斯的历史意义和使命。

1.5 时空中绝对的友人和外人（*Amicus et Hostis*）肖像

这里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另一本书（《欧亚大陆之谜》的“欧亚大陆的潜意识”一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形而上学意义。我们谈论的是，欧洲思想家认同西方传统，这是典型的。同时，它往往不仅涉及西部，还涉及西北。更重要的是，即使是西、西北、北三个地理概念有时也会合并。这与南方、东南部和东方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方向通常也汇聚

- 439 -

成一幅文明图景，以中东闪族文化景观为代表，这在欧洲历史上最为人熟悉。此外，这种观点有时来自罗马遗产，有时来自基督教传统。

但事实上，这是欧洲人对地理造成的错觉，只有最深刻的头脑，首先是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才能摆脱这种困惑，从不同的、更恰当的角度看待事物。因此，勒内·盖农 正确地指出，从真实的（和神圣的）地理角度来看，欧亚大陆是一块巨大陆地，欧洲只是一个西部的海角，一个指向大西洋的半岛。印欧民族生活在整个大陆上，从印度斯坦经伊朗和俄罗斯到欧洲自身。雅利安印度保留了对白人最古老的神话和知识分子观点的记忆，而东正基督教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乌拉尔山脉，直至太平洋，占据的空间比欧洲还大。然而，历史的狭隘性和灌输的陈词滥调，普遍不允许欧洲人将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视为完全正宗的基督教传统，而且是托付给印欧白人的。在我们的语境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在东正教的俄罗斯，“圣像”这个希腊名字与神圣的形象相关联而被保留下来，而且，正是东正教，俄罗斯的圣像今天完全支持了真正的基督教传统，而这个传统在西方实际上已经消亡了。

勒内·盖农回顾德国教授赫尔曼·维尔特（Hermann Wirth）的著作《人类神圣起源》¹⁰²时指出，应该区分北大西洋（西北）、极北（北部）和大西洋（西部）地区等概念。

事实上，施密特对火的崇拜和对领土大地之法的认真研究，是整个印欧白人的独特品质，

他们从北方降临欧亚大陆，定居人口遍布从西到东、从东到西整个大地。哪里有印欧人，哪里就有圣像、圣画，哪里就敬奉火与光、太阳神话，哪里就崇拜传统等级制度、北方乐土（Hyperborea）记忆。神圣图像在印度比比皆是。在伊朗，即使在伊斯兰化之后，伊斯兰教严格禁止人物、动物形象，微型的真实绘画仍然得到蓬勃发展。俄罗斯东正教不仅崇敬圣像，也崇敬圣像画家，而东正教宁静主义，即非受造之光的教义，是俄罗斯教会的中心生命线。圣像是印欧人不可分割的属性，这一点与北方完全一致，与北方乐土，即标准的、传统的全球陆地之法的古老祖先完全一致。

厌恶画像，破坏偶像，与其说是东方的特征，不如说是南方的特征。如果我们考虑到印欧人的北方乐土的起源，这是非常标准的地理对称性。如果北方种族崇拜火和肖像，那么相反的南方种族必然崇拜火的对立面（例如，水）和偶像的对立面（例如，声音）。有趣的是，盖农本人将这种文化二元论与定居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他将定居方式与圣经中该隐的形象，与视觉形象和时间联系起来，而将游牧方式与亚伯、语言和空间联系起来¹⁰³。这与施密特所讨论的元素二元性非常吻合。海上生活（尽管与游牧生活完全不同）是游牧生

¹⁰² See ж-л "Милый Ангел" N 1, Москва, 1991; Herman Wirth, *Die heilige Urschrift der Menschheit*, Köhler & Amelang, 1931, 32, 33, 35 und 1936;

¹⁰³ See René Guénon, *Le Règne de la Quantité et les Signes des Temps*, Gallimard 1945; *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Luzac, 1953; Penguin, 1972; Sophia Perennis, 2001; Рене Генон "Царств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и знаки времени", Москва, 1994. (暂无《数量的统治和时代的征兆》中译本)。

活方式的一种极端发展,开始是陆地游牧,后来在大陆附近海域航行,最后走出决定性一步,进入公海,这一路径一旦结束,他们就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奇怪:盖农声称闪米特传统绝不是东方传统,而是亚特兰主义的西方传统,同时也是游牧的传统。因此,据盖农所说,圣经叙述中对牧民亚伯的态度是正面的。此外,盖农指出,建造所罗门神殿的是从外国人中邀请的大建筑师,并证明神庙是印欧传统的代表,因为它的特点是通过建造这座房子,开拓了神圣建筑,根据施密特的说法,这一建筑正是大地之法的基础,而游牧的闪米特人本身具有不同的社会神圣结构。

最后,关于东方,盖农认为,世界的这一方向比任何其他方向都更加与传统相关,与神圣原型的稳定性相关,与忠于起源相关。在《东方与西方》一书中,他展开详细论证,支持这一论点。可以说,盖农明确将东方与北方联系在一起,认为东方是原始北欧传统的历史继承者。顺便说一句,关于“北方之光”和“东方之光”概念的同源性,可以在亨利·科尔宾(Henry Corbin)中找到精彩的段落,他是伊朗传统中最优秀的现代专家,也是伟大的苏拉瓦迪(Suhrawardi)作品的翻译者。

因此,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观点。北方被认定具有印欧传统、定居生活、崇拜火与图像。此外,北方也与东方有着神圣联系。正是北方与东方这两个方向,在发展大地之法及其中心力线的历史问题中应被视为最初的方向。因此,历史上为圣像崇拜辩护绝不是西方的趋势,而是北方或东方的趋势。这一线索是从印度到爱尔兰整个欧亚大陆的特征。它与北方之光 Nordlicht 的历史轨迹相吻合,也与承载北方之光的民族及文化相吻合。它们是多立克斯巴达、帝国罗马、琐罗亚斯德教伊朗、吠陀印度、拜占庭、东正教俄罗斯、天主教爱尔兰和西班牙。这是大地之法的阵营。

在历史的对立面,分别是游牧闪米特人、圣像破坏者,制海权萌芽,商业文明和“技术突破”的南方和西方(!)。盖农会称这个阵营为“反传统文明的场所”、“伟大模仿剧的编造者”。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盖农在《数量的统治和时代的征兆》一书中提出关于世界之卵的末世解体之“分解”的想法,它在时间上和类型上与施密特分析的海洋的胜利完全一致。盖农和施密特一样,将这种解体与技术进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时代的西方文明联系起来。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深深的敌意和警惕。

最后,根据盖农的说法,西方的和游牧的闪米特因素的作用;南部,如果我们从欧亚大陆的位置评估闪米特人的分布;与贸易和自由交换有关,这是所有制海权网上的特征(迦太

基反对罗马)；站在资本主义的起源(受到马克思和桑巴特的批评)；在宗教事务(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对一切印欧事物都抱有偶像破坏和敌意态度；声援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运动(加尔文主义在荷兰、英国，后来在美国，这些海洋强国中传播)；最后，特别积极地破坏大地

- 441 -

之法的欧洲传统(施密特本人反复撰写过大地之法)，将其放在对应链的最后一段中。

北方+东方、崇拜圣象、印欧人、火、房屋、定居、传统和土地。这些是大地之法的力量。文化和秩序的支持者，他们以雅利安传统的乃至基督教的狂热爱好者身份来支持超然之火的挑战。

南方+西方、破坏偶像、闪米特人、水、船舶、游牧、现代主义和海洋。这些是否定陆地的力量、溶解物的载体、理性混乱的世界末日能量、海洋的法则。他们对海洋的挑战做出回应，站在海洋一边，反对陆地，反对最古老、几乎被遗忘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地之法和所有人类历史之前就已经存在。

1.6 火的法则

东方集团的终结意味着海洋之法的彻底胜利。一切借助其自身的技术手段来抵制其逻辑和结构的尝试都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船上的战斗被西班牙打败了；在经济、工业、战略和理论上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1933-1945)海洋之法的抵抗，被西方依靠军力和狡猾镇压了下去，这部分受到豪斯霍弗欧亚项目的启发，也利用了苏联达到这些目的；考虑到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训，20世纪60-80年代华约国家在技术竞争中落败，此时正值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结束，而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正如一位日本姓氏的美国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人类历史的循环经过了自然的静止极点，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可以说土地、巨兽、欧亚大陆和大地之法的绝对损失。当然，大地之法则本身，只是人类对摆在它面前关于“存在”的开放性问题所作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它的本质。是依靠“答案”的外在形式，而不是依靠火元素，产生了北方乐土的答案。陆地再也无法应对海洋法则的挑战，海洋法则已变得独一无二，且遍布全球。陆地已被洪水淹没，世界之卵已经出现裂缝，陆地秩序已经土崩瓦解。工业革命的结束击破了人们以往的错误观念，凭借开放的技术(entfesselte Technik)，人们可以依靠自身水准进行竞争。绝对制海权的航天制权阶段，

从太空瞥一眼地球，就让所有生物蜂拥而至，从严格的实用主义角度看，这些生物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等于它们的实用性。生命是以真正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的金融等价物来进行计算的。基因工程产生克隆鸡和克隆人，就像昨天发明了蒸汽机或织布机一样。技术已经侵入了人类，到达了人类的中心。在 1959 年，施密特可能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事情可能会突然发生变化。到本世纪末，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了。

水的胜利以启示录的方式吸收了所有元素和所有历史形式，这些元素和历史形式不仅可以被摧毁，而且可以在模仿文明过程、模仿地缘政治的炼金术中得到改造。黄金（金钱）、万能溶剂和海洋力量的技术独创性已将人类变成了受控的生物物质。但仍有一些不受这一全球进程影响的东西。

那就是——火。

- 442 -

正是火，扫荡了它在历史进程中所裹挟的那些自然、文化和社会政治层面的污垢，与它曾经所处的妥协状态相比，火，现在权倾一时，而硕果仅存的只有大地的法则，这就是陆地的秩序。直到现在，火的原始挑战的结构才被澄清，因为直到现在，火才在整个历史卷帙中呈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无非就是人的问题。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意义？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然意义？人在多大程度上会屈服于构成他的自然结构的元素（直到具备普遍的物种合理性）？人以什么方式能够忠实于那些并非明显的超然维度？人最终得到了多少火？还是，人所得到的都只是水？

- 443 -

词汇表

（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蟒蛇战略（*Atlanticism / Анаконды стратегия*）是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路线，旨在从欧亚大陆剥离尽可能多的沿海领土，以遏制其地缘政治扩张。

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 / Атлантизм*）（与水、海洋、制海权、海权有关）是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概念；和以下概念相关：历史上人类文明的西方部分、以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战略联盟、军事战略北约成员国、对应“贸易体系”和“市场价值”（美国模式）的社会取向。与欧亚主义相反。

航空制权（*Aerocracy / Аэрократия*）- 希腊语，指“通过空气的力量”。基于空域发展及其用于地缘政治扩张的战略的权力组成部分。与航海的发展相比，航空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法则，而只是发展制海权的原则。

巨兽（*Behemoth / Бегемот*）来自希伯来语。“野兽”，“陆地怪物”（在圣经中）。施密特的术语。同为大陆，大陆主义，欧亚主义。

柏林（*Berlin / Берлин*）是中欧的天然战略首都。

两极世界（*bipolar world / Биполярный мир*）（双极主义或双极）是一种自然的地缘政治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反映了海洋统治与地球统治的主要地缘政治二元论。

集团（*Bloc / Блок*）是几个国家的联合体，这些国家显著改变了它们的战略和地缘政治质量，将它们带到了更高水平的行星活动中。根据“空间进程”规律，形成国家集团是一个必然过程。

富裕的北方（*Rich North / Богатый Север*）与大西洋主义、西方和自由民主世界相同。

大空间（*Big Space / Больш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Grossraum*）施密特的术语。将多种权力统一为一个战略实体。大空间系出自“空间进程”理论。

外新月地带（*Outer crescent / Внешний полумесяц*）（或**岛状新月地带**）是麦金德的术语，表示包括在制海权影响区域内的所有领土。部分大陆和岛屿倾向于“海洋存在”。它也是一个完全由战略大西洋主义控制的区域。

内陆海（*Inland sea / Внутренне море*）（自拉丁文 *mare internum*）是一个术语，表示封闭

在陆地制陆权范围内的水体，因此不是战略或文化边界。

内陆洋（*Inland ocean / Внутренний океан*）是一个与“**内陆海**”相同的术语，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中部洋**。

- 444 -

内新月（*Inner crescent / Внутренний полумесяц*）（或**大陆新月地带**或**边缘地带**）是麦金德的术语，指位于“外新月”和“轴心区域”之间的欧亚大陆沿海地区。

内轴（*Internal axis / Внутренняя ось*）是单一战略（或政治）空间内中心与外围之间地缘政治联系的质量。另见地缘政治射线和地缘政治领域。

水（*Water / Вода*）（或**海**）是“制海权”的一个特殊术语。特别由施密特（海 *das Meer*）和马汉（海 *Sea*, 海权 *Sea Power*）加以发展。

东方（*East / Восток*）与第二世界相同。

敌人（*Enemy / Враг*）（拉丁文 *hostis*）施密特的术语。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表示一组处于与战略首都相反的位置的外部国家、社会、种族或宗教实体。它没有道德负担，可以动态转移到各种实体。移动类。见朋友。

第二世界（*Second world / Второй мир*）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名称。冷战结束后指欧亚大陆。

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ось истории*）（或**轴心区域**或**心脏地带**）麦金德的术语，表示欧亚大陆的内陆领土，历史发展的空间动态围绕该领土发生。与俄罗斯领土相吻合。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science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ука*）是一门科学，本书概述其主要规定。

地缘政治二元论（*Geopolitical dualism /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уализм*）是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原则，它确定制海权和制陆权的对立面是历史进程的引擎。

地缘政治射线（*Geopolitical ray /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уч*）是地缘政治极点对周边地区的权力（经济、战略、文化、经济、行政等）影响的矢量。静态世界的真实政治图景与地缘政治领域息息相关。在地缘政治中，人们习惯将射线称为永恒持续推动力的开放动态过程。

地缘政治领域（*Geopolitical segment /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резок*）是在特定历史时刻，不考虑政治进程的一般动态情况，所考虑的战略首都（或地缘政治极点）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一组关系。另见地缘政治射线。

地缘战略 (*Geostrategy / Геостратегия*) 的地缘战略军事方面。

地缘经济学 (*Geoeconomics / Геоэкономика*) 是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功利经济的意义上对待空间。“制海权”分析方面优先学科之一。

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 Государство-Нация*) 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具有明显的集中制。国
- 445 -

家形式的政治教育导致诞生族裔群体及其文化。

边界 (*Borders / Граница*) - 地缘政治中有两种边界：线状边界和带状边界。线状边界即海洋边界。带状边界则是陆地边界。对声称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地缘政治集团而言，它的任务是使边界线对自己最长，对敌手最短，反之亦然。

民主政治 (*Demopolitics / Демополитика*) 契伦用语。人口统计参数对国家结构的影响。未得到广泛传播。

间断带 (*Discontinual belt / Дисконтинуальный пояс*) 科恩用语。间断的海岸地带，具有不确定的可变倾向，既可以倒向制陆权的陆地，也可以倒向制海权的海洋。

朋友 (*Friend / Друг*) (拉丁文为 *amicus*) 施密特的术语。纯粹的政治概念。表示其立场与战略首都立场一致的一组外部的国家、社会、种族或宗教实体。它在形式上可以不断变换而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属可移动类别。见“敌人”。

欧亚主义 (*Eurasianism / Евразийство*) 是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概念；为以下概念的结合：历史上人类文明的东方部分、拒绝承认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必要性并在战略上相关或有潜在可能成为国家与民族集团、战略上相关或有潜在可能统一为东方“**制陆权**”国家军事同盟、“**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走向、社会国家、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欧亚大陆 (*Eurasia / Евразия*) 与**大陆**、**心脏地带**、**土地**、**地球**、**制陆权**相同。在更有限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地缘政治上的俄罗斯。

单一世界 (*Single World / Единый Мир*) (英语为 *One World*) 见世界主义。

生活空间 (*Living space / Жизн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豪斯霍弗用语。允许一个民族实现其历史和政治愿望的最小领土范围。

西方 (*West / Запад*) 是**制海权**、**大西洋主义**的代名词。

地球/陆地 (*Earth / Земля*) - 地缘政治中的(或**陆地**)是“地球政治”的特殊术语。而“陆地”理论 (*das Land*) 由卡尔·施密特详细加以发展。

意识形态控制 (*Ideocracy / Идеократия*) 自希腊语, “思想和理想的力量”。俄罗斯欧亚人用语 (N. 特鲁别茨科伊 (Trubetskoy), P. 萨维茨基)。它反对“物质的力量”、“市场体系”、“贸易体系”。在意识形态下, 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对劳动的刺激是从非经济原则出发的。

帝国 (*Empire / Империя*) 是一个超级国家实体, 它在宗教、伦理或意识形态性质的普遍观念的支持下联合了几个民族和国家。

- 446 -

整合 (*Integration / Интеграция*) - 地缘政治的整合意味着多个空间部门的各种形式的统一。整合既可以在军事扩张的基础上进行, 也可以运用和平手段实现一体化。地缘政治一体化有多种方式: 经济、文化、语言、战略、政治、宗教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导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即增加集团的战略规模和空间范围。

殖民地 (*Colony / Колония*) 是被强力控制、被水体隔开的领土。被认为是临时的外部基地, 与大都市的一般地缘政治空间格格不入。与**省份**相反。

历史的终结 (*End of History / Конец Истории*)。福山用语。关于制海权获得全面胜利, 自由民主模式遍布、全球的论文。见**世界主义**, **单一世界**。

大陆 (*Continent / Континент*), 欧亚大陆、土地、制陆权的原则。

大陆主义 (*Continentalism / Континентализм*) 在狭隘的战略方面是**欧亚主义**的同义词。这个概念接近于**土地**, **陆地**的概念。大陆地缘政治学派在俄罗斯是只有唯一的一个, 在德国盛行, 在法国也存在, 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可能存在。与**大西洋主义**相反。

克拉特政治 (*Kratorpolitika / Кратополитика*) 契伦用语。考虑国家的权力潜力, 或国家生活和政府中与宪法、权力有关的部分。它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利维坦 (*Liberalism / Левиафан*) 希伯来语中为鳄鱼。“海怪”(在圣经中)。施密特用语。与**大西洋主义**、**海**等相同。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 Либерализм*) 是一种世界观, 它结合了政治领域的左翼成分 (极简主义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种族和文化平等主义) 和经济领域的右翼成分 (市场、私有化、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大西洋主义阵营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政治表现是自由民主。

经线扩张 (*Meridian expansion / Меридианаль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沿南北轴线扩张) 势力范围

（军事、战略、文化或经济）沿经线扩张，（纬线扩张也是相应定义）；为国家领土和战略稳定的主要条件。

经线整合（*Meridian integration / Меридиа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沿南北轴线**整合**）将各个空间部分沿经线连接成一个整体（即纵向**整合**）。如果有信心控制北部和中部地区，则为正向整合。如果位于地缘政治结构的北部或中心，对**战略首都**的忠诚度值得怀疑或表现薄弱，则为负向整合。

地方发展（*Location development / 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萨维茨基用语。与定性空间或只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空间**相同。

最小地缘政治学（*Minimal geopolitics /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是一门应用学科，它借鉴了真正的地缘政治学的一些术语和方法，但撇开了基本的地缘政治二元论。

- 447 -

世界岛（*World Island / Мировой Остров*）麦金德用语。麦金德称它们为**欧亚大陆**和历史的地理枢纽。在斯皮克曼的文章中，这个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含义，并开始表示整个**制海权**区域（**外新月区**）。由于存在这种差异，最好不要广泛使用该术语以避免歧义。

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 /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现阶段的多极世界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假设几个**大空间**并存。只有在克服了**单极世界**之后才有可能。

世界主义（*Mondialism / Мондиализм*）。来自法语“世界”（monde）。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涉及将所有国家和人民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结构，建立世界政府，破坏种族、宗教、民族、民族和文化界限。有“右倾”的世界主义和“左倾”世界主义。右倾世界主义代表**大西洋主义**的全球化。左倾世界主义认为有必要将**欧亚大陆**扇区也纳入“单一国家”（以某一国家为基础）。

海（*Sea / Море*）与**制海权**、**水**相同。

莫斯科（*Moscow / Москва*）是**欧亚大陆**的天然战略首都。任何大陆整合的轴心的基础。见**欧亚大陆**。

新大西洋主义（*Neo-Atlanticism / Неоатлантизм*）是现代版的大西洋主义，它拒绝世界主义（甚至是右翼），并认为世界主义在给定条件下为时过早和不切实际。新大西洋主义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单一世界**。

新秩序（*New order / Новый порядок*）是大规模地缘政治重组计划。

新的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Нов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与世界主义和创建世界政府的计划相同。

法则习俗 (*Nomos / Номос*) 是 卡尔·施密特的术语。组织任何空间 (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的基本原则。与“秩序”、“法律”、“生活方式”的概念同义。 陆地法则 (*Nomos of land*) = **制陆权**。 海洋法则 (*Nomos of Water (or Sea)*) = **制海权**。

社会 (*Society /Общество*) 是公共结构瓦解的结果。与社区不同, 它从根本上可分为最小成员 (个人)。

社区 (*Community / Община*) 是通过有机联系联系起来的人的自然存在形式。它反对一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个人之间的正式合同的规范占主导地位, 而不是有机联系。社会受传统支配。

火 (*Fire / Огонь*) 是象征纯粹精神的要素。卓越的原则。

单极世界 (*Unipolar world /Одн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是苏联冷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地缘政治模式。唯一主导极点是大西洋主义和美国。

轴心 (*Axis / Ось*) 是两个或多个地缘政治首都的地缘政治联盟。

- 448 -

游击队 (*Partisan /Партизан*) 施密特用语, 是在相反的地缘政治力量胜利的情况下, 陆地法则捍卫者的象征性人物。

热情 (*Passionarity /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 古米列夫用语。种族的内在能量, 文化、政治和地缘政治创造的驱动力。

外围 (*Periphery /Периферия*), 空间和陆地的外围, 没有独立的地缘政治倾向, 远离**战略首都**, 而主要的地缘政治决策是代表战略首都做出的。

政治地理学 (*Political geography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是拉策尔的术语, 表示在契伦之后被称为“地缘政治学”的学说。

可能性论 (*Possibilism /Поссибилизм*)。来自法语“可能” (possible)。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术语。旨在细微区分地缘决定论, 区分地缘政治的部分特征。可能性论声称, 空间并不预先决定历史, 而只是倾向于历史的某种潮流。

应用地缘政治 (*Applied geopolitics / Прикладн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Yves Lacoste 的术语。运用与区域层面的微观问题相关的地缘政治工具, 而不考虑基本原则。也称为**最小地缘政治**。

省份 (*Provinces / Провинция*) 属于基本地缘政治实体的边缘领土, 被视为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殖民地**的反面。

空间 (*Space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是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它不是一个定量的范畴, 而是一个定性的范畴。空间的结构预先决定了历史的结构 (首先是政治史), 这是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主要论点。

空间进展法则 (*The law of spatial progression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ессии закон*) 由让·蒂利亚 (*Jean Thiriart*) 明确表达。大致如: “从城邦, 到领土国家, 再到大陆国家”。政治历史的地理动态不可避免地导致扩大最小社会形态规模。另见“**生活空间**”。

空间含义 (*Spatial meaning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й смысл*) 拉策尔 (*Ratzel*) 的术语, 嵌入于定性空间的历史宿命系统。见**空间**。

区域主义 (*Regionalism / Регионализм*) 是对**周边空间**自主性的一种取向。它具有经济、文化、政治和战略等多种形式。

神圣地理学 (*Sacred geography / Сакр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是古代关于定性空间的一套观念。现代地缘政治的指导思想是理解空间类型的相似性, 并仅以理性的自然科学形式来表达这一点。

警戒线 (*Sanitary cordon / Санитарный кордон*) 是人为的地缘政治结构, 其作用是破坏两个相邻大国的稳定, 这些国家可能形成一个重要的集团, 这反过来又对第三方构成危险。大西洋主义者反对欧亚大陆一体化的战略中的经典举措。

- 449 -

北方 (*North / Север*) 在神圣地理 (并在西奥多·杜布勒 (*Theodor Daeubler*) 的作品) 中, 是精神和理想秩序的象征。在现代地缘政治中, 它是富裕北方概念的同义词, 它与诸如大西洋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类的概念完全相反。

社会政治 (*Sociopolitics / Социополитика*) 契伦的术语。研究国家的社会方面。

陆中洋、米德兰洋 (*Midland Ocean / Срединный океан*) 是斯派克曼的术语。指大西洋, 如果我们将北美和欧洲视为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空间。

中欧 (*Central Europe / Средняя Европа*) 是俄罗斯和欧洲大西洋沿岸之间的空间中间地带。传统上被视为主要受德国影响的地区。

文明冲突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亨廷顿的术语。地缘政治冲

突在文明层面的持久性和不可消除性的理论。

战略首都 (*A strategic capital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толица*) (**地缘政治极点或地缘政治射线源**)是地缘政治整合的中心,是大规模地缘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战略首都之间的联系形成地缘政治轴心。

陆地 (*Land / Суша*) 见地球。

制陆权 (*Tellurocracy / Теллуократия*) 希腊语,“通过地球的权力”或“陆地权力”。具有明确陆地地缘政治方向的大国特征。参见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意识形态。

制海权 (*Thalassocracy / Талассократия*) - 希腊语,“通过海洋的权力”或“海洋权力”。具有航海优势的国家和民族的特征。

东京 (*Tokyo / Токио*) 是太平洋的天然战略首都。

贸易制度 (*Trading system / Торговый строй*) 是一种社会类型,其中劳动的等级制度和刺激来自经济原则。市场、自由民主制度。与意识形态控制相反。

第三世界 (*The third world / Третий мир*) 是欠发达国家的总称,主要属于地缘政治的南方地区。

图兰 (*Turan / Туран*) 是欧亚大陆的东北部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大草原

纬度整合 (*Latitudinal integration / Широт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沿纬度平行线整合) 在连接由中心控制的地缘政治空间方面,是最脆弱和最困难的时刻。应以最和平、最外交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基础是,通过最忠实部门的空间层次结构,使异质区域逐渐依附于中央部分。

纬度扩张 (*Latitudinal expansion / Широт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沿纬度平行线扩张) 是一种侵略性的地缘政治趋势,总是会引发冲突局势,是一种进攻性地缘政治战略。几乎总是充满军事冲突。只有在经络扩张完成后才进行。

- 450 -

生态政治 (*Ecopolitics / Экополитика*) 凯莱纳的术语。将国家视为一种经济力量。没有广泛使用。

太空制权 (*Etherocracy / Эфирократия*) 希腊文。“穿越高于大气层的权力”,太空武器的霸主地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发展趋势。

南方 (*South / Юг*) -- 神圣地理中的南方是一片混乱、混乱和堕落的区域。在现代地缘政

治中，第三世界，自由民主原则尚未确立的欠发达国家。

心脏地带 (*heartland*) -- “核心地球”；参见历史地理轴。麦金德的术语。

腹地 (*Hinterland*) 德语 “背景”。从海岸线向内陆延伸的领土。空间分析的一个术语特征。

《**欧洲共同法**》(*Jus Publicum Europeum*) 拉丁语。规范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性法律法规。

《**一般欧亚法**》(*Jus Publicum Euroasiaticum*) 拉丁语。一项国际法草案，可以在承认大陆地区价值观的优先性的基础上规范欧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莱纳兰 (*Lenaland*) -- “毗邻勒拿河流域的土地”。麦金德术语。指叶尼塞河以东至太平洋沿岸的所有北欧亚领土。麦金德在后来的工作中特别关注这一地区，认为这些土地不属于**制陆权**区域，而是属于**制海权**区域。

联系 (*Linkage*) 是基辛格的术语。大西洋主义 (*Atlanticist*) 战略将欧亚大陆的**非连续地带** (*discontinuous belts*) 连接成由西方控制的连续领土。

中欧 (*Mitteleuropa*) 德语。与中欧相同。

一个世界 (*One World*) 是一个世界的世界主义概念。另见历史的终结。

美式和平 (*Pax Americana* 拉丁语) 与大西洋主义相同。

欧亚和平 (*Pax Euroasiatica* 拉丁语) 与欧亚主义相同。

波斯世界 (*Pax Persica* 拉丁语) 在伊朗与俄罗斯结盟的主持下中亚空间地缘政治重组项目。

边缘地带 (*Rimland*) 麦金德术语。英语为“*coastal region*”，沿海地区；见“内新月”。